

黃欣周編
沈雲龍校

常燕生先生遺集

政論與時評下

常燕生先生七旬誕辰紀念委員會印行

政論與時評
(下)

今天的世界上有中立的可能嗎？

前兩天，我們在報上看到我們新聞界一位名人在某處對一部分羣衆發表談話，他希望不幸第三次世界大戰有一天發作，中國最好是不左不右，在美蘇之間守中立，他說，未來的戰爭只是兩強用高爾夫球式的原子彈相互投擲，如果中國守中立，則只要坐在那裏看他們的熱鬧便夠了，可以避免一場災禍。

不知道這位同業真說過這一番話沒有？如果是有的，我們除了敬佩這位說話的人真是一位軟心腸的大好老以外，還不能不驚訝一般中國社會上的代表人物的常識竟是如此其缺乏！我們說中國社會上的代表人物，正因為懷抱上列同樣意見的人在今天的中國還不止一二人，甚至在負着實際責任的人之中也有懷抱此種意見的人，對於這一類見解我們無以名之，名之曰「中立夢」。

不必說到今天航空萬能的世界，一個國家在大浪來到時要想中立是萬萬不可能

今天的世界上有中立的可能嗎？

的，就在過去幾十年中，中國又何嘗真正中立過，在一九〇四——〇五的日俄戰爭中，中國是一個局外中立的國家，但是戰場却是在中國的東三省，爭奪的目標是中國的領土：旅順、瀋陽、遼陽等，受犧牲最大的是中國的人民，戰爭的結果是平分中國的東北領土。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最初是守中立的，但就在中立的狀態之下，日本在我們的領土山東半島登陸，侵犯了中國的中立而無可奈何。中國在日德戰爭中守中立，但日本在攻下青島之後，對我提出二十一條件，以後山東問題成了中日兩國間一個爭執最烈的問題。這兩次歷史的教訓難道還不能驚醒一部分中國名流的中立夢嗎？

不但中國過去的事實如此，就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之中，有許多弱小國家如荷蘭、比利時、挪威、丹麥之流，起初還不是都想在中立中討巧，躲過了這一場災禍，但是結果如何？比利時在第一次歐戰前是一個永久中立的國家，有歐洲各大強國替她做擔保，她的地位比我們中國安全得多，但是戰爭一發生，領土就被侵佔了。如果不是比人在永久中立之下不忽略她的國防，列日砲臺的堅守阻滯了德軍的攻

勢，則巴黎早已攻下，戰爭勝負早決，比利時這個小國早已在地圖上消滅了。主張在第三次大戰中中國可以保持中立的人，何不看看第一次大戰前的永久中立國家比利時！

在世界大浪來時，不但弱小國家不能守中立，就是強大國家又何嘗能避免捲入漩渦？蘇聯在第二次大戰開始之時，靠了蘇德協定的保障，以為可以取得中立的地位了，但是結果仍不能免於德軍的進攻。美國在兩次大戰中，都有許多做中立夢的孤立主義者，以為讓舊世界的人去自相殘殺，新大陸可以關起門來，隔山看火，但是結果兩次都不能不捲入漩渦，結果吃虧已經不小了。強國尚不能保持中立，何況無力自衛如中國者！小國尚不能免於被侵犯，何況地廣物博引人垂涎如中國者！

我們當然很盼望中國能夠在次一屆大戰中中立，可以隔山看火，無奈絕不可能。在過去一次戰爭裏，硫磺島和婆羅洲的土人都無法守中立，在未來一次戰爭中，不但北冰洋的愛斯基摩人將無法拒絕捲入漩渦，恐怕連南極的企鵝也不能安然睡覺了。不可能的事而自欺欺人，白日做夢，理論的錯誤小，貽誤國事的責任却大。

今天的世界上還有中立的可能嗎？

如果全體的中國人，都相信在第三次大戰之中，中國可以徼倖中立，內則懈怠了國防的準備，外則放棄了聯絡與國的工作，一旦戰爭爆發，中國將有四顧茫茫之感，前途危險是不堪設想的。

我們敬佩這些做中立夢的好人的好心腸，然而希望他們以後說話的時候要負責任考慮考慮，在這個年頭兒，拿和平、中立等好聽的字樣去博取無識者的同情是很容易的，但是國家的命運也許就斷送在這幾個好聽的名辭上面！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廿八日中華時報社論

恢復國民的自信力

勝利的歡聲跟着來的是內亂的悲慘，國民道德和經濟的破產，中國人民在這種低氣壓的氛圍之下，開始感到了現實的幻滅，充滿了悲觀失望的心理。因為對於一切悲觀失望，對於一切人物都不相信，對於一切作爲設施都抱着懷疑觀望的態度，於是得過且過和只圖自私自利快意一時的風氣便成爲普遍的潮流了。我們以爲今天中國輿論界的報國之道，乃是努力打破這種悲觀失望的空氣，從事實上重新喚起中國國民自尊自信，樂觀奮進的心理。如果這一點做到了，中國的報人就算對得起國家。

因此，我們首先要要求中國輿論界要努力擯棄低級趣味的黃色新聞和小品文字的作風。今天號稱領導中國輿論的上海出版界，充滿了的是低級趣味的海派文學，和黃色新聞，這在輿論出版界實在是一種恥辱，一種墮落。我們不是說新聞不應趣味

化，也不是說社會的醜惡不應該暴露，但新聞記述的趣味化自有其道，並不一定非低級化不可；社會的醜惡固應該暴露，但記載的時候應該抱定哀矜勿喜的態度，不應該反而添枝加葉，使紙面上的醜惡更倍於真實的事實，況且中國社會固然多的是醜惡的方面，但也並非絕無光明的方面。有多少奉公守法的公務員在盡忠職守，涇涇終日；有多少忠勇奮發的將士在前仆後繼，誓死不屈；有多少清貧自甘的教育家，在安貧樂道，作育人才；有多少埋頭學問的學者，在研精鑽幾，務求創獲；有多少出死入生的工程技術人才，在築堤修路，努力於國家的建設；有多少實事求是的事業家，在高掌遠躡，經營慘淡。活的不必說，單講中國近五十年來已死的成功人物，政治家如張之洞、譚嗣同、孫中山、黃克強、蔡松坡，軍人如劉永福、左寶貴、馬玉琨、鄧世昌、聶士成、張自忠、梁忠甲，工程師如詹天佑、李儀祉，教育家如武訓、葉澄衷、嚴修、胡元倓，學者如梁任公、王國維、章太炎，事業家如張季直、范旭東，以及一些奉公守法，盡忠職守的無名人物，那一個不是中國的清華元氣。即如清末大家痛罵的盛宣懷、趙爾豐輩，今日尋其治事的條理，遺留的成

績，也覺着其才其功自不可沒，當時毀譽，殊未足爲憑。死者固然如此之多，難道活的人物的事業之中，就沒有值得世人欽仰敬佩的嗎？別的不用說，單講在今天東北華北，就有許多盡忠職守的員工在冒着生命危險去搶修鐵路，搶築河堤，與共黨的破壞工作作競賽，難道還不是值得表彰的嗎？爲什麼新聞記者的筆下就祇看到了醜惡的一方面呢？

中國今天固然有許多不滿人意的現象，但有一部分如物價的高漲，財政經濟的困難，是戰後各國所共同的，並非中國所獨有。另一部分如貪官污吏之多，公務效率之弛緩，固應引以爲恥，但我們如把百年前的英美史治史翻開來看，則可知英美的政治也曾經過這個階段，他們的改革也是經過多年多人的努力才慢慢得到的。試把迭更司的「塊肉餘生述」、「賊史」等類小說翻來看看，就可以知道英國在百年前的社會腐敗情形也並不下於今日的中國；巴黎在百餘年前還是一個臭爛的都市，與晴天香爐、雨天醬缸的北平相彷彿；紐約在百年前還受着耗子的威脅，和今日重慶人之受耗子威脅也相差無幾。中國人只要努力，何患落後？

因此我們對中國輿論界同人的提議，是多獎人善，多紀人功，多表彰光明的方面，以恢復中國國民的自信力。互相詆毀，使中國無一完人，是國民集團自殺的蠢舉動。

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七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成功不必自我

在這次大抗戰中，各方人士，特別是有黨派立場的人，所表現出來的一致缺點是政治的認識不足。所謂認識不足者，就是大家雖然口口聲聲說是長期抗戰，然而對於長期抗戰的意義始終沒有明瞭。大家心目中所夢想的還是在短期中就可以獲得決定的勝利，因此人人想爭做民族英雄，個個想爭抗戰領導權，敵勢猖獗已到如此，而內部摩擦仍未能盡免，未始不是由於這個原因。

我們應該曉得一個民族的獨立自由決不是輕容易就可以獲得的，要享受自由的幸福，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目前我們的敵人是歷史上最凶暴無比的敵人，我們所碰到的時機也是歷史上最困難無比的時機，前途尚須百千萬次努力的掙扎，尚須小心翼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地戒慎恐懼，尚須億萬衆一德一心，共赴國難，一切虛懦的習氣必須掃除淨盡，然後勝利才有可望。在目前就想做民族英雄，想爭領導

權，想拿一黨一派的力量包辦勝利，未免都想得太早了。

一切真誠愛國的人，此時都應該把批評別人、攻擊別人的精神轉回頭來糾正自己，批評自己；放棄一切在抗戰中求生長以及一人、一黨、一主義就可以包辦勝利的幻想；在朝者，開誠布公，泯除猜忌；在野者，誠意合作，不懷私念，大家只要工作權，不要領導權，只求於國事有濟，成功不必自我。民國二十七年以來，猜忌，暴戾，傾險之習氣，深中於人心，有些黨派更專以傾險變詐訓練黨徒，以致不能與他黨他派合作，即自身也分門別戶，互相傾擠，流弊所及，非演成蘇俄布爾什維克黨內部互相屠殺，以及德國國社黨屢次流血清黨的慘劇不止。中國到了今日的慘酷地位，二十多年來在政治舞臺上活動的政客應負大部分責任，而十餘年來有些黨派的錯誤訓練方針，更應負大部分責任。到了今日還不改弦易轍，以後給我們的機會恐怕更少了。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日成都國論周刊第七期

赫爾在汎美大會之表示

昨日報載美國務卿赫爾在汎美洲大會發表演說，略謂：

『美洲各共和國在軍事政治方面均應聯合一致，以資抵禦侵略國之野心，同時防阻外國傳來之危險思想，深入西半球各國。每一國家，均應決定對於共同之利益，應作何種貢獻，及應負何種責任。至於侵略方面，應知美洲現有海陸軍之力量足可抵禦任何一國之攻擊。現歐洲有若干國家，完全不遵民主主義之原則，殊屬非是，彼等之狂妄舉動，已對西半球投暗影，故美洲各國均應一致努力，以達保障人權及維持自由政府之目的，但欲謀達此目的，必須與反動之努力相抗衡。每一國家皆願與其他國家相安無事，美洲各國亦屬如此。但若有某侵略國家，或某數侵略國家，欲以武力侵入西半球各國者，則美洲各國均有誓死周旋之決心。至於主義化之侵略，若散佈危害美洲各國現在政府之理論，亦在絕對禁止之列。美洲各國均無採

取此種理論之餘地，凡有欲向拉丁美洲各國作此項宣傳者，絕難容忍。此輩反民主主義國家活動之結果，已令世界僅有兩途可循，一途爲自由、安定、進步、文明，另一途則爲征服、無政府、退化及野蠻。美洲各國亦受同樣之威脅，故美洲之責任，在維持現有之政體及信念。此次大會之責任，在建立永久和平之基礎，希望各國能推誠合作，充實國際公法之力量。國際法已被若干國家破壞無餘，美洲各國之責任，在重新建設國際法之基礎，此外國際間之經濟關係，亦應予以調整，因此爲重建世界和平最有效之辦法也云云。」

日前曾傳美國政府對於門羅主義當有新的解釋，此段演說殆卽爲門羅主義新解釋之一種。其內容堪注意者：（一）重申美洲各共和國對於軍事政治均應聯合一致，以抵禦侵略國之野心；（二）對野心國家明白表示美洲之軍事力量足以自衛，遇必要時不惜以死力周旋；其尤可注意者爲（三）確定以保障人權，維持民主自由政府爲美洲各國聯合之共同目的，卽聯合之基礎已由共同利害而進入於共同理想，且明白宣布對於反民主自由之思想理論亦必加以絕對禁止；（四）公開承認世界上

現有兩種道路，一爲自由、安定、進步、文明，其他則爲征服、無政府、退化、野蠻，即採用對立陣線的觀點以解釋國際形勢。其前二點爲舊門羅主義所固有者，其後二點則爲對於門羅主義追加之新解釋。當此國際形勢嚴重時代，西半球唯一大國之負責當局有此嚴重之表示，誠堪爲吾人注意也。

吾人嘗謂今日國際大勢已由小國時代進入於大國時代，十九世紀以迄歐戰，弱小國家尙容許生存，略似吾國之春秋時代，今則非大國強國不足以自存，兼併之禍日烈一日，陳啓天先生所謂今日世界爲一新戰國時代（見國論月刊），事實上已給予此說以有力之證明。今日世界各國，無論強弱，均必須由自衛自足之小國主義，進入於發展聯合之大國主義，始能避免失敗。惟各國之國民性及環境情形不同，故其所採以發展之途徑亦異。德國之謀團結大日耳曼民族，義大利之謀併吞地中海沿岸，乃用侵略手段以達其目的者；美國之聯合汎美國家，則用和平聯合之手段以達此目的，其手段雖不同，而造成廣大團結，發展國家生命則一。惟侵略者悖乎人情，收效雖速而基礎不穩，終不如和平聯合之能獲得真正同情耳。

昔春秋之始，鄭、楚、狄、晉等國，紛紛侵略小國，兼併之勢已啓，幸賴大政

治家管仲起而救霸主制度，扶弱抑強，救鄰恤災，始得遏吞噬之風，維持二百餘年之均勢。至戰國而霸業衰頹，兼併始復起。今日列強政治家中缺乏管仲之天才，不能仗義執言，扶助弱小，致野心國家，得寸進尺。堂堂大英帝國，其政治家僅以彌縫苟且爲務，殆與春秋末年晉國執政趙武、范鞅輩無異，識者於以覘英霸之衰。惟北美合衆國幸在雄才大略之羅斯福總統之下，毅然以保障全美和平，抵禦野心侵略爲職志，猶不失霸主氣象。惟今日世界和平爲連鎖的，斷無東半球戰禍瀰漫而西方得以苟免之理。昔戰國末年，齊人以僻處東海獨不受秦禍，遂宴然不設防禦，卒之三晉、楚、燕相繼覆滅，西齊亦折入於秦。美國今日形勢，頗類田齊，吾人深望美國之政府人民，澈底打破孤立主義之幻想，不但美國不能離開美洲，卽美洲亦不能離開世界。必須有不辭領導全世界弱小國家摧毀侵略壁壘之勇氣與決心，始能恢復世界之和平與均勢。吾人觀於羅斯福總統及赫爾國務卿之言論主張，深信其必有此認識與準備也。

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此時還有徘徊瞻顧的餘地嗎？

隨着廣州、武漢的相繼失陷，一部分素來悲觀動搖的分子又皇皇然起來了。

對於持這種論調的人，我們只指出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給他們去反省。日本的大陸政策是四十年來一貫的既定政策，滅亡整個中國乃是大陸政策的第一個階段，今天的戰爭，不是一個誰勝誰敗的問題，乃是中國願意變為朝鮮、琉球第二與否的問題，妄想拿犧牲一部分權利來換取西南西北各省安全的人，似乎忘記了這個最基本的事實。

假如妥協能夠換得一部分未淪陷區域的苟安，也許還有討論之餘地，然而這個安是苟不下去的。他們忘記了塘沽協定的教訓，塘沽協定後繼之以冀察政委會，總算對敵人盡恭順之能事了，然而不久仍有蘆溝橋事變發生。今日而言妥協，不過再來一套放大的塘沽協定，放大的冀察政委會，試問昔日敵人對於華北局部尚不容冀

此時還有徘徊瞻顧的餘地嗎？

察政委會式的政權存在，今日能容許一個放大的翼察政委會永久存在西南各省嗎？稍微研究過歷史的人，都曉得北宋之末，南宋之初，金人即屢次以議和誘宋，結果片時的和平接着就來一次更大的侵犯，若不是黃天蕩和順昌兩次大捷，就是秦檜式的政權也不會被容許存在的。必須能戰而後能和，在今日的狀況之下，只有投降與否的問題，根本沒有和戰的問題。

也許動搖的人要問在今日情勢之下，如何繼續戰法？對於這種問題我們不必替他們舉出長期抗戰的種種戰略上的勝算，因為這些話他們都認為是幻想。我們只要反問他們：不戰又有什麼辦法？假如敵人在片時的和平之下，懈怠了我們的士氣，肅清了後方的全民武裝勢力之後，誰能擔保他不再向西南西北進攻？那時候又該怎樣？

我們應該明白，今天日本不是僅僅反對某一個人，某一個黨的政權，今天日本是要整個吞併全中國，況且這種企圖，也不始於今日，在北洋系袁世凱政權之下，日本已經有二十一條第五號的要求提出了。今天就是讓王克敏和梁鴻志來統治中

國，日本依然不能滿意。我們還應該注意，秩父宮殿下已經在華南戰事中登場了，日本對於未來統治中國作何整個的打算，也就可想而知了。

今天若抗戰到底，無論勝負大家還是一條心，一旦國策改變，對外未必能安，對內先分裂爲兩條陣線：一切革命的、勇敢的分子站在一面，而苟安的、妥協的分子又站在一面，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

我們必須有與敵人同歸於盡的勇氣，然後才能希望敵人知難而退。對於敵人力量的估計過小，固然是誇大狂；對於敵人力量的估計過大，也容易陷入錯誤的打算。

我相信今日中國，一切妥協的主張不會成爲有力的運動；如果有，我們誠懇地希望他們覺悟：苟安不是長久的辦法，投降不足以救了中國，一切誠意爲國的分子，應該一致努力安定人心，團結意志，打銷動搖的理論，繼續發動全民抗戰，將暴敵拖下深坑裏去。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廿八日成都新中國日報

此時還有徘徊瞻顧的餘地嗎？

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說，惟有請政 府立即正式宣佈既定國策不變

今天沒有和與戰的問題，只有投降與不投降的問題；沒有犧牲某一部分領土以保全其他領土的問題，只有整個中國存亡的問題；沒有打倒某人某一黨而扶起他人他黨的問題，只有整個中國民族是否願作日本奴隸的問題。安坐在後方的人，也許沒有嘗過倭寇的厲害，以爲倭寇的貪慾終有止境，如果許他們一點利益，也許可以換得剩餘區域的片時的苟安，不知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倭寇的野心在田中奏章內早已表現得明明白白，她不止要拿整個的中國，連印度、安南、暹羅、馬來半島和西伯利亞、中亞細亞都在她的大陸帝國計劃之內，今天還妄想靠妥協來保持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安全的人，非愚則妄！

我們應該記得日本不但不要「蔣政權」，也不要「袁政權」；不但不要抗日各

黨派所聯合支持下的國民政府，也不要參有漢奸分子的翼察政委會式的政府；但不許中國有一個統一的中心勢力存在，也不許中國有真正的地方割據勢力存在；但不許忠誠愛國分子過問國事，也不許親日聯日的分子真正掌握政權。滿洲偽國的忠臣鄭孝胥總算是對日本極端親善的了，然而尚不容於倭寇，被擯下臺，含憤以死。今天主張對日讓步的人，自問對日的誠意誰能超過於鄭孝胥？鄭孝胥尚不能容其執政，何況不如鄭孝胥者。

今天中國多抗戰一天，日本就得多一天用她準備以開發佔領區域的財力，用她準備以肅清佔領區域的兵力，來繼續維持對我作戰，換言之，就是不能完成她的真正佔領，統治，和利用。反之，如果我們此刻對日妥協，就是給予日本以肅清後方的機會，後方肅清之後，再來編練中國壯丁，利用中國資源，以中國來打中國。那時我後方省分之所謂安全依然是夢想，而我軍民上下的士氣，經過一番妥協讓步之後，必然銷沈頹廢，再無法鼓起抗戰的勇氣，勝負存亡之數，不問可知。九一八事變以後，就因為我國不即刻作戰，以致日寇得從容肅清東北的義勇軍，安定後方，

到今日才能運用一部分東北同胞來對自己國人作戰，這個教訓，豈可忘記？

今日正是國家生死存亡的大關頭，政府和國民的意志如何，決定了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今後的命運。我們應該知道，今日中國若亡，很難再有翻身之日，因為日寇不是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洲之流，單就運用嗎啡白丸一項政策的毒辣手腕而言，也可以使四萬萬民族斷子絕孫，永歸消滅。而妥協讓步，就是亡國滅種的一個重要步驟。

今天只要繼續抗戰下去，我們在敵人後方還有百萬以上的游擊勢力，永遠不會消滅。一旦和平妥協之後，這些人至少有一半要因灰心喪氣而退出了游擊的工作，這是自殺的政策。

事實上不但中國的民意決不許主和的空氣抬頭，就是日本今日在坂垣等極端派勢力掌握之下，又在佔領了廣州、武漢之後，正夢想着一舉而完成滅亡整個中國的大野心，也決無對我妥協讓步之可能。我們賢明的最高領袖及政府，也已有非正式的繼續抗戰的表示，不過流言還是不免，因此爲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說以一國是

起見，我們以爲應該迅速發動全國輿論，請政府立即正式宣佈既定國策不變，非到日軍完全退出佔領區域，恢復九一八以前的狀態，決不言和。

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中國日報

按此文發表於武漢、廣州失守以後，汪精衛出走之前，當時周佛海尙任國民黨中宣部長，正在製造求和之輿論，見此文後，大爲驚詫，曾自重慶以長途電話向報館詢問作者姓名，經報紙負責人嚴拒始已。

三六、三、五作者追記於上海

抗戰與民主

這一次參政會中最重要最有意義的提案，莫過於周參政員覽等五十一人所提的『請確立民主法治制度，以奠定建國基礎』一案，原文已經中央社發表，閱者想都已看過，無待複述。

有些人以為抗戰時期，談不到民主，因為抗戰時期即是軍政時期，軍政時期應該是『軍事第一，國防第一，』軍事以服從為主，以號令貫徹，整齊劃一為主，因此根本與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在抗戰期間來談民主，未免為時過早。

這種話實似是而非，這樣的說法，不但不懂民主，而且也不懂軍事，更不懂民族革命戰爭性質下的軍事。

我們知道軍事決不是單講服從，單講整齊劃一，一味服從被動的軍事是舊時封建專制時代殘餘下的舊制度，這種制度把兵士當作機械，當作一味被動毫無自主志

願的奴隸，只要趕上戰場就算完事，結果戰爭並非出於士兵的自願，當然更與全國人民無干，這樣的軍隊，一與有民主精神的軍隊相遇，就非失敗不可。這種整齊劃一的舊式的軍隊組織，至普魯士腓特烈克大王而登峯造極。腓特烈克當時所遇的敵人是比他更專制、更守舊的軍隊，因此能夠屢戰屢勝，但到他死後不過二十年，他的軍隊就大敗於法國革命後民主化的軍隊之手，直到後來普魯士在沙恩好斯特指導之下，改組了舊式的制度，採取國民兵役制度，將軍事和政治一齊民主化，才又有一八一三年利比瑟的勝利。

從此以後，歐洲大陸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軍事組織，一種是普魯士化的服從性的軍隊，另一種是法國大革命化的民主性軍隊，前者一味講究服從紀律，講究外表，後者則注重民主自由，注重內心自動的志願。事實上每一次戰爭證明了服裝整齊，機械規律的專制軍隊戰不過凌亂囂雜、自由自動的民主軍隊，一七九二年普奧聯軍之敗於法國革命軍，一八一三年拿破崙的大軍之敗於普魯士民兵，一九一八年德軍之敗於英法美等民主軍隊，乃至荷蘭獨立軍之戰勝西班牙，美國獨立軍之戰勝

英軍，都是歷史上有力的證明。

我國這次的抗戰，根據蔣委員長的解釋，無疑地是一種民族革命解放的戰爭，講器械，講服裝，講專門的訓練，我軍都不如敵人，我們所靠以爭取勝利的就是全國軍民自動憤發的作戰精神，而這種精神就是最後勝利的淵源，只有在廣大的民衆都自動起來爭取勝利的條件之下，才有最後決勝的可能。爲着這個，我們必須拋棄一切普魯士化的舊軍事觀念，採取更進步、更改革的觀點，允許全國民衆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信仰上的充分民主權利，使人民和由人民產生的軍隊都知道國家是全民的國家，作戰是爲保護全民福利而作戰，不是爲保護某一部分少數特殊人物的地位、利益而作戰，這樣才能貫徹了民族革命解放戰爭的目的，達到了蔣委員長所指示的方針。

前幾天報上曾披露菲律賓先鋒報對於中日戰爭的批評，有兩句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兩句就是說：「在近代戰爭之中，軍事國家、封建國家自不如自由開明的國家能支持長期戰爭。」日本是一個「軍事封建」的國家，是無疑的了，我們果然

已經完全做到了「自由開明」的地步了嗎？如果還待努力，就應該趕快向這個目標去努力，這不但不妨礙及抗戰，並且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要素。

民國二十八年（月日未詳）新中國日報

建國與法治

建國之道，經緯多端，而其要在於建設法治的國家以代替人治的國家。

近數年來，國家在最高領袖指導之下，統一已漸著規模，建設也突飛猛進，這誠然是可樂觀的現象。但是這種樂觀是有限度的，因為這些成績完全是靠著最高領袖的苦幹精神，和其左右一部分專門人才的努力所造成的。人爲的成分勝過了制度的成分，因此如果一旦主持的人稍有疏忽，或人事稍有變易，則一切辛苦的建設均將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虞。

近代國家所以和舊式國家不同之點，就在以法治代替了人治，一切政治的基礎都建設在制度上，無論主持者是什麼人，都得就法治的範圍，不但不許他越法作惡，也不許他越法作善，這樣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譬如就懲治貪污說，與其設許多監察諜探的人員，今天舉發一個案子，明天懲

辦一個官吏，不如實行會計獨立制度，使經手官吏無從染指，貪污不禁自禁。

又如就杜絕倖進說，與其三令五申，告誡大官援引故舊，不如實行考試及銓敘制度，使官吏進身必須出自考試，按格升轉，則夤緣奔競之風，自然可以杜絕。

從前韓復榘在山東，自己要親自訪察官吏的賢不肖，要訪問民間的疾苦，要審判民間的案件，用心未始不善，但是弄得詐僞百出，政治仍然不能清明，這就是所謂勞而不知爲政。

中國各項事業中以郵政辦理最爲完善，並不是郵務人員特別要比其他公務員清慎勤敏，祇是由於當初郵政在外界指導之下，建立了法治的規模，所以雖然人事屢經變更，依然不曾腐化，這個原故大可以供人深長思一下。

大凡在上位的人，總不願意受法律制度的束縛，總希望多有點自由活動的餘地，這種動機是可以原諒的，但是結果靠一個人的力量去訪察弊政，懲治貪污，不過使作僞之風更精密了一些，於事仍然無補。從前有個大官，獎勵儉德，見了奢侈的屬員就要罵，結果大家當他的面做出寒酸的樣子，背後依舊大嫖大賭大吃大喝，

這種人治政策不過獎勵人民作僞罷了。

商子說得好：

『世之爲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爲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議，皆不類者也。不以法論智能賢不肖者惟堯，而世不盡爲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修權篇）

尹文子也說：

『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大道下）

韓非子也說：

『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爲聰也。且必不任其

數，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也；耳必不固其勢，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姦劫弑臣篇）

『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難三篇）

慎子也說：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鈎，非以策鈎爲過於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內篇）

昔諸葛亮治蜀，『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三國志本傳）諸葛武侯的這種法治精神是很值得後人做做的。

民國二十八年（月日未詳）第二一一號新中國日報

苦幹與樂幹

抗戰時期應該埋頭苦幹，這話不成問題。

不過所謂「埋頭苦幹」這一句話裏面，應該注重的是一個「幹」字，而不是一個「苦」字。應該解釋為雖苦猶幹，而不應解釋為凡幹必苦，假使苦儘管苦，但是苦而不幹，這苦便不免是白吃苦頭，如果幹也幹了，但是幹而不苦，那豈不更容易提起人的幹勁。

大凡厭苦趨樂乃是人之常情，凡做一件事情，要求效率的增進，與其用鞭策來趕他，不如用糖果來誘他，人能對於所做的事業感覺興趣，感覺其樂陶陶，則不必鞭策自能踴躍奮發，其效率遠倍於一味苦幹者。現代的新教育家如蒙台梭利之流，對於兒童都主張用誘導的方法，來代替禁止的方法；現代的新企業家如福特之流，對於工人也都主張用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娛樂設備的方法，來代替舊式視工人如牛

馬的鞭策方法，結果其成效遠過於一味苦幹的方法之上。教育如此，企業如此，政治也是如此。因爲一切事業都不能遠於人情，遠於人情的作法結果只有驅人作僞。孔子也曾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研究工作心理學的人，都知道人類的心理有緊張的時候，也必須有弛放的時候，假使一味張而不弛，結果必使心理逐漸趨於麻痺，工作效率反而減低。一個人日常的生活不能沒有休息和睡眠時間，休息與睡眠並不是浪費精力，乃是恢復精力的主要辦法，一張一弛，是天道，也是人道。所以孔子說：『藏焉，休焉，息焉，遊焉，』老子也說：『當其無，有車之用。』

人類的心理機構至爲微妙，有時候看起來似乎是天天緊張，其實暗中已埋伏下弛廢的根源；有時候看起來似乎是弛散，其實暗中已儲蓄下工作的精力。一個人如果前半生生活過於刻苦，過於嚴肅，到了暮年控制能力一弛緩，必然反動到荒唐的境地，所以道學家反動起來特別淫蕩，吝嗇者反動起來特別浪費，因爲人類的感情是不能一味壓抑的，壓抑過度，不趨反動，即趨頹廢。善於養生的人，應該使他常

常有藏、休、息、遊的機會，則感情有相當的調節，始不至於橫決。治心之道如此，治國之道亦不外如此。

中國維新四十年來的政治，有一個一貫的錯誤，就是不懂得一張一弛的道理，一味『揠苗助長』，結果反使『苗則槁矣』。對於國民教育一味鼓吹悲觀喪氣的國恥教育，而不知提倡發揚蹈厲的國慶教育，甚至連國慶日都停止慶賀，結果悲觀失敗的空氣充滿國中，使民族自認爲低能落伍者，因而養成中國必亡的信念。對於民衆娛樂也一味取壓抑的政策，甚至連廟宇都要搗毀，戲劇都要禁止，結果人人無樂生之心，也就連帶地無積極奮發之氣。這都是過去一般維新志士的短視自殺政策所致。

今天要抗戰，必須使全國軍民勇於赴義，有樂鬪之心，無苟安之念；必須使人視戰場如樂土，視國家如天堂。欲求其如此，就必須改變一向的禁止娛樂的政策，轉而積極獎勵各種娛樂，獎勵人人對於生活的享樂態度，使全國充滿生氣，然後國家始有生機。

誠然，在前方將士浴血苦戰之際，在一般民衆求生不得之際，後方少數公務人員一味花天酒地，驕奢淫佚，實在是應該加以糾正。但是這種風氣決不是用消極的禁止政策所能改變的，並且有些無關大體的娛樂，實在也用不着去禁止。與其禁止公務員跳舞，不如提倡集團跳舞來代替個人的跳舞，與其禁止婦女燙髮，不如徵收高額的燙髮捐以補助戰費，與其限定筵席的費用使閹人趨於作偽，以小賬的名義來代替正費，不如寓禁於征，使社會經濟得以流通，擁有厚資者也可以交際而兼救國，至於如果說前方太苦，後方太樂，人民太苦，官僚太樂，那就應該從提高前方將士和下層民衆的生活福利着手。譬如可以徵發屬集後方的娼妓編爲慰勞隊去到前方調節士兵的性問題，可以徵收上層社會的奢侈稅以作普及民衆娛樂設備的基金，徵收一切私人的園林邸舍來作民衆的遊覽場，提倡集團運動的游藝，以發揚民衆的情感。如最近本市建軍宣傳第一日的提燈火炬遊行之類，這都是比較賢明的辦法。

太史公說得好：『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

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能懂得這個道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如果不懂這個道理，那便是韓非子所說的：『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了。

民國二十八年（月日未詳）新中國日報

汪精衛的終身八字

以汪精衛爲領袖的南京羣醜政府已經開鑼唱戲了，我們想，百分之百的中國人對於這幕戲的感想不但是憤慨，而且是有點滑稽之感。

古今中外沒有一個政府是用這樣滑稽的方法所造成的，有之，只有偽滿洲國的溥儀政府。一個政府倘若想真正夠得上成爲一個真正的政府，最低限度需要四個條件：一是土地，二是人民，三是軍隊，四是財政。汪精衛有什麼？土地，——愚園路；人民，——大小漢奸七十七名；軍隊，——丁默村的特務隊；財政，——日本賞賜的四十萬元；其餘便全屬於日本軍隊的了。重要的民意問題還在其外。

即以此次偽中央政治會議及偽政府各部門的人選而論，除了汪自己的嫡系及王克敏、梁鴻志之流的老漢奸之外，其餘多半是些不知名的分子。所謂無黨無派，各黨各派，實際上沒有一個夠得上有幾分分量的。這樣貧薄的政府，也居然叫做政

府，那麼，任何人都可以關起門來自稱皇帝了。

汪賊等候了一年多，才得到了這個結果，他和他的黨羽必然自鳴得意，一般準備做候補漢奸的抗戰失敗論者也難免有點意志動搖，但是我們替汪賊算算八字，却覺得他的終身命運已經注定了，不免替他慄慄然起來。

我們替汪賊算終身八字的結果，是在最近的將來，汪賊必死於日本人之手。

這不是什麼迷信的八字，是根據歷史經驗和人類心理法則所推算得的科學八字。

自古以來，做貳臣有幾個得好結果的，漢高帝斬丁公，光武殺蒼頭子密，錢謙益是在南京恭迎清兵的領袖，但後來他的名字被乾隆打入貳臣傳，連詩文集都毀了版。

人類心理喜忠而惡佞，古今一律，敵寇儘管利用漢奸，他們心裏對於漢奸必然是非常厭惡不堪的，但看近衛與汪會面後所發表的談話，在日本人眼中汪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不難想見。

以汪精衛之爲人，卽無此次事，也難免不得好死。民國初元汪受孫中山先生之命北上迎袁世凱南下就職，到平津以後，受袁派的收買忽然變節，反電勸孫公北上，這是第一次的反覆；以後在武漢與共產黨合作，忽又反共；到廣州與桂系合作，忽又陰謀廣州事變。十年以來，忽擁蔣，忽反蔣；忽親共，忽反共；忽高談抗日，忽公然附日。以一人之身反覆如此，誰還敢和他共事而信託之。從前東晉末年有個劉牢之，一生善於反覆，初反司馬道子，繼反王恭，末後又想反桓玄，結果爲部將所唾棄，部衆離析，終於自縊而死。以手握北府重兵的劉牢之結果尙且如此，何況手無寸鐵的汪精衛？

在汪的本意，或者是想借日本的勢力取得政權，然後再從容培植自己的實力，以便弄假成真，實行做中國的弗朗哥，然而禍根也就種在這裏。世界上沒有這樣如意的算盤，日本人如果眞想把佔領地政權交還中國人，早已和國民政府講和了，何待製造汪精衛。既製造汪精衛，就是不肯放棄統治中國的野心，既不肯放棄野心，就決不能信託汪精衛。汪精衛的反覆矯詐歷史，日人知之甚悉，防之也必甚嚴，汪

賊決不是長久甘受人支配的人，一旦感覺束縛太甚，必然另起野心，再來一次反覆，而這反覆之日，就是汪賊橫死之日，多半要死於日人之手。

即令汪賊的練兵計劃成功，手擁一部分軍隊，足以保護他的生命，但在人心憤慨之下，他的部下就可以出賣他的頭顱以獻功於國家。

即令汪賊徼倖逃出日人和他部下的掌握，寄身海外，也難免爲恨之刺骨的僑胞所刺死。

所以汪精衛的終身早已注定，他已經兩次瀕死而不死，最後必然不得好死。

日本人對於整個的國民黨是不高興的，與其相信汪，還不如相信北洋系，更不如相信滿清遺老，目前利用汪只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在佔領地政權稍形鞏固以後，必然要去汪而代以更比較忠實點的走狗，那時候就是汪的末日，這個時期也不會過遠。

鄭孝胥被迫下臺後還得個善終，汪的活動力遠過於鄭老奸，日本人怕他的心比怕鄭賊勝百倍，所以必然要置之死地無疑。

有人比汪精衛爲秦檜，其實汪賊何敢望秦檜，秦檜主和是站在宋朝，是在幾次大勝之後，進退是可以裕如的。汪賊既已投入日人的懷抱中，行動早已失去自由，充其量只能做張邦昌、劉豫，還不配做秦檜。金人之立劉豫，原希望以華制華，藉此可以休息金的兵力，不料劉豫既立之後，仍然無力抵抗宋軍的反攻，傀儡已經失去傀儡的作用，所以最後仍然不免一廢。現在汪精衛所擁的實力還不如劉豫，近在南京附近的蘇北、江南，尙且縱橫着幾十萬的游擊隊，何況更遠的地方。汪政權果然能做到日人所預期的任務嗎？只有天知道！

目前汪賊的勾引黨羽，不過是靠着日本人所賞賜的幾個臭錢，但是日本動員了幾百萬的軍隊，打了將近三年的仗，所希望的是什麼。如果拿不到中國的多少經濟利益，還要掬出腰包來替汪政權捧場，小氣的日本人是不会長此打這賒本的算盤的，汪賊的經濟來源一旦減少，汪政權號召下的大小漢奸就要紛紛作鳥獸散了。

這時候，便是汪賊的圖窮匕現，烏盡弓藏之日，請等着看吧。

三十年來的中國政治，證明了民意是終久不可忽視的一個最有利的因素，滿清

之覆亡以此，袁世凱之死以此，安福系之敗以此，奉系之敗以此，直系之敗以此，共產黨之敗也以此。但是過去三十年來的中國，還沒有出現過像汪政權這樣爲全國所唾棄的政治方式，還沒有像汪政權這樣純粹建立於敵人卵翼下的「政府」，自然僞滿和「冀東」是例外。但是日本人能用兵保護僞滿和冀東，日本人有力量永久駐兵在全中國以保護汪政權的安全嗎？如果有這一天，那麼日本人早已自己來幹，不必另製造什麼汪政權了。

『千夫所指，無疾而死，』汪的命運就在這「八字」之中了。

民國廿九年四月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第五屆國民參政會所遺留下的 三大問題

第五屆國民參政會的開會結果，從各方面看起來，其重要性並不比前四屆會議爲差。雖然提案不過七十多件，比前四次較少，但到會人數已達一百五十餘人，比前幾次尙多。並且在這次會中討論到三個有關國本的重大問題，這便是：

- 一、憲法問題；
- 二、黨派問題；
- 三、物價問題。

國民參政會全體同人，對於這三個問題都看得非常重要，所以特組了三個特種委員會來從事審查或研究的工作。關於五五憲草的研究，在上屆會議中，已組成了憲政期成會，經過半年長時間的研究，尤以旅居昆明的期成會會員所聯合提出來的

憲法修正草案，主張增設由國民大會選出的國民議政會，賦予以審核預算決算宣戰媾和的人民代表權利一項，最引起執政的國民黨分子和黨外人士的熱烈辯論，結果由議長主持，未付表決，仍留待會後繼續研究。關於黨派問題，在本會會議以前的幾個月中，無可諱言地國共兩黨之間，曾發生許多不幸的誤會事件，雖由上屆會議選派參政員若干人，組織華北慰勞視察團辛苦北上，打算對於這種不幸事件加以考察，但又因種種誤會未能完成其任務。本屆會議開始之時，正值汪逆精衛偽組織成立之後，所以國內的精誠團結更見必要，因此蔣議長虛懷大度，特用飛機歡迎共產黨幾位參政員惠然南來，共商國是，而共產黨的各位參政員也能不遠千里而至，這一種精誠團結的氣象，足令漢奸偽組織爲之懾服。所以本屆會議中，對於黨派問題雖然並未作具體的決定，僅賦予議長以處理的全權，但從此以後，不幸的誤會事件，大約可以減免了罷。關於物價問題，在特種審查委員會中曾作連續三日的長時期討論，結果貢獻意見四項二十五條供政府採擇，也算有一個相當的結果。

這次參政會和前幾屆的不同之點，就在於前幾屆會議的任務多在於擁護政府所

已執行的政策，如擁護抗戰建國綱領及聲討逆僞，褒獎將士之類，此次會議則於擁護政府的政策之外，更主動地討論到若干問題，以補助政府之不及，如上舉的三大問題就都是政府所未曾解決的問題，要仰仗參政會去加以解決。

平心而論，參政會對於這一任務並未能完全做到。如憲法及黨派問題，就尙未能作澈底的決定，而物價問題也僅能貢獻許多意見，至於政府是否真能一一採納這些意見，以及施行之後是否真能挽救物價的上漲，那就尙待以後事實的證明。對於這些缺陷，參政會同人應當坦白自認。而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參政會的性質不過是一個備諮詢的建議機關，並無強制執行的權力。明白了這個，便可以知道國民議政會的設置確有其必要，而任何民意機關，無論是國民大會也好，國民議政會也好，其他名義也好，總之必須賦予以討論宣戰媾和，審核預算決算，及信任政府之權，國民代表有了這些權才可以推動政府，使之忠實地執行國民公決的政策，否則，議決自議決，實行自實行，依然兩不相干。假如更不幸地碰到有汪精衛一類的人物執行國政的時候，擅行對敵的和約，就沒有一個機關能夠制裁他。我們固然相信目前

政府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應該予以極大的自由權力，但憲法是百年大計，不能僅顧目前而忘記了將來，況且事實上漢奸汪精衛在未作漢奸以前，也曾主持過中樞的國政。在憲政未實施以前，汪的逆動尚可以用黨的決議去制裁他，憲政實施以後，一黨專政既已結束，國民黨自不願單獨負政治的完全責任，那時候誰來執行這個監督的責任，恐怕終久總是一個問題吧？

對於這些問題，我不願意詳細加以討論，因為我始終覺得一切問題都是一個事實的問題，在事實未造成需要以前，雖有言說無益；在事實已經需要以後，任何思想反對也反對不了。我們只要努力於事實的認識和推進，這樣的大時代不是空談所能解決得了的。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五日成都國論半月刊

恭讀蔣委員長為實施糧食管理告

川省民衆書書後

自成都市上因米價平準問題引起米荒，馴致波及全省，如重慶灌縣等重要城市，亦均引起同樣現象，在苒至今，已將兩月，仍無解決辦法，成都市長因此辭職，此實抗戰期間最不幸之現象，而最感苦痛者爲一般都市住民，家無隔宿之糧，專恃零購爲生者。頃讀蔣委員長爲實施糧食管理「告川民書」，乃知市民此種苦痛，已爲最高當局所注意，不但對於四川全省之糧食調查管理各種事項，已設有專管機關，並制定各項辦法，期於剋期實施，且發表洋洋數千言之「告川民書」，言之不足則深長言之，深長言之不足則垂涕泣而道之，想四川目下之糧荒問題，經此一番誥誡，當可不日即恢復經常狀態矣。

當此前方軍民浴血抗戰之際，而後方一部分不明大義之豪富，竟忍心害理，祇

求貪得厚利，不顧同胞困苦，違抗法令，待價而沽，此誠如告川民書所謂『乃國民道德墮落問題』，非僅有關民食之問題也。政府既以最大決心管理此事，較之禁煙剿匪尤爲重視。吾人以爲此事之成敗，與數千百萬之民命有關，惟其所關者至重大，故吾人敢不避干瀆，略貢數言，以供政府之參考。

統制經濟管理經濟誠爲世界普遍的潮流，而在戰時尤爲重要。惟國家實行統制管理政策之前提，必須社會與政治雙方均具有可以實施統制管理政策之基礎，在平日一切戶籍財產之盈胸，運輸流通之狀況，市場之分配銷售狀況，與夫銀行存款出入之簿記，既均有詳明而確實之調查登記，而又輔以清明之政治，公直之輿論，奉公守法之官吏，代表民意之糾彈機關，言出必行之法令，故能舉重若輕，一旦決心實施統制管理，任何人不能加以逃避。夫惟如此，故經濟之統制管理，不僅託諸空言，亦不僅糧食一端爲然也。今吾國在平時社會組織既欠健全，一切調查統計均無正確之依據，而政治機構又未必盡屬靈活，執行政令之人員又未必能盡奉公守法，是統制管理之意固在抑不平而使之平，然其結果或恐反因行法不善而致有上下其手

之弊，轉失政府愛護民衆之原意，甚或爲政府招民之怨，此不可不慎者一也。

夫工商業之統制管理，在漫無準備之國家，已難免有行法不善之流弊，而在農業經濟之管理則尤爲困難。何則？農產品散居田野，非若工商產物之集中都市，況囤集糧食者固以豪富大戶爲多，而鄉曲小農，稍有積蓄者亦未必無小小之貯集，政府官吏勢不能執人人戶戶而搜購之，徵發之，苟執行者稍有不慎，則擾民之舉在所難免，以蘇俄共產黨之組織嚴密，而執行農產物徵發之結果，尙屢次遭遇農民之反抗。吾國今日所擬實行之糧食管理政策，雖屬公允而合乎人情，然在抗戰期間，則不能不持以極端之戒慎恐懼，始免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慎者二也。

今日囤集糧食者非僅一般中農，大戶多屬於城市中之豪富，而此輩直接間接多與過去及當前之政治有相當之因緣，故作惡之本領既大，而趨避之方法亦巧。而負執行統制管理之責者，或因情面之瞻徇，亦足失其管制之效力，故法行自上，言之甚易而行之則難，雖有最高當局宵旰勤勞於上，然耳目豈能盡周，苟非恢張輿論，普設民意監察之機關，勢難不避權貴，擒賊擒王，此不可不慎者三也。

川省本爲米產豐富之區，而米糧又非久囤不壞之物，囤集糧食者，其間實有種種天時人事上之危險，然何以多數鄉農竟不畏此種危險而相率囤集此不易經久之物，其間心理必有足資人反省者。夫貨幣之爲用本以代替實物，便於存貯及流通，乃今日人民心理反若寧甘受實物之損失，而不願以之易取貨幣者，此其故不可不深長思也。任何問題，不經細思則已，一經思及則有使人不能不警惕反省者，目前凡百物價之無理膨脹其一例也。夫事之起因於實際之需要者，甚易調治，而其起因於心理之無端恐慌者，則非并其心理之癥結悉舉而去之，則不易收效。大禹之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五子之歌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政者誠不可以不慎也。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敵人果能南進麼？

這兩天，遠東的局勢已到了最緊張的階段，日寇於十三日所召集的御前會議，雖號稱係慎重審議與中國事變有關的問題，但在此艦隊向南海一帶集中之際，其所討論的主題自不能不與所謂「南進問題」有關，而同時，英國政府也宣布了設立遠東軍總司令之舉，並誇大宣傳地中海的戰績，對日本表示一種強硬的姿態，也反映着南洋形勢的緊張。在這種情形下，一般人會想到英日甚至美日的正面衝突是終於不可避免的事。

自然，這種觀察不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對於日本的南進企圖，在審量了她的僅存的力量以後，終不免要打幾分折扣。事實上，日本假使要貫徹所謂「大東亞主義」的狂妄野心，非動員大部分的海軍，並與陸空軍一齊協同動作不可。以英國在遠東的海軍力而言，自遠不足與日本爲敵，美國在明年羅斯福就任新職以前，也決不

能有實際的動作，這一切似乎都與日本有利，但我們同時也不能忘記日本在戰略上的不利地位。從日本到新嘉坡，距離在三千海哩以上，即從最近的佔領地海南島出發，也需在一千英哩以上，越國遠攻，在戰略上非常危險。況且若欲實行佔領，又非有大批陸軍爲輔不可。即撇開兵力問題不論，單以日本現時的運輸能力計算，也沒有這個力量。況新嘉坡的守禦已有多年的準備，以英國遠東的海空軍力量，攻雖不足，守尙可能，若新嘉坡堅守至半年以上，則即無美國的參戰，日本的勞師遠征也必發生種種意想不到的困難。因此日本於直接攻擊新嘉坡一舉，必然尙在躊躇，不敢冒此大險，而新嘉坡拿不到，即去攻擊荷印，則所冒的危險更大，所費的兵力更多，因爲她還須分出一大部分兵力來監視新嘉坡的異動，如何尙有充分的力量去攻擊荷印。至於從陸上進攻馬來半島，雖是一般人所推想的，但這仍有三層困難，第一須克服西貢方面法越的反抗，第二須取得暹羅的同意，允其假道，即使這兩層都容易做到，但從暹羅南境到馬來半島南端，仍有五百英里以上的山林沼澤地帶，英人可以步步設防的。日本如果冒然敢走此路，則難免遭受義大利最近在希臘山地

所受的損失，因為英國的空軍仍然可以發揮一部分力量。

以上是單就軍略而言，事實上日本的海軍大部分須留以對美，勢不能輕於一擲，而陸軍在對我作戰三年半的過程中，已經損失精銳過半，士氣不振，征南洋不但抽調為難，即令勉強湊集成功，也勢非全軍覆沒不可，況日本若欲越海遠征，在外交上必須穩住了中蘇兩國，才有抽調陸軍之可能。謠言攻勢，早經我方駁斥，則所謂「結束中國事變」必然徒託夢想，而所謂日蘇劃分東亞勢力範圍之說，也已經蘇聯官方鄭重否認，想來也不會怎樣順利，外交既陷於如此絕境，如果再要做一次冒險，挑動英美兩國，非自殺而何？

至於財政經濟上的危機，則更形嚴重。在對南洋侵略之際，對外貿易勢必完全停頓，因日本不但一切工業資源須仰給於美國及南洋，即工業品的銷路，也以南洋及印度為尾閭，在越海遠征之際，運輸船隻的缺乏，資料來源的斷絕，日本僅存的工業勢必全陷於停頓，而又無法效法德國與蘇聯的物物交換制，其結果更縮短了崩潰的時期。

敵人果能南進麼？

因以上種種的困難，故日本南進冒險之舉，雖然表面上聲威赫赫，實際仍不過一「銀樣蠟槍頭」，這隻槍頭至多抵到西貢爲止，過此以往，則困難重重，日闕雖妄，或者尙無此勇氣。

至於西進以圖緬甸，則不但緬甸的地形對於侵略者是最不利的，而且緬甸並無日本所需要的軍需資源，取得之後，也解救不了日寇的經濟恐慌，但是要鎮守這塊「石田」，就非虛糜五十萬以上的大兵不可，這個算盤更打不過來。

然則將不戰乎，放棄南進的企圖乎，則美國的海軍準備行將於明年內提前完成，歐戰形勢逐漸對英方有利，經濟封鎖政策的結果，再等一年日本更無機會去反抗英美了，是則也不過束手待斃而已。

不是冒險自殺，便是束手待斃，這便是日闕眼前的苦悶，而其所以致此，則全由於侵華政策的錯誤。「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這位「東鄰處子」的前途，將不勝有「蒼茫落日」之感了。

民國廿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他山之言與吾人之反省

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於本月二十日開第三次大會，平準金管理委員會美方委員福克斯君曾出席發表演說，全文已見昨日報載。吾人讀福氏演辭之後，深覺其言皆中肯綮，以甫履此土不過數日之客卿，所發言論竟能如此中肯，吾人除欽佩其觀察力之銳敏，不愧專家之名外，又深覺自慚。何則？福氏之所言，皆吾人平日所欲言，而不能言，不敢言者也。國人不能自言，而使外人言之，稍有良心者，當知自愧並求所以反省之道矣，故特疏舉福氏言中之要點而複述之，以供吾人之反省。

按福氏之辭，言簡而意賅，總其要點，不外以下數端：

其一，福氏述其來華後之第一印象，爲中國人民抗戰意志之堅決，而抗戰勝利之道，在於全國之精誠團結，故其言曰：『無團結則國家不能生存，國內團結一致，乃中國基本力量之所在，可以粉碎一切敵人征服中國之企圖，深望中國人民不

惜任何代價保持其國內之團結，各黨各派應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立場，捐除成見。』其言之懇摯如此，中國過去偶因一二黨派之不知大體，互相摩擦，致招來外人之懷疑，而始有今日之忠告，反躬自問，寧無愧怍。抑國人聆福氏言論之後，今後果能澈底捐棄成見，不惜任何代價以保持其團結到底乎？此吾人所應反省者一也。

其次，福氏以爲『中國之所以能精誠團結，乃由於政府與人民間具有一種真正之民主關係，』而又幸有偉大之領袖領導之。『美國所以願意對中國繼續增加其財政上與軍需上之援助』者，乃『希望中國民主政治生活之能推進也』。中國今日既站在民主國家立場，希望取得美國之援助，則今後政治自必向民主主義方面推進，且非此不可，可無待言，然吾人反躬自問：今日一切政象果已澈底舉民主之實，而不至仍迷戀於法西、納粹之反動思想及制度乎？三民主義所標舉人民應有之選舉、創制、罷免、複決等民權，果已真正實行乎？民主國家人民最低限度之應享權利，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果已慷慨賦予乎？真正代表民意之憲法果已制

定乎？此吾人所應反省者二也。

又其次，福氏以爲「欲使此次財政會議真能成功，吾人必須使全國各地自中央以至地方財務人員絕對能滿足下列各項條件，如增進設備，改善手續，健全機構，與慎選人員是也。」『今值戰時，新式的及更近代的方法，必須引用，公務員必更需有堅強之信念，並加強其屬員與民衆之信念，今日各種措施對國庫有極大之影響，財政與金融政策必須調整，使能適合此新時代之需要。』『財務行政人員若能不偏不袒，不屈不撓，認真收新稅，則對以往民主政治之信念乃可繼續維持於不墜。租稅制度必須集中，然後租稅行政方能適當訓練及使用租稅人員，無此項人員則一切財政制度均無法成功也。美國之文官任用法現正推進適用於全國所有公務人員之任用，此值得注意者。』吾人反躬自問，今日中國之財務行政，其設備果已增進，手續果已改善，機構果已健全乎？現有之財務行政人員，其登用果盡依文官任用法之規定，而無徇私請託之弊乎？果均受過嚴格之訓練乎？所有人員果皆能不偏不袒，不屈不撓，獲得民衆之信仰乎？此吾人所應反省者三也。

又其次，福氏演說又謂：「健全行政機構之建立，使能在組織健全與制度統一之預算監督下，靈活運用，必須保有近代之會計制度與完整之會計報告，將政府之財政情形充分表露之，爲民主國家重要之特質。」吾人反躬自問，中國今日之財政制度果已統一乎？預算果已確立乎？近代之會計制度與完整之會計報告果已保有乎？政府之財政情形果已充分向人民表露而具備此民主國家重要特質之一乎？此吾人所應反省者四也。

凡此四端，福氏言之深切著明如此，爲外獲友邦之同情、內博民意之擁護起見，吾人深望政府在此次財政會議之後，即一一依言次第實行，庶幾大信可昭於天下，則所謂田賦徵收實物也，收歸國有也，土地與糧食政策之推行也，全國人民孰不樂於擁護而觀厥成哉？

民國三十年六月廿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今後的東西兩戰場形勢

一月以來，民主國家所爭論的歐亞兩大戰場孰爲重要的問題，因邱吉爾、羅斯福、諾克斯等相繼發表演說而告一段落，事實上儘管羅斯福和諾克斯等再三聲明對遠東戰場決不歧視，而日軍已迫近澳洲，分侵荷印，「馬來戰事已告終止」，新嘉坡要塞戰即將開始，緬甸方面毛淡棉已經撤守，距離仰光祇有一百英里，英軍已退至怒江西岸，在此時期如尙在討論什麼戰略先後的問題，眞所謂「宋人議論未定，而兵已渡河」了。

今後的太平洋戰事，新嘉坡要塞自能堅守待援，但荷印諸島及澳洲的一部分如爲日軍佔領，則新嘉坡已成絕地，英美援軍無法到達，長期抵抗頗爲困難。在此時期最要緊的是美國海空軍大量援助，我們不知道美國在目前所能派遣到南太平洋的海空實力究竟如何，事實上的動員已達何種程度，觀於馬加撒海戰的劇烈，似乎同

盟國的海空軍力量較前已有增加，但還不夠，必須趕速大量增援，以確保澳洲及荷印羣島的一部分，否則南太平洋澳洲附近島嶼如在援軍未到之前完全爲日本佔領，甚至侵入澳洲本土，佔據達爾文港，則美國海軍遠來已失去重要的橋樑，將有鞭長莫及之苦。預想在最近一月內，南太平洋的諸島嶼間，必有較大規模之海戰發生，而此次海戰之勝敗，則決定新嘉坡及整個南洋的命運，同盟國必須慎重處之，竭力赴之。

緬甸的戰事，在今後地位之重要，也不亞於新嘉坡及南太平洋。我國大軍既早已出動援緬，此時正發揮主動精神之時，必趕快表現中華健兒的身手，打幾個大勝仗，才能保障了西南亞洲的半壁，也間接保障了中國自身，緬甸對中國的重要遠過於對英國，英國或可以輕視緬甸，但我們不能聽任其輕視到底。

邱吉爾和一部分英國內閣人士，念念不忘希特勒，希特勒誠然可怕，但蘇德戰事的轉變，已使希特勒的冬季防線始終不能確實建立，因之也就無立刻再發動另一戰場攻勢的可能。希特勒的處境實已進退狼狽。英美既然注意歐洲戰場，也可以，

就該趕快發動大規模的反攻，闢新戰場於歐洲大陸，最好是在斯坎的納維亞半島，再來一次挪威登陸，逼迫瑞典，夾擊芬蘭，與蘇聯大軍取得聯絡，使法國本部感到威脅，則自無暇他顧，再過兩個月，美軍源源開到英倫三島，英國準備完成，北歐天氣轉暖之後，不等希特勒再度發動對蘇攻勢，同盟國就應當以全力開闢這個戰場，否則若仍徘徊瞻顧，坐誤時機，一旦德國重新開始對蘇攻勢，萬一蘇聯失利，則世界大局就不可收拾了。

但北歐新戰場的開闢，無論如何，至少還得兩個月，這兩個月真是千鈞一髮的時機，新嘉坡必須守得住，澳洲必須不讓日軍登陸，荷印、菲島的戰事必須不停，以牽制日軍，仰光附近必須給日本一個打擊。這就是同盟軍在遠東所應努力作到的事。

只要再支持過兩個月，赤道下的炎威和雨季就要到來，給攻擊者增加許多困難，救蘇聯者是冰天雪地，救緬、馬者必是可怖的日光，連天的陰雨，和無數目不可見的疾病微菌。日寇的軍隊不敗於白人，而必敗於這些傳播極速的疾病微菌，除

非趕速撤退，必有全軍覆沒之虞。但如果新嘉坡不能守到此時，則戰局必然改觀，而同盟軍的反攻也須延長一些時候。

目前太平洋的戰局正如淞滬失守後的中國抗戰，和蘇德戰爭的初期一樣，侵略者必要經過一暫時猖獗的局面，此後即轉入長期戰爭相持的局面，對於這些初期的挫敗，不必驚惶，也不必過度悲觀，但人事必須盡到。時間固是勝利的要素，但人事的努力與否更爲重要，望同盟國毋自餒自懈。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歷史上中印國交之回憶

當此星洲陷落，仰光危急之際，蔣委員長是二月九日訪問印度，與印度政府及在野領袖交換親善之意見，此誠東亞國際史上破天荒之曠舉，亦爲最切時宜之行動。倫敦人士認爲蔣氏此行，具有極大之政治意義，誠非過譽。抑考中國與印度同爲世界最古文明大邦，兩國邦交發生於二千年前，二千年來此兩大民族之交際，先以禮讓和平行之，從無武力侵戰之事，誠開人類國際未有之先例。二十年前印度詩哲泰戈爾來華講學，梁任公先生即曾舉此以爲兩國文明遠邁他邦之榮耀證據。惟兩國過去國交往來之歷史，在今日中印及其他友邦人士或有未能羅舉者，吾人不敏，願藉此機會，一爲回溯，以供留心東亞大局者之參考。

印度自西曆紀元前五百年左右，約當我國春秋時代，西北國境之印度河流域，隸屬於古波斯帝國，至紀元前三三四年，希臘馬其頓國亞歷山大大王滅波斯帝國，

遂略取西北兩印度，乘勝東征，因天暑士卒多病而班師。亞歷山大卒後，印度豪傑旃陀羅笈多起創摩揭陀帝國，是爲孔雀王朝，擁兵六十萬，統一中西北三印度，擊敗亞歷山大部將敘利亞王塞留哥，納其女爲后，割其印度河東岸地，傳至其孫阿輸迦王，卽內典所稱之阿育王，國威益振。王崇信佛法，定佛教爲國教，會教徒千人於國都華氏城，開第三次結集，確定佛教教義，分遣高僧傳教於外國。於是西自大夏，南至獅子國（卽錫蘭島），舉印度全境皆宗佛教。其傳教之僧人，西抵敘利亞埃及，是時正值我國第一雄主秦始皇在位，阿輸迦王卒於西元前二二一年，而始皇卽以前一年統一中國，相傳其時有異人室利烏來朝，說者謂爲沙門入中國之始，其說雖不可信，而此東亞兩大帝國在文化上或已聞聲相慕，亦事之可能者也。

未幾，盤踞我國甘肅西境之大月氏民族，爲匈奴所破，西徙阿母河流域，征服希臘民族所建之大夏王國，餘部南踰興都庫什山，侵入印度河流域，分建小國，溝通中印文化。是時正值我國漢武帝在位，聞大月氏與匈奴有讎，欲聯之以共伐匈奴，乃遣大外交家張騫奉使西域。騫備歷艱險，爲匈奴所留者十餘年，卒脫身抵月

氏，以元朔三年即西元前一二六年回國。使命雖未成功，而間接發揚漢威於西域，使中印交通孔道因之開闢，其功甚偉。

騫前後使西域凡二次，其初使月氏歸，即聞其南有大國身毒，歸報天子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因獻由蜀經西南夷以通身毒之策。元狩元年，即西元前一二二年，武帝使騫由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各行一二千里，以求身毒國。卒以路險莫通，然由此經略西南夷，收滇黔兩地於版圖。身毒即印度之古譯，亦曰天竺，正史所載中國知有印度，實自此始。今滇緬路形勢危急，開闢中印公路之議旋起。此路倘能及時因東亞兩大民族之諒解而早告成功，則不但我國國際路線不致中絕，抑且蕺二千年前雄主能臣所欲竟未竟之志，謂之曰歷史上之偉舉，其孰曰不宜。

西漢末年，大月氏諸侯丘就却統一諸部，建立王國，是爲貴霜王朝。西漢哀帝

元壽元年，即西元前二年，大月氏王丘就却遣使臣伊存來聘中國，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其口授之浮屠經，由是印度之佛教文化，遂經大月氏使者之手而流入中國。至東漢明帝永平八年，即西元後六五年，漢廷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求佛法。愔至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並佛像載以白馬，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東還洛陽，詔立白馬寺於洛陽雍關之西。華人之至印，與印人之來華，見諸正史者，當以此爲嚆矢。而其相互往來，純爲文化之溝通，絲毫無政治侵略之意，此則兩大民族光明敦厚之古誼，可以資吾人今日之回憶者也。

自斯以後，經大月氏王迦膩色迦之獎勵，佛法宏布全印，洋溢於四國，數百年中，竺僧東來，與華人西渡者，史不絕書。見於高僧傳者，若三國時之維祇難、竺律炎、曇柯迦羅，若東晉時之曇摩掘多、曇無讖，若南北朝時之求那跋陀羅、菩提流支等，其確屬印度人者，不下十數人。其尤著者，如鳩摩羅什之廣譯經論，宏暢性宗，若菩提達摩之面壁九年，一花五葉，皆於中國文化有甚深而不可磨滅之影響。而中土僧俗之西赴印度者，若法顯、寶雲、玄奘、義淨等，亦先後遙遙輝映。

顯之「佛國記」，獎之「大唐西域記」，淨之「南海寄歸傳」，至今爲治印度古史及中印交通史蹟者所寶貴。此千餘年前中印兩大民族文化之故跡，而爲今日患難相依之兩國人士所永矢弗忘者也。

迄於唐初，太宗神武戡亂，威震四夷，於時玄奘法師以貞敏之懷，「翹心淨土，經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周遊西宇，十有七年。」曲女城那爛陀寺之大會，尤爲震古爍今。「揚我皇之盛威，震彼俊之權豪，偃異學之高玄，拔同師之區幟。名王拜首，勝侶摩肩，萬古風猷，一人而已。」是時印度之鳥菴王朝戒日王尺羅逸多二世在位，對師尤敬禮有加。貞觀二十二年，卽西元六四五年，太宗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蔣師仁爲副。適值王薨，國內亂，玄策奔吐蕃，檄召諸國兵爲之平亂。乾陀衛江一戰，虜叛王之妃子，獲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餘所，執叛王阿羅那順逆於長安，此歷史上中國出兵助印度平亂禦侮之第一次，亦僅有之一次也。

自是以後，中印兩國，國運皆漸衰頹，印度始爲回教之阿富汗王國所征服，繼

爲突厥所侵掠，復爲蒙古人所侵入，至西元一五二六年（明世宗時），蒙古遺裔巴卑爾入主印度，建立莫臥兒帝國，其孫亞格伯繼位，統大全印，大弘文教，今日印度統一之規模，實莫臥兒帝國啓之，英人承之，而莫臥兒王朝固我中華民族偉人成吉思汗與帖木兒兩大帝之後裔也。

近代歐人之經營印度，始於一五〇五年之葡萄牙人，其後荷法等國相繼東來，而英人之東印度公司獨收最後之利。英人與印度發生政治關係四百餘年，至今日而印度猶未能取得自治領之正式地位。甘地、尼赫魯諸賢領導印度，力爭自由，而獨不能受日寇甘言之惑，欣然與中華民族携手共維東亞之真正和平，吾知中印携手合作策動成功之日，即日寇授首之時，亦即一切帝國侵略主義壽命告終之日。天降大命於此世界僅存之兩大亞洲民族，其永保精誠無懈！

作於民國三十一年二月

日本的危機

新嘉坡失陷以來，日寇在太平洋上的形勢似乎猖獗一時，有些悲觀論者不免鯁鯁過慮，更增加悲觀動搖的心理。其實凡事不能單從表面去看，研究一件事情必須表裏洞澈，才能把握住事的真相。中國哲學最講盈虛消長之理，夏至陽盛之極而一陰伏其下，冬至陰盛之極而一陽已伏其下，天時如此，人事亦然。試觀三十年來中國內戰史迹，任何派系當其勢力猖獗之極，若不善爲調攝，即已伏有內部崩潰之機，遲早必發無疑。新華皇帝夢時代的袁世凱，督軍團兵諫時代的段祺瑞，第二次直奉大戰時代的吳佩孚，五省聯軍時代的孫傳芳，大元帥時代的張作霖，乃至張宗昌、褚玉璞之流，莫不如此。以此推之天下之事，亦莫不然。日本自崛起以來，一戰勝我，再戰勝俄，三戰勝德，至今又戰勝英美，攻佔關島、香港、馬尼刺、新嘉坡，包圍荷印，進迫緬甸，甚至有會師印度之勢，可謂盛極一時。但亢陽之極，已

伏陰機，以日本區區國力，無德無功，遽欲於短期內征服所有「大東亞新秩序」內一千萬方哩以上的面積，十萬萬以上的人口，天下寧有如是容易之事！今日世界大國如英美蘇中，其廣土衆民皆係於數世紀或數十世紀中逐漸辛苦經營得來，從無短期內征服如此廣大土地如日本及其盟友納粹德國之例而可以保持下去者。亞力山大、成吉思汗、帖木兒、拿破崙的帝國之敗不旋踵，可爲殷鑒。單就此一點論，日寇已決無倖成之理；若再就事實來看，則我們覺着此次日本的海上勢力擴張之速，其中實含有多數潛伏的危機，此等危機合併起來即爲日本致命之傷，試一一指明如下：

第一，日本此次並未擊敗敵人的主力，日本在東亞的敵人，海上方面爲美國的海軍，陸上則爲中國與蘇聯的陸軍。日本對華作戰五年，並未擊潰我國的武力，最近且有湘北第三次的大敗。蘇聯的陸軍更虎視東北，尙未一試。在海上日本所擊敗的是英國，但英國的海軍主力被牽制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在遠東實不成一勢力。美日兩國海軍至今未曾一碰，僅馬加撒海峽小試其鋒，日寇已損失不小。若非珍珠港

偷襲倖勝，則日本今日卽有失敗之虞。以美國造船力之雄厚，今後時間愈久，愈有利於美方，將來大艦隊一經出動，日本的命運豈待著卜，此其危機一。

第二，日本對於海軍沒有自信力。日本此次攻佔馬來、新嘉坡、香港、馬尼刺等地，皆係靠陸軍之力，海軍尙未大用，可見其對本國海軍力尙無自信，否則何不用海軍直接攻擊新嘉坡要塞？珍珠港之勝由於偷襲，威爾斯親王號及復仇號之沉，由於空炸，日本海軍除攻佔一二無守備無抵抗力之關島、威克島外，並未一試。太平洋之戰是一個海上主力的戰爭，海軍不能真正獲得決勝權，雖佔地極多何用。

第三，日本陸軍在太平洋戰中也未真正顯出力量。日本陸軍的素質在對華戰爭五年來每下愈況，國人皆知，此次對南洋的侵略，僅因英國陸軍的失着而獲倖勝，並非真正力量決賽的結果。香港、九龍之戰，馬來之戰，新嘉坡之戰，皆由守軍自動撤退及投降，並非日軍真有力量。試觀菲律賓賓巴丹半島上麥克阿瑟將軍統率的美菲軍隊，已抵抗八十日之久，尙未屈服，就可見日寇陸軍力量也甚薄弱，並非勁敵。以此久戰疲勞的軍隊，一旦與中美蘇三國訓練成功的聯軍相遇，不敗何待？

第四，海上運輸力的日漸消耗，是日寇的致命傷。日寇佔地愈廣，則維持交通線越不容易，南洋島嶼棋布星羅，海岸曲折，由日本本國海岸至新嘉坡的距離，三倍於南京至重慶的距離，在此廣大交通線上，即使無敵人的攻擊，單就平時船隻運輸力言，已不勝任，何況日本的戰船自開戰以來，已損失百分之十四，商船亦損失百分之十。過去日本的造船能力最大每年不過數十萬噸，而美國於一九四二年即能製造商船八百萬噸。過去兩月中日本商船已損失四十萬噸，今後如繼續下去，則一年之內日本商船的損失將達二百四十萬噸，日本所有能作遠洋航行的商船，總噸數不過三百萬噸左右，則一年之後十分之八的運輸船隻，即已損失，何況尚須維持對華作戰的運輸，何況尚想作印度洋的冒險，何況美國海空襲擊力的增長正與日寇海上交通線的延長爲對比的增加。由此可見，日寇在南洋的勢力愈擴張，潛伏的危機越多。

日本如果欲渡過此危機，必須迅速達成兩種任務，即一、迅速擊潰美國海軍主力，二、迅速擊潰蘇聯的陸軍，佔領海參崴。如果美國海軍爲輿論所迫，在目前準

備未充分的時期即開始對日決戰，則日本也許有倖勝的可能，但美國海軍戰略早經多年研究，決不如此輕率，縱冒天下之譏評也必蓄力待時，決不於此時輕易一用。蘇聯領土廣大，交通困難，日寇縱使與德國東西同時夾攻，也不過將疲敝的陸軍葬送於西伯利亞冰天雪地之境，加速其崩潰而已，並不能取得決定的戰果。至於會師印度則更是勞而無功之舉，印度雖然資源豐富，守備力弱，但佔領印度僅能動搖英國，而並不能損及美蘇的海陸主力，即不能完成戰果。且資源雖富，如船隻不敷，也不能運回本國，無濟於事。因此算來算去，日本的前途並無可以樂觀之處。

不過敵人的危機是一件事，我們的勝利又是一件事，敵人雖終必失敗，同盟國雖終必勝利，此事決無可疑，但我們必須能守候到那個時候，否則旁人勝利，於我無分，此則有待於內部的團結振作者也。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一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現階段的國際戰局

最近日寇自攻佔爪哇及仰光後，太平洋戰事之第二階段已結束，今後將入於第三階段，其主要目標自在澳洲，印度及緬北似亦可劃入此階段內。日軍之意似欲趁美國準備未完成前以加速度完成西南太平洋之佔領，故澳洲之攻取勢在必然，且必以最大兵力臨之。澳洲雖地域廣大，不易完全佔領，惟其人口甚稀少，且人口之大多數集中於東部口岸，若將此等口岸佔領或封鎖，則佔領澳洲之目的即已達，北部之達爾文港尤爲遠東自新嘉坡以次之最大軍港，若達爾文港不守，則美國艦隊將來即無停泊修繕之良好港灣，最近將來雙方之爭奪當在此點。

英美最初所定戰略，似亦側重於澳洲之保持，故最初即將澳洲劃歸美國艦隊駐防，最近又調麥克阿瑟將軍至澳洲任同盟軍統帥，預料美國必以較大之兵力防守澳洲，阻止日軍之進攻，蓋澳洲如失守，則美國在西南太平洋即無反攻之根據地也。

惟美國之準備似距完成期尚遠，最近之增援能否阻止日軍之進展，尙屬疑問，日軍在此期間，必採速戰速決之戰略無疑。

若澳洲東北海岸不幸失守，則日軍在西南太平洋之軍略地位卽已鞏固，美國海軍雖能退守澳紐海峽，短期間亦無力反攻，則此後日本第二步之攻擊方向，至堪注意。

緬北僅屬牽制之師，似無使用大兵力之必要，印度之窺伺自在意中，惟敵對印度似側重於政治攻勢，至於軍事方面僅以海軍封鎖及擾亂南印各海口卽已足，勞師遠征，危險較大，且運輸力量亦嫌不足，故若非德國向近東進攻，兵力已達波斯灣附近，日本似無急急進攻印度之必要。

在此情形之下，日本之企圖似將注視德蘇戰爭之發展，俟蘇聯在西線危急之時，一舉而切斷西伯利亞鐵道，攻佔海參崴，以絕北方後顧之憂，並防止美國由北方海上之進攻。惟日本對蘇不無顧忌，非俟希特勒之春季對蘇大攻勢發動，且顯有成效時，似尙不致卽刻發動。

希特勒之處境與日本同，亦利在速戰速決，不能坐待，本年春季必發動更大之攻勢無疑，其攻擊之方向最可能者有兩方，一爲仍舊進攻蘇聯，一爲假道土耳其向近東攻擊，以日前巴本被刺案之布置卜之，似卽爲製造題目以壓迫土耳其就範之一種策略，土國之態度如何，未可預料。巴本案發生後，土政府卽搜集蘇聯領館及僑民住宅，似對德表示好感，惟究竟讓步至何程度，必待事實表現始能判明。目前同盟、軸心雙方對土之外交戰正在進行，何方勝利，關係大局至重。

惟德國無論對土是否採取攻擊，其主要之攻擊目標似當仍在蘇聯，蓋蘇聯之龐大軍力如不擊潰，則德方後顧之憂未除，任何舉動均受牽制。故必須趁此英美反攻準備未就緒之際，先行解決蘇聯，以絕後顧之憂。德國在進攻蘇聯之際，必千方百計誘使日本從東方夾攻，但日本勢將仍採鷓蚌爭持漁人得利之故技，暫時注視局勢之發展，等待時機，不必先捲入漩渦，目前關東軍及朝鮮軍負責人物之回國以及駐蘇大使之更迭，雖爲日本注意對蘇問題之表示，惟發動軍事似尙須等待至夏季，因彼時蘇德戰事始可見分曉也。

邱吉爾赴美後英美雙方在華盛頓商量之戰略爲先對付歐洲問題，太平洋方面暫取守勢，目前仍照此計劃進行，美軍之源頭開往愛爾蘭卽爲此戰略之一種表現。英美之意似仍欲在歐洲西線關第二戰場，但事實上恐有困難。若遷延日久，令大軍困守三島，蘇聯獨力難支，一旦失敗，世界大局卽不可問矣。

我國在此期間，雖軍事方面暫時尙不至有大變化，然戰事既成長期，我國被困於最內圈，經濟上及國民心理上俱須忍受嚴重之苦痛，故國民精神之鍛鍊，尤爲重要，然欲國民精神之振作，則政治清明，使民心團結而不離，尤爲首要之圖也。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廿一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英印談判經過給我們的教訓

英國特使克利浦斯自三月二十二日到印度後，迭與印度各黨派領袖交換意見，折衝二十日之久，卒歸失敗，英國所提出的方案，爲印度各黨派所拒絕，使克氏悵悵而去。此事關係世界戰爭全局，我們除對於英印談判之未能成功，深致惋惜，並深信其不久仍必能以另一方式協商成功外，並覺得此次交涉經過，可以給我們許多有益的教訓，特縷述如下：

第一點是印度各黨派領袖的威武不屈態度，堪爲我們的模範。印度民族以亡國之餘，手無寸鐵，欲求平空爭到獨立當甚困難。此次英國戰時內閣所提出的方案，雖去印人理想尚遠，然已大爲進步，如果在卑怯性成的民族看來，正該感戴皇恩之不暇，乃印度朝野各黨派領袖竟視如無物，毅然加以拒絕，其所爭之是非，我們局外人不欲置評，但以此種威武不能屈的態度論，卽令有些民族自愧弗如。看了這

個，才知道甘地以鷄皮鶴髮之七十老翁，僅恃不合作運動即能震撼一世的緣故，要講獨立自由，這才是真獨立，真自由；要講精神文明，這才是真精神文明。

第二點是印度各黨派領袖的獨立自尊精神，也很可令人欽佩。此次印度問題之談判，不但英國政府特派專使，移樽就教，我國蔣委員長躬任調停，即美國的羅斯福總統也特派私人代表約翰遜氏飛印，協助談判，印度人的面子可謂十足。如果在一向以媚外事大爲榮的民族看來，即使平日有憾於英人，對於美國總統這種盛意，也該感激涕零，乃印度民族公然敢對此世界盟主的勸告，視爲等閑，新德里九日的路透電，載尼赫魯談話稱：「美國報紙最近曾作教訓勸告之詞，或謂何者與印度有利，何者與印度無益，甚至謂美方之勸告倘若我等不能接受，則情形必致如何，其中不無威脅之意。不知友人之勸告自最爲可貴，自最應加以考慮，惟我等素不慣於任何國家之保護，我等之政府亦非基於他國之教育或威脅，本人所願聲明者，我輩並未向任何人發出呼籲，亦並未邀請任何人出面調停。本人確信羅斯福總統在將來必可居於重要之地位，惟我輩尙未請其出面調停我等之問題，蓋我等深知我等有我

等之責，必須毅然擔負起來。最後之命運若何？一切均依賴自力；我等自歡迎他人之合作，以共圖大業，惟最後仍需自力，絕不可依賴外力之援助，此蓋爲我等之確信。羅斯福總統對於我輩刻下之問題甚表友好之關懷，盛意至可感激，惟謂出首調停與否，羅斯福總統有決定之責，則此種想法，對羅斯福總統及我輩係屬不公之論。」云云，其言之正大光明，堪令許多一向依賴外力的奴隸心理者聞之汗下。因此我們聯想到最近大公報載公孫震先生專論，主張印度問題應由印英中美四國用集體協定的方式予以處理（見十二日中央社電），我們覺得這個意見也大有慎重考慮之必要。因爲像這種由列強協定來干涉印度內部事務的方式，大非一個自尊心強的民族如印度者所願接受。中印唇齒相依，國交初樹，尤須善於自處，不可貿然插身其間，致使印度朋友懷疑我們受英國的驅使，來干涉他們的內政。以前華盛頓九國公約保證中國的獨立完整，至今中國稍有自尊心者引爲深恥。我們既不願自己受人保護干涉，我們也不應該期望我們的兄弟之邦印度人願受他人干涉保護。我們以爲英印的問題還是讓英印兩國人自行去解決，我們外國人無出頭干與之必要。若不幸而

干涉無效，自找釘子碰，更屬大可不必。天下的事，有許多不是單靠武力金錢就可解決的，我們縱不尊重別人，也須自己尊重自己。

第三點是印度民族的反軸心侵略態度，始終不渝，也深可令人敬佩。此次印度各黨派的拒絕英方建議，是出於獨立自尊的國家主義覺醒，不是受他人的煽惑，更不是希望假借另一侵略者的助力去對付眼前的統治者。關於這點，甘地和尼赫魯都有明白堅決的表示，甘地說：『吾人儘可於任何地帶溘然而逝，但絕不能向侵略者投降，非武力抵抗者，必不致爲流言所惑，其奮鬥目標，並非希望第三者援助，以求自英國枷鎖中獲得解放，彼等堅決相信自己之奮鬥方法，捨此以外，別無他途可循。』（十二日孟買路透社電）尼赫魯也說：『余之信念，概言之，卽不屈服，不投降，不資敵，不與侵略者合作，並盡量阻撓其行動。』『余確信德日倘在此次戰爭中獲勝，並控制全球，實爲世界之悲劇。余願以更有效之方式，在世界之戲劇中，盡一份責任。』『吾人決不向侵略者投降，猶如過去二十年內吾人始終不與英人妥協者然。苟有人謂吾人大可乞援於另一侵略者，則余決不能容忍此項觀念，而

誓將與之奮鬥到底。」（十二日新德里路透電）兩位印度國民領袖的這種態度，可謂光明磊落已極，一般希望勾結外力以推倒統治者的卑賤心理，也應該聽甘地、尼赫魯之言而發生感動。

第四點是英國人此次對印度問題的優容含忍，也大可供自命統治者流的參考。英國人本是最富於政治天才的民族，此次對印談判雖歸失敗，但其表現政治天才的高明之處，已不一而足。甘地、尼赫魯輩本爲手無寸鐵的書生，所持者亦仍僅大多數手無寸鐵的民衆，若在其他政治手腕拙劣的統治者當此問題，早已一怒而斬甘地之頭，解散國民大會之黨，罪以反動，目以通敵，封鎖其輿論，逮捕其黨徒，如此一來，也許暫時可以耳目清靜，但後患却不堪設想。乃英人不僅不肯如此做，即監視封鎖等無聊舉動，亦不肯一試。英國的宣傳機關路透社對於印度反對黨領袖的言論反一律代爲宣播，未嘗歧視。英人這種寬大的態度，便是英國民族政治技術的高明之處，也就是英印終必言歸於好的堅固基礎。印度國民大會主席阿沙德於英印談判破裂後尙稱：「吾人所共同祈求之目的未曾實現，殊爲可憾，惟余必須承認一切

討論俱係在友好情緒下進行，雙方意見雖相距甚遠，然克利浦斯特使仍以朋友之態度辭別，吾人自始至終均保持誠懇之態度。」云云。印度領袖這種善意的態度，即反映英國政治之成功。人家對於被統治的異族尙且如此謙和，同在一國者更當何如？

我們仍希望中國人不要輕視印度兄弟，我們應該在此次英印交涉中尋求我們的有益教訓，才是求善於鄰邦的道理。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青年的指導問題

——爲紀念五四運動而作——

今天是五四運動第二十三週年紀念，雖然五四已不定爲青年節，但五四對於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影響仍然存在着，因此我們願意借這個日子，來一談青年指導的嚴重問題。

過去對於五四的評價，未免失之過高，因此近幾年來，起了一種反動，有些人竟以爲五四運動毫無價值，甚至於說五四運動對於青年，對於國家社會，都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這種見解也未免矯枉過正。我們看這幾年來的教育指導方針，似乎在向力矯五四運動之弊的方面去走，但是做得過火了，就未免又生他弊。平心而論，天下任何事件，沒有絕對有利無弊者，也沒有絕對有弊無利者。五四運動的價值，固然不像一般以吃五四飯爲職業者那樣捧得五體投地，但是若說一無成就，甚

至罪惡無窮，那也未免太過。試看二十年來，政治社會上中堅的人物，有幾個不是從五四潮流中陶冶出來的，這就是五四之功。假使中國現代歷史上抹去了「五四」這一頁，我們敢斷定，必然要減色好多。

五四運動對於青年，對於國家社會最大的功績，就是打破沉寂麻木的空氣，喚起青年的獨立自覺精神，造成了一個浪漫主義的狂飈運動，這種功績是無論如何不能磨滅的。但是一部分頑固分子的深惡痛絕也就在這裏。在他們的腦筋裏，青年應該像行尸走肉一樣，聽指導者的任意安排，要他們穿制服，戴制帽，要他們立正，稍息，聽口令再開步走，要他們剃光了頭，打起裹腿，要他們奉令喊口號，貼標語，要他們免談國事，最好連報也不要看，要他們喊領袖萬歲喊得高入雲霄，如果能樣樣辦到，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和青年指導的團體就算功德圓滿，校長、訓導主任、軍事教官先生們也就可以放心睡覺了。但是這樣下去對於國家社會果然是有益無損的嗎？這個問題似乎還有一問的必要。

人類社會的進化是由生生不已的新生機造成的，青之所以為青年，就在他們的

腦筋還沒有爲陳腐的社會桎梏所埋沒，他們是社會的新芽，國家的嫩蕊，一個社會如果把青年的一線生機都斬伐淨盡，使他們變成行尸走肉，只會聽命令，沒有提線的人在背後就不會走路，這樣的社會還能活幾天，是問題之至。

成年的人往往好把自己的標準去評判青年，要青年就自己的範圍，實際上是永遠辦不到的，因爲青年的進取精神和老年的保守精神一樣，同樣是人類進化的產物，自從荷爾(G. S. Hall)和鮑爾溫(J. M. Baldwin)以來，發展心理學的研究日有進步，一般都知道人類自有生以來，心理的發展正反映着過去幾百萬年來種族演化歷史的發展，而青年時期正代表着人類開始踏進文化範圍的第一步；青年的冒險精神，自由活潑思想，和獨立不羈的態度，正是我們數千年前祖先在開闢新天地時所曾經表演過的，沒有這種精神，我們人類不會發展到現在的程度。因此指導青年不能依據成人的標準，必須就青年本身的發展程度去定立適應青年身心的標準。以成年老年的標準去範圍青年，猶如強迫石器時代的人類去接受現代思想一樣，不但徒勞無功，且恐增加反感。

一切以青年指導自居者，如果能回憶自己的青年時代，也許就不會誤解青年了。因此，我們認為眼前的問題，不是應該怎樣指導青年，而是先把指導者的常識指導一下，特別對於青年心理學和生理學的常識應該多具備一點，笑話或者就可以少演出了。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四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朱森教授之死與尊師重道問題

中央大學地質系主任朱森先生最近因誤領平價米五斗問題受教部處分，氣憤而死，此事已引起重慶輿論界之注意，如大公報、新華日報等均有論列。據本月十七日大公報所載朱君友人李春昱、丁驪兩君投稿，據云朱君之死，係因其夫人在其從重大轉教中大的過渡期中，誤領重大去年九月份之五斗米，爲人告發後，教育部卽下撤職追米之處分之令，朱君因此氣憤，當卽辭職，旋因胃病復發，入醫院不治而死。其事之經過如此。

重慶各報對於這個問題所表示的祇是惋惜學校待遇不足以維持一個學者的一家生活，以致受逼而死。我們以爲問題的關鍵還不在此。我們是新聞界的人，不大明瞭現行教育的法令，但我們很懷疑，在最高領袖及教育最高當局再三提倡尊師重道的空氣之下，教育部是否應該對於一個學校教師有撤職處分之權。教師與公務員不

同，公務員是由任命而來的，教師則是由聘請而來的，前者是雇用性質，後者則是禮聘性質；前者是國家和人民的公僕，後者則是國家和人民的賓師。照我們中國的傳統習慣，師道與天地君親同一神聖而不可侵犯，照例私家聘請先生，稱爲西賓，東家對於西賓不但立於平等地位，且須竭誠敬之能事，先生的俸給不是薪水，工資，而是節敬，炭敬。先生即使發現有過失，東家亦祇能客客氣氣解約，而不能將其撤職處分。國立學校國家即是東家，教師是國家的賓客，而非雇員，因此國家對於教師不能以對公務員之態度對之，否則卽失尊師重道之意。世界各國固然有以教師當公務員待遇的，如日本各級學校的教師卽係官職之一種，其資格由任命得來，但此係蠻絡之俗，不足爲中華禮義之邦所效法。要講尊師重道，先得把國家對於教師的關係改正過來，一切官廳處分不得加於教師身上。

近來本市某校曾發起尊師重道運動，其用意未始不善，但考其辦法祇是由學生致送教師以米若干斗，這種辦法也不無可議之處。以送錢送米來增加師道的尊嚴，結果恐難免使學生認師長的目的祇在錢米，『通稱本是教書匠，到處都能僱得來，

「如不幸而有此觀感，結果恐師更不尊，道更不嚴。固然教師也是人，也要吃飯，且自五四運動以來，一部分不知自愛的教師爲索薪罷教的事，也所在多有。師道之淪夷，不始於今日，但今日而欲恢復師道尊嚴，則必須對於教師的人格加以尊敬，從精神道義方面提高教師的地位。從事教育的人，也應該以此自勉。」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廿六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同盟國應急取攻勢戰略

目前世界大戰中有四個重要戰場，第一個是中國戰場，第二個是蘇聯戰場，第三個是埃及戰場，第四個是西南太平洋戰場。這四個戰場的勝負，雖互有影響，但對同盟各國的任務和利害則顯有輕重之別。如中蘇兩戰場，則由中蘇兩國各自獨立支持，而埃及戰爭則由英國擔當，西南太平洋戰場則由美國負責，這固然由於地理環境使然，但同盟國家間的軍力，人力，物力，尙未做到共同使用，通力合作的境地，則顯然是一件憾事。反之軸心國家則在各戰場常能收互相呼應之效。譬如最近德軍正在以最大力量進攻斯大林格勒，而隆美爾將軍亦在埃及發動攻勢，以牽制英國在中東之軍隊，阻其向高加索增援，如果隆美爾之軍隊能佔領埃及，奪取蘇彝士運河，則可進窺伊朗，伊拉克，而圖與倭寇會師於波斯灣。日本在浙贛線上及粵南所撤之兵，無論其將用以攻印或侵澳，或與德國夾攻蘇聯，但具有與德軍互相呼應

之作用，則爲顯明之事實。從整個的局勢看，同盟國仍取守勢，即仍居於被動的地位。這幾年來，同盟國之所以着着失利，最重要的原因，即在於採取守勢，靜候敵人之來攻。而一遇敵人之閃擊，則措手不及，遭受不可挽回之打擊。自然，採攻勢必須先有相當之準備，但如必待準備完成而始發動攻勢，則時間之因素將成爲敵人之友。例如同盟國船舶之供給，雖英美兩國正在加緊生產，但如不積極打擊軸心國潛艇、飛機之活動，則生產之數字將不能填補沉沒之噸數，而同盟國之船隻，不能一天一天增加，將要一天一天減少。所以同盟國家必須改變戰略，即在攻勢中加緊準備。所謂開闢第二戰場亦即採取攻勢戰略之一種具體表現而已。敵人聞開闢第二戰場之議，未嘗不惴惴於懷，不知同盟國究將向何處進攻。因爲略地既廣，不能處處設防，時時戒備，如果要處處設防，時時戒備，則敵人的兵力就分散了，就難以集中兵力採取攻勢了。至於同盟國之攻勢目標不限定於歐洲、非洲或亞洲，最重要的是要使各戰場的戰事能收互相呼應合作之效。換言之，要使同盟國的力量能夠靈活地聯接起來，然後才能夠聯合作戰，因此同盟國中的中英美蘇四大主要國家的力

量必須如周身之血脈互相貫通，聯合使用。而中東、印度、澳洲、海參崴諸地自同盟國之戰略觀之，在今日實居於極重要之地位，要保持這幾個戰略上之要點，不能僅以增強防禦爲已足，尤須造成一種使敵人無力進攻，或無暇進攻的形勢。這就要同盟國先採取攻勢了。如果我們能在西南太平洋、緬甸、遠東及埃及同時實行反攻，則澳洲、印度、中東即可獲得安全，而日寇對於蘇聯亦就無力抑且無暇進攻了。這就保障了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增加了其對德的作戰力。倘英美能在歐洲大陸進行突擊，或佔領作戰的據點，則更足以減少德國對蘇聯的壓力。現當日寇又圖蠢動之時，同盟國應先下手，使日寇無法再逞狡計。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七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民國卅一年國慶獻詞

今天是辛亥起義，創造民國的第三十一週年紀念日，也就是抗戰第五年的國慶日。吾人回想過去締造之艱難，目擊當前責任之重大，敬述所感，以當獻詞。

辛亥革命不是一個普通朝代的更易，而是中華民族建國的開始，一方面推翻了滿清的統治，革除了數千年來的專制政治，建立一個嶄新的民主共和國，同時要排除列強的特權，建設一個統一獨立的現代國家，所以雙十節是最值得我們慶祝的一個紀念日。但是中華民國雖已誕生了三十一年，却無日不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之中，建國工作迄今猶未完成，一半固由於我們自身努力的不足，一半却由於日本的肆意破壞。它存着獨霸東亞的野心，所以不願中國建國的成功，中國如果成功了一個統一獨立的現代國家，則日本的野心自然無實現的可能。所以它時而挑撥離間，製造我們的內亂；時而出兵干涉，扶甲倒乙，破壞我們的統一；最後則竟不顧

一切，悍然出動海陸空軍實行企圖武力征服中國。所以我們五年餘的抗戰，也可以說是在掃除這建國工作的最大的障礙物，也就是在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大業，這自然是一件最艱巨的工作。

我們回想滿清末年，政治腐敗已達極點，然而如果沒有徐錫麟、彭家珍之躬行暗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壯烈殉國，譚嗣同之從容就義，以及無數先烈之斷頭流血，則腐敗的清廷也是不會如此容易推倒的。所以辛亥革命的成功是無數先烈流血得來的代價。今日我們的敵人是一個積數十年準備的強敵，我們今日的工作是要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建設一個獨立自由統一的現代國家，則不付更大的代價，如何能夠成功？所幸抗戰以來，上下一心，精誠團結，開民國以來未有之新紀元，所以軍隊愈戰而愈強，民心愈戰而愈奮，外援愈戰而愈厚，國際地位愈戰而愈高。現已一戰而躋於四強之列，百年來不平等之桎梏即可解脫，這都是我最高當局領導有方，將士勇忠犧牲所獲得之代價。然而敵人猶在掙扎，正在加緊分化的工作，不觀乎敵國特使又在逼汪逆訂立賣國密約乎？故最後勝利之獲得猶待吾人更大之努力。

建國工作之障礙還須作徹底的掃蕩。我朝野自應加強團結，精誠合作。全國軍民更應奮發淬勵，齊心努力，以完成先烈未竟之大業。這樣才足以慰我先烈在天之靈，吾人於悼念先烈遺澤之餘，願以此與國人共勉焉。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把握物價問題的中心點

目前抗戰形勢日趨好轉，軍事政治均無大問題，大家所最憂心的是物價的不穩定，因而有促進財政經濟危機的可能。這一次國民參政會對於這個問題也特別注意，結果蔣委員長所手訂之加強管制物價方案經參政會之無條件擁護而通過。我們以為目前的物價問題不但是抗戰的一個暗礁，並且是國民政府施政能力的一個試金石，因此願貢獻一點基本的意見，以備政府及社會人士之參考。

要解決物價問題，必須對於年來物價飛漲的原因有一種正確的認識，而把握其中心要點。近來一般以耳代目者，往往把物價高漲的原因歸罪於貨幣膨脹，甚至對某部分政府當局私人加以攻擊，似乎以為只要某某二人一去，物價立時可平，這種論調實在是非常淺薄。姑無論抗戰時期，收入減少，開支浩繁，尤以軍費戰費支出佔國家歲出的最大宗。我們既不能贊成一般漢奸心理者所暗中希望的停止抗

戰，則軍費戰費即不能減縮，因之財政開支也不能減縮，財政當局個人無點金之術，則除增稅以外，財政收入自不能不仰賴於舉債，向國家銀行以公債抵押的結果，又不能不使貨幣籌碼增加，這都是情勢的不得已，任何國家在戰時都不能不走此路，任何人士臺都不能不採用此法，以之歸罪於一二個人，未免非平情之論。貨幣籌碼增加自然就是貨幣膨脹，一定要說增加不是膨脹，也是欺人之談，不過若將物價問題完全歸罪於貨幣膨脹，也與事實不盡符合。現在物價較之抗戰以前的增長平均指數約在五十倍左右，有些物件如五金電料之類竟有漲至數百倍者，現在國家發行通貨的總額數字不可得而知，假定估計抗戰前的發行總額為二十萬萬元，目前的發行額為六百萬萬元，此種估計或大致去事實不遠，這樣是通貨較抗戰前膨脹了三十倍，物價如果單與貨幣有關，則也祇應漲到三十倍，不應該更漲到五十倍乃至百倍以上。所以通貨膨脹當然是物價問題的一個重要的原因，無容諱言，但並非唯一的原因。

當然物資保有者和販售者的乘機漁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政府當局要決

心制裁奸商，也不失爲一種辦法。但商人唯利是圖乃是他的本業，我們要商人不謀利，坐視他的資本因物價高漲而日日縮減，也非人情之常。況且目前的情形，居奇者雖均爲擁厚資之人，而囤積者則並不限於此輩，一個車夫，一個女工，一個有數口之家的公務員，今天多買了一升米，明天多買了幾尺布，也不能不說是囤積，也不能說對於刺激物價沒有一點關係，但情理是可以原諒的，不能一筆抹殺都謂之爲奸商。

商人的居奇是爲着營利，過分營利罪雖可誅，但殺一並不能儆百，老百姓囤積是爲着避害，情理更有可原。趨利避害本來是人類的天性，我們不能不教人趨利避害，也就和我們不能不教水往下流一樣。治水之法，與其用人工築堤，千方百計以障水之就下，一旦堤防失固，將有潰決之虞，倒不如因其勢而利導之，使水不爲人害而轉爲人利。鯀堙洪水而失敗，因爲他逆水性而行；禹疏百川而成功，因爲他順水性而能利導。理財之道正如治水，用「堙」的方法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只有用「疏導」的辦法才能有效。我們中國的傳統政治就是重疏導而不重堤防，史記上說：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是中國政治哲學的精華。與水爭地，必受洪水橫決之害；與人民爭利，其害更不堪設想。我們願談物價問題者要把握住此點。

至於經濟疏導之策應如何，以後容再別論。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管制物價問題之關鍵

本年國民參政會所通過之蔣委員長手訂之「加強管制物價方案」，近經中樞各主管部門精密檢討之結果，已擬定具體實施各種辦法，自明年起即將一一付諸實施，其要點不外實行限價政策，而限價之標準則根據國民黨十中全會之決議，以糧價鹽價作為限價之標準，此種決議，大體合理，因糧鹽二物不但為人生日用所必需，且政府手中握有物資，易於調節也。

惟一般物價問題內容複雜而多端，非若糧鹽二物之簡單，實施之際，障礙甚多，必須事先了解問題之所在，而加以預防，始不致出爾反爾，壞信長姦，茲願本同人所見，一商榷之。

按欲求限價之成功，其要在政府能掌握物資，糧鹽兩物之價所以尙能維持一定標準者，以政府掌有此二物也。一般物資，種類繁多，性質各別，既非政府所盡能

掌握，且有根本即不敷應用者，如棉紗布疋之類，故物價之節節上漲，原因雖多，而物資缺乏實爲原因中之最主要者。以事實而論，近年以來，物價上漲之程度，與物資之供求問題，仍有密切之關係。需求雖多，而供應不缺，縱使受奸商操縱，其上漲仍有一定限度。近一年來，據各種統計，物品上漲之勢最低者，莫如肥皂，肥皂爲人人所必需，然因製造簡易，材料可取諸當地，製造廠商甚多，故價格始終不能高抬。又如紙張，需要亦廣，然因產量較多，故價格雖漲亦不能過高。又如五金類爲物價上漲之最高者，其中有較戰前漲至一千倍以上者，蓋以物資來源完全仰給國外，而又爲軍事所必需，然據報載，昆明因存有洋釘若干萬箱，故五金飛漲，而洋釘獨不能漲，此皆可見物資問題實爲物價問題之關鍵，若物資供求平衡，雖商人百端操縱，亦無法使之必漲，若物資之供求不能平衡，則雖政府繩以嚴刑峻法，亦不能禁物價之不漲。如衣著中之棉織品，因中國根本缺乏紡紗工業，戰前早已仰給於洋紗，棉花產地又多淪陷，故物資早已不能供求平衡，無論用任何方法限制，恐終難限其不漲。反之如糧鹽二物，中國產量尙足，故雖漲而不能過鉅也。

由此可見，欲求貫徹限價之目的，莫如增加物資，節制消費，其應著手或注意者約有以下數點：

一，保障生產者之利益 近年物價飛漲，獲利者僅為投機商人，其餘正當之工業生產者，如廠商、製造商之類，早已因物價與工資之高漲而陷於不能維持之窘境，農民亦因所產物之受種種限制，而不能繼續生產，如綏遠之糧食，陝西之棉花，俱因政府限價過低，而形成怠產現象。此種情形，非常可慮。政府在實行管制物價之時，應特別注意此點，對於工農之生產者利益，宜特加保障其合法利潤，不可但注意於財政或其他眼前利益，而陷於殺鵝求蛋之錯誤政策。

二，防止物資外流 嚴格管制物價之結果，使淪陷區之物價高於後方，最易助成敵偽套取我物資之危險，政府雖嚴密防杜，然利之所在，非他力所能遏止，前方游擊商人之活動能力，實至可驚，不幸物資為敵偽套取，而淪陷區之法幣源源回流，其結果實不忍言。此點必應考慮。

三，實行全面管制 管制必須全面，各種物價連工價在內，必須普遍限制，且

須深入內地，統一管制機構，始能收效。歐美各國管制物價政策之易於成功，因其社會早已大工業化，政府但使對各大工商業部門加以統制，即可生效。我國則土地廣大，至今猶屬農業社會，集中管制，非常困難。若不能全面管制，一物限而他物漲，一地限而他地漲，則徒使商品逃避，政策失效，此亦應密切注意者。

四，實行管制消費 欲物價不漲，莫如嚴格管制消費，最好從公務員及其家屬入手，政府宜制定公務員制服，使一律服用，則衣著之費省；宜爲公務員及其家庭設立機關食堂，強迫用餐，則伙食之費省；宜澈底禁絕一切酒食宴會場所，娛樂場所，奢侈品售賣商店，一律不許開設，則應酬等無謂浪費省。社會上消費量減少，則物資之浪費可少，但須高級長官以身作則，否則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雖令亦不從也。

以上四點若能辦到，則物資問題或可解決，而物價不限而自平矣。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紀念牛頓出世

昨天是英國大科學家牛頓的三百年生辰，本市各大學將於今後數日中舉行紀念儀式及科學講演會，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舉動，故特爲文以祝之。

牛頓出世已經三百年，這三百年中世界科學的發展已遠超過牛頓之所期，牛頓所苦心經營的天體力學已爲愛因斯坦所修正，牛頓生前曾說：科學譬如大海，我不過拾了些海邊的貝殼而已，這話是事實，並非謙辭。肯說這老實話的牛頓適足以證明其偉大，遠非一般坐井觀天，自命不凡的妄庸餘子所可比。

今天去牛頓出世雖然已經三百年，但我們中國還沒有產生牛頓這樣一位偉大的科學家，還需要重新認識牛頓，學習牛頓，把牛頓的精神整個移到中國來。

牛頓生於一六四二年，就是明思宗崇禎十五年，大科學家伽利略恰好卒於這一年。西洋近代的科學思想在明亡前六十年已經輸入了中國，一六四三年方以智著一

物理小識」，已經展開了國人對於物理學的研究，不幸以後三百年中，中國士大夫的心思才力誤用於文獻考據之學過久，忽略了對於自然科學的研討，以致在科學研究上落後了三百年。這三百年的落後非同小可，中國近代的一切恥辱都是由此而起。現在，科學的口號在中國已經普遍化，但科學的根本精神和真正價值還未爲一般人甚至文化界的領導人物所了解，一切反科學、僞科學的思想還在普遍籠罩着，特別是近二十年，反動的復古思想一天一天復活起來，學術文化界弄得烏煙瘴氣，牛頓如有知，真不知爲這個不長進的民族如何痛哭流涕。

我們今天紀念牛頓，不但要接受牛頓在科學上的貢獻，並且要學習牛頓的精神，牛頓的精神是什麼？第一是遇事肯思索的態度，見了蘋果落地就要追根究底；第二是爲學問而學問的態度；第三是虛心的態度，這三個態度就是牛頓所以成功之點。特別是虛心的態度，今天中國學術界是太缺乏了，我們需要努力養成這種風氣，才不愧紀念牛頓的一番舉動。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廿六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應該紀念的幾種國家恩人

中華民國在多災多難之際，已經辛苦渡到了第三十二年，回憶三十一年之前，國基初定，民志未一，帝制餘孽和野心強鄰環伺內外，待機而發，內有洪憲復辟等亂，外有二十一條的國恥，在當時的人誰敢保中華民國會到了三十二歲。但是畢竟已到了今天，並且勝利在望，國運方隆，這就是三十多年來志士仁人爲保衛祖國，擁護民主，流血斷脰而不辭的功勞。每一個中國國民都不應該而且也不會忘記。

今天已是民國三十二年的第二天，這就是說，我們自從二十六年七七抗戰發動後，已經戰到了第七個年頭，這七年以來，支持國家半壁江山，抵住敵人數百萬大兵的，是靠著誰？七年以來，我們在前線，在淪陷區，死了無數的官兵，至今還有五六百萬大兵在拚命禦敵，這些官兵們大多來自田間，平日國家在太平之際，享福沒有他們的分，今天國家到了生死的關頭，却把抗敵衛國的責任，完全交在這一

人身上。我們如果想一想前線士兵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再想想他們在後方留下的眷屬過的又是什麼樣的生活，再拿來和後方一般驕奢淫佚的富紳豪商生活比較一下，怎麼還對得起這一般抗戰的弟兄，這又是不應該忘記的一件事。

再者，抗戰七年以來，淪陷了幾多省分，甚至如東北四省，在十二年前就已淪入「王道樂土」的地獄，今天後方各省的人民，以及徼倖逃到後方來的一些戰區的人士，承天之幸，過的還是照常的生活，兩下比較起來，應該如何悲痛？如何憤慨？聽說有些地方甚至高等學府裏，還在分戰區、後方兩種壁壘，互相讎視，互相攻訐，這真是喪心病狂到萬分的心理。我們聽了這些消息，真是痛心，我們希望在後方互相排擠衝突的一些壁壘，能夠多想一想淪陷區域的同胞過的是什麼日子，也許良心可以發現一下，感情可以略平一些。

還有不可忘記的是，這七年以來，在國家地方機關服務的公務員，在教育界服務的大中小學教職員，他們過的是什麼日子？抗戰的結果，使少數一部分人肥了，越肥了，但大多數的素來清苦的人士，却越清苦了，越瘦了！爲國家犧牲是他們的

本分，不敢叫瘦，也不應該叫瘦，但國家和一般人民也應該不要忘記抗戰是全體國民的責任，不能任聽一部分人瘦，而他部分人却越吃越肥，如果抗戰祇是爲少數人發財升官，這情形是應該早點改變的。

抗戰以來，人家說農村繁榮了，農民生活提高了，但實際上享受土地和農產物增進的利益的，却祇是少數的地主糧戶，大多數的農民，不但並沒有什麼好處，而且徵兵、徵工、支差、攤派，比以前更加繁重。中國的國家是靠農人支持，抗戰勝利，他們得到的好處比別人少，但是抗戰的擔負却完全出在他們身上，這種情形，豈得謂之公平？我們如果不趁現在解決這個土地的問題，戰後的問題恐怕更還要嚴重一點，我們能夠忽略這個問題嗎？

自從抗戰以前，有多少義勇軍人和青年，在前方山凹水涯裏，打游擊，殺敵人，他們吃不能飽，臥不安枕，整天整夜過着非人的生活，吃的苦比正式軍人過甚，但是還得不到正式軍人的待遇，甚至稍一不慎，因誤會而送命或失去自由的，也所在多有。試想，如果不是有這一般傻子拚命拉住敵人的後腿，使敵人處處防

範，處處顧忌，敵人能夠有今天這樣狼狽嗎？有些安然坐在後方的人，還在高談闊論罵這般人爲輕舉妄動，我們聽了真有些難過，並且也替這般說話的人羞恥。

最後，我們還不可忘記在國外，在同盟國家淪陷的土地內，在敵人的勢力範圍內，有若干萬流離失所的僑胞，他們過的是一樣非人的生活。在抗戰以前和抗戰初期，海外僑胞對於祖國的貢獻真是仁至義盡，到今天，我們還不能拯救這般僑胞出於水火，我們太對不住人了，也太對不住祖宗了。

俗語說：「有恩不報非君子」，中國是君子之國，中國文化自來就以報恩爲第一義。建國三十二年，抗戰七年，我們辜負了許多生死的恩人，從今以後，再不許忘恩了。一個人在吃一口飯、喝一口水的時候，都應當想到上列的這些恩人！特別受抗戰之賜而有官可做，有財可發，有權可掌的人，更應該飲水思源，把這些人的長生祿位牌供在他們的大廳上，否則便是狼子反噬之徒，抗戰勝利，罪在必誅。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二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中土友誼之回顧

土耳其報界同人最近組織訪問團，訪問西南亞洲及非洲各國，遠抵印度，雖因該團內部關係，中止訪華之舉，但已表示將來有特組團體，專誠訪我之可能。記者願趁此時機一述中土過去之友誼，以促進兩大民主國家之相互認識，而奠定亞洲民族聯合之基礎，並特以諗吾友邦同業。

土耳其爲吾同洲同種之友邦，其民族發源於中國境內，六朝隋唐之際，突厥民族武功政術焜耀於中國史冊，人皆知之，而不知其來源或更古於此。當我漢族始祖黃帝奠定中夏文明基礎於西元前二十七世紀之頃，蒙古高原卽有獯鬻民族崛起於北方，至周謂之玁狁，戰國末年至漢謂之匈奴，其民族實卽突厥之祖先也。匈奴在秦漢之際，經偉大領袖冒頓單于之努力，蔚成北方亞洲之游牧大帝國，與南方漢族之農業大帝國對峙凡二百年之久，彼此關係或爲和親，或爲武力，而和親之時尤

多。漢朝公主宗女嫁爲匈奴閼氏（卽皇后）者，凡有數人，其後匈奴分裂爲南北二部，南匈奴入居長城以南，漸與漢族同化；北匈奴遠徙歐洲，建設匈牙利王國於多瑙河中流，其留居塞外者，至東漢中葉，西元後二世紀頃，歸化鮮卑，其統治者雖號稱爲東胡民族，而人民實匈奴之遺族也。自後乘中國西晉末之亂（西元四世紀），匈奴鮮卑入據中國本部，建設多數國家，逐漸與漢族完全同化，因有隋唐大帝國之興起。中國史上武功文治號稱極盛之偉大領袖唐太宗，其母族竇氏卽爲匈奴大人之後裔，而太宗之外祖母，又爲北周宇文氏之公主，亦卽鮮卑人種，故唐太宗本身實爲漢族與匈奴、鮮卑三大民族之混血兒，而匈奴鮮卑實爲一族，亦卽突厥民族之先輩也。其留居塞外者，至西元五五五年，經民族偉人木杆可汗俟斤之領導，始統一漢南北及新疆一帶，建設新的大帝國，卽突厥帝國，當其盛時，勢力直達亞洲西部。後雖因內部分裂爲東西突厥，而爲隋唐所戰敗，然其餘部遠徙小亞細亞，至西元十一世紀，遂有酋長塞爾柱克率部進入回教名都巴格達，建設塞爾柱克土耳其王朝，完全濡染回教文化，與歐洲基督教國家從事護教戰爭至二百年之久。

至十三世紀末年，又有鄂斯曼土耳其繼興於小亞細亞，四百年中，名王迭出，覆滅東羅馬帝國，威震東歐北非，以澳罕王與我國之明朝正德同時，即今之土耳其人也。

十九世紀以後，此亞洲東西兩大民族同爲歐人所侵略，均趨衰微，土耳其有近東病夫之稱，我國亦蒙遠東病夫之諺。土人不甘失敗，乃有土耳其青年黨之組織，卒於一九〇八年發動革命，推翻專制，改建君憲，而我國亦於一九一一年推倒滿清，建立民國。土耳其自革命以後，外患迭乘，疆土割裂，至上次歐戰之後，簽訂綏佛爾條約，國幾不國，幸經民族英雄凱末爾崛起，與希臘血戰二年，卒獲全勝，光復故土，取消不平等條約，完成獨立自由之新民國。我國今日在偉大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對日抗戰已達六年，其規模之大，犧牲之鉅，自較土耳其當日更爲艱難，然所取之步驟，實與土國無異，則最後勝利之必然到臨，亦可以土國之先例卜之也。

此次歐戰爆發之後，土國雖尙守中立，其同情實在民主國家方面，聯蘇聯英不

遺餘力，最近訪問之舉，尤足覘其意向所在，特格於形勢，尙未能公然表示左袒耳。一旦土耳其崛起參戰，卽爲軸心國家敗亡之日，吾人可以預卜之。

抑吾人尤有進者，中土兩國同爲亞洲之獨立大國，土國爲近東回教諸國之心，而對於其他國家只有扶助，從未以領導自居，更無侵略野心，其情事實與我國之在東亞相若。彼日寇嘗以大亞洲主義自居，然其對於亞洲諸國，只有侵略，並無扶助聯合之誠意。今後吾亞洲民族如欲建立光明之前途，既不可一味仰仗他族代謀，亦不可蹈日本之覆轍，必須首先合力擊敗妄想征服亞洲之日本，然後團結同洲各國，建設亞洲集團，與歐美各民主友邦，共維世界之永久和平，此則中土兩大亞洲國家所尤應聯合特別努力者也。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廿二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瑞德關係的惡化與納粹的北顧之憂

現在歐洲僅存的中立國家，除梵蒂岡教廷外只有五個，即瑞典、瑞士、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在這盟軍進攻歐洲大陸的前夕，這幾個中立國的向背却足以影響大局，特別是瑞典和土耳其，因為他們的軍略地位很重要，國力又相當充實，舉足可以輕重之故。最近瑞典政府於本月五日宣布取消瑞德火車假道協定之後，使德國在挪威的駐軍頓與本部失去聯絡，對於納粹的打擊甚大。今後瑞德關係的發展如何，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因為這不但關係於納粹在斯坎的納維亞半島的勢力消長問題，我們也須記得從西北歐去進攻德國，正是打擊納粹心臟的最捷之路啊。

瑞典政府拒絕德軍假道的動機是由於人民的要求，本年四月四日，瑞典總理韓森在法隆論及德軍無假道瑞典之必要，即謂國人對此事不無憤慨，當時瑞人鑒於德軍在挪的暴行，憤慨日深，對韓森政府的對德敷衍態度日形不滿，瑞政府為平息國

人之怒起見，乃於六月中旬宣布在四個月以內禁止外國船通過瑞典西南的斯略格爾克海峽，原因是因爲在瑞典的領海中，有兩隻瑞典潛艇——烏爾文號和德拉根號被擊沉了。那次的宣布已經使德挪之間的海上軍事交通線受了重大打擊，此次又把陸上交通完全封鎖，奎斯林的傀儡政府從此遇了緩急不能向主子乞求更大的援助了。

瑞典是道地的諾狄克（北歐）人種，納粹主義所宣傳的世界最優秀的人種神話，惟瑞典可以當之無愧。因爲人種和文化的接近，所以上次歐戰和這次歐戰的最初幾年，瑞典人的同情都比較地傾向德國方面。在一九四〇年，瑞典曾經拒絕英法軍隊假道運往蘇芬前線，但却允許德國假道運兵往挪威，他們堅持說德國的過境軍隊是不帶武器的。

瑞典人的反德心理開始於德軍侵佔丹麥挪威之後。自從德軍無理地突然佔領丹麥，又趕走了挪威的正統君主及其政府之後，瑞典人才感覺到納粹對於這些神聖的北歐人種的國家也並不尊重他們應有的獨立自由權利，不禁起了一種冤死狐悲之感，從此以後，瑞典一面在社會民主黨領袖韓森所領導的四大黨聯合的政府之下，

對德國儘量敷衍，以求不受侵略；一面在總司令多爾納將軍主持之下，暗中訓練軍隊，充實武備。現在瑞典已有了國防軍七十萬，約有一半夠得上作戰師團的水準，到緊急時期並且可以動員更多的人；能夠自造輕型武器，和瑞典自製的博福斯高射砲和平射砲。缺點是沒有足夠的坦克和重武器，戰鬥飛機也很少，但即使這樣，已使德國非用至少五十師的兵力不能夠對付了他，這就是瑞典對德的態度所以一步一步強硬之故。

目前瑞典與挪威正統政府關係仍然是很密切的，瑞典政府最近會任命約翰具克佛里斯男爵作挪威老君主哈康的倫敦流亡政府的代表，這就是對於兩潛艇被擊沉事件的間接報復。至於瑞典人民對挪威的同情及對德軍的憎恨則更明目張膽，日趨激烈。在本年的挪威獨立紀念日，瑞典全國會舉行普遍的示威運動，瑞挪兩國國旗到處交叉，皇家歌劇院特別表演「皮爾·根特」一劇。當約翰斯坦貝克的「月落」上演的时候，羣衆歡呼雷動。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廳，安德隆教授預言說：「不久，山神們（指德國人）就會被打退到山裏去的，」並接着說：「一切的瑞典人，不管曾經

受過納粹主義的同化與否，現在都自動地說：「挪威的事例，比任何事都給我們以更多的教訓，教訓我們明白我們和所謂歐洲新秩序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自從一九〇五年挪威脫離瑞典而宣布獨立之後，瑞挪兩國間存有長久的嫌隙，瑞典人對於挪威的獨立紀念日向來是不會熱誠慶祝的，但是今年却例外了，瑞典和挪威又聯合起來了，促成這種聯合的，就是納粹德國對於北歐國家的侵略壓迫政策。

本年六月六日瑞典總理韓森曾在都拉維克發表演說，申明以軍力維護本國和平及自由之決心，外長耿室亦在森德維根發表同樣性質的演說，六月十七日韓森在議會答覆質問，又重申武力抵抗侵略之旨，都可以表現瑞典的態度已因國防的完全和人民的督促而日漸積極了。

瑞典也許仍然願意長久保持中立下去，和上次大戰時一樣，但就這樣也已經對德國打擊不小了，因為挪威德軍與本國聯絡失去之後，同盟軍隊便可以不費力佔領挪威，利用挪威的空軍根據地直接轟炸德國及中歐，並且可以由海上進攻德國，這

樣一來戰事就移到德國本土了，再加以芬蘭的接濟斷絕，必定早日投降，蘇聯更可抽調兵力進攻德國，納粹的命運就決定了。

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收復東北計宜早定

——爲九一八十二週年紀念作——

我們這次抗戰，除爭取本國的獨立自由及與同盟國家共維世界和平外，別無要求，對於領土的要求尤其不存野心，最近宋外長屢次宣稱，尊重朝鮮及泰國的獨立，態度尤爲光明磊落，惟對於我已失的領土，則必須整個收回，寸土尺地不能讓人，臺灣及東北各省均在其內。現當盟國勝利在望之際，我政府對於收復已失十二年的東北四省計劃，當已成竹在胸，我們站在草野的立場，對於這個重大的問題，願意貢獻一點蕪蕘的意見，以供政府參考。

東北四省的應歸我國收復，名正言順，本不成問題，但友邦少數不明真相的人士，過去尙不免受敵人的宣傳，而有戰後國際共管種種邪說，雖早經我國輿論加以駁斥，猶恐未能盡人皆能了解，況東北的國際關係素稱複雜，今後縱使日人完全退

出，若我不能急起直追，早作未雨綢繆之計，恐前途尙難免波折。我們以爲今天已到了着手東北善後布置的時機，政府應該利用這個時機，從各方面加緊布置，使將來日寇撤退之後，東北能全部完整返回祖國。其急應着手布置者有以下幾點。

一，軍事方面早應布置，使將來由國軍之手自行收回東北，而不必借助於任何友邦。將來軍事收復東北，必須與收復華北同時並進，不可使日寇主力退守關外，有負隅的機會。我們主張，在目前宜於塞外綏蒙邊境，建立收復東北的軍事策源地，集合東北軍力，選拔素負聲望的東北籍軍事大員，主持訓練新軍，補充器械，使成爲現代化的第一等軍隊，將來時機一到，即以東北軍隊收復東北，既可從塞外直拊長春，斷敵後退之路，復可使東北民衆曉然於中央並無畛域之分，安東北人民之心，卽所以加速日寇的總崩潰。

二，政治方面，應該把東北四省府機構加速充實，增加經費，集中人才，並移省府於近邊塞之地。在中央方面，亦應多起用東北人才，促進中央與地方的聯絡，使中央德化，決於邊區，人心始有「俟我后后來其蘇」的希望，收攬人心，宣揚德

意，即所以從政治上粉碎日寇的分化陰謀。

三，經濟方面，收復東北之後，善後諸端急需財政，以我國的國力恐難獨任此事，關於此點，宜本孫中山先生遺教及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最近決議案，歡迎外資合作，使東北建設計劃能加速完成，並可因國際投資的關係，使東北今後的地位多加一重保障。我們主張政府在目前就應該約集國內關心東北問題的人士，成立一東北戰後建設計畫研討機關，製定東北戰後建設計畫綱領，昭示內外，使國際人士了解我國對東北經濟開發的真實態度。

四，宣傳方面，日寇處心積慮，吞併我東北，十二年的統治，難免以教育文化政策麻醉我一部分幼稚的東北兒童，對國外的宣傳，復不免欺騙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友邦人士，我政府對於此宜急取對策，一面加緊招收東北流亡青年及民衆，加以訓練，使深入敵後方，從事宣傳工作，打擊日寇文化政策的毒謀，一面更宜集中國際宣傳力量，改變國際觀聽，使全世界人士俱了然於東北與中國的不可分離的關係，將來對我收復工作，影響必大。

以上四點，俱爲目前切要之圖，以政府的明哲，當早已見及於此。語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收復東北的時機今天已經成熟了，我們所以在這九一八十二週年紀念的日子，來對這個重大的問題，貢獻一點意見。

民國三十二年九一八新中國日報社論

我們願意當「東方猶太人」嗎？

前幾年德國的排猶事件曾經鬧動過一時，德國之所以採取這種殘酷的手段，不外是國社黨的一種政略，他的用意是製造一個攻擊的目標來團結黨人的意志，使狂熱的精神有所發洩。凡是一種革命的運動，和作戰一樣，必須時時刻刻使每個分子皆在緊張熱狂的敵愾同仇心理之下，始能免去懈怠渙散或黨內的自相紛爭。參加革命的人大抵都是不安分的暴烈之徒，這般人是不能一天沒事幹的，革命的領袖必須懂得這一點心理，時時製造共同對外的目標，「鬼有所歸，始不爲厲。」俄國共產黨政府，二十餘年來，厲行消滅資產階級，虐待白俄，高唱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屢次大興黨獄，實行捕殺「托派」，與德國國社黨政府之公開反對凡爾賽條約，實行援助國外被壓迫的日耳曼民族，高唱反共，反第三國際，和排斥猶太人，雖各有其特殊的動機，但革命政略的運用也是一個重要的原素。希特勒是最懂得駕馭羣衆，

操縱羣衆心理的，他之所以不惜冒全世界的大不韙來壓迫無告的猶太人，決不是盲目的瘋狂之舉。

這種政策對於德國前途的不利是很顯然的，我們記得德國之所以富強，乃是受了法國路易十四朝虐待新教徒之賜，當時成千成萬的新教徒因不堪法國的壓迫，都逃入普魯士境內，這些人都是勤苦幹練的生產者，普魯士驟然添了這許多幹練的生產分子，才頓時富強起來，這正是受了法國的短視政策之賜。西班牙自驅逐回教徒摩爾人出境以後，也同樣地陷於衰落。今天希特勒的短視政策，在政略上雖一時小收效果，而在民族前途上終是一種絕大的損失，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至於聰明才智的猶太民族，祇因爲自己沒有國家之故，到處受盡壓迫，更足令我們夢想世界大同的東方民族反省。

但是我們今天還沒有工夫來替他人擔憂，因爲我們中國人的命運也和這些猶太人差不多。你們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東方猶太人」嗎？這不是別人，就是我們中華貴國。這個徽號是誰送給我們的？就是我們的鄰人而兼仇敵的日本小鬼製造出來

我們願意當「東方猶太人」嗎？

打擊我們的，有事實爲證。

前幾年，暹羅曾有大捕華僑的事件，大家總還該記得，據一位深通暹羅國情的人說，暹羅國內近年來散佈一種排斥「東方猶太人」的流言，他們說，世界上除了善於吮吸他民族經濟利益的猶太人以外，還有一種「東方猶太人」更爲可惡，猶太人本無國家，所以寄生他民族內尙有可原，現在「東方猶太人」本來自己有很廣大的領土，却要跑到人家國裏去經商，去壟斷他國的經濟利益，這種人更非打倒不可。暹羅近年來屢次排斥我華僑，就是受了這種流言的暗示。

還有更駭人聽聞的，據說暹羅現在也高唱一種「收復失地」的口號，他們所謂「失地」便是指我們的西南各省。他們說暹羅與中國的苗蠻夷獠同屬馬來人種，自蚩尤時代就生聚於中國，數千年來受漢族「侵略」日漸南移，今天暹羅人應該發憤收復他們的失地，替老祖宗蚩尤報仇。

以上這些話自非暹羅人所能製造，當然還有一個原產地，這便是我們的東鄰日本。我們今天不要只顧東北、東南的問題，以爲西南各省可以苟且偷安，我們應該

及早注意這種隱患，同時更希望主持邊遠省分的大員和一般談民族問題及研究本國史的朋友，不要再無中生有標榜什麼若干民族聯合的政策，製造什麼解放弱小民族的無的放矢的口號，以及什麼漢族壓迫苗族的神話材料，以免在百孔千瘡的國事前途上更添出一個捷克式的少數民族問題。

我們中國人幸而至今還有國家，我們應該珍重這個國家，我們應該懂得無國家的猶太人所受的痛苦是怎樣地深？我們不是猶太人，我們要澈底消滅「東方猶太人」的侮辱之辭，我們要用舉國團結的精神和鐵拳的政策，來對付那些製造民族分裂神話的敵人和漢奸。

作於民國三十二年

我們願意當「東方猶太人」嗎？

六〇三

第二戰場開闢的前夜

前幾天有一個英國政府的負責人說過一句話，他說現在歐洲的形勢，已到了十二點前五分了，一切都準備好了，再過五分鐘，噹噹噹響過了十二下，一切就都擺出來了。

這是說的第二戰場的開闢問題。不錯，歐洲的局面現在已到了劍拔弩張的前一霎，「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單等諸葛亮唱過一齣「祭東風」之後，好戲便開場了。

現在歐洲的諸葛亮是誰？邱吉爾嗎？斯大林嗎？羅斯福嗎？我們不能說，這齣祭東風是怎樣一個唱法？繼續空中轟炸嗎？擺開第二戰場嗎？或者另有其他作法嗎？我們也不敢說。但可以指出幾件事實來。

第二戰場之所以遲遲不曾實現，固然是由於軍事的原因，但也許還有軍事以外

的其他原因。第二戰場的開關是一個問題，開關之後必須於最短期間取得決定的勝利又是一個問題。若是戰場開關之後，不能於短期間取得決定的勝利，致又演成長期拉鋸戰的狀態，則於盟國目的仍相背反，故在第二戰場開關之前，必須做下奠基的工夫，這就是說政治外交的工作必須與軍事工作同時進行，先期成熟，打起仗來，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下列幾方面是盟軍所必須切實注意的：

第一是主要盟國間的彼此協調。在這上面除了第二戰場的本身就含有協調的政治作用以外，如英蘇對波蘭的問題，對巴爾幹戰場的問題，美、英、蘇對義大利巴多格里奧政府的問題，美英對遠東戰場的問題，必須都求得適當的解決，才能免於步調參差。

第二是盟國間主要國家與附從國家間的協調，其中如蘇波的爭執，如英蘇對南斯拉夫的態度，如英美對阿拉伯聯邦及猶太人建國問題的態度，如巴多格里奧政府的地位，如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地位，都是待決而未十分決定的問題。

第三是盟國內部的政治問題，如自由法國戴高樂派與吉羅德派的關係，如義大利保王派與民主各黨的關係，如南斯拉夫開羅政府與狄托元帥的關係，都有急待調整的必要。

第四是對中立國家的態度和政策，其中包含有土耳其參戰問題，愛爾蘭封鎖問題，西班牙對盟國的關係問題等等。爭取中立國轉向是盟國軍事勝利的一個主要基礎。

第五是瓦解軸心的附庸，這在義大利內變事已獲成功，但如蘇芬談判的頓挫，也許影響到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的態度，因此軸心的附庸尚須加緊爭取，特別是維琪法國的向背可以影響軍事全局，現在希特勒力爭先着，已經對匈牙利實行下手了，盟國必須不再徘徊，致使挖牆腳的工作功虧一簣。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從德國內部挖穿納粹統治的壁腳，據傳巴本在土耳其的活動與其本國普魯士軍人派的推倒希特勒以與盟國媾和的運動相關，這固然也許是對方的宣傳作用，但我們相信這是可能的，因為希特勒與普魯士派軍人政客之間

原有鴻溝存在，不過這一切却待爭取。

我們相信老謀深算的盟國政治家，必定早已對這些問題一再考慮，從事準備的工作，所謂只欠東風，也許就是欠這些，這些問題解決之後，第二戰場便可以順利完成了。

但這些問題果是容易解決的麼？我們以為有些問題不是在這個時期即刻就能求得適當的解決的，因為這裏邊包含有若干矛盾，我們以為關於盟國間的政治問題，最好留待戰後解決，免致因政治影響軍事。目前盟國急需的政治工作，是爭取軸心內部的瓦解，要做到這一層，必須把盟國一向高調的理想態度稍為修正得與現實情形符合一點。從前美國南北戰爭的起因本是為蓄奴問題而起，但林肯總統在戰時却並不談奴隸問題，祇以維護統一，反對南方分裂的大題目來宣傳，等到勝利已有把握，又不等到戰爭結束，而突然片面宣布奴隸解放令，這是最實際的政治態度，盟國的政治家應當以為模範。漢高帝封雍齒以安反側，王韓信以定三齊，政治家的手腕應該如此。

至於歸根到底，必須軍事上打幾個勝仗，才能促進政治工作的速成。所以第二戰場的開關不能等待到政治準備成熟以後，必須擺在政治工作之前。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四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祝福甘地先生

甘地先生被釋放了，雖然是因爲健康的理由，並且是在甘地夫人不幸病故之後，依然是一件全世界歡喜的事情。

甘地先生不但是印度的偉人，並且也是全世界人類的巨星，他的健康和自由是一向爲全世界人類所注目的。現在世界上不少的是英雄豪傑，但少的是聖人，以道德力量來過問政治的聖人，甘地不是豪傑，但他比豪傑們還具有更大的力量，這就是道德的力量。一個領袖儘可以武力或政治力量制服人家的反對，但却不能使人家心悅誠服，只有以道德爲基礎的領袖，才能使人心悅誠服。甘地就是這樣的一個偉大的領袖，他是王道型的，與一切霸道型的政治領袖，全然不同，這就是他雖然沒有尺土一民之資，而能夠感動全世界人心的緣故。

因此，我們雖然不是印度人，也不便過問英印間的一切政治問題，但對於甘地

先生的健康和自由總不能不時關心。我們老早就希望甘地先生能夠恢復自由，保重身體，現在居然被釋放了，不能不佩服英印當局的畢竟開明。

所遺憾的是甘地夫人未能以同樣的理由早日釋放出獄，以致身死囹圄，使甘地先生留下永久的遺恨。

還有遺憾的是尼赫魯及一切國民大會的領袖們尙未能隨甘地之後同樣獲得自由，以致印度問題迄今未能解決，使敵人尙有藉口的餘地。

現在鮑斯及其一派的親日印度人，勾引日軍進窺科希瑪，所藉口的就是印度尙未獲得獨立自由，所以印度的獨立自由是驅逐日寇出境的一個最有力的手段，而釋放國民大會黨人又是恢復印度獨立自由的第一步，一切遠東反日的民族，都關心這個問題。

盟國作戰的目的，是爲着全世界人類的自由正義，並非專爲本國的利益。根據邱吉爾先生和羅斯福總統所訂的大西洋憲章，尊重民族的自由是盟國作戰的主要原則，此憲章也可適用於太平洋方面，也已經羅斯福總統聲明過，印度問題的解決是

否可以尊重印度民族的自決，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情。我們知道印度內部尚未能完全和洽一致，政權的糾紛尚多，英國對印度也有種種不能放棄的理由，但事實上印度內部的糾紛和英印的關係都應當以印度恢復獨立自由爲入手主要條件，印度自由一旦恢復，內部的糾紛自能以訴諸國民公意的手段來解決，而英印的關係也當更趨圓滿。試觀澳大利亞、新西蘭、南非洲、加拿大等自治領，在未獲得自治權之前，與既獲得自治權之後，對於英帝國的幫助孰大？英國人是一個開明的民族，素來重視自由，對不同民族的愛爾蘭人尙能畀以自由，印度的民族比愛爾蘭大的多，地位也重要的多，印度問題和愛爾蘭問題向來就是英國帝國政策中的兩個瘤，現在右面的一個瘤早已割去，左面的一個瘤也到了該動手術的時候了。我們希望邱吉爾先生和甘地先生這兩大偉人要趁這個時候替英印兩大民族樹立千年和好的歷史基礎，則太平洋上的諸民族必能均蒙其福。

爲着這個理由，我們敬祝甘地先生早日恢復健康。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九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政治與軍事

在抗戰時期，舉國上下都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爲號召，這自然是天經地義，但如何才能達到軍事勝利的目的呢？這就不是很簡單的了，因爲軍事勝利有其先決的條件，這些條件不一定都是屬於軍事的，有如政治方面的設施和做法，雖非軍事性質，却可以直接影響到軍事方面，政治上如果措施得宜，必可以促進軍事勝利的早日到臨。

譬如此次河南戰事，在日寇雖係臨死前的掙扎，但其勢也不可完全輕視。野獸到了臨死的時候，鋌而走險，其反噬的力量必倍於平日，此次河南的戰事雖結果日寇必將蹈前幾次湘北戰事的覆轍，抱頭鼠竄而去，但就眼前講，日寇的野心和毒計都比那幾次湘北戰事更加兇險。前幾次的戰事，日寇的目的是在虜掠物資，破壞我經濟力量，並不見得有深入的計劃；此次河南戰事，則除經濟目的以外顯然尙有其

他更大的目的。因此我們對於此次戰事也不可以輕心掉之，我們不可狃於前幾次湘北戰事的結果，以爲日寇之志仍不過在虜掠，必須警覺他有更險毒的陰謀而須以全力應付之。

談到全力應付，就不單是軍事的事了，目前我政府在西北一帶，駐有大兵，本不懼日寇的西犯，此一路大兵如能抽掉出關，參加豫西的戰事，則戰事全局必可改觀。又陝北方面亦另有一路重兵，此重兵若能開拔東下，從晉南出太行山以拊日寇之背，則日寇必進退失據，無形中減輕了豫西軍事上若干的負擔。但此兩路重兵若欲同時開拔，則不單純是軍事的事，必須以政治力量輔助之。據本月十二日重慶大公報社論評述，知王世杰氏在西安正商談此事，我們希望此事須速求一解決，切不可輕心掉之。抗戰以來，全國上下，均以國家民族的共同利益爲前提，精神團結，一心一德，才有今日的國際地位，寇患愈深，各方面的警覺也愈切，我們知道今後中國各方面的有力人士，必更能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全力合作，以政治促進軍事的效率，以軍力打擊日寇的反噬。

再如物價問題，在眼前抗戰中的中國成爲一極嚴重的問題，一般公教人員叫苦連天，尙是小事，我們試想前方的士兵，那一個人沒有家眷，沒有親屬，若是前方的軍人流血打仗，而留在後方的親屬受物價的壓迫，無法生存，影響有多大！中國軍人這七年來爲國家的犧牲貢獻真夠偉大，今後社會情形更形艱苦，中國軍人的吃苦精神也必更能表現是無疑的。但爲社會公道起見，我們却不可坐視軍人吃苦，以爲軍人當然吃苦；我們必須努力解決物價問題的危機，使軍人不必顧慮其自身及後方親屬的生活問題，安心打仗，但如何才能解決物價問題呢？這依然是一個政治的問題，只有政治上有了辦法，才能穩定物價，制止投機，並進而實行計口授糧，憑證購物的嚴格經濟統制政策，以穩定前後方的人心。

現在正是試驗我中華民族政治才能之際，願舉國上下勿忽視此事。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一種隔離物價惡化瘟疫方策的建議

在目前，誰也能感覺到抗戰中國一切都有希望，但有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却擺在每一個人的眼前，這就是物價問題。這問題現已達到了極嚴重的惡化境地，如果沒有救治的辦法，則縱使抗戰結束，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也必因此引起若干難解決的騷亂，有促成經濟總崩潰的危險。

把這種危機看作是一部分窮酸的公教人員誇大其辭的喊叫，這根本是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常常聽到一般自命樂觀派的人說，物價問題並不嚴重，因為受苦的不過是一部分公教人員，其餘的大多數的農民和勞工生活比戰前還要優裕，這根本是不知民間疾苦的話。照紙幣表面的數值計算，自然現在農工人等比從前收入增加得多，一個拉車夫身上可以掏出一大堆鈔票來，但如以實際物質的價值計算，則不但農民勞工和公教人員一樣叫苦連天，即小商人以及一部分公司廠家，也一天不

如一天，一天比一天的收入實際減少，最後不可支持而陷於停頓，年來許多工廠商店已經有些因無法支持而停閉的。若物價問題不加制止，則此種現象必日甚一日。

現在的物價狂漲，有如一場賭博，又好比一場噩夢，大家天天在那裏狂賭，濫賭，賭的是若干張白紙印着黑字的鈔票，不會賭的人，賭輸的人，固然早已淘汰，就是號稱賭贏的人，到頭來大夢一醒，才知所有財產不過是一堆廢紙，和紙面上印得一些驚人的數字，此種夢境一過，必有若干暴發戶因此陷入了最悲慘失望的境地。

要救治這種物價的惡性騰漲，現在任何方法似均已過晚，但有一個方法似仍不妨採用，即把這種物價的惡化當作一場瘟疫，如不能根本救治這種瘟疫，即須用隔離的方法使受疫者與無病的人分離，以免傳染，已經染疫極深到了投機囤積狂程度的人，我們不妨將他們另自畫一個圈子，圈將起來，讓他們自在他們的市場裏做貨幣賭場的熱夢，法幣的數字在他們之中轉來轉去，越轉越膨漲，但實際上並不代表任何的物質，這樣便與一般人的生活不發生關係。至於一般未染病狂的人，也應當

另自畫一個圈子，使他們與引起投機狂的病菌隔離，不至再受傳染。

用什麼東西做圈子呢？這就是貨幣，貨幣是引起投機狂的病菌，也是隔離傳染的重要工具。應付目前物價惡化的唯一辦法，似乎應該從貨幣着手，我們目前似乎需要兩種貨幣，一種是供投機用的舊籌碼，只許在一般投機狂的圈子裏打轉，另一種新籌碼則使用於一般無病的正當職業者中，此種新籌碼須有以下幾種性質：一、只能換實物而不能儲藏；二、每人所能換到的實物有一定限制，而不能過多；三、此種籌碼只能在政府機關的文武公務員工中週行，離開這個圈子便不能適用。如果具備這三種條件，便不會為投機者所利用，因為投機者得到他毫無用處。

這種新籌碼一定不是貨幣的性質，而是一種實物分配券的性質，並且必須有時效的限制，譬如過了一年便作廢之類，公教人員所求只在生活維持得過去，他們有了這種券便不要法幣也將就過去了。

以上所陳頗為簡略，如社會上對此建議能感興趣，再為詳談。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新中國日報專論

歡迎華萊士副總統來聘

美國華萊士副總統是羅斯福總統的得力助手之一，又是新政派的領袖，在國內國外久著聲譽，此次奉羅斯福總統之命，專誠訪問我國，並順途訪問西伯利亞，其意義之重大實非歷屆任何外交使節可比。我們以中國新聞界的立場，在歡迎華萊士副總統起程消息之餘，謹貢獻一點意見。

太平洋上的形勢爲中美英蘇四大國所分治，而日本恰處於四大之中，過去日本利用太平洋上四大國的不能充分合作，投間抵隙，施用其各個擊破手段，一步步由一個閉關的島國躍居太平洋上的首席。他首先利用中俄兩國在伊犁的衝突而伸手於臺灣；繼而與帝俄合作共同從中國手中奪去朝鮮；又繼而利用英併緬甸，法侵越南，中國屢讓步之後而發動中日戰爭；又繼而利用英日同盟以發動日俄戰爭；又繼而利用日俄的合作，平分滿洲以拒絕美國門戶開放的政策；又繼而利用第一次歐戰

和俄國革命而與美訂蘭辛石井協定，侵我山東，出兵西伯利亞；又繼而利用國民革命後的排英反蘇政策而發動九一八事變；又繼而利用英、美、蘇的矛盾而與德義勾結訂立三國防共協定；又繼而利用歐洲多事，英、美、蘇不暇顧及亞洲之際而發動蘆溝橋事變；又繼而利用歐戰的方急，蘇聯戰事的不利，而發動珍珠港事件，席捲南洋；所有這些都是利用太平洋上四大國的不能充分合作的機會，以伸張其毒牙，我們可以說，假如這四大國早點覺悟，能夠充分彼此真誠諒解，合作無間，日本絕不會有今天。

現在四大國在屢受日寇的這樣毒手之後，已經充分覺悟了，華盛頓同盟公約的簽字，已經把四大國和一切愛好自由的民族聯成一個堅固的陣線，開羅和德黑蘭兩次會議，又確定了四大國的一致步調，英美是海軍國，中蘇是陸軍國，在聯合進攻日寇之際，英美擔任的是海上的責任，而陸上進攻的責任便應由中蘇兩國來共負，現在蘇聯雖未參加對日戰爭，並且還和日本訂立中立條約，最近更延長漁約，但這些都是在歐洲戰事未解決時的不得已之舉，我們相信蘇聯最後終必參加對日的包圍

陣，過去蘇聯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援助就是證明，而在中國方面，如無蘇聯在陸上的充分合作，則中國陸軍也不能單獨擔負擊潰日寇的重任。以英美來講，西伯利亞東部的蘇聯基地，乃是最理想的進攻日本本土的根據地，這個意義上華萊士副總統的訪華並訪問西伯利亞，必能以美國的地位促進中蘇兩大國的合作邦交，並進而促進蘇聯的抗日意志。

其次，華萊士副總統是美國著名的農業專家，曾任農業部長多年，中國是農業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而農業技術猶在落後，華萊士副總統此行，在公務之餘，必能仔細考察中國的農業狀況，而加以協助。

此外，美國是自由民主的先進國家，華萊士副總統又是思想進步的新政派領袖，中國現在正在討論民主憲政的實施問題，華萊士副總統此行必能本其民主政治的經驗，對中國的民主運動有所了解並貢獻其見解。

謹以此三點希望奉贈於華萊士副總統，祝副總統旅況佳適，政躬康健！

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羅馬之收復

義大利戰場自盟軍在義南登陸以來，歷時九月，始由德軍之撤退而佔領羅馬，以戰事成就言，不能說是過於順利，義大利的戰場本來不甚重要，盟軍也未嘗以全力赴之，羅馬雖下，但德軍在羅馬以北仍築有堅固陣地，義大利的工業中心本在波河流域，波河流域不下，仍不能說已握得義大利的命脈，而即使佔領波河流域，也不能越阿爾卑斯山以拊中歐，所以義大利戰場的得失所關並不甚大，不過在這盟軍大舉登陸的前夕，盟軍在義大利戰場的勝利，尤其是佔領羅馬，則頗也有其重要性。

第一是政治的，可分義國及中東歐諸小國兩方面來看。義大利的巴多格里奧政府本來不爲國內在野黨所支持，義大利的反法西斯政黨有六個，即共產黨、社會黨、自由黨、行動黨、基督教民主黨、勞働民主黨，這六個政黨過去因受法西斯的

壓迫都不能公開存在，巴多格里奧的反保皇氣味過重，和這六黨的氣味也不相投，對於義王，因其祖護法西斯的緣故，反感尤深。但這六黨之間對義王的態度也不一致。義大利共產黨的領袖巴米羅·塔格勒提 (Palmiro Togliatti) 曾長期流放於莫斯科，自返國以後即宣稱王位問題為國家統一之障礙，主張勿過重視，自蘇聯宣布支持巴多格里奧政府以來，該黨態度更趨妥協，但其他各黨頗有主張堅持到底者。惟此問題自去年四月十七日義王伊瑪努三世正式宣稱，俟盟軍一抵羅馬，隨即宣布退位以來，已可謂有解決的希望。現在盟軍已佔領羅馬，義王自當依其諾言退位，巴多格里奧的政府也將再度改組，容納民主分子，將取更民主的形式，義大利國內政治問題或可獲一解決。羅馬本為義大利歷史及現實的首都，羅馬收復義大利即有了首腦，只要此後各黨派之間不要再鬧意見，民主的義大利在國際政治上仍不失為一重要要素。

其次，中歐及巴爾幹諸小國的向背問題，也與義大利問題的解決有關。羅馬佔領後，盟軍可抽出兵力威脅巴爾幹的德軍，並可利用羅馬附近的機場，以轟炸中歐

及東歐諸附庸國家，現在英國、蘇聯邊境，及義南的空軍根據地已聯絡一致，盟軍飛機可利用這三方面的基地穿梭轟炸，來往不停，使納粹及其附庸疲於奔命。羅馬攻下之後，空軍轟炸維也納、布達佩斯、布拉格、和德國東部更容易了，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也更受了威脅，義大利轉向政策的成功，和盟國對於巴多格里奧政府的支持態度，使各軸心附庸小國中的猶疑派更堅定了傾向盟國的態度，知道傾向盟國之後，自己國家不致吃虧，主持轉向政策的本人也不致過河拆橋，被盟軍遺棄，盟國這種不念舊惡的態度，很可以縮短勝利的期限，不失爲一種聰明的態度，特別是蘇聯的首先承認巴多格里奧政府，更與英國的支持南斯拉夫解放軍，同樣可減少盟國間的許多糾紛，表現了盟國政治家的非凡的現實手腕。可惜對於自由法國的內部糾紛不能採同樣現實的政策，以致達爾朗被刺於前，吉羅德被逐於後，使維琪法國內的親盟國分子，冷淡了許多念頭，盟軍攻歐登陸軍事之遲遲不能發動，對法政策的措置失宜不失爲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希望盟國的政治家，此後應鑒於這種失敗，而採取更現實的政策以應付德國及其附庸國家內的動搖分子，務須不念舊惡，一視

同仁，效漢高帝之封雍齒，唐太宗之用魏徵，則盟國的政治和軍事，必可一帆風順，早登勝利之途。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六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瞻望法國復興的前途

最近布里敦森林的國際貨幣金融會議，已宣布完成關於國際貨幣基金之工作，計國際貨幣基金總額爲八十八萬萬美元，各國應攤繳基金數目，美國佔第一位，廿七萬萬元，英國第二，蘇聯第三，我國第四，而法國佔第五位，認額四萬萬五千萬美元。關於管理此龐大之基金，將設一十二人之董事會，其中五席屬於美、英、蘇、中、法幅員最大之五國代表。以上消息雖純屬於國際貨幣金融範圍以內之事，且該會議並無決定之權力，尙須經各國政府批准，始能生效，但此會議之成就至少有兩點應行注意：第一點是屬於國際貨幣金融問題的本身的，從此以後，全世界各民族將依經濟關係組成一大合作的共存共榮體，沒有一國可以超然於這種國際經濟勢力的支配之外（中立國及戰敗之軸心國將來自必陸續加入不成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們將來另有論列。還有一點也可以特別注意的，就是在此會議中，法國的地

位已與美、英、蘇、中四強並列爲五大主要國家，在戰後國際貨幣金融管理機構中，有重大的發言權了，經濟與政治是不可分的，經濟上法國既已恢復了五強之一的地位，政治上的地位自也不難恢復，從此次戴高樂將軍訪美的載譽歸來一事，也可覘其消息。

法國的失敗並非失敗於民主，乃是失敗於政客式的偽民主，法國自一八七一年推翻拿破崙三世的帝政，重建第三共和以來，即未能本大革命傳統精神，肅清反動勢力，真正向民主的路上去走，當時法國的民主領袖，不惜與反動的舊勢力妥協，以換取一形式的偽民主，這就種下了七十年後失敗的根基。在代表舊勢力的麥馬韓總統任期之下，復辟運動，幾乎成功，僅因王黨各派內部的矛盾而始告失敗，但王黨的勢力仍舊明目張膽在共和政治之下肆意活動。七十年來的第三共和法國，名爲民主，實際上受支配於兩種人之手，一種是播弄政治的政客，無論是左派的，右派的，前進的，後退的，大家却只是掛一個政黨的招牌，喊幾聲民主的口號，實際上既不要民衆，也不要組織和紀律，朝秦暮楚，主張和政策可以隨時變化，純粹投機

，這樣的政黨，實際上已變成了少數野心政客의賭博機構，與民主完全無涉，他們不要民衆，民衆也不理會他們；此外另一種人則爲軍人，軍人雖不過問政治，但頭腦頑固，習氣陳舊，不知隨時代而進步，完全沒有受過革命的洗禮，這一次的戰敗，就是由於軍人沿襲傳統，不能了解新的戰爭技術，而政客又畏葸自私，一敗便降，以致弄到國破家亡的慘敗局面。

自法國崩潰以後，新舊法國才有了劃分壁壘的明顯界線，一方面是陳舊的舊法國，在頑固的軍人與狡猾的政客賴伐爾領導之下，公開向敵人投降，出賣祖國，慘殺同胞，美其名曰維持秩序，而秩序到底不能維持，保全實力，而實力終於盡歸敵人利用；另一方面，則一切自由的，革命的，愛國的，前進的人才，在戴高樂將軍的堅苦卓絕領導之下，創造了一個自由抗戰的新法國，現在盟軍登陸法境，巴黎的攻下至少在本年冬季可以實現，維琪餘孽的授首之日已不在遠，一個自由解放的新法國已在望了。

有些人以爲戴高樂派自在北非組織政府以來，即排斥舊日參加抗德的有功軍

人，一味以爭奪政權爲事，達爾朗既暗殺於前，吉羅德又被逐於後，未免使附和者寒心，阻礙了法國本土的解放進程，不知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原無妥協之餘地，一經妥協，卽須改變原來宗旨，處處妥協，革命的立場勢非動搖不可。我國辛亥革命之始，因誤與北洋軍閥袁世凱妥協，而卒招致革命的失敗，卽其前例。達爾朗之被刺，當然至今尙爲一疑問，我們不敢斷言其爲何人所刺，但以達氏之爲人，初附維琪，繼投盟國，反覆無常，如此種分子可以容忍，則一切漢奸分子，臨時俱可搖身一變，化爲功臣，正義是非，俱無憑藉，更有何人不樂爲漢奸？吉羅德將軍的人格功績，固非達爾朗輩之比，但其部下包庇維琪餘孽甚多，若自由法國不能剷除此等反動分子，則戰後法國必仍爲反動勢力所盤據，一切改革俱無希望，因此戴高樂派的大膽決心肅清守舊分子，實在是法國復興的必要步驟。

今後法國的前途，仍不失爲國際上（特別在歐陸）一大重要力量，戴高樂將軍已宣佈戰後法國將爲一聯邦組織，所有殖民地將悉成爲一聯邦，這是順應世界潮流的極明哲之舉。英國政府早聲明扶助法國強大爲其主要的政策，爲防止德國再起，

維持歐洲均勢起見，也非扶植法國復興不可。今後拉丁五國家（法、義、比、西、葡）在以法國爲中心的形勢之下，如能結成一西南歐聯盟，在歐洲必能形成一重要力量，爲維持國際和平起見，我們也希望此種形勢能夠出現。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納粹死期臨頭

歐洲的戰事到了現階段，納粹德國的敗象已經層見迭出，勝負的決定已不成問題。一般人所最關心要問的，是德國究竟能支持到什麼時候才會崩潰呢？失敗到什麼程度呢？今年呢？還是明年呢？東線先崩潰呢？還是西線先崩潰呢？

依我們判斷，德國的失敗決等不到明年，大約至遲在一兩月以內就要失敗，失敗必由西線開始，而非東線，一敗之後，即崩潰不可收拾，與上次歐戰的最後命運相同。

一般人以為照目前的戰況看來，東線蘇軍進展一日百里，華沙不久即可攻入，東普魯士也將受蹂躪，而西線則自盟軍登陸開始以後，五十多天中，仍局促於諾曼第半島中未能如意進展，較之東線蘇軍的進度，不免相形見絀，似乎德國即使失敗，也應當先失敗於東線，而後西線才繼之。但照我們的看法，則並不如此，東線

蘇軍的進展之速，實際上並非全是戰勝攻取之力，德軍的撤退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希特勒因爲兵員缺乏，人力不夠，勢不能維持東西兩面同時作戰，勢必於兩線中權衡輕重，有所取捨。照德國參謀部的估計，必然認爲英美的實力較大於蘇聯，西線的重要和危急遠勝於東線，所以才毅然決然放棄東線已佔領的區域，縮短戰線，把兵力移轉到西線來，與英美盟軍死命相持於諾曼第半島一隅中，這就是西線盟軍所以進展甚緩，而東線則甚速的原因，並不是西線盟軍的戰鬥力不如東線。照目前情形看來，蘇軍在東線的進展固然似乎躊躇滿志，但進展過速也不無危險。上次歐戰，俄軍最初也以驚人的速度攻入東普魯士，但不久即遭興登堡的松山（坦能堡）一戰，包圍俄軍二十餘萬，解了東線之圍。上次歐戰後蘇聯紅軍打敗了波蘭的侵略以後，也曾攻到華沙，但不久就遭波蘭的反攻，鎩羽而去。又上次歐戰之初，德軍長驅直入，攻到巴黎附近，但經霞飛將軍馬侖河一戰，也前功盡棄。我們並不是說歷史定要重演，但依兵法說，千里而追人者必蹶上將軍，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古今戰術雖異，形勢大致仍同，以蘇軍將校深明戰術，對此必已留意，故我

們不能希望於東線者過甚。反之，西線盟軍雖進展較遲，但謀定而後動，穩紮穩打，一步也不踏虛，進得一點就是一點，照目前情勢說，英美必然準備再來一次登陸，登陸的地點大約不會距諾曼第半島過遠，或者即在德軍的背後或側翼。目前德軍抵禦諾曼第半島登陸的部隊，已經用盡九牛二虎之力，但是盟軍還綽有餘力，儘可以再來一次登陸，譬如兩個人角觝，力量弱的本來早已汗流夾背，搖搖欲倒，忽然再從腰旁挨上一腳，豈有不頓時撲倒之理，而這一倒，必然再也爬不起來，因爲目前德國軍心已經搖動，人民和將領早已厭戰，納粹政權久已爲人民所厭惡，最近更失去軍人的同情，所以必然一敗卽不可收拾，敗到崩潰的程度，那時希特勒和他的一般狐羣狗黨們，必然夾着尾巴，坐上續航六千哩的遠航飛機，向阿根廷之類的南美國家逃亡，到了半路上也許飛機失事，墮入大西洋底。有人說，希特勒如失敗必自殺，這是拿東方人心理揣測西方人的話，拿破崙失敗不自殺，墨索里尼失敗不自殺，希特勒爲什麼要自殺？失敗了便自殺，是神經脆弱的感傷主義者的想法，希特勒比日本軍閥神經健全些，所以日本失敗了，東條、小磯之類或許要切腹，而希

特勒、戈林之流則決不切腹。

所以諾曼第一戰，儘管打得慢，但都是真正的決戰，納粹存亡靠此一決，此一戰而敗，卽如長堤決了口，洪水將滔滔而入，再難挽回。照目前情勢看，諾曼第一戰至遲兩月內可決，而盟軍在他處的登陸也許不會遲過兩星期之後。等着吧，希特勒黨人的判決快執行了，而日本到了那個時候，只有閉了眼，橫了心，蠻砍一氣，最後以舉國切腹了事。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一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論小磯戰略

東條內閣因塞班失守而下野，小磯、米內兩個陸海軍巨頭組成了小米內閣，在小米內閣組成之初，我們就推論其必將加強作戰而決非降志求和，果然，小米內閣組成之後，第一件重要的內政改革就是設立作戰最高會議，以統一作戰力量，說到這件事。日本人的低能也實在可笑，他們千不學，萬不學，偏偏抄我們的舊文章，模仿我們的最高國防會議而設立了最高作戰會議，抄墨卷竟抄到他們所一向看不起的敵人身上，真正可憐極了。

但是還有更可憐可笑的，小米內閣以加強作戰力量爲目的，這本來是不錯，因爲日本的前途只有誓死作戰之一途，投降也決無前途，所以繼續加強作戰，在日本的地位說來是不錯的，不過作戰必有作戰的目標，小米內閣自成立以來，不但沒有改變東條的錯誤戰略，反變本加厲，集中大軍攻圍衡陽至四十四天之久，仍未能攻

下，頓兵於堅城之下，本爲兵家所忌，德軍攻圍斯大林格勒的失敗就是前車之鑒。小磯輩如果還懂得點兵法，就應該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趁東條失敗下臺之際，把攻圍衡陽的兵力撤回，面子也圓住了，實力也保存了，小磯輩不知此理，放過了一個難得的機會，這就是「儒林外史」上馬二先生說的：「知進而不知退，小小的一條亢龍。」

不但此也，如果攻略衡陽真有戰略上的必要，則拚全力爲一孤注，雖然危險，尙可說值得一試，然而我們替日本想，即使把衡陽打下又怎麼樣，過去南京、武漢、廣州、宜昌也都失過，這些地方的戰略地位並不遜於衡陽，但是中國軍隊從沒有因爲失了這些要地而投降過，而崩潰過，到了今天，雙方的勝負已經顯然判明，難道中國抗戰到了第八年的今天，眼看最後勝利就要到來，還會轉過頭來投降嗎？不但衡陽下了不會停止作戰，即使粵漢、湘桂兩路全失，敵人打進貴州，甚至重慶，我們也必繼續堅決抵抗無疑，而照目前湖南的戰局看來，日本人連一個衡陽都打不下，所有打通粵漢、湘桂等路的計劃就完全是妄想，而把鐵路一直修到中南半

島，就更是妄想中之妄想。然則日軍犧牲三十萬的主力，頓兵堅城四十餘日之久，所爲何來！盟軍的力量恐怕不會等到日本在中國大陸布置好了之後，才來動手。

爲日本計，此時最大的敵人是美國，其次是英國，應該把主力擺在對美英作戰的方面，對中國大陸只取守勢，就是要作戰，也應該增援緬甸，守住緬北，以扼中國的國際通路，對於太平洋上的美國艦隊，宜用全方，伺機一戰，同時加緊發動對蘇的外交，以保全北方門戶，小磯輩不此之圖，浪費兵力於中國戰場，作無目的之混戰，而忽略了自身的根本，是誤日本者近衛、東條，而亡日本者或即小磯、米內也，日本國民如有遠見者，當爲前途的命運一哭。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八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貝當將何以見法人？

大戰勝利在望，戰後和平會議中有一條最重要的自然是審判戰爭的禍首，因爲世界上幾千萬人的生命財產之犧牲，都是由這幾個禍首所造成的，所以戰後對於這些禍首之審判，必須從嚴，而不可稍事寬假。

禍首之中自以希特勒、墨索里尼之流爲元兇渠魁，理應付之極刑，但還有比希、墨諸魔更罪大惡極者，這就是賴伐爾、吉斯林之流的賣國賊。因爲希特勒之流雖然窮兇極惡，畢竟就他本國的立場看來，不失爲爲國效忠，他們的舉措雖然錯誤，以致替本國惹下滔天大禍，但這只能說是誤國，禍國，而尙非賣國；誤國，禍國之罪與賣國固尙去一間。惟有賴伐爾之流，甘心出賣祖國的利益，投效敵人的陣營，爲虎作倀，認賊爲父，廉恥喪盡，良知全泯，尙靦然以救民水火，維持和平自居，這一類人乃真是人類所不應容者，爲宇宙正氣計，爲人類尊嚴計，爲國家綱紀計，

貝當將何以見法人？

這一類人都應當在十惡不赦之例是無疑的。寧可以放過希特勒，而決不應該放過賴伐爾之流，這就如曹操雖然姦雄，尚可義釋華容，而華歆之流的逼宮角色，則爲大義所決不能容之故。

現在盟軍已經逼近巴黎，巴黎和全法國的解放即在目前，維琪政府一般傀儡人物，已經狼狽逃往萊因區邊界之貝爾佛特，最後當然逃往德境，託庇於讎敵手下，等到盟軍打進柏林之後，賴伐爾之流的命運不問可知，這其間最難過的當然是貝當。

貝當和賴伐爾的情形有些不同，賴伐爾乃是甘心自願當賣國賊，供敵人的玩耍，罪在必誅，貝當則情形尙有可原，因爲他是老朽昏庸，頭腦簡單，不知國際大勢，一時受姦人包圍，墮入陷阱，做了個頭號的大傀儡，原他的本心，或許尙出於愛國的動機。在他當初的估計，也許受了一般法國反英派親德分子的宣傳，以爲英國背棄了法國，爲法國計，只有投入德國的懷抱，才能保全一般上流社會的生命財產。這一般人又製出一個自己騙自己的口號來，說什麼歐洲大陸自己團結，以抵抗

海外的侵略。如果歐洲大陸的國家，真是平等合作，組成一個自由的歐洲聯邦，這自然是很合理的，無奈希特勒式的歐洲聯邦，乃是以德國爲主子，而其他各國都是奴隸，這樣的聯邦，正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一樣，是一種澈底騙人的口號，如果有人甘心贊成這種賣狗皮膏藥式的合作，不是喪心病狂，便是老朽昏庸。

爲貝當計，以他在軍界的資望，以他的年齡，以他的號召力，如果在法國戰敗之後，卽領導自由法國流亡到海外去繼續抗戰，則今日聲威赫赫，進入巴黎，何致讓戴高樂輩出頭？卽不然，忍辱求和爲城下之盟，保全半壁江山，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希特勒撕毀了康邊協定，進兵南法，土倫軍艦自行鑿沉之後，德軍已破壞信約，貝當便應該毅然下野以謝國人，乃不此之圖，聽任賴伐爾上臺，而仍舊戀棧下去，甘爲傀儡，魏剛被禁而不能救，海軍自毀而不能殉，如此元首，有何意味？事到如今，悔之晚矣！

這就是一切悲觀分子的下場榜樣，爲貝當計，真不值得。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貝當將何以見法人？

要顧實際，莫爭面子

我們中國七年以上的堅苦的抗戰，由次殖民地的地位一躍而爲四強之一，這兩年來，盟軍在歐非，在太平洋上，節節勝利，眼看大局已日趨光明，國人的心理也興奮了不少。但是不幸，近一年來，日寇急不暇擇，鋌而走險，在中國大陸開始了迴光返照的猛攻，中原會戰，我師既失利於先，長沙衡陽又相繼不守，現在敵人已經深入廣西，分兵搗湘西以窺黔邊，又傳聞潼關方面也有結集重兵的模樣，萬一桂戰繼續縱敵深入，使日寇貫徹打通中南半島大陸運輸線的企圖，不但使南洋方面的戰事因而延長，且恐影響到雲南的國際交通路線，縱使辛苦打通滇緬中印公路，仍恐有被封鎖之虞。在這種情勢下，國人的心理又由興奮轉爲焦急，對戰局不免憂慮，對政府也不免責難，甚至國外的批評也不免存勢利之見，這都是當然的。我們在此光明與艱苦並進的今日，對於這個嚴重的局勢，不能不向政府和國人貢獻一點

意見。

我們以爲今天的中國人應該頭腦清醒一點，自己明白自己的真正地位。我們本是弱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百年之中，我們老是過着屈辱憂患的日子，我們在國際上就從沒有抬過頭，直到抗戰以前我們還是弱國，道地的弱國。我們所碰到的對頭倒的確是強國，從上次歐戰以後，日本的海軍佔世界第三位，陸軍則在希特勒整軍以前，幾乎是第一位。以這樣的弱國，碰到這樣的強鄰，又處心積慮非吞滅我國不止，勝負之數是顯然的。所以在抗戰之初，日寇宣稱要三個月解決「支那事件」，並不是誇大之辭。我們當時主張抗戰，實際起而應戰，也並不是有絕對獲勝的把握，不過一個國家被人欺負到這個程度，戰亦亡，不戰亦亡，爲國家人格計，爲文化歷史計，都不能不戰，不可不戰。因此我們才以沉痛悲憤之心情發動了歷史上無比的全民抗戰。我們的抗戰是這樣抗起的，說當時就有全勝的把握，不過是戰時鼓舞人心之談，這一層我們全體人民應該都明白。倭倖天奪其魄，日寇過於輕看中國的戰局，想以少數的兵力取得短期內的勝利和平，才使我們能退師武漢，箠路檻襪，保

全了西南西北半壁。我們試想，假使日寇在開戰之初，就結集雄厚的兵力，使用閃電的戰術，由南京窮追到武漢，到重慶，我們的局面又將怎樣？幸而日寇一持重，再持重，留重兵於滿洲以防蘇聯，扶植汪偽政權以圖用政治解決中國，嗣後又利用歐戰機會，發動了珍珠港事變，把陸海重兵都分散到太平洋、印度洋上去，以爲英美勢力一旦崩潰，中國可不戰而屈。這才換得中國戰場上幾年的小康局面，人心也由驚慌趨於穩定。我們不必自欺欺人，如果頭腦清醒一點，就應該明白這幾年戰局的稍微穩定，並不由於我們真正轉弱爲強，而是由於敵人根本看不起我們，不會使用大量兵力來對付我們的緣故。

珍珠港事變以後，美英和我立於同一陣線，我們在國際間陡然得了極有力的支援，這真是天相中國，而也是敵寇的誇大狂自掘墳墓的結果。又因爲盟友美國的極力提携，想使中國成爲遠東安定的強大勢力，才有華盛頓二十六國的和平宣言把我們一提到四強之一的大國地位，與英美蘇並肩而立。這真是我們的不虞之譽，我們一面衷心感激盟友的好意，如果是頭腦清醒的話，一面就應該切切實實了解自己

的弱點，自己實在不配四強這個「強」字，切切實實從軍事政治改造入手，做到一個真材實料的「強」，這才不負盟友的好意。不幸我們並沒有做到這點，甚至也沒有切實向這一方面去開步走，相反地却中了「自我宣傳」的毒素，以為我們是真強了，連世界上都說我們是已經強了，這一來，軍事上狃於強大而不思整頓，以為敵寇就無力來攻；政治上狃於強大而不思洗刷，以為國家已經入了坦途；外交上更充滿虛懦之氣，不但對蘇外交失了調節，並且無故得罪了英國，今天邱吉爾開一下小的玩笑，其原因何在，我們應該反躬自省，不可一味埋怨他人的勢利。

到了今天，事實還是事實，什麼四強的虛名也救不了中原會戰的恥辱的失敗。有過去的過分的興奮，才有今天的過分的悲觀，過分的興奮和過分的悲觀都是要不得的。只要明白我們自己原是弱國，是百年積弱的弱國，從來也沒有變為強國過，就不必有過去的過度興奮，也不必有今天的過度悲觀。只要自己了解自己本是弱國，以弱抗強，以百年的積弱抗世界的巨強，則打敗仗是當然的，不必諱言，更不必氣餒。今天國內的輿論界頗有主張我們不可承認失敗的，我們的意見則與此稍

有出入，我們以爲失敗不必諱言，也不怕承認失敗，邱吉爾在新嘉坡失守以後，就曾痛言英國的失敗爲可恥的收穫，並不隱諱，可見承認失敗並不算是恥辱，失敗而不求挽救才算是恥辱。

頭腦清醒一點，要顧實際，莫爭面子！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菲島登陸戰的展望

美國空軍自本月九日起至十八日分別自中太平洋及中國基地，連續向菲律賓、琉球、臺灣三地施行大規模的戰略轟炸至十日之久，世人早知其必有作爲，果然，到十七日，美國的大艦隊突入菲律賓濱中部之雷伊泰灣，十八日午後起對雷伊泰島實行砲擊，首先在距馬尼刺東南四百二十五哩之彈丸小島蘇魯安登陸，旋即在雷伊泰島登陸，西南太平洋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偕菲總統奧斯敏納親自督師，據發表此次登陸菲島之美國第六軍及一部分澳軍，約有二十五萬之衆，海軍大小船隻六百零六艘，飛機至少二千五百架，顯示美軍已調遣太平洋上所有可用之兵力，開始遠東第一次的大規模登陸戰。駐菲日軍據調查約有十五萬人，在數量上已不及美軍，在裝備上更遜之遠甚，雷伊泰島在菲律賓羣島的中部，美軍在此島登陸成功，並已解放其首府答柯羅板及機場兩處，卽不啻將菲島南北切爲兩段，駐菲律賓濱南部岷大

那我的日軍從此永絕北歸之路，而駐北非呂宋島的日軍，在美軍轟炸之下，亦將斷絕海上的接濟，加以菲島游擊隊紛紛四起，協助盟軍，殺敵致果，在此四面楚歌的形勢之下，駐菲日軍的命運不卜可知，求如駐法德軍之尚有殘部能退回國內者，恐更不如。寺內壽一雖是倭寇宿將，對此恐亦將棘手無策，最後不過付之「切腹」而已。

此次美軍在菲島登陸的成功，實爲世界海戰史上空前的大革命，蓋雷伊泰島距離美國太平洋的海軍大根據地珍珠港在四千五百哩以外，以龐大的艦隊，遠渡重洋，在海戰史上是極危險的一件事，特別是關於軍需給養的問題，但美國人把這個問題居然解決了。星期記事報的海上通信記者對此事的描寫說：

「一個新式的戰術已經在太平洋上展開：沒有陸上基地的艦隊已經駛近日本本部，距離之遠和補充給養的困難問題都不能阻止我海空軍在太平洋上的活動，我們正在建設一串龐大的連環艦隊，使我們的海軍力幾乎完全成功一個獨立的根據地。我們正在創造一個自給自足的海上單位。在有威力的主力艦、巡

洋艦、及航空母艦周圍，我們有一個充足的輔助艦隊能夠在海上供給一切的需要而不用顧慮時間和距離的問題。

『在遠征挪威之役，我們已經表現我們的技巧能夠在海中創造陸地，在法蘭西海岸，我們建設過人造海港，在太平洋上我們把這個勇敢的觀念更發展得遠一些，我們已經創造了一個能夠浮在海面，隨着艦隊走的海軍根據地。』

的確，菲島登陸戰的本身雖然重要，但星期記事報記者所指出的這一點海軍戰術上的大革命或者更爲重要一點，因爲既然一個龐大的遠征艦隊可以不需要任何陸上根據地而能夠遠渡重洋，則一切海上遠征的困難問題就都解決了。日本人執持他們傳統的保守戰術，以爲菲律賓濱和新嘉坡都已握在手中，盟軍再也無法攻擊日本本土，現在應該覺悟了，不必等到逐島攻略的成功，美軍已經佔據距臺灣七百哩的大陸，迫近日本本國的門戶了。一個自由的民族比起專制獨裁慣了的奴性民族，不但在和平上能有更大的貢獻，即在戰爭上也更能發揮自由創造的想像力，這是這次戰爭的最有價值的發現。

同時還有一個更值得興奮的消息，英國的主力艦隊已經開始東駛，據英國海軍司令亞歷山大宣稱：「這僅是開始之開始」，「我們的計劃是明明白白的，我們的路子是公開的。」這支艦隊的東開，與近來英國東力艦隊對尼科巴羣島的砲擊，聯合而觀，英國的動向是不難判斷的，緬甸、泰國、和馬來半島的解放已經在望了，中國的大門也快打通了。

如果一個艦隊可以不需陸上根據地而渡海遠征，則美軍在佔領菲島成功後的第二步驟，安知必須向福建廣東海岸而不是直扣舟山列島，登陸浙東甚至窺崇明島以直扣上海，從長江下流溯流西上，以切斷日本在中國大陸的南北聯絡線呢？世上沒有辦不到的事，一個自由理想的民族的戰略是不會受步兵操典的規定的。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汪兆銘死矣

汪兆銘死了，正當盟機轟炸南京的前一日，孫中山先生的誕辰，國民黨慶祝建黨五十週年紀念的前二日，汪兆銘死了。盟機至而汪兆銘亡，孫中山生而汪兆銘死，死得其時，死在敵寇日本的懷抱中，死得其所。

論汪氏的爲人，聰明才智，文采斐然，口舌翻瀾，聳動一世，也總算是個「言偽而堅，行偽而辯……」的特殊人物。晚節不終，身敗名裂，飲恨以死，也許有人以爲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有點替汪氏惋惜，惋惜他太不值得。不知汪氏之一生，自來就是個有聰明而無操守的人，反覆變詐，不止一次，這一次不過是投機投錯了，實際上他的「失足」已不止一次。

故汪氏少年曾以刺攝政王一案，博得革命青年的聲譽，「飲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之句，傳誦一時。其實汪氏當時，不過是同盟會的一個普通黨員，並不佔什

麼重要地位。當時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所倚畀者爲胡漢民、楊庶堪諸氏，汪氏以不見重於黨內，乃憤而謀刺攝政王，以博一時聲譽。乃攝政王尙能明白事理，待以不死，汪氏遂感激涕零，大有轉變之勢，幸而清廷不久即亡，否則汪氏恐早已賣黨降敵矣。

及民國成立，汪氏銜命北上，勸袁世凱南下就職，袁氏愆慮部下，發動平津兵變，火焚大柵欄，汪氏震於兵威，竟電告南京孫大總統及臨時參議院請允許袁氏在北平就大總統職，這一着是袁氏與革命勢力消長之機，而竟壞於汪氏的思想動搖。自此以後，汪氏受袁世凱的煽動，與當時所謂名流者組織「六不會」，以不問政治爲清高，革命黨人而不談政治，不問政治，就是間接助長了權姦的包辦國事，可見汪氏在少壯時就是個意志不定的人物。

到北伐成功，寧漢分裂，汪氏在武漢組織左傾政府，高唱「革命的向左邊來，不革命的往右邊走」的口號，大爲一般自命思想前進者所頂禮膜拜。曾幾何時，昔日高唱左傾者，居然搖身一變，與敵寇締結防共協定，又大唱其反共救國的論調，

政治上反覆無常，變詐百出，未有過於汪氏者。是汪氏之罪，又不僅在甘心當敵人傀儡，做漢奸領袖之晚節不終一點也。

我們以為政治上成功的人物，不但重才智，尤須重操守，操守不堅，見風轉舵者，縱有些須才智，最後終難免於一敗塗地，汪兆銘的末路就是一切政治熱中者的前車之鑒。操守之中，最大者莫過於對國家的忠，政治上的主張儘可不同，路線儘可多歧，但最後這一點國家觀念的大防線總不可破棄。像汪兆銘這樣以私人派系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甘心認賊作父，出賣祖國利益的人，雖有時可欺騙一時，終必身敗名裂，為全國所共棄無疑。政治家於此出處大關鍵不可不慎。

歷史的巨輪是永遠照着正義走，違反國家利益、人民公意的行動，縱使一時獲售，終久必為時代所淘汰而去，汪兆銘是被歷史的巨輪所碾碎了。

汪兆銘的軀殼與靈魂俱死，孫中山先生的精神與事業永生，我們願以此義貢獻於中國國民黨的朋友們，祝國民黨從此掃除了一個前途的障礙，為國家，為民主，繼續五十年前建黨的精神，為中國永奠自由之基。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奉勸囤積者趕快拋售囤貨

七年半的抗戰，一切人都受苦受難，惟有兩種人享了國難之利，一種人是地主，糧價高漲了，他們坐享其利，國家僅向他們徵購一部分驅使佃農所不勞而獲的餘糧，還要怨天怨地；另一種人是商人，物價高漲了，他們的利潤更加倍優厚，國家僅向他們徵收一部分營業稅，過分利得稅，他們也怨天怨地不已。人心是從不知足的，但看眼前糧戶子弟和商店小夥計們的豪縱奢淫，可以想像他們的生活狀況至少不比抗戰以前更苦，但是他們還在怨恨。如果從人心不足的這一點上去觀察，我們倒也不必過於見怪他們。

但是，現在我們要奉勸這兩種人一句話，現在你們出售囤糧囤貨的最後時機已經到了，若再不覺悟，趕快趁這個價格最高的時機把你們的囤糧囤貨拋出了手，難免有一天你們的糧和貨要貶價出售也無人敢接，那時候，帶也帶不走，丟又捨不得

丟下，幾年辛苦，付之一場流水，富貴榮華，轉頭都成了幻夢。

這七年半以來，許多早已淪陷省區的人民的苦況，我們也不必多說，但看最近長、衡、桂、柳逃難出來的人民，扶老携幼，流離顛沛，火車汽車票價的黑市要幾十萬元一張，還得千方百計去鑽營，鑽營到手的也不過把身體綁在車頂，從窗戶裏鑽進去找人托一下，便要托股費數千元，路上歇一宿棧費數千，打一尖飯費數千，許多坐不上火車汽車的人便得排着隊在崎嶇的山路上開慢步走。這時候能夠帶得上隨身行李衣服的就得上等走運氣的人物，何況成千百石的糧食和成千百匹的陰丹士林布？請問那些地方的地主豪商們，他們的糧到那裏去了？貨到那裏去了？田園住宅，珍玩古董到那裏去了？如果那些人能夠早點覺悟，把笨重的物資轉換成輕便的法幣黃金，至少到逃難的時候隨身帶來也還方便一些。到了逃難的時候再覺悟就晚了。

也許長、衡、桂、柳距離後方根據地還遠些，這些例子遂不足以感動人心，那麼請看最近的。現在因為敵寇窺伺黔邊，下川南一帶如西秀、黔彭、綦南一帶的大

戶們已經急於要貶價拋售餘糧，而苦於無人敢接，有糧換不出錢，又帶不了走，請想這些地方的大戶們此時心理是怎樣？作何感想？

我們固然相信在蔣主席領導之下，指揮英勇素著的國民革命軍，一定能把敵寇打得粉碎，敵寇決無更進一步的可能，但是當上等百姓的，平時既享國難之福，在這時候不是也應該把剩餘物資拋散出來，以平衡高漲的物價，穩定後方的人心，爲抗戰盡一分力量嗎？有糧食，有貨物，就該趁此時機獻給國家，以便提高前線官兵的待遇；其次便應該散給社會，以救濟貧苦患難的同胞，多結些善緣，也可以多得些善報。若不幸陷於淪陷區同胞的命運，有糧食的盡被敵人充公，有貨物的盡被敵人沒收，敵人還要用五家十家聯保的方法抽你們的壯丁，送到南洋羣島去當炮灰，送到關外去做苦工。從前淪陷的省分，人民還可以往後方跑，今後又跑到那裏去？頭等闊字號的達官貴人可以携眷屬，坐飛機，到南北美洲去做海外富家翁，你們還沒有這個資格，就得趁這個時候打打合式的算盤。

「識時務者爲俊傑」，是散財消災的時候了，覺悟吧！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盟國有加強對日作戰之必要

最近我國實業、教育、銀行、文化界人士張伯苓等二十一人，發表聯合宣言，呼籲盟國，修改戰略，加強對日作戰的力量，我們對此主張，深表同情，特爲評論如下：

中國以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五年之久，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後，雖已有英美盟軍加入作戰，但因盟國所持歐洲第一戰略之故，事實上直到中美空軍加強中國戰場的力量，及美軍登陸菲島以前，中國所得盟國的幫助甚少，即在美國租借法案下所得的物資援助較之英蘇等國所得，也微乎其微。在盟國當時因希特勒尚在盤踞歐陸，氣燄尙高，故在討論戰略之時，以德國爲第一敵人，而暫置日本於緩圖，尙屬情理之常。故我國雖對此種估計感覺失望，但爲尊重盟國的意見起見，尙未加以抗議。但到了現在，形勢已完全不同，歐洲自盟軍登陸法境以來，勢如破竹，義大利

既反正於先，法國亦解放於後，軸心附庸諸小國，紛紛投降，西線盟軍已攻抵魯爾工業區，過此以往，就都是平原，德人無險可守，長驅柏林，已不成問題。東線的蘇軍也已攻抵布達佩斯近郊，匈京陷落之後，即可進攻維也納，動搖德奧的心臟。在此情形之下，以英蘇兩國愈戰愈強的兵力，對付殘敗的納粹，儘有把握。反顧日寇，雖東京及本土工業區屢遭轟炸，而元氣並未大傷，南洋諸島至今尤在掌握，菲島戰爭至今猶在膠着，最近更集中兵力，陷長沙，下衡陽，取桂柳，乘銳且進入黔境，幾有搖撼我重慶首都之勢，假使再縱容下去，明年春暖之後，難保其不再舉兵西犯，那時勝負尙未可預料。卽照目前形勢看，如任日寇打通中越的直路，保持大陸交通線，則誠如顧維鈞大使所言，卽使日寇本土被佔，也許還可以頑據中國大陸與盟軍周旋到底，所以要擊潰日本，而不以中國大陸爲根據，並不可能的，要以中國大陸爲根據，而不加強中國政府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在這一觀點上，我們同意張伯苓等的呼籲，希望美國政府軍事當局，修改戰略，迅速移歐洲的大部份兵力及援歐物資的一大部份用於中國戰場，以加強中國政府的抗戰力量和必勝的信念。

我們不但希望美國如此，同時也希望英國和蘇聯兩盟邦要考慮此點。英國是在遠東擁有鉅大利益的國家，沒有亞洲的英國屬地，便沒有大英帝國，現在英國遠東的屬地，除印度外，大部份仍在日人手中，這不但是英國之恥，也是英國之憂。爲保持本土的安全起見，英國自須以主力從事對德戰爭，無暇東顧，但自德特爾比茲號主力艦被燬以後，英國的艦隊在歐非已無敵人，應該把主力全部調到遠東來，同時蒙巴頓將軍所部的英印軍隊，也應該立即開始大規模的反攻，收復仰光及馬來亞，摧毀日寇的南洋堡壘，我們希望高瞻遠矚的邱吉爾首相，早早考慮此點，以恢復英國在遠東的威望。

蘇聯目前雖對日尙未作戰，但在遠東擁有特殊地位，日寇若在中國大陸立住了腳，對蘇聯的遠東國境是一大威脅，對納粹的死灰復燃是一大聲援，蘇聯目前對歐洲局面已有充分的把握，對於亞洲的發言權，是不會忘記的，我們雖不希望蘇聯立即對日作戰，但在世界戰局檢討上，能夠稍稍遷就中國的願望，讓美英分出大部分力量來加入亞洲戰爭，則對於遠東戰局也就幫助不少，援助中國即是打敗日本，

原不必一定要參戰才行。

最後，我們對於本國政府也有一點希望，我們雖同情對於盟國修改戰略的呼籲，但並不以為我國應把擊潰日寇的整個責任，倚靠在盟國身上。像最近一年來中原會戰和湘桂會戰的失敗，是中國軍事上的莫大耻辱，不能完全諉責於盟國的缺少幫助，西諺說：「天助自助者」，自強自救，是今天中國朝野一致所應努力的目標。而尤其最要的，是屏除失敗主義的心理，洗滌過去一切的缺點，擔負起自己的責任來，以爭取自身的勝利。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迎民國三十四年

一元復始，萬象聿新，艱難締造之中華民國已屆第三十四年度元旦，堅苦犧牲之抗戰已開始進入第九年代矣。吾人倦懷過去，瞻念將來，謹以五義，貢諸國人。

一曰安不忘危。新春之際，後方人士，莫不歡欣鼓舞，及時行樂，此亦人情之常也。然亦曾念及夫去冬敵寇陷長、衡，下桂、柳，進犯黔邊，西南震動之際乎？彼時朝野上下之心情如何？人民之惶慄如何？國際之觀聽如何？今黔境敵寇雖已敗退，然湘桂兩省，尚爲敵軍盤踞，力作打通中南大陸交通線以進犯我昆明之打算，一旦敵人布置就緒，孰能保其不再冒孤注一擲之險，是今之所謂安者，始猶燕雀巢於危幕而自以爲萬安也。語曰：『勿恃敵之不來，恃我有以待之，』惟能安不忘危，庶可以轉危爲安，此其第一義。

二曰佚不忘勞。伏處於後方之人民，其心甚安，其情甚佚，逸則思樂，亦人情

之常也。然今日後方朝野上下片刻之娛暇，實受前方冰天雪地中無數爲國捍衛將士浴血苦撐之賜，凡稍有良心者皆不能不自感其對於前方將士所負之重債。況前方將士之外，尚有無數胼手胝足從事修築國內國外公路、鐵路、機場、河道之員工，彼等冒瘴癘，經艱險，與敵寇競爭，與毒蛇猛獸掙扎，苟無此輩員工之勞，亦無從獲得今日片刻之閑逸，凡處於後方偷得片刻之閑逸者，應如何思念前線將士員工之勞苦而有以撫慰之，安輯之，此其第二義。

三曰退不忘進。自抗戰七年半以來，吾人因戰略上之關係，始而放棄華北，既而放棄華中，繼而放棄華南，去年一年之中，又放棄河南，放棄湖南，放棄廣西，今日所餘之地，僅川、康、滇、黔、秦、隴、青、寧、新九省可稱完整，特較本部二十八行省，僅得其三之一耳。以我國軍備之落後，國防工業之幼稚，吾人對於不得已而退守西部山嶽地帶之政府及國策，誠不願多事苛責。然收復失地之念，應無一日忘懷於胸中。吾人深望今後一年之內，政府下大決心，發大毅力，不許再退一步，並進而收復一切已淪陷之失地，拯我淪陷區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朝野上下，

俱當以此自勉，此其第三義。

四曰合不忘分。吾人以弱國而能抗戰至七年以上者，無他奇蹟，實賴我舉國朝野各黨派同心一德，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不授敵人以隙。敵寇對我舉國之團結，殆無一日不思破壞，無一日不思挑撥，回顧抗戰以前，我國內戰之頻仍，黨派之傾軋，今日有此成績，不可謂非奇蹟，亦我國民族所應自負者。然此種團結之成績，其來既屬不易，自當加意保持，勿使稍有裂痕。國中各黨派如能時時回想過去內戰之慘痛，兩敗俱傷之危險，則一切意氣自不難化除。語曰：『願君不忘在莒，願臣不忘中鉤，』合不忘分，知合之難而憂分之易，長保團結之道也。此其第四義。

五曰親不忘疏。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親仁善鄰，古以爲寶。我自抗戰以來，所得盟國之助，不爲不多，然盟國之中，有甚親者，亦有尙疏者。親者固不宜中道此離，自生隔閡，其尙疏而未甚親者，又寧可聽其自然演變而不加以人爲之調整乎？善謀國者，多樹友，少樹敵，親者益親，疏者亦轉而爲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者勝算多，雖強大不可以忽，況在苦戰疲弱如我者，願國人其念之，

此其第五義。

吾人持言論之責，新年無以貢者，願貢此五義，以當獻曝，溯既往而瞻將來，吾人誠不勝其朏朏之誠也。

民國三十四年元旦新中國日報社論

慰勞冬防出力人員

時節將屆春節，各機關團體正在籌備春節勞軍的運動，國家抗戰七年半，全賴前方將士浴血苦戰，才有今日。在此天寒地凍之時，後方安居樂業的人民，分出一點時間和財物來，慰勞前方替我們打仗的將士，這當然是情理上應該而且必要的。

但我們以爲，抗戰以來，有功於國家人民的，還不止是前方的將士，卽如後方的許多負保障治安責任的機關，如警察、憲兵、地方保安團隊、各縣市防護團等，或在平時維持都市和鄉村軍民的秩序；或在空襲時協助人民，保衛治安，減少損害，有形無形對於國家社會有很重大的貢獻；特別是在這嚴冬之際，奸宄潛伏，行旅維艱，全靠這些負維持治安的機關人員，肯不辭辛勞，不避寒冷，晝夜巡邏，當我們市民擁被高臥的時候，這些機關中的人員還在迎着寒風，冒着雨雪，或屹立於街頭，或糾察於郊外，遇難爭先，見險不避。前線作戰的將士雖然辛苦，其功勳尙易

爲人所注意，惟有這些在後方效力治安的人員，平時既無赫赫之名，而所受的辛苦也不亞於前方將士，在此春節勞軍之際，我們以爲後方的人民團體，也應該對於這些爲大衆出力的人員，擴大慰勞一下，以表示人民對這些機關人員感謝的微意。

不但此也，慰勞不過是一時的舉動，僅足以表示一點意思，還不足以實際解決他們的困難，免除他們的後顧之憂。我們以爲對於這些負維持後方治安責任的人員，也應該依照調整官兵待遇的規定，提高他們的薪俸及津貼，以足以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爲度，若說這一筆龐大的經費無從支出，則調整官兵待遇既已決定動用人民外匯資金，及全國人民獻金獻糧，在此兩種龐大的收入之下，難道不能分出一部分經費來調整後方的軍警團隊的待遇嗎？即使還不夠，我們以後不妨向都市居民中設法，指定一兩筆收入專作此用，譬如在房租這樣高漲的情形下，一般有房產的人，不勞而獲，坐致厚息，就應該增加房租的收入，按房租實際收入徵收累進的稅額，比例應該特別大點，因爲房產不比地產，有地的人，雖然坐擁租穀，究竟還是爲國家增加了生產，並且國家已對他們徵收實物，還有獻糧及種種名色，負擔已比較重

些。惟有有房階級的人，除了坐着吃瓦片以外，對於國家社會毫無貢獻，有許多房主，擁有房宅若干，平時封鎖，寧可任其曠廢，而不肯出租，這實在是那不合理的現象。據理說，政府如果真能實行民生主義，早就應該仿英國的辦法，把無家可歸的難民，強迫安置到這些空廢的房屋或以少數人口而坐擁閑房若干間的住戶內，實行計屋住人的辦法。如今政府既礙於大戶的情面，而不敢實行民生主義，則向他們抽點較重的房捐，以維持爲治安出力人員的最低生活，難道還不合情理嗎？按理說，不但出租的房屋應該收房捐，即號稱自住而實際曠廢的住宅，也應該收房捐，更應該收得重些，因爲自己用不着又不許別人用，實在是違反社會公道的行動，真正實行三民主義的國家，正不能容許有這種行爲的。這一筆房捐，如果整理得徹底，以之維持一地方警察機關人員的生活，儘可有餘，不必再說別的收入了。並且用警察來調查房租，征收房捐，徵收來又專爲他們自身的待遇調整之用，這是順理成章，輕而易舉之事。聽說新任公安局徐中齊局長，到任之始，還找不到住房，可見成都市房荒的情形。但我們確實知道，成都市上平時有許多大宅，或曠廢無人，或以

少數人而坐擁巨宅，不許他人染指，這種情形，在平時已不合理，在戰時尤不合理。我們以為應該賦予市政府以調查房屋並強迫房屋出租之權，才可以減少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怎樣慰勞並解除這些為維持後方治安出力人員，如警察、憲兵、保安團隊等的生活困難，是我們每一個後方居民的責任，大家應該負起這個責任來。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三十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這幾天

這幾天，全世界的局勢正到了一個極微妙的階段，中國內部的局勢也到了一個極微妙的階段。

在歐洲戰場，蘇軍的攻勢已達距柏林四十哩的左右，西線盟軍也開始反攻。東線攻勢進展所以較西線爲速，固由於西線德軍有堅固的防禦工事可資固守，而東線則無可守者，但蘇軍的進展如此之速，幾乎出人意料之外，恐怕還是得力於政略成功者爲多。我們知道在蘇聯境內早已存在着一個自由德國的委員會，由若干被俘的德國將領組成，其中不少階級較高的分子，德國的國防軍多數出身於普魯士的地主階級，傳統地對於俄國抱有好感，希特勒執政十二年，始終沒有完成了黨化國防軍的計劃，國防軍將領中不少對於納粹的一黨專政懷抱惡感的人，由這些被俘將領的拉線，在保全他們在普魯士的地產和特權的條件之下，這些在東線對蘇作戰的國防

軍，不難以潰退的方式來縮短戰爭，壓迫希特勒及其黨人下臺。最近傳說希特勒在東線會槍決若干將領，似乎可以證明此事。照這樣看來，蘇軍在東線進展之速，可以說是政略的偉大成功，還不僅在戰略方面。

如果東線的德軍照這樣潰退下去，則希特勒黨人縱想靠納粹黨軍的力量，死守柏林，抵抗到底，恐怕大勢已去，也難挽回最後的噩運。我們固然可以想像柏林被佔以後，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軍還可以逃到巴威略去繼續抵抗，但那時候已不成一個局面，歐洲的戰事已經可以說是結束了。

因此，德國國防軍的向背，可以決定納粹政權的命運，也就是可以決定歐洲的戰局和全世界的局勢。但這裏便連帶引起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同盟國家的領袖，早已宣言德國須無條件投降，但在目前的情勢之下，特別是蘇聯的政略既是把國防軍與納粹分別來看，則盟國所既定的原則是否可以修改呢？就在這個時候，傳說美蘇英三國領袖已在某地聚首，會議的結果想不久就可發表一部份。此次會議自必以德國投降問題為主要的議題，而德國失敗後對日的作戰問題也必同時討論。關於如

何接受德國投降，如何處分德國的土地，如何消滅德國的殘餘力量，如何解決波蘭、匈牙利、及波羅的海、巴爾幹諸國的問題，自必也同時在這一大會議中求得同意的解決。我們以爲無條件投降的問題似乎不難求得解決，因爲「無條件投降」這句話實在是我們中國人譯錯的，按原意應該譯作「無談判投降」，即是戰敗方面不須經過議和談判的方式，只要接受戰勝國片面的條件便夠了。依此解釋，是條件無須談判，而並非沒有條件，事實上義大利投降之時也是有條件的。因此接受德國某一部份人的投降，這問題並不難解決，所難者倒是怎樣處置戰敗的德國，和歐洲大陸上許多政治糾紛的問題。我們相信羅邱等偉大的領袖，對這些問題必能本維持戰後永久和平的襟懷與眼光，以互諒互讓的方式，大刀闊斧消弭國際間的種種猜疑與矛盾，爲人類未來的命運奠定福利的基礎，如果處置稍一失當，則貽禍也將無窮，我們所以說這幾天是最微妙的階段者在此。

歐洲的問題也就是東亞的問題，柏林的攻佔和馬尼刺的攻佔同樣將決定了德國和日寇的最後命運。照目前情勢來看，盟軍在東亞的次一登陸地點當在越南的金蘭

灣附近，越督德古維是維琪份子，此時當早已與戴高樂政府取得聯絡，十餘萬法越軍的向背可以決定日寇在南洋的命運，這個日子不久即可到了。所要緊的是我們中國人應得爭氣些，過去湘桂戰場的失利，已經使盟軍在中國大陸的登陸受了影響，最近廣東戰事又復轉進，照這樣下去，我們實在無面目對同盟國家。這雖是一個軍事的問題，但也未始不與國內的政治局勢有關。這幾天，國內的政治局勢也到了一個極微妙的階段，怎樣微妙，我們且不必細說，我們只希望有掌握中國命運權力的各方面人士，也應該擴大襟懷與眼光，以互諒互讓的方式，大刀闊斧來消弭種種猜疑與矛盾，爲中國未來的命運奠定一個永久福利的基礎。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尊重民衆的節日

民國成立，推行太陽曆已有三十三年以上的歷史，但是民間的習慣依然覺得只有舊曆年才夠年味。記得民國初年一推行新曆的時候，民間會流行一付對聯，叫做：『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這是當時民衆對於政府推行新政的一種諷刺。照理說，『百姓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任何一種革新事業，在開始時未有不招民衆反對的。當局原不必一定顧慮民衆的反對而即停止革新，但所謂革新者，須是舊的確實要不得，改革了以後確實比未改革以前要好，才有值得一改的必要。若是改與不改都差不多，一個半斤，一個八兩，那就不必一定有與民衆習俗挑戰的必要。即如上述的一聯，其中上聯所指陳的男女平權一事，確實是舊習俗不好，要不得，非改革不可，非把男尊女卑的舊習慣打倒，換成了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新風氣不可。但是過

年一事，却並沒有什麼好壞，陽曆固然有陽曆的好處，陰曆也並不見得就壞到極點，非澈底廢除不可。平心而論，太陽曆在中國，在世界自有其地位。

第一，太陽曆起於埃及而行於歐洲，太陰曆起於巴比倫而行於東亞，兩者有同樣長的歷史，無分優劣，若以石器時人已曉得用月亮週期計算曆法而論，陰曆的歷史還要更長些。

第二，太陽曆流行於歐洲各民族中，約有五萬萬人，太陰曆使用於東亞各民族中，除中國外，還有日本、朝鮮、越南、暹羅等，也約有五萬萬人，也無分優劣。若連印度、阿剌伯等曆法在內，則使用陰曆的範圍還要廣些。

第三，就中國境內的氣候說，陽曆過年，氣候還不算寒冷到底，農事還不盡休息，要到了陰曆年前，才算窮冬，農人才大部分休息，一過舊年，才真正臘盡春迴，才覺得真正有新春的氣象。

第四，就中國習俗說，陰曆不但是農民的節日，也是一切工商等界人的共同休息的日子，甚至在執行新政的官憲家中，遇到這種節日，也照樣要烹羊宰牛，沽酒

相勞，甚或比普通老百姓還要熱鬧些。荀子說：『約定俗成謂之宜』，既然已相沿成風，似乎並無一定要廢除的必要。

以上四點，並非說我們現在應該廢除陽曆，恢復陰曆，民國使用陽曆，已經有三十四年的歷史，並且爲便於與世界各國來往起見，陽曆自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民間習用陰曆却也不一定禁止，尊重民衆的習俗也就是民主精神的一端。根據這個理由，我們覺得本年政府規定陰曆元旦各機關放假一日，不失爲賢明之舉。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裁員簡政問題

近來政府厲行裁員簡政，各機關奉令進行甚為積極。裁員簡政本是我們一向的主張，於今居然見諸事實，自不失為政治進步的一種好現象，不過被裁之人既多，也難免引起一大批失業人員的社會問題。在此生活高漲之時，公務員平時靠薪給收入，已感萬分困難，何況一旦失業，走頭無路，自難免要產生許多不幸的事件。雖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國家用人行政，本不必過於顧慮，但如善後有良好辦法，自也不妨對這一般可憐蟲設法安插安插。我們於此，提供幾點意見如下：

第一，裁員要有公平的標準，不可任長官的喜怒，使應裁者不裁，不應裁者反而裁去。什麼是公平的標準？我們以為首先應裁挂名而不作事的額外人員，譬如每一機關，都有所謂顧問、諮議、專員、參議之類，專者不專，議者不議，這些人首當裁。其次裁員應當以任職久暫，勞績多少為標準，而不應以官階高卑為標準。任

職久的人員應當保障他們的地位，不應率爾裁去。又其次，中央應將各機關人員釐定一定標準，每一機關應有若干人員，都切實明白規定，不許另添名義，多一個不成，少一個也不可。這三點標準定了，才可避免不公。

第二，簡政比裁員還要緊。目前的現象，不但同一機關冗員太多，同一政府系統下駢枝的機關更多，我們以為政府應下大決心，將政府應屬機關，從新審核一下，同一性質，不另設機構；有舊機構者，不另成立新機構；某機構不屬於某部者，應按其性質改屬於他部。政府設機關應根據統一的法章而不可根據一時的命令，這一點也很要緊。

第三，對於被裁人員應妥為安插。被裁人員的安插照理說本不必由政府費心，但事實上中國的工業化既落後甚遠，社會上實在安插不了這許多人，政府仍不能置之不理。我們以為政府應按照國家在此時及戰後的需要，提早把這些被裁人員加以特殊的訓練，以備錄用。譬如，戰爭不久即可望結束，戰後復員工作需人甚多，盟軍在中國登陸以後，馬上就需要若干有智識有特殊訓練的人員，協助這種工作，所

有被裁的人員，似乎都可以安插到這一項工作裏去，經費不妨由國際救濟經費中撥給，這似乎是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此外自然還可有別的办法。

第四，對於未裁的人員，應充分保障其生活及地位。地位的保障應嚴格實行文官制度，事務官以下的人員不得隨長官爲進退，任命人員必須經過考試，按年資遞升，無大過不得罷免。生活的保障應提高待遇，按生活指數增薪，不使有凍餒之虞，才能促進行政效率。

以上種種，卑之無甚高論，但却是目前急要之圖，希望政府注意。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黨派團結中之所謂黨派

黨派團結的建議由呼聲變成了事實，這事實又反應在朝野內外一致促其實現的呼聲上，現在各方面的協議正在進行之中，我們暫時不必加以評論。我們現在所要提醒的只有一點，就是所謂黨派團結中的黨派，究竟指的是些什麼黨派？

我們爲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因爲我們看到了昆明出版的民主週刊第一卷第七期上，有羅隆基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黨派團結的具體方案」，在這篇文章裏，羅先生指出了：

『中國今日有三個大的政治集團：（一）國民黨，（二）共產黨，（三）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同盟只有四年的歷史，他是抗戰期中中國許多小黨聯合而成的組織，然而他的產生是適應時代的需要。民主同盟的構成分子包括了許多政治團體的分子，例如中國青年黨、中國國家社會主義黨、中國第三黨、

救國會等等。所以民主同盟本身的歷史雖短，但構成分子所代表的那些黨團都有十年至二十年以上的長期歷史。民主同盟目前已經成了單一的團體，他已經接收了大量數無黨派的盟員，這些盟員都有長期的政治的與社會的關係，如今他的組織普遍到了全國。民主同盟在今日中國有了他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上堅固的基礎，這當然亦是全世界應該共同承認的事實。……」

羅先生是我們的老朋友，並且曾經一度是中國青年黨的同志，現在，他從退出了中國青年黨，參加了中國國家社會主義黨，又退出了中國國家社會主義黨而以個人資格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他這篇文章不知道是代表他個人的意見，還是代表中國民主同盟的意見。我們看了之後覺得有不能不辨正之點。如果是代表個人的看法，我們覺得這是一種錯誤；如果是代表整個中國民主同盟的看法，我們就覺得這更是一種曲解。我們覺得，在今天國內懷抱這種誤會或曲解的人似乎還不止羅先生一個，有些報紙上也常常把中國民主同盟代替了其他一切民主黨派的地位，這種誤會或曲解，恐怕不是其他各民主黨派所樂意接受的。因此，我們願意站在中國青年

黨的地位，對這個問題申述一點我們的意見。

我們始終認爲：中國現今有許多具有歷史和相當組織的政治集團，而並非如羅先生所說的只有一個，就如羅先生上面所指出的中國國家社會主義黨，中國第三黨，救國會等，他們都各有相當長的歷史和組織力量，他們並沒有放棄了自己的組織而整個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就我們中國青年黨說，青年黨黨員之中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的不過是全體黨員中之極少數，在過去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時代，這個同盟不是一個單一的政治團體，而是一個各民主黨派的暫時聯合，同盟的一切決議取決於各黨派的協議，因此他們是以代表中國青年黨的資格而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誠如羅先生所說：『民主同盟目前已經成了單一的團體』，那麼，他就不能再以各民主黨派的聯合自居，而僅變成了中國各民主黨派中的一個單位，與中國青年黨，中國國家社會主義黨，中國第三黨，救國會等處於同等的地位，那麼，中國青年黨黨員而又同時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的分子，祇能認爲係以個人資格參加，而不能認爲係黨的代表，因此，如張表方先生所說：『民主同盟不能拘束各黨派之一切行爲，各

黨派亦不能以其一切行爲單獨代表民主同盟。」（見昨日本報來論）是很正確的說法。不過我們應該補充聲明一句，各黨派並未『加入民主同盟』，而祇是各黨派的一部分黨員加入了民主同盟，他們是以個人資格參加的，猶如另一些黨員之以個人資格參加其他同盟式的組織，如文化界同盟，出版界同盟之類，因此，如羅隆基先生所說：中國今日只有三個大的政治集團，而把中國青年黨等所謂「許多小黨」（我們不知道怎樣才是大黨）都歸併到中國民主同盟系統之下，我們認爲與事實不符，至少不免是一種誤解，有聲明的必要。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廿七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中國對舊金山會議應持的態度

舊金山會議雖然不是和平會議，然而却是戰後和平會議的預備會議，一切戰後問題都將在此會議中樹立一個解決的輪廓，凡不能參加此會者，對戰後世界問題將失去發言的機會，而有任人宰割之虞。這一點但看許多中立國家都爭先恐後對德日絕交宣戰，以求獲得一個被邀請國的資格，甚至連一向傾向軸心的西班牙、葡萄牙兩國，也在醞釀對日本絕交，就可知此次會議的重要性了。

我們中國幸而以首先抵抗侵略，血戰八年的犧牲，不但得出席此次會議，並且忝居四邀請國之一，取得領導會議的強國之一的資格，這在我國國民自然感覺愉快。但同時也不能不更凜於自己責任的重大，更須以小心翼翼的態度來應付這次關係重大的會議。因為我們自願實力實在夠不上強國的資格，無實際而有虛名，是天下最危險的事，糊塗的人或以此為榮，稍有常識的人則不能不引以為深懼。所以我

們希望我國代表團在出席此次會議之前，對於我國在會議中所應持的態度，不可不慎重地加以考慮。

首先說，我們的國基尚未穩固，戰後需要長期的和平，和平是世界性的，不可分的，要求國內的和平首先必須努力促進戰後世界的真正和平，因此我們必須以全副力量來促進國際和平機構的建設，提出有積極性建設性的建議，喚起各國政府和人民的同情，縱使稍偏於理想也不要緊，因為我們的建議縱使通不過，但如果真有高尚而遠大的建議，必可博得世界人民的同情，這同情對於我們的建國前途是有極大的好處的。不過，同時也須不要忘記我們是一個獨立國家，有損國權而無益世界的事，是我們所絕對不能接受的。

其次，這次會議是由美英蘇三強來領導，這三個強國在會議中自然具有舉足輕重的資格，而這三強對於世界問題的態度並非完全一致，彼此間還有歧異之點，也是事實。我們中國在這種情勢下，既不可一味俯首帖耳，惟某一強國之命是從，自失其國格，又不可一味虛僞狂詐，無故刺激強大的友邦，而並無以善其後，其間態

度頗爲難處。我們以爲中國如欲實踐第四強國的地位，則在會議中一切言行，必須以三大國間意見的溝通調劑者自任。俾斯麥在柏林會議中曾以公平的經紀人自命，我們雖無當時德國的發言力量，但也不是毫無力量，公平的經紀人不必定須自身有超越一切的力量，但使能善於適應事機，則一切力量都可以化爲我的力量，都可以做我的後盾。春秋時代的宋向成，鄭子產，所憑藉者都是小國，然而也可以有偉大的成就。甚至如維也納會議中的法國代表泰勒藍，以戰敗國家的地位，尙能操縱一切，獲得外交的勝利。可見形勢在乎人爲，不必先自己氣餒。

其次，這一次會議中，幾個強國都在爭拉友邦，各自形成一個集團的勢力，以便在會議中取得多數的支持。美國除了汎美國家的支持以外，還可以在歐亞兩洲中爭取幾個友邦。英國除了大英帝國各自治領之外，地中海上的幾個國家如義、希、西、葡、乃至挪威、荷蘭、比利時、及近東的回教國家，大約多可把握。蘇聯則有巴爾幹及中歐的諸國爲衛星。各方面勾心鬭角，你拉我奪，會中內幕的鬭爭一定很烈。中國在此情勢中，如欲保持大國的獨立地位，則爭取友邦的團結是必要之着。

我們以爲，中國在會議中，對於次強如法國，在太平洋上利益一致的如澳洲、紐西蘭、加拿大、菲律賓、印度，同處亞洲的國家如土耳其及阿剌伯諸國，在美洲而與中國邦交素篤的如巴西、墨西哥等，都有特別拉攏在會議中爭取一致的主動地位的必要。

最後，我們中國是東亞大國，對於東亞問題，特別是對日問題，有重大的發言資格。對於這一點，必須特別以主動資格提出具體主張。首先須加強盟國擊潰日寇的決心，要求在歐戰結束後繼續對日作戰的保證，其次確定在戰後處置日本問題中中國的重要地位，保留對日要求重大賠償的權利。中日是緊隣，戰後日本的如何處置有關於中國的國運者甚大，我們對此問題必須充分審慎考慮，一切以保障東亞在戰後長期和平爲前提，胸中先有一套成案，才不致臨時草率，任人支配。此外東亞的弱小民族，如韓國、却度、緬甸、越南，對我國都有好感，我們應遇機會替他們仗義執言，以弱小民族權利的辯護人自任。對於亞洲殖民地問題，我們應提出一個公平合理而切實能行的方案，以杜戰後遠東的紛亂。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以後再另

談，不必多講。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中國對舊金山會議應持的態度

六八五

兒童節略談關於兒童教育三四事

這幾天，本市的各小學正在忙着籌備兒童節的盛大紀念，各校的兒童們在烈日炎光之下天天加緊操練，以備今天的檢閱，這種情形想來在他地也都一樣，因此引起我們若干感想。

我們的教育似乎也同政治一樣，過去的注意多半在形式方面，而不問實質如何。負教育兒童之責的，平時的注意祇在兒童的制服是否整齊，步法是否一致，注入的教材是否能夠死記，師長的管教是否能夠服從，對於兒童的個性發展，生活需要，並不會加以多大的注意，這樣的教育，結果在整齊劃一方面也許做到了，成千成萬的兒童變成了一色的機械，每一個兒童的創造天才，活潑個性，就在這種機械教育之下埋沒下去。今天的兒童埋沒了自由創造的種子，將來的國家就減少了無數獨立的創造和發明，這都是形式主義之毒。過去內地的小學，排隊歡迎縣長、鄉長

及某大軍人的事是常有的，今天這種現象雖然比較是少了，但把兒童當作會場的陳列品，爲各種儀式湊湊熱鬧的事，却還是家常便飯。我們覺得，爲尊重兒童權利，養成他們獨立自尊的人格起見，這一類的事似乎越少越好。兒童節是兒童自己的節日，與其排着隊在大會場裏站上幾點鐘，立正看齊，飽聽訓話，（也許站遠點的還聽不到）不如讓兒童在這個節日，自由結合，表現一點創作的興趣，尋找一點正當的團體娛樂。

因此我們連帶地又想起了中國的童子軍教育來，中國創辦童子軍已經有三十四年的歷史，但是效果如何？童軍教育的目的本在訓練兒童的德育，養成應付生活環境的各種有用技能，中國今天每一個小學和初中男女學生，都是童子軍，但品性並不見得就人人都好了，技能也祇成了形式，惟有服裝却非講究不可。眼前的布料這樣昂貴，教育當局却強迫每一個學生都要備一套整齊的制服，有些特別自命講究的學校還要強迫學生用一律的牀單，一律的鞋帽，但圖辦學校的人落一個整齊清潔的好名譽，而不顧學生的經濟能力能否負擔。其實在抗戰期間，短衣赤足也可以照

樣讀書，制服並不是最要緊的事。我們以爲今後教育當局對於這一類形式主義的作風，似乎可以放寬一點。

目前小學生的教本，不但紙張印刷方面非常惡劣，有損於兒童的目力，就是內容也因爲非用部定教科書不可的緣故，千篇一律，毫無比較，以中國地方之大，各地風土習慣氣候物產之不同，而強其採用一式教材，結果與實際生活相去太遠，兒童對之毫無興趣。即如本市各中小學向有春季娛樂與秋季娛樂兩種，而採用同一的教本，結果到夏天講的是白雪，冬天反而講到西瓜，至於北方人有從來未見過船的，南方人有從來未見過駱駝的，遇到這一類的教材，不但學生莫明其妙，就連先生也除了照本敷演以外，講不出什麼道理。我們以爲今後新教育當局，似乎應該把統制思想的部定教科書制度取消，教育部是全國教育行政的最高出令者，應辦之事正多，似不必勞神與書買競爭營業，不但應該聽任各書局自由編製教本，以收觀摩比較之益，但經部中審定即可，並且還應該聽任各縣鄉教育團體，自由編製有關鄉土的教材，才可以適應地方的特殊需要。

至於教法方面，講演注入式的教育對於兒童尤覺特別不宜，爲發展兒童個性起見，似乎應該多參用討論的方式，越少照本宣揚越好。手的教育比腦的教育更重要，爲矯正過去中國重文教育之弊起見，似乎應該多提倡兒童用手去做，用眼，用耳，用腳去接迎自然，這些問題，需要教育家的悉心研究，我們不必多談了。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四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亞洲需要蘇聯

蘇聯對日通告廢止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所訂蘇日中立條約一舉，雖然是世界上的大事，但却不是出人意外的事情，因為從雅爾達會議以後，蘇聯同意與中國代表同出席於舊金山會議，並且會議日期選定為四月二十五日，即在蘇聯有權宣告廢止此約的日期以後，已經把蘇聯的對日態度明白宣示於全世界了。可以引起驚異的，倒是這次照會內容措辭之嚴厲，不大像通常的外交詞令，以及距離四月十三日以前尚有幾天，蘇聯就迫不及待，毅然作此決定。前一點預示今後蘇日關係尚不僅發展至廢止中立條約為止，關係必更惡化；後一點證明蘇聯對於外交處處採取主動的地位，而日本則倉皇狼狽，陷於被動的苦境。回憶四年前松岡洋右親訪歐洲，在莫斯科締定了此約，當時德國秘密準備攻蘇，莫斯科已得消息，而日本的盟友納粹德國竟不肯以一點消息透露給松岡，以致松岡在莫斯科締定此約之時，自以為莫

大的成功，臨行時斯大林且親送至車站，而不知已經上了人家的大當。及至德國攻蘇戰事發動，日本才舉國大譁，自知已縛了手足，替蘇聯釋去了東顧之憂，結果松岡洋右被迫下臺，但大錯已成，遂不得不決定南進，失去了與德國夾攻蘇聯的機會，挑怒了巨人美國，演成了今日的慘敗，所有大錯，都是由於松岡洋右一紙條約所致。今天我們回顧這一段歷史，蘇聯何其巧？日本何其拙？可見一國政治家的眼光識力，是非常有關於國運的，日本沒有政治家，所以才有今天。

蘇日中立條約雖然宣告廢止，但距離滿期尚有一年，在此期間，除非日本對蘇挑戰，蘇聯無破壞條約即時進攻日本的必要，事實上待歐戰結束，蘇聯大軍東調，亦尚需若干的時間。而以日本目前的狼狽情形而論，雖明知待到明春，不外是坐候挨打，恐怕已無先行挑戰的勇氣。所以蘇日條約雖已宣告廢止，但今後相當時期內仍當視作有效。日本今後所取的對策，將是加緊向蘇聯獻媚，妄想以種種的手段，消極地阻止蘇聯的參戰，積極地希望蘇聯出來作調人，以乞取比較有利的投降條件。我們雖相信蘇聯的外交，向來六轡在手，一塵不驚，不是日本的乞憐獻媚所能

轉移的，但今後蘇聯對於遠東將不復是局外人，一舉一動都可以決定全局的命運，而於地處遠東、與日本作戰八年的我國，所關尤大，則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實。我們以為我們中國人應該特別清醒地認清這種新事實，而樹立我們的外交新政策。

這個新事實是什麼呢？就是從蘇聯革命以來，二十八年之中，除了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的一個階段之外，蘇聯的注意向來集中於歐洲，對亞洲問題向來處於旁觀地位，今後這個形勢已經變了，新時代已經開始了，蘇聯在歐洲的強大敵人德國已經潰敗，東歐的親蘇堡壘已經建設成功，今後蘇聯已無西顧之憂，可以放手過問東方。蘇土友好條約的重新修訂，表示蘇聯的注意已經到了韃靼尼爾海峽，越過了這個海峽，就是亞洲了。蘇聯今後不但是歐洲的國家，也是亞洲的國家了，這個事實必然隨時間的進展而愈益顯露，無論如何，我們中國人必須準備迎接這種新事實，而不可稍有徘徊。

我們以為今後中國的外交政策，必須建立於這種新認識上，即東亞和平安定的支柱，決不可除外了蘇聯，中國的國防安全保障，也不可不以蘇聯的友誼為最大基

礎。中、美、英、蘇是保障戰後世界及遠東和平的四個有力的支柱，這四根巨柱，缺一不可，否則和平大廈的房頂是會倒塌的。因此今後對於遠東一切問題的處分保障，必須把蘇聯拉到裏面，必須尊重蘇聯的意見和信賴蘇聯的力量。就中國自身的安全保障講，尤須特別加強中蘇的友誼。我們以為在這一二次舊金山會議裏，我國代表應該抓住機會，出力支持蘇聯的合理立場，以便於中蘇兩國邦交有更進一步的融洽。

亞洲需要蘇聯，中國尤其需要蘇聯的合作，努力吧！邁大步行。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九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我們的準備怎麼樣了？

這幾天，盟軍在歐洲戰場的發展，已經深入德國中部，把德國切成了數段，東西兩線的會師已不在遠，不久，盟軍就可以自由宣告對德戰事已經結束了，儘管希特勒的政府永不投降，也無礙於事。

在太平洋，琉球島的登陸戰已將近尾聲，非島和緬甸的戰事可以說已經全勝，美軍的次一動向當然是登陸中國海岸，向華北、華南同時進攻，英、荷、法等國則擔任收復南洋各島及越南的責任，這些場面，不久都可以明白展開。我們看了這些樂觀的消息，一面爲盟軍的勝利欣幸，一面却不能不爲我們自己焦急，我們所焦急的是，在那樣偉大的場面之中，我們平素忝爲四強之一的中國，究竟應該擔任一個怎樣的重要腳色？我們對於自己所應該擔任的腳色，準備到什麼程度了？

收復中國領土應該是中國自己的責任，不得已而求助於盟軍，情有可原，但不

能夠專靠盟軍替我們打仗。一旦盟軍在中國海岸登陸，以中國戰場面積之廣大，交通之困難，盟軍海上運輸補給線之綿長，數百萬日寇的頑強抵抗，想像戰事可能艱難，我們自己不出力，專靠人家替我們出力，不但爲情理之所不許，也爲事實之所不能。我們當然要準備反攻，從西面往東打，以便與由東往西的盟軍會師中原。這種準備想來政府當早已計劃，但準備得切實不切實？在最近幾個月內是否就能夠按照計劃，配合反攻？準備到怎麼樣了？我們不免有點着急。

在盟軍未登陸中國之前，日寇爲鞏固大陸交通線起見，開始了對我襄樊、老河口、南陽的進攻，目前軍事雖尚在相持之間，事關軍機，我們未便判斷，但這件事却不失爲對我們軍事準備能力的一種試驗。我們應該先守得穩這些地方，才能談得到第二步的反攻。這是我們一個表現軍事能力的機會，我們的準備怎麼樣了？

國內的團結問題，是大規模反攻前一個重要的條件，全國人民希望這件事趕快成功，全世界同盟友邦也都注目這件事情。赫爾利並未疲倦，在分訪英蘇之後，不久當返任我國。中國人的事，爲什麼中國人不提前自動解決？中國是未來國際和平

我們的準備怎麼樣了？

機構中五個常任安全理事國之一，自己還要過問全世界的大問題，爲什麼自己國內的這些家務小問題不能趕快自求了結之道？我們對於團結的準備怎麼樣了？

眼看四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就要在舊金山開會，我們希望在這個會裏，我們的代表有臉面對世界人講話，那就必須對外趕快打勝仗，對內趕快在民主原則下團結。對於這兩件事，我們的準備怎麼樣了？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敬悼羅斯福總統

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先生於昨晨四時卅分，（東方戰時時間）因腦充血病猝然逝世於喬治亞州溫泉別墅，這一個驚人的噩耗，霎時傳遍了全世界，一切愛好民主和平的人，都爲這個不祥的消息而震驚，而痛悼了。我們謹以中國報人的地位，對於這位爲人類自由，國際合作，盡瘁至死的偉人，致最大的悼念。

羅斯福總統服務美國最高行政十三年，在職的期間，正值全世界震蕩危疑之際，羅總統以隻手力障法西斯的洪流，爲民主自由堅苦奮鬥，心力俱瘁，以致影響體力。在本屆總統競選之初，美國一部分輿論就以總統的體力爲疑，但羅總統宣稱：余如一老卒，有服役國事之義務，如國家需余負責，余不能不拋棄安閒之在野生活而繼續工作。這一種偉大的服務精神，在我國歷史上祇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武侯可以相比。如今強寇未殄，大星先落，時勢需英雄，而英雄不待，

凡有血氣，誰不爲之同聲一哭？

爲羅總統個人計，人生百年，孰無一死？總統平生致力要打倒的是法西斯，東西法西斯眼看已將潰崩；所致力要維護的是人類的正義，世界的和平，正義與和平眼看就要在總統所手造的舊金山會議中實現，此時而死，死可以無憾，死永將不朽，正如林肯總統在南北戰爭將結束前的逝世一樣，個人的大名將永留於天地之間。但爲世界人類計，這時候正是和平正義由萌芽以至滋長將至結胎之際，這時候正需要一個殷勤將育的保姆將他撫育成成人，一旦失去了這個保姆，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和平、正義，就得更加倍小心地保持，才能夠望其迅速成長。

站在我們中國人的地位，對於羅總統的噩耗尤覺感痛萬分，十餘年來，羅總統一貫是我們中國最親密的友人，他扶植這個多災多難的中國，在戰爭中長成，在和平後光大，他關心中國的抗戰力量，他關心中國的民主前途，他爲中國的團結努力，其熱心的程度不亞於中國人，甚或過於一部分的中國人。他爲什麼這樣關心中國？因爲他曉得要想維持戰後世界的永久和平，非有一個民主繁榮的中國矗立於東

亞不可。現在，羅斯福總統永別了，中國再沒有這樣一個熱心仗義的世界偉人做我們的益友了，今後的責任完全落在我們中國人自己頭上，要民主，要團結，在我們；不要民主，不要團結，也在我們，可不要辜負了這一位去世的好朋友。

至於羅總統去世後的世界大局，想來不會有什麼重大的改變，納粹德國已近尾聲，東方的倭寇也不要妄想有什麼機會。繼任的杜魯門總統已經明白宣布：「將使故羅斯福總統之政策全部實現，為達此目的，政府人員不作更動。」又發表談話稱：「茲請告訴全世界人士，吾人願竭盡所能，在東西兩大戰場，繼續推動戰爭，直至勝利之到來。」全世界人都聽明白了這幾句話，我們相信杜魯門總統必能繼事述志，使羅斯福總統的抱負得以全部實現。我們敬以滿懷的期待，注望杜魯門總統的將來。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紀念羅斯福總統要實現四大自由

今天，全中國各地都在舉行對於美國故羅斯福總統的追悼大會，關於羅斯福總統的噩耗，本報前日已有論列，今天再把未盡之意申述一下。

我們以爲今天全中國人的追悼羅斯福總統，並不祇是追悼一位友邦的元首，而是追悼一位爲全世界人類自由奮鬥到底的堅強戰士。自由是人類最可寶貴而又最難得的財產，自有歷史以來，有無數人類爲爭取自由而犧牲，羅斯福總統是最近而最偉大的一個。羅斯福總統對於自由的見解，具體表現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與英國邱吉爾首相共同宣布的大西洋宣言八條，卽世所稱爲大西洋憲章者。這八條宣言中包含着四大自由的原則，羅斯福總統畢生的奮鬥目標可以說就是爲着擁護這四大自由。現在，羅斯福總統雖然不幸棄世，但他所揭示的四大自由原則已永留於天地之間。我們中國人民，自來是一致擁護這四大自由原則而熱烈斬望其實現的，我們

要真正紀念羅斯福總統，就必須把四大自由的原則付諸實施。對於世界，我們自然應該趁這一次舊金山會議的機會，與各盟邦攜手共奠世界的自由基礎，對於我們自身，更應該勉力奮進，依據四大自由的原則，以改建新中國。如果反省自身還有未能盡得這四大原則的地方，就應該更加努力。

譬如就言論自由這一點說罷，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為求國家社會的進步，對於國家事，對於社會事應該要表示其所認為是的意見的，這是民主國家人民的職責，也可以說是民主國家人民的權利。但是今日中國的人民還沒有享受言論自由的權利，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各種檢查制度，限制法規的存在便是一個有力的反證。言論自由不是我們所應該努力的嗎？

其次說到信仰自由。宗教的信仰，固應由人民自己決定，不能加以強制，對於政治學說的信仰，也應該由人民自己決定，不能加以干涉強制。如果信仰政治學說的不能自由，則什麼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都成了空話。法西斯主義者，便不許人民有信仰的自由，它祇許人民信仰法西斯主義，而不允許人民信仰其他的

主義，所以法西斯主義國家的人民，沒有思想學術自由之可言，一切學術思想都是被統制着的。便對於這一點我們已應該加以反省，有所努力。

說到不虞恐懼的自由，我們更是慚愧，民間到處還貼着「莫談國事」的招貼，青年們談談國事，出門就得小心背後，報紙的言論一有發揮，便有受警告、扣留、甚至送報的報丁都有失蹤之憂。中國人的確尚未脫離了恐懼的威脅，不虞恐懼的自由，中國人真應該加倍努力才行。

再說到不虞匱乏的自由，我們中國人更覺可望而不可即了，今天除了少數發國難財的貪官，污吏，奸商，土豪而外，那一個人不是日日匱乏，時時匱乏，少米無柴，有鹽少醋，匱乏已經成了現代中國人的家常便飯了。這一大批天天匱乏的中國人，就是世界和平的大威脅，要世界能保和平，就得中國不出亂子，要中國不出亂子，就得替四萬萬五千萬人爭取不虞匱乏的自由。

要紀念羅斯福總統，就得實現這四大自由，先從我們自身作起。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六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為波蘭關懷

在歐洲的國家中，波蘭最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她的境遇也最令人同情，她的地理環境不幸注定了她多災多難的命運。十八世紀以前，波蘭的文化和國力在東歐是首屈一指的，但到了十八世紀以後，四圍興起了俄普奧三個新強，波蘭就走入噩運了。一七七二，一七九三，一七九五年三次的瓜分，公然在地圖上抹去了波蘭的名字。這時候西歐國家正忙於法國大革命的擾亂，無力過問，遂讓波蘭孤軍奮鬥，但波蘭民族的反侵略精神，也就在此後繼續發揚起來，從哥修士孤起，無數波蘭的愛國志士，用他們的生命和鮮血，寫出了歷史上最光輝的一頁，波蘭的國家是亡了，但波蘭的民族精神却在一百二十年後救活了他們的祖國。

第一次歐戰之後，波蘭在他的偉人畢爾蘇斯基將軍領導之下，重新獲得獨立，當時的國際環境頗對他有功。不幸自畢爾蘇斯基死後，繼起的當國者，缺乏識力，

甘心做了法西斯尾巴，對內則把持專制，對外則虛驕狂妄，結果法西斯的狂潮在歐洲長起了，波蘭反倒變成了主要的犧牲品。

這一次歐戰起後，波蘭的反動政府在十八天內就倒了臺，波蘭民族又一次飽嘗亡國瓜分的悲運。幸而一部分的波蘭志士，在倫敦組織波蘭流亡政府，始終不屈，國內的地下運動，也在納粹鐵蹄之下，繼長增高，波蘭人這種反抗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但爲什麼這一次歐戰導火於波蘭的被侵略，而到了大戰將終，納粹垂死的時候，舊金山的聯合國大會裏，反倒沒有波蘭代表的位置？這件事我們以爲不能怪外人，還得怪波蘭人自己。

關於倫敦流亡政府和盧布林政府的是非曲直，我們外國人無從判斷，但依我們第三者的眼光看來，大家縱然主義不同，歸根到底總都是波蘭人，同胞兄弟，有什麼不好商量的？爲什麼各走極端，你結一個外援，我找一個打手，好像寧可送給外國人，而自家兄弟却總不能合作，弄到外國人再三勸告干涉，而團結問題仍是遙遙無期。這一次舊金山會議裏的失掉地位，我們以爲責任是在波蘭人自己身上，不能

怪任何人。

此外，波蘭既是東歐的國家，過去又吃過俄國人的大虧，此次大戰起後，蘇聯的地位何等重要？倫敦的流亡政府，既要做復國的工作，蘇聯的這一着棋當然非特別布置不可，但是我們看倫敦流亡政府這五年來的態度，似乎不但沒有加意這個問題，反有處處和強鄰疏遠的傾向，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握在莫斯科手裏，還徘徊了一年多，這期間不是沒有妥協的機會，但倫敦的流亡政府，一再態度倔強，坐失機會，雖經英美的諄諄勸告，而始終不知順應時變，到了今天，整個波蘭已經入了紅軍手中，英美愛莫能助，倫敦的流亡政府，儘管不承認盧布林的組織，於實際究有何補？所貴於政治家者，在識機先，試看與波蘭環境相同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貝奈斯總統領導之下，對於這個問題如何的應付？所以波蘭問題之弄到今天，我們以為不能怪別人，還得怪波蘭人自己。

總之，謀國之道，在於審形勢，辨利害，把握住當前的機會，不但感情恩怨不可計較，即是非曲直也非所必爭，不忍小忿而誤大謀，是謀國者所切忌，不但波蘭

人應該明白這個道理，一切情勢相同的國家都應該以此自省。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廿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紀念五一要實現經濟民主

今天五一，是全世界勞動人民偉大的日子，自有世界以來，建築世界的責任就擔負在廣大的勞動人民身上，沒有這些勞動人民平時胼手胝足的血汗生產，我們的世界將無糧可食，無衣可穿，無房可住，無路可行，就是精神食糧所賴以表現的書報也將無以出現，世界是勞動人民所手造的，因此這個世界也應該為勞動人民所有。

但不幸，自有世界以來，勞動和享受就分成兩截，大多數人民在從事生產的勞動，而坐在那裏享受者却另是一部分人。上古時代是酋長，貴族，此後是帝王，現代歐美工業國家則是資本家，在眼前的中國，則享受特權而並不勞動者是一般特權官僚，和國難地主及國難商人等，這是眼前最不公平的事實。抗戰八年以來，在前方打仗的是出身農工的士兵，在後方支持整個社會的是廣大的農民和一般產業職業

工人，仗打完了，打勝了，誰最應該享受勝利的報酬，我們以爲這些人應該有最先要求的權利。

五一雖是工人的節日，但就我們中國的現狀看，勞動的分業化尙未形成，工農之分尙未顯著，我們不可忽略了農民也是勞動者的這一事實。工農在戰後如何共同提高生活地位的問題，是今天我們最主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如不解決，戰後建國的基礎無異於還是擱在沙灘上。

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不必說，即以戰時英國而論，在保守黨的政府之下，也曾通過了卑佛里克的計劃案，要替幾千萬勞動人民解決戰後衣食住行的問題。我們中國也講民生主義，但事實上主義與事實全無關係，數萬萬勞動人民的生活更顯得悲慘，更沒有希望。假使官僚資本在戰時已經集中了大部份的財富，則在戰後，這些少數特權的份子，憑藉政治，經濟（也許還得加上武力）兩種特殊的地位，更可以壟斷一切，廣大的勞動人民，更無出頭的日子。

這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以爲只有用經濟民主的方式才能徹底解決。所謂

經濟民主，不僅是由國家計劃一切經濟的生產分配，最要緊的有兩點：第一，必須使勞動人民有選舉自己代表過問政治的權利；第二，必須使各種勞動人民對於自己所從事生產的事業，有權過問。而要做到這兩點，必須先開放勞動人民的自由組織權，一切由非勞動人民指導干涉或包辦的御用式工會農會應該取消，讓真正的勞動者自己組織自己的人民團體。

因此，我們在今天對政府及國民建議三事：

一，未來憲法中，國民經濟一點，應該在保護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上着眼，不可僅為少數有錢有勢者謀利益。

二，修改農會組織法，取消指導包辦的方式。

三，發動智識青年「到民間去」幫助工農，替勞動人民服役。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一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德國瓦解，日本不算數了！

希特勒寧死不投降的政策，把德國弄得瓦解，自己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全世界只剩下納粹德國的一個忠實的（？）盟邦——日本，但是斯達林說：「日本不算數了！」

希特勒爲什麼把德國弄得這樣慘敗，自己也身敗名裂而死（？），有人說他不應該東西兩面同時作戰，違背了俾斯麥以來的德國傳統政策，並且也背叛了他自己在「我的奮鬥」所手定的原則，這誠然是不錯，但我們以爲這還是小節，我們以爲即使希特勒不東西兩面同時作戰，結果他的政權也必有崩潰之一天，不過或許時間稍延後一點罷了，爲什麼？因爲他的錯誤還有更大於此者。

希特勒失敗的第一個根本原因，是在違抗了民主主義。希特勒的政權本是從威瑪憲法所造成的民主氛圍中養育成功的，他的獲得政權也是由於利用一部份民衆的

勢力而成功，他雖然在思想上反對民主主義，然而民衆的力量他是認識的，利用民衆的策略他是懂得的，至少在選舉中他的納粹黨曾獲得較同時各黨爲多的選票，這是一個事實。但是他以利用民衆而成功，一到登臺就把民衆的利益置之腦後，以一黨包辦國事，誅鋤異己，作威作福，一意孤行，以致今日仍爲全世界的民主勢力所推倒。「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衆是不可欺騙的，希特勒的慘敗，說他是敗於對民衆不忠實，敗於違抗了民主主義，並不爲過。

但希特勒還有一個同樣大的失敗之點，這就是他違抗了國家主義。希特勒違抗了民主，爲民主主義所打倒，這個道理容易懂得，說他因爲違抗了國家主義，爲國家主義所打倒，這需得解釋一下。近來國內有些言論，認爲希特勒的失敗是失敗在「狹隘的國家主義」，這種說法實在有點歪曲了事實。希特勒如果是國家主義的忠實信徒，則在他恢復德國主權，取消凡爾賽條約之後，就應該罷手了。因爲國家主義者的要求不外是求本國的統一，獨立，自由，但是希特勒達到了這些目的之後，還不肯罷休，還要往前走，走到那裏去？走到世界主義裏去。他夢想統一世界，

至少也要造成一個「歐洲合衆國」，因此他才大膽地侵略鄰邦，與每一個自由民族的國家主義精神爲敵，他壓迫別的民族的國家主義，激起了全世界被侵略民族的愛國狂潮，全世界的國家主義者聯合起來把他打得粉碎了。斯達林在今年五一節告軍民書中說：「今年，我們祖國的各族人民，在偉大愛國戰爭勝利終結的情況下慶祝五一節。」這句話已經說明了蘇聯的戰爭是一種愛國的戰爭，是保衛祖國的戰爭，其他各國又何嘗不如此？希特勒的世界帝國的企圖就是被這種全世界愛自由民族的國家主義精神所打倒，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希特勒的世界主義早已成功了。

德國的唯一殘存盟友——日本，也是一個抱「八紘一字」，「大東亞共榮圈」的野心世界主義者，世界主義的狂潮支配着日本民族也和支配着納粹德國一樣，是全世界國家主義的最大敵人。德國雖然已經瓦解，但日本在東亞的勢力仍未消滅，我們雖然同意斯達林的肯定的言辭：「日本不算數了」，但我們仍希望盟國間趕快商定一個切實的辦法，把文字上不算數的日本，打成一個事實上真不算數的日本，

撲滅日本民族的世界主義野心和毒素，教訓他們一點國家主義者應有的國際法規。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七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德國瓦解，日本不算數了！

用事實來答覆日寇的和平攻勢

日寇自發動所謂對華事變不得結果以來，八年中屢次用和平來引誘我國及同盟國家，到了最近德國崩潰以後，日寇更心慌了，和平的攻勢越來越緊了。目前日寇的和平攻勢，是先從自身做出悔過的姿態入手，德國投降以後，就首先把她舊日的盟友臭罵一頓，加以背信棄盟之罪，然後把蘇聯着實恭維一頓，說自己和蘇聯始終是好盟友，接着便是宣告軸心已經失了存在的意義，已經無疾病而終了，這便是向英美重新獻媚，以便作和平談判的基礎。最後，便是昨日報上所宣露的，由她們的實業界人士出面，非正式地經由蘇聯向英美試探和平的空氣。

日寇這種扭扭捏捏的醜態，無疑地祇能引起世人的厭惡，而絲毫得不到同情。日本如果是一條好漢，拚死也幹到底，雖然走錯了路，尚不失為光明磊落。如今却在他的盟友德國慘敗之後，不但沒有絲毫的同情表示，反掉過頭來臭罵一頓，希特

勒地下如有知，真該失悔，失悔與這樣沒有骨頭的民族做朋友。

但是日寇之存此妄想，也並非無因。他們以為在德國投降以後，盟國間的裂痕日益顯著，盟國間的矛盾就是日寇的幻想寄託之處。他們幻想利用盟國間的矛盾衝突，從中取得一點有利的和平條件。我們不要以為日本國內的和平派，祇是一般持重的元老、重臣、資本家的類，其實即是一向最激烈的少壯軍閥，在目下也急於要和，求和的心理也更迫切。須知道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卑劣的民族，他們欺善怕惡，附勢趨炎，從前之依附軸心，是因為軸心勢力高漲，現在軸心失敗了，他們便把巴結軸心的心理一轉而為巴結英美了。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完全是由這種事大主義的卑劣心理所籠罩的，甚至自有歷史以來的日本，都是在這種卑劣心理下過生活的。當唐朝的大將劉仁軌在白河口大敗日本以後，日本人便轉回頭來歌頌中國的文化，遣唐使和所帶的留學生，把中國文化模做得維妙維肖。但一到近代，中國在軍事上失敗了，日本便開始看不起中國，開始來反噬她的恩人。英美也是日本的恩人，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之有今日，大半是靠英美的幫忙，但珍珠港事變以後，日本

又把她第二恩人反噬到淋漓盡致，現在又開始反噬她的第三恩人德國了。像這樣的卑劣民族，是不能和她講什麼信義的，惟一的教訓他們改悔的方法，是把盟國的偉大軍事力量，盡量打擊在這種卑劣民族的頭上使他們嘗嘗巨棒的痛苦滋味，打擊得越澈底，才能把恐懼的心理作成記憶永遠刻在下一代日本人心上，才能知道破壞國際和平是要受懲罰的，才能知懼而悔，知悔而改。現在對於日本的打擊還不夠，還差得多，還不能使日本感覺痛苦，還不能保證以後的和平，還需得加緊進攻，所以還不到准其投降的時候，不用說對等的有條件的和平了。

不過盟國間的矛盾却也是一個事實，這事實給予日寇一些幻想，也給予我們一些失望，因此我們目前惟一的希望，是希望盟國用事實來答覆日寇的和平攻勢。

第一，我們希望中、美、英、蘇四大國的領袖，最近趕快舉行一個巨頭會議，在會議中正式聲明對日本非無條件投降決無和平之可能，以斷絕日寇的妄想。

第二，我們希望盟國間趕快本已往互讓互助的精神努力解決存在的許多糾紛，以消釋矛盾，增進團結。

第三，我們希望盟國迅速以歐洲作戰的全部陸海空軍兵力移往東方，加緊軍事的進攻。這裏面最要緊的更有三點：

一、我們希望美國的對日作戰決心要仍本羅斯福總統的遺志，絲毫不可動搖。美國民衆應該動員全國正義的力量，壓制暗中活動的孤立派，解決杜魯門總統的困難。

二、我們希望英國本其過去及現在的諾言，趕快調全部海軍及大部陸空軍力量，參加太平洋的戰事。

三、我們希望蘇聯趕快取消對日不介入的政策，立即對日宣戰，並開放遠東根據地給盟國。

我們中國人吃日本的苦最深，對日作戰最早最久，所以應該有權向盟國提出以上的呼籲。

最後我們對於本國政府也有幾點希望，我們希望中國要把對日作戰的主要任務放在自己身上，不要一味希望盟國，也不可一味追隨盟國。如果不將日本的實力消

滅淨盡，將來首先吃大虧的還一定是我中國。過去中國的悲觀主義和失敗主義者，曾有不少的人暗中希望和日寇和解，現在事實已經證明悲觀失敗主義者的錯誤了，但因為日寇的降格求和，也許反能使中國地下的這些悲觀失敗主義者又轉換一種妥協主義的方式來抬頭。我們必須動員全國有正義感的人民的力量來粉碎這種妥協主義的心理，和可能引起的影響，才能真正爭取並保持勝利。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廿一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言論報國七週年

本報於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創刊於漢口，迄今星霜荏苒，倏忽已七週年矣。回憶發刊之初，正值抗戰初期，首都淪陷，將星雲集於楚分，國士影從於鄂渚，智者效其謀，勇者竭其力，雖風鶴之警屢作，而金石之志不渝。是時第一屆第一次國民參政會正集會於漢口，朝野各黨英俊之士，携手言歡，全場一致通過抗戰建國綱領，曾參政員琦代表中國青年黨，陳參政員紹禹代表中國共產黨，起立發言，擁護蔣委員長之抗戰國策，博得全場熱烈之掌聲。當時舉國團結之精神，實已造成一片祥和之氣象，故雖屢敗而屢戰，不聞再竭而三衰，國勢機微，實繫於此，當時詩人有「萬派朝宗江漢水，半篙爭渡淺深舟」之詠，可謂適切。今日處七年之後，回憶當日筭路檻樓之局面，真有不勝其感慨萬端者。當勝利將臨前夕之今日，國人其猶有憶及當時舉國團結共禦外侮之一片精誠氣象，而思有以永葆此珍貴之歷史奇蹟者

耶？抑否耶？

本報在漢出版甫及一月有半，即因武漢危急，機關疏散，而被迫停刊。最後一日社論題爲「中國救了全世界」，當時確已見及中國之抗戰，不惟可以轉敗爲勝，且對於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之反侵略戰爭，有重大之貢獻。當時在漢同業，尙有未喻此旨而加以糾彈者，由今思之，孰爲真理，事實已作有力之證明矣。

本報在漢被迫停刊之後，在漢之機器物資，盡歸委棄，同人中一部分逃赴前方，展開游擊工作，從實際上報效國家，一部分間關入川，於險阻艱難中籌備復刊工作，幾經波折，卒於同年九一八紀念日復刊於成都。自此以後，六七年來，幸蒙社會之衛護，讀者之獎勉，辛苦支持，至於今日。此六七年中，本報言論，一本在漢創刊之初衷，秉筆直言，不稍回護，期自盡其言論報國之天職。雖衡諸歐美各言論自由國家之同業，成效猶微，然截長補短，亦不無微效，綜其成就，約有四端：

一曰堅決擁護抗戰國策，反對中途妥協之謬說，昭示抗戰必勝之真理，以轉移視聽，澄清國論。本報在漢發刊之初，即揭載「征倭論」一文，主張對日戰爭必須

打到日本本土，澈底摧毀其國力，始可一勞永逸。當時輿論雖不敢公開反對此說，而頗有竊竊私議，以爲過甚者，今日征倭之策，已成盟國一致必行之戰略，當日私議者當可自悔其誤。及武漢廣州同時淪陷之後，悲觀空氣，一時蠶起。汪逆精衛方憑藉其國民黨副總裁及代理行政院長之地位，四出蠱誘，動搖戰意，本報見危機之日迫，乃特別發表「正人心，息流言，拒邪說，惟有請政府立即正式宣布既定國策不變」一社論，大聲疾呼，糾正此種錯誤之心理。當時周逆佛海任中宣部長，覩文大驚，特電本報，澈查作者姓名，經本報嚴辭拒絕，始廢然而止。此一段歷史，久未爲外人所知，至今日發表者，非敢以堅持抗戰居功，不過使知國論動搖之際，服務新聞事業者，貴有遠識及勇氣，以把握時代真理，不爲任何權勢所搖動而已。

二曰鼓吹全民政治，促進舉國團結，爲人民基本自由權利而奮鬥，以期永奠國基，消弭禍亂。本報同人過去爲民主奮鬥二十餘年，當左右兩派獨裁思想瀰漫全世界之際，本報同人即曾出生入死，爲民主真理，從事鬭爭。及本報出版之後，七年以來，一本固有之宗旨，筆誅墨伐，轉移輿論，今日民主主義已成爲舉國一致之公

論，向之反對民主，斥民主爲落伍思想，爲破壞統一，動搖國本者，今則無左無右，均已自變其論調，依附於民主主義之列。真理爲最後之勝利者，時間爲最有勢之裁判人，本報同人卽不居其功，國人之不健忘者，尙可以追溯歷史而加以公平之認識。願同人猶欲有言者，民主無新舊，面有真假，真假之辨，在於事實。今日舉國皆言民主矣，其眞乎？尙須待諸事實之證明，願國人之高調民主者，各自競於事實，人民不可欺也。

三曰衛護世界和平，鼓吹國際合作，介紹國際之正確知識於國人，尤特別致力於弱小民族權利之保障，與夫國際正義之伸張。本報自出版以來，卽特約國際問題專家，輪流執筆，或於社論，或於專論，或於闢欄，對於國際大勢按期爲有系統之述評。凡本報所評述者，如德國之必敗，如英美蘇之必能團結抗戰，如戰後國際和平之尙須努力，今均已經事實證明；此外如對美外交之外，尙主張對蘇，對英，對法，對土外交之努力增進，迄今猶待加強。本報國際版之編排標題，尙蒙社會之讚許，更非自詡；其尤可述者，當印度國民大會派領袖尼赫魯氏訪華之際，本報特撰

「歡迎尼赫魯先生來華」一文，結果蒙受短期停刊之處分，本報爲同情亞洲被壓迫民族而得之懲罰，非本報之恥辱，實本報之光榮。此種爲自由正義而奮鬥之光榮精神，本報將永葆之，願國中同業亦同永葆之。

四曰對學術文化思想之主張與貢獻。本報同人，以爲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一國之文化思想，實爲一民族自立於天地之主要因素。中國自海通以來，內外思潮之激盪，國民思想久已失其重心，守舊者故步自封，尙思抱殘守闕；騫新者惟新是喜，又思盡棄其故物而東施效顰，一張一弛，兩俱無當。思想之最危險者，莫過於誤認世界可以大同，國家當予廢棄，一孔之士，動輒斥國家主義爲狹隘，而自命爲博大真人，此輩名流，誤國之罪，殆不下於何晏王弼。本報同人，二十年來爲國家主義而奮鬥，此物此志，始終不渝，今日「國家至上」之信條，已經各黨派之一致擁護而成爲立國原理，思當日之受盡譏彈，始覺眞理之彌可珍貴。惟今日又值國際和平思想復盛之日，國人之過趨理想而不知現實者，又未免故態復萌，或將高唱廢棄國家思想之謬說，苟有於此，本報必辭而闕之。至於本國家主義之原則，建立正確

之宇宙觀，人生觀，歷史社會觀，以發揚真理，指導國人，則又本報數年來所歷歷努力者，今後更必本此認識而繼續發揮也。

綜以上四端，本報七年來言論上之貢獻，大端略盡於此。此外如對於戰後建設問題之研討，經濟社會問題之主張，及一切當前各種現實問題之評述，本報皆有意多加貢獻，而用力或恐未周，今後當本此認識，特別於此數端加以策進。本報同人能力有限，識解均不免欠缺，鞭策之，督責之，使之自強而不息，庶幾稍效言論報國之微勞，此則所望於社會愛護者隨時之鼓勵者也。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為民營企業呼籲

今後中國的經濟建設方針，究竟應以國營為主，抑或以民營為主，已成了一個急切要解決的問題了。抗戰八年以來，政府為補救戰時財政的困難及穩定物價金融起見，極力擴充國營事業，而對於民營事業則處處取管制壓迫的政策，這個政策實行的結果，是工商萎縮，民怨沸騰，貪官污吏得乘機以上下其手，「怨歸於上，害歸於下，而利歸於中飽。」舉其重要之弊約有以下數端：

一，國營民營待遇不公。國營事業既無營業稅，所得稅，戰時利得稅並稅捐擔負，而尚有享受各種平價物如煤米布油鹽的利益；民營事業則既無利益可享，又有若干負擔，事實上已難與國營者競爭。再以管制而言，政府對於民營事業管制甚嚴，自中央以至地方，層層監視，節節留難，以視國營事業，祇須上級一機關允許，即可便宜行事者，待遇相差不啻天淵。在如此政策之下，民營事業焉得而不萎

縮。

二，政府獨占的事業過多，不予民營者以機會。依第一百四十八次國防最高會議通過之「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規定（甲）應由政府獨占之經濟事業不宜過多，此類事業包括（1）郵政電訊，（2）兵工廠，（3）鑄幣廠，（4）主要鐵路，（5）大規模的水力發電廠等；（乙）未經政府指定的獨營之事業，均可由人民經營。此項原則本屬公允，乃最近國民黨六全大會所通過之工業建設綱領，則規定「凡工業之有獨占性質者，如鐵路，郵電，公用事業，及動力工業應歸國營，」較之第一期經濟原則所規定者，國家獨占的範圍不啻擴大若干倍，民營事業所可能經營之範圍不啻縮小若干倍。故此次決議發表以後，民營事業者，非常惶惑，甚感戰後經營之不易，影響民營事業的發展甚大。

三，管制制度流弊太多。據全國工業協會所得各地會員報告，謂目前各種工業，困難重重，其大概情形爲（一）廠品價格調整時間，相差太久，而其他物價則時時上漲，致雖經調整，爲時稍久，即感與成本相差甚遠；（二）核價未能參加其

他因素，如原料之未必以官價購進，由於煤焦供應之不敷，與電力之不足，影響於工作之停頓，所受之損失；（三）原料及電力供應之困難；（四）週轉資金之枯竭。

以上三點已使民營生產事業障礙重重，再加以執行管制人員的藉故敲詐，機關公文之手續繁重，民營事業焉得不日趨萎縮。

四，工礦貸款，有名無實。我國民營企業，因物資高漲，資金短少，平時運用，極感拮据，經濟部所設工礦調整處，本以協助民營工廠資金爲目的，惟主管機關規定貸款辦法，條件嚴苛，手續繁重，既須有機器設備，並須以原料或成品作爲抵押，或由銀行承兌，始合貸款條件，如西北各省，機器輸入不易，僅賴手工業維持之毛棉紡織，製革，造紙等廠及土法開採之礦廠，即無貸款資格，加以所定各種表冊，項目繁雜，非平空捏造，即無法填入，而工礦調整處設在重慶，除陪都工業稍能享近水樓臺之利益外，邊遠省分至有不知其名者，有名無實，可勝興歎！

五，統購統銷，制工商業之死命。我國對外貿易在法價結滙與統購統銷政策箝

制之下，殆已垂垂待斃，統購統銷政策之影響農村、工商業及對外市場之弊，已爲人所共知。執行統購統銷業務之資源委員會，貿易委員會，復興公司，世界公司，中茶公司，礦產運銷處等機關人員積弊重重，亦均爲社會所公開指摘。此等機關，本以對外貿易爲主，自國際路線封鎖以後，轉移其業務於內銷，以低價批購生產出品，以高價轉售於商民，與民爭利，或自行設店輔銷，開支龐大，我國之重要生產業，如絲，茶，桐油，豬鬃，棉花，羊毛等，受此影響，無不日趨萎縮，前途實難樂觀。

六，稅務制度及機構之病民。我國戰時稅務機構，系統龐雜，過去稅務田糧皆爲地方財政基礎，今則直屬於中央，由中央在各省市縣設立機構，直接辦理，與省市縣政府立於同地位。語其機構，單就稅務而言，則有財政部貨物稅局，直接稅局，查征所，省政府財政廳各縣經征處，鄉鎮征收所，機構重疊，無一不爲魚肉人民之工具，其稅額則並非按業務之大小，盈利之厚薄，遺產之多寡，契據之有無，以爲課稅之根據，而係以分派式行之；中央分派於各省，各省分派於各縣，各縣分

派於各鄉鎮保及各戶，應重者反輕，應輕者反重，使經收人員得以上下其手。稅務不得其平，正當商民受害匪淺。

以上六點，都是今日中國民營生產事業者及正當商民所受的痛苦，這種政策如不即刻改絃更張，民營事業是不會有前途的。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廿六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日本向盟國投降

原子彈的警告和蘇聯的對日宣戰，給予日本以雙倍的嚴重打擊，我們早已料到日本要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提示，放下武器，束手歸降，現在事實已經證明，我們的預料不誤，日本已經投降了，已經無條件投降了，投降得很好，可惜太遲了一點，不但白白犧牲了世界上無數和平人類的生命，而且也白白犧牲了日本的無數生靈，像廣島、長崎那樣的慘劫，日本政府如果早有點覺悟，就很可能免去，『早知今日，悔不當初，』日本人啊！使你們遭這樣慘劫的並不是盟國，而是你們的政府，你們的軍閥，你們的窮兵黷武的「武士道」、「大和魂」，你們從今以後既然放下屠刀，就得要真正澈底洗心革面，改變自己的頭腦才好。

至於我們中國，血戰八年有餘，今天得了這個結果，誰能不歡欣？誰能不鼓舞？然而環顧國土，猶大半在敵人手中，我們自己不能以自己的血汗收復自己全部

的國土，今天幸靠幾個得力的盟邦才得有今天的結果，我們應該自愧是徼天之幸，却萬不可自以爲已經功成名就，從今再沒有敵國外患了，這是我們在歡欣鼓舞之餘，對於勝利在前的國人的一點微末的忠告。

日本雖已接受無條件投降，但一切停戰手續尙待繼續努力督促，中國境內現住有二百萬日軍，其中難免有負固不服、不奉其政府命令、仍圖頑抗者，我方在此情形之下，應如何政治軍事雙管齊下，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迅速接收日軍駐地，繳除日軍武裝，安撫陷區民衆，恢復地方秩序，這些都是一刻也不能緩的事，想政府當局對此當已有所布置，民衆有可以幫助政府之處，也應該儘量幫忙。

「外寧必有內憂」，這是一句古話，却不是沒有幾分真理。我們今天在對日戰爭中已獲得解放，已獲得和平，我們但願這解放是澈底的，這和平是無例外的。那一句古話，我們希望不要應驗在今後，我們也相信二十世紀的中國民族，頭腦應該有些進步了，那一句話一定不會再應驗的。因此，我們敬祝

抗戰勝利！並祝

永保內外的和平！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煥發新猷與民更始

敵人投降，國土光復，九年苦戰，有了結果，這是普天同慶的事，但是這兩天，人心在慶祝之餘，還不免有一點鯁鯁過慮，過慮些什麼？第一，恐怕勝利之後，依然是過去的金迷紙醉，則晏安即是酖毒，反不如抗戰期間尚有振作的氣象；第二，恐怕外戰停而內戰起，應了『外寧必有內憂』的一句古話。這兩件都不是杞憂，因為有過去和當前的事實為證。人心之憂慮正是國民愛國精誠的表現，也正是國事的一線生機之所繫。

這兩個問題說難解決，是難解決，說好解決，却也並不甚難。因為這兩個問題，實在是一個問題，歸根到底，都是一個政治問題。自身的政治有了辦法，晏安不會變成酖毒，外寧也不會有內憂；自身如果沒有辦法，不但季孫之憂，不在顯矣，而在蕭牆之內，就是自身的腐化，也成就了不可救藥的死症，不必更怕人家的

打倒。譬如說，共產黨的問題，在十年以前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在今天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決不是靠武力所能解決的。講到武力，今天的共產黨雖然聲勢浩大，實際上不過是幾十萬枝步槍，比過去的大軍閥並不見得強大多，爲什麼軍閥好對付，而共產黨不好對付？因爲共產黨在政治上有作法的，不比軍閥的單靠武力。十年以前的中國共產黨，因爲暴動屠殺的錯誤策略，引起了人民的恐怖，國民政府在當時的受人擁護，不能說不是受共產黨失去民心和日本的侵略兩種形勢所造成，但是，自抗戰以來，中共在毛澤東領導之下，改變了已往的作風，糾正了已往的錯誤。在抗日游擊戰爭中，共產黨的宣傳固不可盡信，但也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從不曾對日軍真實作戰，因爲淪陷區有許多共黨游擊根據地就是事實的證明。至於共黨在所謂解放區中的政治工作，固然很多不滿人意的地方，但大體上說起來，政治上沒有貪污，行政效率貫徹，沒有廢弛，這也是事實。像這些事實，就不是單靠武力所能解決的。當前各政黨間所需要的不是武力的鬭爭，而是政治的競賽，誰的政治能夠得民心，能夠有效率，誰就能夠取得中國的領導權。事理擺在那裏，不容人

不承認。

因此，我們不能不希望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之後要立刻煥發新猷，有一番與民更始的作風。我們的調子並不過高，我們祇要求國民政府要立刻作到以下的幾件事：第一，要立刻把法幣整理，使物價正常，一般人民的生活得以改善；第二，要立刻把各種賦稅取消的取消，該核減的核減，使人民的負擔可以減輕；第三，立刻要把交通復員辦好，使逃難的人民可以回家；第四，要替抗戰的軍人想回家後的辦法，更要替他們的家屬先想辦法；第五，要把收復區的治安辦好，首先應該把幾個主要城市中的治安維持得風鶴不驚；第六，應該替散兵游勇和解散後的偽軍想一條歸路，使他們不至聚而為匪；第七，應該立刻把收復區的教育恢復起來，使青年有了讀書的機會；第八，應該立刻着手編纂戰史，使為抗戰而死的英魂有所安慰。

還有更重大的，我們以為國民政府對於這一次的抗戰勝利雖不是無功，然却不可以自己誇功，相反地，却應該下一個罪己令，這個令內應該包括幾件事情：第一，應該歷數自國民政府統一以來，所有政治上的種種反省，越反省得澈底，越可

以收復民心；第二，應該大赦一切政治犯，除了漢奸以外，都應該普赦；第三，應該立刻取消一切束縛民意的法令和機關，譬如圖書雜誌新聞的檢查制度，就應該首先立即廢止，連向來有法西斯傾向的阿根廷政府現在都已廢止新聞檢查，中國不應該不如阿根廷。我們相信這個罪己令如果頒發，比三十師的新裝備武力還有效。

我們愛護國民政府之心不亞於國民黨人，我們願國民政府自重自愛，使勝利的成果不致虛耗，才對得起成千萬為抗戰而死的將士和人民。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感想

中蘇的友好談判，經過宋子文院長的兩度訪蘇，美國的斡旋，中國代表團在舊金山會議的對蘇友好與支持態度的先容，終於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由兩國外長代表簽字而宣佈了。這個條約，包含盟約條款正文八條，和附件五件，及記錄一件，和外面所傳的大致差不多。我們細讀各件全文以後，不禁發生一些感想。

我們自日寇積極侵華以來，就主張中、蘇兩國的國交應該努力改善，蘇聯是中國近隣中最龐大的隣國，無論從地理上、政治經濟上、文化歷史上、及國際的現實環境與世界的和平前途上，中國都該和蘇聯樹立永久的友誼，並且也只有取得蘇聯的友誼，才能鞏固抗戰的勝利，才能爭取建國的時間，所以我們對於中、蘇兩國的友好盟約的成立，在基本態度上是同意的。

中、俄兩國發生正式的外交關係，遠在二百五十年以前，尼布楚與恰克圖兩條

約的時代，中、俄是以平等地位來辦交涉的。從一八五二年起，中國因為政治腐敗和內亂的緣故，國力日趨衰弱，帝俄才乘機以侵略者的態度，向我東北及西北國境，肆其吞噬。一八五八至六〇年，中國借俄使的力量，調停英、法聯軍的進攻，結果就有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的相繼訂立，放棄了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國土，面積差不多等於整個的東北三省。一八八一年，又因為西北回教徒的叛亂而有伊犁條約的締定，雖然收回伊犁的主權，但也損失了伊犁河下游的一大段國土，面積等於半個新疆。一八九六年李鴻章因為憤甲午中日戰爭的失敗，意欲聯俄制日，親使俄國締定了喀西尼條約，結果日本在東北的侵略勢力受了挫折，但俄國的勢力又繼之而起，卒致釀成一九〇三年俄人佔領奉天之舉，而引起了俄日戰爭。在俄日戰爭期間，雙方交戰國是在中國的領土上作戰的，但中國却守的是局外中立。總結滿清與帝俄時代交涉的歷史，在俄國是一片得意的記錄，在中國却是充滿了屈辱的外交失敗。而且最奇怪的是每一次中國都得到了俄國的友誼與援助，而每一次中國所損失於俄國者，比所調停維持而換回的利益還大。從俄國革命以來，蘇聯

在列寧領導之下，改變了已往的作風，樹立了亞洲的新民族政策，中國國民黨也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建立了對蘇的新認識，孫中山與越飛的協定，開了中蘇外交平等和友誼的新紀元，至少在表面上又重新恢復了恰克圖條約時代的平等國交。如果從那個時代起，彼此就充分認識了中、蘇國交的重要性，努力樹立兩國的交誼，則一九二九年以後兩國間的不幸事件或許可以不致發生，而日本也不會悍然發動瀋陽的事變。如今亡羊補牢，雖未為晚，但時代已經不是那個時代了，蘇聯也不是那時候的蘇聯了。我們很能諒解國民政府努力改善中、蘇外交的苦心，我們也深知在現實情勢之下，這個條約的內容雖不能符合國人的願望，東北的同胞或者更覺得有所歉然，但外交辦到如此結果，東北的領土行政主權畢竟得到了盟邦的承認，三十年後的戰後和平建國時間畢竟得到保障，尤其是國民政府畢竟得到了蘇聯在道義上、軍需品及其他物質上的特別加註聲明的援助，如果這些將來都能見諸事實，在國民黨自不失為一大勝利，在外交當局也算盡了最大的努力。我們愛護國民政府，我們也同意讓國民政府再爭取一點時間來表現他的建國的成績，所以很希望全國人民能夠

諒解這個條約，更希望東北同胞能夠了解國民政府雖是建都於南京，但是並沒有忘記了東北，而東北同胞當然也願意盡他們所能盡到的，舍他們所能舍的，以換取國民政府政權的鞏固，和統一的成功。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發生一點感慨。我們感慨的是中國的國民革命比較蘇聯的革命不過稍後了幾年，但是蘇聯政府在這二十多年之中，一個五年計劃又接着一個五年計劃，把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了歐亞大陸上的霸國，把世界上最強硬的敵人親手打出國境，打到敵都，還有餘力出兵到我國東北的領土。我們中國呢？也革命將近二十年了，到今天有幾個國內的重要據點是我們親手把敵人打退而收復的？東北淪陷十四年，我們的國軍至今不能接近中國的邊疆，還得重勞到我們的隣邦，仔細想一想，也實在有點內愧於心呢！

這一個條約雖然是外交方面的事，但對於中國的內政自然不能不發生一點影響。影響也許可以有好壞兩方面：就好的方面說，可以使中國的各方面人士更加深刻了解了內部團結的必要，因而使團結更易於成功。反之，如果因為外交上有了一點安全保障而加深了國內的對立，以致引起了更沉重的內憂，則外交安全也未始始

終可靠，這就是所謂壞的方面。究竟中國的政治問題是向那一方發展，那就要看在對立的各方面，是國家的立場超過了黨派的立場呢？還是黨派的利益勝過了國家的利益？全國國民和全世界的友人都注目着這個問題。我們的感想如是如是。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廿八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以憂勤迎接勝利

今天是日本政府及其帝國大本營正式向盟軍簽字投降的日子，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類等待這個日子已經很久了，中國最先等待，從七七事變起，已經等待了八年有餘了；從九一八起，已經等待了十四年了；從甲午中日戰爭起，已經等待了五十年了；從日本併琉球起，已經等待了六十六年了。今天日本的投降，雖然大半是盟國的功勞，然而我們也並非一味因人成事，從九一八以來，中國軍民爲保衛國土，抵抗強權，犧牲總在幾百萬人以上，淪陷區民衆因受暴敵壓迫，困死在陷區，或流離而死於道路者，又在千萬人以上，這一筆血賬，比任何國家所付出的代價都重。因此全世界上應該沒有一個民族比中國人等待這個日子還更心切的，也沒有一個民族比中國人還更歡喜的。今天全中國的人民用盛大的狂歡來迎接這個勝利，這是人情之常，應該狂歡，狂歡得有理，狂歡得有味。

但是在狂歡之餘，我們也不能不提事實，讓大家多警覺一下。我們中國的哲學從來講的是盈虛消長，循環往復，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失敗即是勝利的根源，勝利也許就是憂患的開始，能夠把握住這個道理，才能夠不致聞勝而驕，自招憂患。慢說這一次的勝利並不是澈底的勝利，更不是全靠自己的力量打出來的勝利，就像今天世界上的名副其實的四強如美國，他們的政治家還在警告他們的國民說，美國人如不求進步，五十年或百年後可能淪為三等國家。看看！人家美國人是怎樣的想，何況我們中國？我們很同意陳部長辭修的談話，今天日本雖敗，兵力人力尚在，全國政令軍令統一，天皇的命令能夠得全國各地軍人的一致服從，負責的軍政智識界領袖和一般民衆，切腹自殺者日有所聞，這樣的一個民族，雖然翦去了爪牙，依然還是一隻負隅的猛虎，依然還是可怕的，如果盟國不能善自控制，日本的復興也許比我國還要快些，那時候，一個充滿了復讎火燄的日本，張牙舞爪起來，首當其衝者仍然是我們中國。想想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條約簽字時代的法國，他那老虎總理克雷孟梭是何等的氣燄逼人，不過二十年，就有康邊森林的投降協定，歷史

的成例真是可怕！我們爭取勝利是得到了，但如何確保這個勝利，並消化這個勝利，這才是以後全國上下都應該警覺的問題。

況且，我們今後的問題還不僅來自日本，我們失地的收復和主權行政的完整至今還是障礙甚多，勝利並不是完全的勝利，憂患正擺在眼前，我們就陶醉於勝利，為勝利而狂歡，雖是人情之常，理所應有，若反省一點說，却未免太早了，太簡單了！

然則我們應該怎樣來迎接這個勝利的日子？我們以為應該用憂勤來迎接。憂是憂深慮遠，勤是自強不息，只有憂勤才能確保勝利，只有憂勤才能預防災患。我們應該用憂勤的心理去親仁睦鄰，協和萬邦，以維持集體的安全；我們應該用憂勤的心理去調和黨見，團結全國，以建立民主的體制。從來防病莫善於健身，只有舉國上下，同心協力，利用今後二三十年間的國際和平環境，發展科學工業，建立精神和物質的國防，使國家真正強了，真正站得住了，則一切能為敵者均不難化而為友，今天的勝利才算真正的勝利。記住！成也在這二三十年，敗也在這二三十年，

繁榮強盛在這二三十年，亡國滅種也在這二三十年。我們要以憂勤迎接勝利，却不
要讓勝利誤人！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二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以憂勤迎接勝利

七四五

始事於西北，收功於東南

太史公有兩句話：『始事者必於東南，收功者必於西北。』這是從古代中國歷史地理的事例中歸納出來的一個定理。現在，就全世界的形勢說，我們確應當把這兩句話顛倒一下，叫他做『始事者必於西北，收功者必於東南。』拿這一次的世界戰爭來看，這兩句話恰符事實。這一次的世界戰爭，開始於德國的進攻波蘭，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分三路進攻波蘭，九月三日，英法兩國即宣布對德進入戰爭狀態。雖然就亞洲說，中國與日本早已戰爭了兩年，但兩國在當時均未正式宣戰，以各主要國家間正式宣布入於戰爭狀態為標準，實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起，因此也就可以說世界大戰正式開始於此時，如今恰滿六年，軸心的最後一個堡壘日本帝國，也恰於今年九月三日在密蘇里艦上對盟國簽訂投降條件，世界大戰到此才算正式告終。以歐亞大陸的形勢說，歐洲是西北，戰爭起於波蘭，更是西北之西北；亞

洲是東南，盟軍統帥麥克阿瑟來自菲律賓，更是東南之東南。所以把太史公那句老話修改一下，變成了『始事於西北，收功於東南，』倒頗能夠概括這一次世界大戰的始末。

回想這一次世界戰爭的開始，德國以殘敗之餘，不二十年而整軍經武，連破強敵，吞併歐洲十四個國家，這並不是納粹黨人有什麼神奇莫測的本領，完全是由於當時的英法政治家眼光短淺，苟安心重，故意放縱德國，以為滿足了德國的欲望，才能免於捲入戰爭漩渦的所致。殊不知納粹這隻野獸，他的貪欲是無止境的，越進步，越貪得，越讓步，越猖狂，弄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英法再也讓無可讓了，才不得已起而應戰，但是時間已未免晚了。本來在希特勒進兵萊因的時候，英法兩國如果態度稍為強硬，並且一致一點，就可以促納粹政權的崩潰，並不用費多少力量。但是遲疑又遲疑，寬縱又寬縱，直到猛虎養足氣力四出吞噬，然後倉皇應戰，雖然畢竟把這一羣野獸打倒了，然而死了多少萬倍的人？流了多少萬倍的血？浪擲了多少萬倍的金錢？誰應該負這個責任？當年主張綏靖政策的英法政治家張伯倫、

達拉第輩，實在應該負完全的責任。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今軸心最後的一隻猛獸日本是在俯首投降了，全世界的政治家們也許以為從此盟國可以安枕而臥了。然而看一看事實，今天的日本武裝雖然解除，仍然擁有久經作戰、飽受訓練的壯丁將近千萬；中央政府在其天皇名義之下，仍然強固得可以命令全國一致服從；日本本國的工業基礎和科學技術設備仍然完善；發動對華侵略的戰犯近衛文麿等仍然掌握政府的大權，這種事實，比起第一次歐戰後的德國來，還要完整好多，盟國的政治家如果祇圖一時的休息，竟放任這樣狀態長久下去，將來難免不蹈張伯倫、達拉第的覆轍，而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培植種子，這是今天一切戰勝國家所應該深切警覺的問題。

我們以為要防正今後日本再發動侵略的戰爭，必須盟國間澈底團結一致，續密地、嚴厲地執行管制日本的政策。首先應該處罰日本的戰爭罪犯，近衛文麿、東條英機、小磯國昭之流，絕對須付諸公審；次等的戰犯也須永久驅逐於日本政治舞臺之外。其次，日本的軍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設備必須澈底破壞，不許以任何名義秘

密恢復，要管制就要管制得澈底，今天稍有模模糊糊，他年就得費成千百萬的人命，才能挽回這一點錯誤。

望盟國政治家小心，不要太隨便了！

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始事於西北，收功於東南

七四九

團結的大路

從毛澤東到重慶以後，國共兩黨的團結談判斷斷續續已經超過了一月以上的時間，談判的空氣雖然融洽，但是距具體解決的程度還遠。現在，關於政治性質的問題留到政治會議去解決，把責任轉移到全國各黨派身上，當然不失為一種比較好的辦法，但政治會議的結果如何，是否即能取得一致的協議，亦尚在未定之天。至於有關軍事和地方性的問題，則去解決的程度尚遠，更不待論。團結談判之所以如此困難，自有其事實上的原因，但我們以為，今天中國內外的形勢，既非團結不可，則團結已為一定不可移之前提，無論是那一個黨派，那一個政權，只有在團結的大前提以內去想辦法，決不能在團結的辦法以外去另打算盤。這個前提既然是一定而不可移易的，則無論團結談判在事實上有如何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也必須設法打破；而且也祇能設法打破，並且如果肯設法就一定能夠打破，這個信心是必須有的。

。爲謀國之忠起見，我們期望一切據有政權兵權的政黨，都應該先樹立這個信心。

團結談判之所以困難重重，我們以爲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癥結，爲一般人所未及知而却是顯然的事實的，這癥結是什麼呢？便是直接從事談判的國共兩黨，都有點過分現實主義化，看得現實太重，而看得理想太輕，因爲過重現實，所以對於一切現實的具體問題，斷斷計較，好像商人的講生意一樣，一採取這樣的態度，則自然覺得處處好像自己吃虧，好像對方檢了自己的什麼便宜去了。當然，有政權有兵權的負責者，對於現實問題是不能輕易忽略的，不過如果是還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政黨，政黨不能離開了民衆，離開了理想，則就應該表現得和實力派稍稍不同一點。實力派的基礎純粹建設在實力上面，所以不能不始終在現實的範圍內打圈子，一個政黨，尤其是過去標榜過什麼主義，什麼革命的政黨，就不能夠一味走實力派的路，在現實主義下兜圈子，因爲一個有主義，具革命性的政黨，他們的力量不是純粹建築在實力（如武裝和地盤）身上，而是建築在廣大民衆的擁護身上，民衆是擁護理想的，民衆的同情是依理想而轉移，並非依實力爲轉移，每一個革命性的政

黨，當初的實力並不會超過一切軍閥，但是能夠在現實的壓迫下一步一步長成起來，所靠的是理想的威力，而並不是現實的力量。因此一個長成的政黨，無論他長成到什麼程度，他絕不可只憑恃力量而放棄了理想，如果放棄了理想而一味憑恃力量，那就變成了純粹的實力派，或者說得更確鑿一點，那就是軍閥，軍閥是沒有前途的，因為他僅祇得到了實力而離開了理想，離開了民衆，那就是自取滅亡。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都是有主義、有革命歷史的黨，過去由微小的集團而取得了廣大的政治基礎，所靠者並非武力而為理想。今天兩黨各有政權，也各有軍權，自然不能不在現實問題上相互計較一下，但是我們所希望的是兩黨應該始終還站在理想方面，對理想的原則不妨爭執，對現實的權利儘可讓步，這樣才可以獲得民衆的同情，政治前途才更有希望。

多談些原則，少談些現實，團結談判自然容易成功，這是一條大路，誰能順着大路走的，誰就更易得到成功。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四日

速援暹越僑胞

暹羅政府對於旅暹華僑的屠殺政策，已經進行了十日之久，我政府尙未聞有何切實援救的辦法，同時越南的獨立黨人和法軍的衝突，我旅越僑民也遭受了池魚之殃。這兩件事都使我們太感覺難受了，號稱已獲最後勝利，國家的地位已列於四強之一，而僑民的生命財產依舊沒有保障，依舊在受壓迫，受摧殘，這是什麼道理？誰應該負其責？

暹羅本是日本的幫凶，在日本未發動七七事變以前，暹羅的反動政府在鑿披汶領導之下，就充分表現其幫凶的面目，改國名爲泰國，自稱泰族，妄稱我滇黔桂粵的少數民族皆屬泰族系統，鼓動大泰族主義，妄想侵并我西南領土，同時以旅暹華僑爲進攻的第一對象，製造「東方的猶太人」之稱，以污辱我旅暹僑胞，禁止我華僑自辦學校，自辦報紙，設立種種苛例，限制移民，摧殘華僑在暹工商業，在日本

發動侵華以後，更加入「大東亞共榮圈」歡迎日軍入境，作爲侵略南洋及緬甸的階梯。就遠東的戰事說起來，日本是第一個大凶手，暹羅就是第二個大凶手。這一次戰爭的結果，元凶日本既已失敗而俯首就擒，第二個罪犯就應該輪到暹羅，不料暹羅政府，輕輕的換了人物，就冒充起自由暹羅起來，我們的盟國也居然特別加以青眼，認爲已經洗心革面，可以不咎既往了。在盟國的立場，或者別有用心，我們不必追問，但是這件事直接關係於中國的利益，過去暹羅幫凶之時，受摧殘的是我們中國僑胞，今天暹羅雖號稱洗心革面了，依然對我們華僑施行最凶暴的屠殺，中國若不是四強之一，還可以諉咎於國力之不充，現在中國既已忝居於強國之林，而對於抗日戰爭又有最高度的發言權，爲什麼含垢忍辱，至今不敢表示一點強硬的反響。我們覺着政府的態度未免太慎重，太軟弱了，照這樣下去，我們的僑民生命財產仍舊毫無保障，要這強國的徽號做什麼？

越南的事件雖然和暹羅不同，但僑胞的生命財產依然是一樣地受摧殘，受壓制，也不聽見政府有什麼強硬的對付辦法，現在中國境內不是沒有兵，爲什麼這些兵

能拿來做保護僑民的交涉的後盾，而甘心讓人家來摧殘。

不但此也，緬甸收復已經半年，我們的僑民還不許回去，馬來和香港也同樣禁止華僑返境，中國替盟邦打了八年的硬仗，打開了滇緬路，收復了緬北的主權，而所得報酬却是如此，我們不必怪他人，中國的外交和僑務當局，至少對於這種問題，應該以去就力促政府採取比較積極一點的態度吧。

過去華僑對於祖國的貢獻是人所共知的，今天華僑需要祖國援助了，祖國不要太對不起這一般忠義的僑民。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六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聯合國教育文化會議中我國應有的努力

聯合國教育文化會議，已於本月一日在倫敦開幕了，這個會議是繼續戰前的世界教育會議的，但也具有許多新的色彩，譬如這一次大戰前，法西的教育思想極爲猖獗，文化工作更是積極，世界人類吃這樣思想的虧很不少，所以這一次會議，對於如何防止法西思想的復活，是一個主要的議題。不過事實上法西思想的猖獗，自有其客觀的原因，只能從治本方面去積極地疏導，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的措施，如能消滅人種、階級、信仰等成見，一律以正義爲依歸，即使對於戰敗者也只能以正義公平的原則去處理，不必過於憑恃戰勝者的強權資格，則自能免除刺激戰敗者的復讎心理，法西主義者自無利用煽惑的口實，而法西思想亦必不滅自滅；反之，如

果戰勝者以主人自居，不是分割人家的土地，就是奴役人家的人民，則自身已經走了法西斯主義的覆轍，民主其名而法西斯其實，如何能禁止戰敗者的蓄謀復讎？在這樣環境之下，法西的毒種已經在全世界所謂民主強國中奪胎換舍，空口白話來討論消除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就未免成爲無意義的事了。

這話姑且不談，單就這一次會議中我們中國代表團所應持的態度，和希望達到的目的，我們以爲也有應該注意的地方。簡單地說，我們不希望中國代表在會中自擂自吹，專爭虛面子而不顧實際，亦不必人云亦云，一味隨班畫諾，舉手贊成。中國有中國特殊的教育文化環境，有特別需要急切解決的問題，有必須仰仗盟國友邦幫助之處，中國代表團應該針對這些現實問題，面對着全世界的教育家提出我們正當的要求，請求世界的協助。

中國人應該承認中國是一個教育落後的國家，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民還沒有受過最低級的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在數字上雖然似乎不少，但至今還沒有一所像樣的大學，社會教育更談不到。中國這種貧乏的教育環境，經過八年以上的長期戰

爭，更使情形趨於艱難，這種情形是必須坦白地向全世界的教育界公開的，而且還要使他們了解，這一個四萬萬五千萬廣土衆民的大國，如果不使教育文化的工作普及，那對於全世界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中國教育界的責任，是應該向全世界公布這種種事實，中國教育界才有權利向全世界要求充分的援助。

我們應該要求些什麼援助呢？第一，自然是物資上的援助。現代的教育是不能脫離工具的，沒有圖書儀器，誰也不會辦出一座好學校，沒有廣播幻燈，就無法進行社會教育，沒有紙張，印不出書籍，沒有印刷機，雖有紙張也不行，像這種種，都是非仰仗外來的物資不可。因此中國代表團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向全世界呼籲，並且分別地和各國熱心贊助中國教育文化事業的政府當局、工商業家、宗教團體、輿論機關，取得實際的聯繫，要求他們採取一切步驟來幫助中國建設戰後的教育。

其次，人才的援助自然也是需要的，我們自然應該趁這個機會把各國的教育專家多多延攬一些來中國，替我們解決許多問題。不過鑒於過去的經驗，外國來的專家未必真懂得中國的實際環境，外國專家提出來的方案也未必真能實用於中國，所

以對於這一層倒不必十分用力，人才還是要自己去訓練，從實際工作中去訓練，不過能夠多給這些實際做工作的本國教育人才一些到外國考察觀光的機會，比延攬外國專家或許得力的多。

至於學術思想上的介紹灌輸，自然也是很重要的，中國的文化教育界如何和他國同道取得連繫，建立一種長久的文化交流的工作，這是國人所早已注意過的，所以不必多談。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和平，奮鬥，救中國！

抗戰告終，人人都希望以後將進入一個和平建國的時期，中國距現代國家的水準尚遠，至少需有三五十年以上的和平時期，才能完成現代國家所必需的幾種基本條件。今天世界上的國與國之間，經過了二十年間兩次戰爭的慘酷教訓，尚想以聯合國的機構來鞏固和平，使戰爭永遠不至再現，何況同屬一國之人，經過了八年以上戰爭的痛苦經驗，再加上二十多年的內亂，戰爭的可怕，應該深印在人的心目中。在戰爭初結束的時候，誰不是作如此想，以爲中國從此以後可以永保國內外的和平了。

但是事實並不如人所預期，內戰的陰影漸漸在傳說中長大起來，籠罩過和平的呼聲，而且這內戰的陰影背後，還潛伏着一種國際的危機，更使人感到戰慄。關心世界大局的人，和關心國內建設的人，都不得不同時憂慮了。

我們以為內戰的危機誠然是在一天一天長大着，但是中國人民却不可因此喪失對於和平建國的信念。中國大多數的人民必須先有一種堅決的信念，堅信中國非和平不可，堅信只要中國人民站立起來，內戰必不可避免，和平必不可保持，而且也應該堅信，和平是無條件的，不惜一切代價，我們必須爭取長時期中國的和平。

當然有人可以懷疑，發動內戰者都是有武裝的，真正的人民赤手空拳，如何能夠制止雙方的內戰？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力量不止是武力一種，要估計力量，必須把全體各種力量都估計在內，其中包含正義和道德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感情的力量，政治的力量，經濟的力量，文化思想的力量，壓倒大多數的人口力量，我們要估計是戰爭的力量大，還是和平的力量大，必須把這一切因素估計在內。如果真如此估計一下，則必然可以知道，站在戰爭一方面的，不過是全國人口中之少數中之最少數，所恃者不過是武力和一些歪曲的理論；而站在和平一方面的，則是全國人口中之最大多數，並且具有一切精神的實質的力量，如果這些力量一旦聯合起來，足以制止內戰而有餘。今天所以不能制止內戰，並不是人民沒有力量，乃是人

民對於自己的力量尙不會真正覺察，並且更沒有切實聯合起來，因此呼籲和平者儘管呼籲和平，而進行內戰者依舊進行內戰。

因此我們要制止內戰的危機，樹立和平建國的基礎，就必須把人民所有的力量發掘出來，喚醒起來，聯合成一條鉅大的洪流。首先必須指出中國今天的對立形勢，並不是這一黨和那一黨，這一個政府和那一個「政府」，真正的對立是主張內戰的和主張和平的。主張和平是全國人民中最大多數的公意，也是國家和全民的眞正利益；破壞和平者無論是屬於那一黨，不過是全國人民中之最少數，在內戰中對峙的兩黨，合計起來，全體人數不到一千萬，何況此兩黨中也有不少明智之士反對內戰的，拿這個數目比起全國其餘四萬萬四千餘萬的廣大人民來，真是微末到不足計數。以此鉅大的愛護和平的人民，竟不能制止少數持有武器者之從事內戰，這不是人民沒有力量，而是人民不知善用其力量所致。

人民如何善用其力量？我們並不是主張人民都拿起武器來，去和從事內戰者作戰，以戰止戰是不能眞正止戰的，人民有的是和平的武器，以和平的武器對付戰爭

的武器，才是真正勝利的方法。

如何運用和平的力量去制止內戰？我們可以舉幾個例，譬如人民有的是正義和道德的力量，就應該大聲疾呼樹立非戰的正義，無論是用何種名義，保持統一也好，爭取民主也好，總之不許你們打，凡內戰者都是罪人，不論什麼理由。這個正義和道德的標準一立，則任何方面都不能有所狡辯，人民可以說，我們不問什麼理由，所要的是和平，只要是破壞和平者，便是全國的罪人。

人民又有的是理性的力量，我們可用理性去勸告雙方的作戰者，用理性去喚起他們的理性；人民又有的是感情的力量，我們可用感情去感動雙方的作戰者，用感情去感動他們的感情，使他們明白內戰的結果是對雙方都不利的，使他們感覺內戰的痛苦是凡有人心者都不忍再見的，政見縱有不同，利害縱有出入，但是，在和平的方式下去爭，是利益較大的，是理智的，在團結的空氣下去互讓，是更可以消弭過去的歷史恩怨，是更可以少犧牲自己的同志袍澤的。你說這是迂闊之談嗎？不然，人人都有理性，人人也都有感情，只要你真有理，真至誠，無人不可感動。實

實際上爭權奪利、窮兵黷武者不過是少數高高在上的野心領袖們，大多數的士兵還不是被脅迫作戰，一旦雙方士卒有了厭戰的感情，有了非戰的理智，更有了反戰的勇氣，大家放下武器，解甲歸田，再不替什麼黨、什麼政權、什麼私人爭權奪利，打江山，謀天下了，我們敢保這內戰就一定打不起來，要打一齊站開，讓那些少數的野心家們自己去相互消滅！

人民有的是精神和道義的力量，再加上實際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思想的力量，配合起來，一致動作起來，擁護和平，反對任何口號的內戰，我們不許打，誰敢打？

把擁護和平的勇氣拿出來，堅持到底，這內戰就自然會消弭了。在這裏，我們應該引用孫中山先生的口號：

『和平，奮鬥，救中國！』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充實各大學的研究所

現在的大學課程，儘管科目繁多，但是每一系的本系必修科似嫌太少，這些繁多的科目中，有一小半是與該系無重大關係或竟風馬牛不相及的課程。並且本系必修課在前兩年大體是複習中學的課程，後兩年也並不十分專門化。要想獲得更高深的學識，祇好留學外國。我們極端贊成留學，但是不贊成祇用這一種辦法，也不贊成大學剛畢業就派出去。因為留學生費用至鉅，無法大量派遣；並且剛畢業就出國，以程度而論，未免躉等，結果必致毫無所得。不過國家現在迫切需要大量的專門人才，我們認爲於派遣留學生之外，應該盡量充實各大學的研究所，使凡屬非留學生不能擔任的事，研究生也能擔任，並希望將來研究生的數目能夠超過留學生，更希望派遣留學生時，就研究所畢業生中派遣，俾成爲精益求精的留學生。

有些大學現在已經設置研究所，不過細加檢討，覺得應當改正或充實的地方太

多了。首先就數量而論，已覺悲觀，因為沒有設研究所的大學比已設者要多得多，現有各研究所也未將各科設齊，研究生的數目通常不及本科生的百分之一。再以質而論，我們發覺導師很少專任，由本科教授兼任者實居多數。課程大體是替本科三四年級開的，即使沒有研究所也得開這些課，研究生等於是是在本科班上旁聽。至於專為研究生而設的圖書儀器，更是寥若晨星了。結果研究所祇能供大學作點綴門面之用，並不能完成牠本身的使命。

研究所之未能發揚光大，不能歸咎於牠自身，也不能歸咎於大學當局，實由於政府不加以重視，有時且加以種種限制。所以研究所並不能得到足用的經費，於是課程師資設備都祇好到本科去揩油。再看對於研究生的待遇呢，在校時所領公費或獎學金並不夠一個人的伙食，畢業後的出路仍與本科生相同。沒有錢的大學畢業生根本不敢來讀研究所，他們有些到社會上服務，有些考公費留學。有錢的呢，乾脆就去自費留學，因為服務留學都不會像研究所那樣吃苦而不討好呢。在這種情況之下，研究所即使大量招生，也不會有多少人來考。

我們竭誠希望政府改變作風，並針對現有缺點提供幾件改善的辦法：（一）給各大學以足用的經費，務使每一大學都有一個完備的研究所，並且某大學有多少系，則其研究所就該有多少科，每科皆大量招生，使每一個願意深造的畢業生都有研究所可進。（二）研究所每科皆應有充實的設備和大量的專任導師，及專開的課程，我們理想的辦法是：每兩個研究生有一個實驗室，每人有一個小圖書室，每三個人有一個導師，並且凡屬應讀的課都應開齊，使研究生在所內能夠名符其實地在從事研究。（三）研究所的性質絕不能與本科雷同，惟二者之間應互相配合。最好本科側重對某種學問加以普遍的嚴格訓練，不必因為欲作專題研究而荒廢基本課程。研究所則聽其自由發展，作各種專題研究不必再複習本科課程，否則研究所仍為變象的本科，不特不能完成本身的使命，研究生也要覺得索然寡味。（四）現有各研究所年限太短，長者僅三年，短的祇有兩年，在短期內實不易完成研究工作，應該至少四年，對於內容較為繁難的學科，且應酌量延長一二年，這樣纔能夠使研究工作不致因限於時間而草率從事。（五）明朝的太學生政府不僅管吃管穿，還要供給

眷屬生活，現在雖不存此奢望，但是一個研究生所領公費，至少要等於憑他的學識在社會上服務所能得到的報酬。我們知道在社會上服務要作種種人事上的應付，要受各種閑氣，如果不受氣也能得到那樣的報酬，並且還有書讀，人們必定趨之若鶩。（六）政府於各種人員任用條例上，應明文規定讀四年研究所的能夠得到的位置要比服務四年的大學生更高，否則研究生會覺得讀四年便是禁錮四年，他們會中途而去的。從前一中進士就做官的，出路總不及在翰林院住過的好，所以雖然在翰林院內既窮苦且無權勢，但是進士們惟恐不得入院。這種心理說起來雖不好聽，不過中國非有大量從事研究的人才，便不能談到建國，對於這種心理實應加以注意。

（七）每年就研究所畢業生中選考留學生若干名，並規定要研究所畢業者始能應留學考試，大學畢業後曾經自修者，祇能作為同等學力，同等者取錄額不得超過總數十分之一。這樣有幾種好處：第一是研究生畢業後仍有繼續深造的機會。第二，基礎深厚的人，到外國肄業既不致扞格不入，又用不着從頭學起，祇消尋求在國內無法得到的知識就行了。留學年程可以縮短，因此而節省下來的費用，又可以多派些

留學生。第三，現在不滿意留學生的人，認為有些人外國意味太濃厚，又認為是少年得志，推究其原因由於出國太早。派研究生出去就不會發生這些流弊了。

綜之，研究所雖不能代替大學和留學，但是對於二者的確有莫大的裨益。三者配合起來，可以相得益彰，我們不能讓牠被人漠視，我們希望中國於十年之內擁有足夠她需要的研究所畢業生。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中國不堪再內戰了

內戰足以毀滅一切，中國不堪再度內戰了！

然而不幸得很，近二十年來，以國共兩黨的互不相下，竟長期陷於內戰之中，迄今猶不能停止。抗戰以前的十年內戰，除增加人民的痛苦，引起嚴重的國難以外，國共雙方皆無所得。在八年多的抗戰期中，國共雙方雖大致趨於一種暫時對內休戰狀態，但相互戒心和局部衝突並未完全消除。及抗戰勝利，國共兩黨又有再度內戰的危機，幸因全國人民的責望和美國朋友的調解，曾於一月十日正式宣布停戰。接着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一致通過五項決議，並由軍事三人小組商定整軍方案，以求逐漸完成和平團結與民主統一，舉國以及舉世莫不為之慶幸。不料政協決議與整軍方案未及實行，即因東北問題引起軍事衝突。衝突到現在，已由東北擴大到關內，如任其繼續衝突下去，其勢非毀滅整個國家與全體人民不止。我們為國家前途

計，爲人民幸福計，不得不對於國共雙方要求迅速停止內戰，竭誠從事協商。

這次內戰之所以再起，國共雙方皆將其責任推在對方。但從第三者看來，共產黨自應負大部分的責任，國民黨亦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國民黨所應負的責任，在不應提議修改政協決議，使共產黨有所藉口。共產黨所應負的責任，在不應依賴國際援助，武力奪取東北，使政府無從接收，而政府已接收的地方，如長春等也不能和平保有。政府爲重行接收長春等地，不得不調兵遣將，遠赴東北作戰。中共爲保持既得的東北地盤，亦不得不在關內攻城略地，以牽制政府，策應東北。有人以爲政府軍在東北失敗以後，必在關內發動攻勢，以圖報復。但我們以爲在東北衝突尚未分大勝負以前，中共軍必在關內發動攻勢，以圖牽制。最近中共軍在蘇北、山東、河北等地的動態，即足證明全面內戰的危機已十分嚴重了。現在國共雙方的軍隊，已如箭在弦上，不能不發了！我們要號召全國人民一致警告：國共雙方，立即停止內戰，恢復和平，使全國人民得於長期抗戰以後，稍事休養生息。

有人說：一切熱心從事內戰者，只知有武力，只知以武力奪取政權或保持政

權，那知人民的死活和國家的安危。國民黨站在政府的立場，也許認爲保土衛民，責無旁貸，但共產黨的心理呢？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曾說過「沒有武力，便沒有一切」的話，正是一個確證。不過我們不願如此推測國共雙方對於內戰的心理；卽令果真如此，也未必於國共有益，試分別加以說明。

先就國民黨說：國民黨內也許有人懲於過去對於共產黨的經驗，不願再與共產黨合作，堅決主張武力解決，這是內戰的一個因素。我們對於這個因素，暫不批評。但我們要問國民黨究竟武力能不能解決共產黨？在抗戰以前，政府曾用武力圍剿江西的共產黨十年，無法肅清，結果造成西安事變，歸於暫時休戰。現在共產黨經過抗戰以來的發展，論其實力，已五十倍於抗戰以前，論其地盤亦五十倍於抗戰以前，東北以及華北各省已大部分在共產黨武力控制之下，國際路線業經打通，可以源源得到接濟，如政府要以孤軍遠赴東北與共軍爭勝負，實在難有勝算。縱在東北有暫時的勝算，而關內也難保無意外的威脅。華北各省且不必說，卽逼近首都的江北亦不免時時感受威脅。一時一地的勝算，決不能認爲是最後的全盤勝算。從前

圍剿十年尙無辦法，現在豈能在短期內以武力消滅共產黨呢？如果迷信武力解決，勢必釀成二度長期內戰。在長期內戰中，久苦於抗戰的軍隊，能否保其始終效命，而不生意外呢？萬一有了意外，如何終局呢？又在長期內戰中，久苦於抗戰的人民，能否保其一致贊同而不生變故呢？萬一國民經濟因長期內戰而陷於破產，致激起民變，又如何下場呢？又在長期內戰中，國際地位必一落萬丈，國際援助必忽告停止，國家財政又如何支持呢？萬一國家財政因長期內戰而陷於破產，致激起「官變」，又如何收拾呢？凡迷信武力解決的人們，對於以上各種問題，需要作一個深長的考慮。如其逞意氣，好痛快，難免誤國自毀。古人說得好：「兵猶火也，不敢將自焚。」我們不願親見國民黨以兵自焚，希望其從速戢兵！蔣主席是國民黨的總裁，當更不願親見國民黨爲內戰所毀滅，所以曾有「政治解決」的正確宣示。我們希望全國各方都依照蔣主席的這個宣示，解決國內一切問題，以免互毀自毀。

再就共產黨說：共產黨內也許有人堅信其現有的勢力，已可與國民黨抗衡，不妨一面以武力方法奪取地盤，一面以政治方法僵化政府。於是邊談邊打，無往不

利，不到數月，已大有所得，再經數年，即不難取國民黨而代之。我們假定這種想法有幾分實現的可能，但決不是很輕易的有實現的可能。其所以不能輕易實現的重要原因有以下幾種：第一因中國太大，決不能由一黨武力統治全國。國民黨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尚不能以其一黨的武力統治全國，共產黨也不能以其一黨的武力統治全國。第二因中國民族性不大適於共產黨的作法。共產黨的作法多是極端的，突變的，而中國民族性則是中庸的，調和的，兩不相容。近年共產黨雖在國民黨勢力範圍內倡言民主自由，但在共產黨勢力範圍內則未必真有民主自由。例如江北人民因受共產黨壓迫而被害被捕被逐者日益增多，即是一個百口莫辯的事實。第三因國民黨的軍隊多曾經防共的訓練，決不易在短期內全部被摧毀。第四因共產黨有國際背景，容易引起國際問題，甚至引起國際戰爭。現在共產黨已擁有東北及華北的大部分，如再進一步發展，即難保不發生國際問題。從前國民黨北伐發展到華北及東北以後，即引起九一八事變，便是一個殷鑑。萬一國內戰爭發展成爲國際戰爭，整個中國有被犧牲的危險，共產黨亦無最後成功的可能了。

總之，內戰足以毀滅一切，即國共雙方亦均將難免爲內戰所毀滅。國共縱不爲國家與人民設想，也應爲自己設想。要善於爲自己設想，便立即停止軍事衝突，重行從事政治協商！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九日上海中華時報社論

中國不堪再內戰了

七七五

發揮協調的精神

日軍投降了九個月，國內擾亂不寧也達九個月。勝利來臨之日，便是內戰爆發之時，爲什麼八年來全國人民用血淚汗所辛苦換得來的勝利，應該糟踏於不必要的內戰之中？有的人責備中共，不該在勝利後爭受降，致啓戰機；有的人責備政府，不該在勝利前採取「拖」的政策，把國共談判及黨派會議久延不決；有的人責備中共，沒有誠意，協議隨時可以推翻，市價見風高漲；有的人責備政府，也沒有誠意，恐怕政權開放，大權旁落，失掉領導的地位；有的人責備中立的黨派，並不能嚴守純正中立的立場，作有力的發言，以盡排難解紛之責；有的人責備社會賢達，孤芳自賞則有餘，曲突徙薪則不足。互相責難，則互信不立；各持己見，則協商難成。沒有充分發揮互信和互讓的精神，所以「政協」和「軍調」，都不易得到有決定性的協議。因此，有許多人對政治前途，感覺失望與灰心。

其實，責難、失望、和灰心，都是多餘的，這一切互相責難和失望悲觀的現象之表現，都象徵着史無前例的現代化的民主新中國之誕生，正在陣痛的難產之中。西諺云：「羅馬不是一天造成功的」，民主是需要學習的，民國雖然有三十五年的歷史，但過去內憂外患佔了大部分的時間，使人民、政黨、以及政府——中央的和地方的，都沒有機會好好學習民主，所以政治民主化的課題，在戰後中國，今天還是大家所要上的第一課。中國這隻古典的舊船，在今天才開始嘗試作「民主的處女航」。全國人民，社會賢達，和各黨派領袖，必須本同舟共濟之義，一致努力，航登彼岸目的地。學習民主，如同學習游泳一樣，學游泳便得親自實地去下水游泳，學習民主便得朝民主的方向和道路上實際開步走，最初的一步是最難走的，但也是最重要的。如像游泳，最初一次學着下水是一樣的艱難和重要。學習游泳，便不要怕打濕衣裳；學習民主，便不要怕衝突和摩擦，也不要怕忍讓和妥協。

貝爾納斯曾云：『和平必須建立在互相諒解與互相尊重的基礎之上，不可以縱橫掉闖的手段獲致之。』這就是說，彼此必須相見以誠，必須根據公理與正義來建

設和平。所謂和平，必先得其平，然後始能和諧。必須以忍耐的精神，體諒對方的困難，然後才能養成互信互讓與通力合作的態度。

一般人都以為蘇聯的態度是非常倔強的，尤其莫洛托夫。其實不然。在倫敦會議陷於僵局，宣布延會之後，莫洛托夫曾致函英外相貝文，函云：「在我離別我們同盟國——大不列顛——邊疆之時，余請求閣下轉達英國政府對余之熱誠招待及深摯之友情，表示謝意。我深信在戰勝共同敵人之後，為英蘇兩國人民利益計，為鞏固世界和平計，吾人將來之合作，必將繼續，既經克服中途所遭遇之種種困難後，吾人將繼續聯合努力，以期完成此種偉大之目的。」這個和平中正，充滿了互信與互助精神的莫洛托夫便被一般人遺忘了。就賴這種精神，才使巴黎四外長會議有續開的可能。巴黎會議雖又告延會，但是列強間的了解，同時也推進了一步，國際間未來的合作，還是要靠這種精神維繫下去。

貝爾納斯曾云：「美國願意以狄克推多的和平，加諸敵人，但不能以狄克推多的和約加諸其同盟國。」和平與政治的進步，在國際上與在國內一樣，是有賴於理

智的協調的。今日的中國在學習民主合作，今日的國際社會也在學習民主合作。

今後國共雙方如能本互讓互信的精神，發揮理智協調的作用，同時各中立黨派及社會賢達，均能爲人民及國家設想，仗義執言，排難解紛，則中國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工作，並不難完成。經過了過去長期的摩擦，衝突，和會議協商，國共雙方及各黨派以及社會賢達，應該已得了一個深刻的教訓和現實的經驗：何任那一方面，都不能完全照自己的意思，草擬民主和平的具體方案。我們知道在國際列強之間，英美兩國意見雖然一致，實力雖然強大，原子秘密雖然在自己掌握之中，尙且不能，也不願以狄克推多的和約加諸其友邦蘇聯，蘇聯也無法以其一國之意見強英美接受。那麼，我們國內的和平與民主，也必然是有賴於各方面的協調與合作，才能完成，這是毫無疑義的。

現在國內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戰後瘡痍滿目，法紀蕩然無存，生機毀滅殆盡，實在再不堪遭受內戰的破壞了。中共表示在任何時期都不拒絕商談，政府也早宣示長春收復後，和平協商即可繼續進行。我們深盼國共雙方，以人民和國家爲

重，速即結束軍事行動，立即重開政協與軍事三人小組會議，以和平方法解決一切政治軍事問題，使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的目的，得以早日促其實現。玩火者必爲火所毀滅，兵凶戰危，武力絕不可靠。民主和平的新中國之誕生與滋長，是需要熱烈的愛國精神和理智的協調精神予以栽培和灌溉的。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廿六日中華時報社論

兩重統治下的人民

現在事實上許多地方受着兩重統治，一重是國民政府的統治，另一重統治者尙無普遍適用的名稱，可姑名爲共產軍權。老百姓對於兩個統治者的政績，素來不敢批評，更不敢說孰優孰劣。我們謹守大耳朵百姓的立場，不作上下床之分，祇是根據耳聞目見的事實，說說老百姓在兩層統治下的痛苦。

第一、在兩重統治下，人民具有兩重負擔，而且這兩重負擔，又不期然而同落於農民之身，兩方面都以田畝爲課稅的對象。我們不能不感激蔣主席，將收復區的田賦豁免一年，讓人民稍紓喘息。但是這一負擔免除了，其他的負擔又接二連三的來了。目前人民在國民政府統治下的最大負擔，一爲指購軍糧，其間弊病百出，民不堪命。另一爲鄉政經費，任意攤派，名目繁多。有一位縣長榮膺國大代表，各縣長議決每保恭送程儀一萬八千元，該縣有一千幾百保，即此一項便是兩三千萬元。

在另一方面，共產軍權征收田賦，絲毫不放鬆，有的地方三十六年度的田賦已經征完，並且不但點滴不得短報，反將大畝折成小畝，從前的小畝作爲一畝半征稅，限期交納，急如星火；到期不交，即拘押不貸。兩重統治下的人民所過的生活，這是一種情形。

第二、兩方面間的敵意，同樣強迫人民接受，每一方面都責令人民不得與對方發生關係，不得向對方完糧納稅，不得在對方擔任公職，不得奉行對方命令。不然，通匪的罪名便來了；不然，動搖份子的頭銜便加上了。人民還了稅，交了款，不敢問收錢的人是誰派來的，從而不敢要收條。因爲政府只有一個，並無第二家，如何敢問他是那一家政府？政府需款孔急，愛民甚切，不必要，何至要錢！有必要，人民必然擁護，又何敢計較出多出少！這是說不敢問，其實說亦不敢說，譬如我完過了糧，有一官員問我，你完糧沒有？我就難答。我說沒完過呢，他馬上便要我完！我說完過呢，他要看證據，我沒有，沒有而說完過，便是刁民。更且不知問者屬於誰方，萬一知道我向他的對方完糧，則禍且不測。這是兩重統治下人民的又

一種情形。

上面說的，是就一種地帶而言，是某一方面自命屬於他的。其次，還有一種地帶，是顯然爲某一方面所不能獨有的，於是產生第三種情形，便是「最惠待遇」；意思是說：怎樣待遇我的對方，也就要怎樣待遇我。對於對方的官人，放過鞭爆迎接，對我方官人亦要鞭爆迎送。對於對方的委員辦過酒席款待，對於我方委員亦必須酒肉相待。不然，便是有意反動，或不前進，決不寬饒。

以上三種情形，在兩重統治下的人民也就夠受了，不必再多說了。我們是老百姓，爲減輕負擔計，爲不在夾棍下討生活計，我們要求統一！我們要求祇要一個政府！一切好聽的名辭，都是那麼一回事！我們要活，我們要統一！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四日中華時報社論

自由經濟與平抑物價

自從抗戰以後，因爲軍費浩繁，貨幣膨脹的關係，從二十九年起到，物價突然上漲，以後累年增加，突飛猛進，至今未已。這期間，政府也曾用盡種種方法，希圖管制物價，但是不問你採取何種方法，物價依然上漲不已，不管制還好，越管制越糟，從二十九年起到三十五年，這六年間政府對於物價管制的失敗，就證明了統制經濟政策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爲什麼在他國可以實行的統制經濟政策，來到中國就着着失敗？我們須要明瞭各國的背景不同，在歐美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平常一切經濟事業都已經組織化過，全國的經濟命脈有十分之七八操於幾個大公司、大工廠之手，這些公司工廠，其組織之龐大，部門之繁多，不亞於一個小王國，因此政府如欲實行統制干涉政策，只要把這幾個大公司工廠的首腦部看管好了，一聲號令下去，便可以如身使

臂，如臂使指。這就好比一師軍隊，先已經編成了若干團，然後成立師部，指揮自然靈敏。中國的社會則不然，不但根本沒有像歐美那樣規模龐大的工商組織，就是像樣一點的公司、工廠也寥若晨星，全國的工業還留滯在手工業的時代，全國的商業還握在成千萬的小商店之手，全國的主要物資還分散在農村，在田園倉庫之中，這就像一師軍隊，連團營連排都沒有成立，單靠師部發號施令，所指揮的是一個個單獨的士兵，請問這命令如何執行法？這就無怪於政府統制經濟政策的連番失敗了。

要避免這種失敗，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路，仿蘇聯的辦法，索性把一切私人工商企業都打倒，一切國產，國製，國營，國銷，政府現行的政策，似乎是想往這條路上走，什麼中紡公司、中蠶公司之類，都是這一套作風，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表面上似乎政府可以吃乾一切，但是我們要知道，在別的產業發達的國家，政府要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過是把這幾個大工商企業組織接收過去，並不必另起爐灶，這就好比別人已經編成了一團團的軍隊，政府只要

把他接收過來，改編一下，就不難造成一師勁旅，即使如此，英國現在的工黨內閣，還在緩之又緩，慎之又慎。像中國，根本還沒有大工商企業的基礎，政府要辦理一切國營事業，必須從頭辦起，好比練兵從一個個士兵練起一樣，這是何等繁難！何況中國這些經濟軍官，又多是官僚出身，祇知道假公濟私，那裏能涓滴歸公？因此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結果，不過是替官僚創造機會，促成了官僚獨占的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的最惡劣形式，人民固然大受其殃，國家也未必有什麼利益可圖，民間經濟日益破產，結果必致國家的稅收日益減低，財政基礎動搖，物價膨脹，預算增加，不得不更靠發行紙幣以維持政府財政，結果造成循環的惡化。伊索寓言中的愚人，嫌金鵝一天生一個金蛋不痛快，殺鵝而取蛋，結果鵝亡而蛋盡，現在政府的經濟政策，正是這種殺鵝取卵的愚笨作法。

另一條路，是自由經濟的路，我們認爲這才是中國今日唯一可行之路。自由經濟唯一的流弊，是恐怕私人資本壟斷一切，但中國今天沒有這樣大本錢的資本家，不必怕。反之，在目前這種中小工商企業分布的中國社會，自由經濟的政策可以促

進中小工商業間的自由競爭，自由競爭的結果，每一個工商單位，必須簡化產銷程序，改良技術，減低成本，貶損價格，才能與他人競爭，而大家相互競貶價格的時候，物價自然低落。物價低落的結果，表面上似乎工商業吃虧，實際上成本減低，社會購買力增加，工商業更可欣欣向榮，而國家稅收自然增加，通貨得以收縮，財政基礎漸可走上正軌，物價自更形穩定，國家也並不吃虧。至於採用自由經濟的政策，或慮外貨將大量傾銷，中國落後的工商業將無法立足，不知外貨傾銷的結果，受其害者僅在某一業，而蒙其利者實在全國。譬如說，外國汽車大量輸入中國，卡車低到一萬塊法幣一輛，固然中國的汽車製造工廠必須破產，但廉價汽車的大量輸入，將使運輸成本大大減低，財貨越發流通，百業都可減少成本，物價和工資，普遍即可下落，新興的中國汽車製造業，憑藉低廉的成本，自然也還可以再抬起頭來，與外國同業競爭。自由經濟好比放水自由流，流來流去，自然會走到平面；統制經濟好比築堤防水，堤越築得高，一旦潰決起來，水患越大。

本月二十四日本市中央日報的地方通訊欄中，曾載有下列一段新聞：

『如此便宜』

六浦汽車競爭營業

連日互相減售票價

(六合通訊) 浦(浦口)六(六口)長途汽車公司，在浦六公路行駛汽車，已將三月，原售客票每人一千元，迭次漲價至二千五百元，前日(十七)又由京來一東方汽車運輸公司，亦售客票，第一天售價亦賣二千五百元，第二天則減價二千元，今晨(十九)浦六汽車公司，亦大減價，每客票價祇售一千五百元，兩汽車公司連日互相減售票價，乘客便宜不少。又聞現每日開班，來往三次，比前多增一班。』

請看，這就是自由競爭的經濟政策，可使物價低落的事實證據。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廿七日中華時報社論

怎樣提高兒童體健

「聯合社南京八日電：南京市政府衛生局今日發表，初小學生中，體格不健全者，佔百分之八十，首都產婦其中用舊式產婆接生者仍有百分之七十，致造成今日學童體格不健全之現象，惟戰後接生情形已較前改善。」

中國兒童以及一般青年體格之不健全現象，已爲一般所週知，南京市衛生局所發表的這個消息不過是更提醒了我們注意的一斑而已。誰也知道兒童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今日中國兒童體格之不健全，即說明了下一代的中華國民體格之不健全。「健全之精神寓於健全之體魄」，下一代國民體格的不健全，即是說明了下一代國民的精神也不會健全。當此大地列強競爭角逐最激烈之際，下一代國民的體格和精神之不健全將如何影響於下一代的國運，這真是值得憂慮的第一等大事。

不過，南京市教育局把兒童不健全的責任歸之於舊式產婆的接生，實有點故入

人罪。我們知道今天中國國民中體格比較健全的還是出身農村的農民，抗戰以來，全國的壯丁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來自田間，就是證明。但這些農民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甚至百分之百都是由舊式產婆所接生的，由此可證舊式產婆雖應改良，雖易釀疾病，但却不能把兒童體格不健全的責任一齊推到她們身上。中國的衛生當局出身西醫，當然對西醫及新法接生是先抱有成見，我們當然並不反對新法接生較良於舊法接生，但新法的西醫們也要反省，在替某要人夫人接生一次便需手續費一百根金條，最蹩腳的醫院接生一次也要一二十萬的高價之下，一般平民並非不信仰西法接生，實在是力不從心，你教他不找產婆找那些人？所以我們以為市衛生局與其指斥舊法接生之不當，不如多設些免費接生醫院，但這免費須是真免費，不要一面免費，一面藥品膳食還得收錢。並且醫生和看護小姐們也得多訓練一下，免得擺出高貴面孔來嚇病人，使病人不敢登門，這例子我們見得也太多了。

其次，有些人把兒童的健康歸之於營養不足，這也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中國不是美國，連歐洲也不敢望，拿歐美人的營養標準來繩中國人，簡直是勸飢民食肉

糜，嘗見有些西醫，勸病人你要每天吃雞蛋幾枚，牛乳幾盃，豬肝二片，水果幾枚，維他命丸二粒，魚肝油精幾滴，在他說起津津有味，似乎很不難實行，却不知道除了少數高等華人以外，有幾個家庭能夠吃得起這些東西，事實上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他們每天連白米白麵都不敢問津，肉菜水果更非所敢想，每天啃窩窩頭，高粱麵，紅苕，也祇能將就果腹，但體格比較都市中的高等華人却也並不見得低下，可見營養尙非最重要的問題，中國人的生活程度還不配談這些。

中國兒童的體格不健全，當然得之於父母不健全的遺傳者爲多，但我們以爲不是不能用後天方法去補救的。補救之法在於普遍提倡國民體育，特別在學校中加強體育和運動的地位，強迫施行，今天中國的中小學校仍是以讀書爲主，而不知注重體育。我們以爲教育部應改訂課程，把讀書的時間縮短到半日，而以下半日的時間整個支配於體育和勞動作業項下，並且爲矯正過去一般重文輕體的積習起見，應該以學校兒童體育的成績作爲校長教師的主要考績標準，同時學生體育不及格者不得進級及畢業，如果這樣作下去，負教育責任者自知特重體育，以學校經費百分之五

十以上來發展體育，兒童體魄自有改善的希望。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日中華時報社論

邱吉爾演說與法國的歧路

戰時英國首相邱吉爾，本年法國國慶紀念日，在梅資發表告法人的演說，是最近國際間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邱氏雖爲在野之身，但因其個人聲望及保守黨再起執政的可能性，故平時言論已極爲人所注意，況英國勞工和保守兩黨，所爭者祇在對內的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因係基於國家的利益，故相差並不很遠。往往在朝黨所不便講的話，邱氏以在野黨領袖的地位倒比較地可以放言無忌，與政府的實際政策互相配合。因此邱氏的一言一動，不止代表保守黨，往往與英國的整個國策有互相呼應之妙，其言論所以引人注意者在此。

邱氏在首相任內，向以保持英法親善爲最重要的任務。當英法聯軍慘敗之際，邱氏即發表聲明，主張英法成爲合衆國，英國願以全力支持法國抗戰，雖當時法奸貝當等力主親德，不肯接受英國的好意，以致法國單獨投降，但邱氏對法國的高情

隆誼，至今猶在法人記憶之中。這一次邱氏所以對法國發表演說，就是沾這一點便宜。

法國在戰後復興之初，本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條是獨立不倚於英蘇兩大之間，並且以自身爲盟主，聯合西南歐拉丁國家，造成一個拉丁民族的西歐集團，這是戴高樂將軍一派人所主張的，可惜法國在戰後實力大受損傷，這個計畫雖好，無奈力不從心。第二條路是親蘇以拒英，與蘇聯卵翼下的東歐斯拉夫民族集團遙遙呼應，同時促動西班牙的反弗朗哥運動以速成歐洲大陸的聯合，將英美勢力排斥於大陸以外，這是法國共產黨所主張的，社會黨也有一小部人傾向此點。第三條路是親英聯美，造成英法合作的西歐集團，以與斯拉夫民族的東歐集團相對抗，並防止德國的再起，此議英人最爲熱心，法國的人民共和黨和社會黨中的穩健派，未始不贊同此意，但時機尙未成熟，故不便公然喊出來，現在法國的出路是正徘徊於聯英、聯蘇兩條路線之中。

以法蘇關係而論，兩國距離較遠，利害衝突較少，揆之遠交近攻之意，以及歷

史上的俄法同盟舊誼，法蘇親善以共同防德，安定大陸，本屬合理之舉。況過去英國的大陸均勢政策專利用法國以打德國，法國人吃虧已經兩次，對英國的好意不免疑畏，過去貝當之所以寧可與德國合作，而不肯伸手向英者，亦即鑒於大陸的國家應該團結，不必再受島國利用之意。今日聯蘇比昔日聯德，更覺順理成章。但今日法國在大陸並無假想敵人，所急需的是取得經濟物資的援助，以促進復興工作。這種希望，只有美國才能滿足，蘇聯無能爲力。美、英一體，聯美即非聯英不可。況蘇聯對法，又仍不脫對其他國家中操縱內政的舊作風，對法國的共產黨特別幫忙，前此時爲幫助法國共產黨在選舉中取得勝利起見，曾特別以糧食接濟法國，這種作風實在傷及法國人的自尊心，未免弄巧成拙。況且蘇聯對戰敗後德國的政策，迄今猶在動搖不定，法國人深恐蘇聯爲對抗英美起見，扶植出一個強大統一的新德國出現，如果這樣，對法國大爲不利。這種種因素，都促成了法國對蘇政策的徘徊。在今日反共的人民共和黨領導法國政權之際，內政的對立，反映到對外政策上，其不能不比較傾向於英美採一致步調，是很自然的。

至於英國本身是一海權國，對於歐洲大陸必須扶植一次強的陸權國，以對抗最強的陸權國，乃是傳統的政策。在過去路易十四和拿破崙時代，法國最強，故英國聯普、奧、俄以對法；克里米亞戰爭以前，俄國最強，故聯法以對俄；克里米亞戰爭後，拿破崙第三的法國最強，故聯普扶義以對法；二十世紀以後，德國最強，故兩次歐戰均聯法俄以對德。此次戰後，德國一敗墮地，法國創痍未復，而蘇聯方憑藉共產黨的國際勢力和斯拉夫民族的聯繫，到處與英美成爲對立的現象，爲英美計，欲在歐洲大陸上覓一陸軍大國，以共同對付蘇聯，實非拉緊法國不可，因此英法聯盟的呼聲，英國人比法國人實在熱烈得多。

爲法國計，與英、美親交固無不可，但却沒有因聯英而反蘇之必要。西歐集團和英法聯盟之說，最足以引起蘇聯和斯拉夫國家的疑忌，最近捷克總統貝奈斯的代表東歐斯拉夫民族的發言，已可覘消息之一斑。法國若一味倒在英美懷中，蘇聯勢非扶助德國復興不可，這對於法國是最可怕的。法國之大利，在調和美、蘇、英三強間的衝突，穩定歐洲大陸，使德國無法再起。這就在乎法國領導國政的領袖們的

眞知灼見了。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八日中華時報社論

邱吉爾演說與法國的歧路

七九七

勉抑意氣，相忍為國！

政治本來是最複雜最煩難的一件事，而民主政治的原則，就是相互尊重他方的地位和意見，需要以容忍和諒解為基礎，尤其一絲一毫不可獨斷專行。中國雖未進於民主，但學習民主的態度，則不可不有。重感情，逞意氣，各走極端，置國事於不顧，是最要不得的。

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來的一片祥和之氣，到今日已變為遍地干戈了。我們很痛心這種以干戈代協商的方式，全國國民和國際同情的友人，也同樣痛心這種以干戈代協商的方式。但干戈畢竟已起，大家既不願長此坐視中國戰亂的蔓延，就不能不趕快想想辦法，雖不能戢干戈於未起之先，也應該努力使戰亂縮短，趕快化干戈為玉帛，化戾氣為祥和。而這就是國共兩當事者以外的其他方面人士和全國國民所應該急起直追的責任。

當前中國的政治問題，決不能以干戈方式解決得下去。這種道理，不但全國國民都懂得，就是國共雙方的當事者又何嘗不曉得。但是曉得雖然曉得，而終於不能不走上千戈之途者，無他，不能抑制意氣感情的用事耳。從古國事，敗壞於小人者半，敗壞於君子者亦半。君子何以能敗壞國事？就因為理智不能約束感情，而互逞意氣，各走極端之故。唐之牛李，宋之新舊，蜀洛，往事昭昭，載在史冊。今天的國共雙方領袖，以至於民主同盟的領袖，如羅隆基先生之流，我們可以說都是君子，都是誠心誠意想把國事弄好的，也都並不會拒絕和他人協商乃至合作。但滙集這許多君子於中國，何以國事尚不能順理成章和協下去，而必至於以干戈解決，這就不能說沒有一點意氣用事的成分在裏面了。

凡是意氣，不能祇怪一方面，事情總是相激相盪才成功的。回想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之日，會內會外的空氣，何等和洽，但因為在開會期間有些方面，發言論事，仍未能盡平感情，協商問題，也未能真正披心置腹，以致協商雖有成就，而疑忌之心，彼此未戢，會後種種事端，愈激愈厲，俗語說：「微風起於蘋末」，一念意氣

未除，今日干戈四起，凡對國事負責任的各黨各派領袖，都應該痛切自省！

現在戰亂雖在發展，但和平之門並未關閉，不但馬歇爾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正僕僕於廬山道上，就是周恩來也還未離南京、上海。打既然決打不澈底，爲什麼不趕快想不打的辦法？我們以爲一面國共軍事會談應即刻恢復，並商定停止衝突的辦法；一面應請政府迅速公布李聞案的真相，依法解決。同時各方面均須切實停止宣傳戰，相互尊重對方的人格，一切誣蔑之辭，懸揣之論，在發表前自己慎重考慮一下，庶幾意氣漸平，然後始能有補於國事，所謂相忍爲國是也。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廿四日中華時報社論

敬告一部分反美的中國黨派

前天美海軍第七艦隊司令柯克上將在本市招待中外記者，報告安平美軍被襲擊事件，態度審慎，事實詳明，關於重申美軍在華所負任務一點，尤有堅決的表示。

中美國交，自開始締約以來，百餘年中，從無不友好的關係。中美兩國的國交，和中國與任何國家的國交比較起來，有一個最特別之點，即是，中國和其他任何國家的國交，都不過是外交上應有的禮貌，說不到真正親善，但中國與美國的交通，却不僅存在於國際的禮貌中，而真正存在於大多數中美兩國國民的心中，特別是每一個中國人對美國的友好態度，是出自真誠，決無一點做作之處。這並不是中國人對美國有什麼特別好感，而是事實告訴我們，美國的對華政策，從來沒有做過其他的強國，有一點對華侵略的行爲。各國在華都有租界，但美國沒有；各國在庚子事變中對中國強索賠款，但美國却自動退還，辦了一個清華大學，如羅隆基博士

這樣的著名的反美家，就是用美國退還的庚款所培養出來的人才，可見美國也並不會以教育手段來專門培植親美人才，實行文化侵略。至於煽動中國境內的民族來叛離中國，以分割中國的主權，像日本之製造偽滿和偽蒙疆政府一樣，更是美國人所從來沒有想到的。中國人是有眼睛的，也是有良心的，他們分辨得出真朋友和假朋友的區別來，決不會上任何人的當，因此中美友誼的交流，才存在於每一個中國老百姓的心中，而不祇存在於官員們的口裏。

近十年來，中國才有所謂反美運動，發動者是甘心做日本侵略者走狗的漢奸學者們。日本人因為對華處處侵略，引起了中國人民普遍的反日感。他們不自反省，却誤以為中國人之反日，是受了英美的唆使。因此，在日寇佔領中國大部土地的時間，就唆使他豢養的漢奸偽府，出來作公開的反英美運動，還嫌不痛快，又來一個珍珠港事變，結果把明治維新以來七十年的一等強國日本，打成了一個階下待決之囚。

和漢奸們談良心，談國家利害，本來是空事。但為漢奸政權本身起見，幫助他

的主子反美，也是一種錯誤的自殺之舉。他們如果真有一點眼光，就應該知道漢奸政權的生命，繫於他主子日本的存亡，而日本的存亡，却繫於美日關係的好壞。爲延長漢奸政權的壽命起見，他們不但應該力戒本身的排美運動，並且還應該勸他們的主子日本好好認識美國，不要把這個巨人刺激起來，一拳打倒他們的靠山，連小傀儡們的命都隨之而瓦解。

但漢奸和他們的主子，都不曾有這樣的覺悟，以致惹火燒身，自取殞滅，其原因是一個心理上的問題。在法西斯集權主義的國家，如日本和德義之類，他們平常所受的訓練，使他們祇迷信力而不知有理，祇知道要手段互相利用，而不相信人間存在有真正的誠意和同情。民主國家如美國者，則正與之相反，他們不是沒有力，但寧可先和人講理；他們不是不會耍手段，但却希望先以真誠感人。譬如現今在美國手裏控制着的日德戰犯，照集權國家的腦筋看來，何必還弄什麼審判的花頭，爽快拿來槍斃，豈不乾脆。但美國人偏不這樣做，不但容許戰犯據理辯護，還容許本國的律師出庭替敵人辯護。這就是有力不用，而先以理來的民主作風，是法西斯式

的集權頭腦所決不能了解的。又如日美的敵對，到珍珠港事變的前夕，已經事態顯明，決無妥協之餘地，但美國却不惜甘心上當，和來栖野村委曲周旋，直到珍珠港的炸彈打到頭上，才起而應戰，這就是以君子之心待人，還希望敵寇可以感化的王道之風，也不是法西斯集權腦筋所能了解的。

因爲法西斯集權者的心理狀態，和民主國家的心理狀態，彼此相去太遠，才弄得互不了解，以致釀成世界上空前的悲劇。民主國家的人，以爲無人不可講理，無人不能以至誠感化，却不懂得法西斯的哲學裏，既沒有理，也沒有情，只有力與詐。因此，本來拿出鐵拳來，一拳就可使法西斯屈服，把問題解決的，却偏偏要再三綏靖，張伯倫達拉第輩，吃綏靖主義的虧，幾乎弄得身敗名裂，而羅斯福也吃了珍珠港一大虧才始覺悟，這是民主國家的悲劇。同時，法西斯集權者也因爲祇尙詐力而不知有情理的緣故，看了民主國家的講理態度，以爲是示弱，感化態度以爲是怯懦，妄想得寸進尺，以爲多來幾次威脅手段，就可以把民主國家嚇退了。希特勒因此一念之誤，而進兵波蘭，惹起滔天的大禍；日本軍閥也因此一念之誤，認識美

國不足，而惹起了珍珠港以後的燒身火燄，這是法西斯集權者的悲劇！

像法西斯這樣的集權侵略國家，和依附這些集權侵略者爲生的漢奸集團之類，他們的行爲，正是受了他們錯誤的哲學觀念的支配，命運使他們非走上這樣天理昭彰，自取滅亡的路上不可，論其行爲，本不足惜，事過境遷，也無申論的價值。不過中國在法西斯滅亡的今日，有些以民主爲號召的黨派，還在不知不覺地走着法西斯的覆轍，妄想以叫囂或非法的行動嚇退了美國人，使美國知難而退，這却太不懂民主國民的心理了。這樣的錯誤政策，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前途，祇有損失，而決不會有一點好處。我們深切痛惜有些民主黨派的錯誤作風，將影響於整個中國民主運動的前途，因此不能不痛陳利害，垂涕泣而道之。一個對自己的錯誤不惜正言糾彈的人，才是自己真正的好朋友，而那些祇會隨聲附和，跟着拍掌叫好的人，却是斷送自己的禍種。這個時代，一切的人，都應該努力學習聽好話了。

我們應該學習蘇聯作家愛倫坡的敏感，從新認識美國，美國人是容易了解的。

民國三十五年八月七日中華時報社論

和諧的空氣最重要

在國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一般人的憂慮都集中於召開以後，中共和其他黨派如不參加，將使這個國大不但不能完成全國團結的任務，反而有引起全國破裂的危險。這幾天金鈔物價的狂漲，就是反應着一般國民對這個問題的焦慮。政府當局的焦慮當也不下於國人，因此在國大開會之前，政府先下了停戰令，又決定緩延三日以待各黨派的協商，這都是表示國民黨領袖的認識時局的嚴重，而不惜再三讓步以期委曲求全的苦心。同時各黨派間的非正式綜合會談，也已再三集會，中共代表也都出席參加，這也表示中共方面並未拒絕再作協商，當然就包含可能的讓步，這都是和平前途的一線曙光。國民的反應，是物價金價開始低落了，這可以表現國民期待和平的心理。

本來事實上，國共雙方雖然都在秣馬厲兵，但都有不能繼續打下去的苦衷。在

中共方面，軍事上迭次失利，第二中心的張家口也既不戰而棄，再打下去也不會馬上有勝利的把握，儘管高調可以退入山地，戰至最後一人，但事實上一退入山地，就成了流寇，已經失却政治上應有的地位，縱戰至最後一人，人民到那時候是否還束手待拉去充壯丁，當炮灰，而沒有別的新變化發生，是很難保的事。外援既不可必，政治解決是對中共最有利的，權衡利害輕重，和有百利，戰有百害，中共領袖中不乏明達之士，衷心未始不願相忍爲國，以完成團結的局面。就國民黨方面講，軍事上雖然比較勝利，但財政基礎却是脆弱的萬分，以這幾個月物價狂漲來看，內戰一旦爆發，財政金融先沒有把握，財政金融如果動搖，軍事就靠不住，因爲共產黨的軍隊或者可以單吃飯不發餉而打仗，國民政府的軍隊却不能夠不發餉而打仗，共產黨或者可以強制征發人民的糧食物資，一個堂堂政府却不許如此做。何況戰爭一擴大，哈爾濱以北先成了禁燬之地，隨時有燃着火藥庫的危險，政府有此顧忌，也不能不希望早點言和，化干戈爲玉帛，化戾氣爲祥和。

雙方既均有不能再戰，不能不言和之勢，則何以還在相持而不相下，無非是爭

些面子，爭些意氣，或者期望對方讓步而檢點小便宜，須知道一個堂堂政黨是不許如此作的。政治上不能講意氣，動感情，也不能專貪小便宜，須要從大處着眼，我們相信國共雙方領袖都是眼光遠大的政治家，決不會讓意氣感情支配到底，因此我們對於和談的局面是相當樂觀的。

三天之期易屆，一切問題未必能都得解決。我們期待國大再延三天，或者多延幾天，同時對於蔣毛會晤的消息，也期待其實現。同時在大會的前後，務必要避免刺激，造成和諧的空氣。像延安近來聲明中誣衊蔣主席個人獨裁的措詞，和中央社所發共黨內部分裂的消息，都是可以不必要的，政見儘管有異同，態度却不可不大方，只有和諧的空氣，才能造成和諧的結果。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善保政府的威信

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十項發表之後，輿論界反響不一，我們姑且不論內容如何，有一句話希望政府先要切實注意的，就是這一次是政府能力的最後一次試驗了，不要再輕易放過這個機會，要好好注意善保其威信。

抗戰以來，十年之中，政府所表現於人民的是政令屢更，政信不立，即如對經濟措施而論，今天一套辦法，明天一套辦法，十年以來不知道換了多少辦法，結果依舊是物價越管制越漲，財政越來越困難，民生越來越凋敝。即如這一次的進出口貿易的政策，十天以前才頒布了出口補助及進口附加稅辦法，十天以後又停止了，這樣的狐狸狐搨，簡直使人民無所措其手足，如果說十天以前那個辦法是不對的，爲什麼不追究責任？負決定那個辦法的當局爲什麼還在戀棧，而不自行引咎。

本來政府的失信於民已不止這一次，回憶宋子文院長上臺之初，即以黃金捐獻

四成一舉使政府吸收人民黃金儲蓄的政策完全破壞無餘，從此以後人民對於政府的政令簡直不敢相信，只得自己另想其他的辦法。這一次的黃金風潮不能不說與過去政府的失信於民，有聯帶的關係。

政府的屢次失信於民，表現政府的無能。孫中山先生說：人民要有權，政府要有能，但以奉行中山先生主義而執政的政府，多年來所表現的，却是人民既無權，政府也無能。因為政府無能，才一次一次受到政策失敗的打擊，才不得不今天換一套政策，明天變一套把戲。政府說統制物價不自今日始，但是統制的成效何在？因為有過去抗戰期間的失敗，所以今天政府無論再來談什麼方案，人民也不敢傾心相信，即使方案內容盡善盡美，人民也依然不能不以懷疑的眼光視之，姑且存案，以觀後效，若真正問效力有多少，恐怕不但人民不敢相信，就是政府當局自身恐怕也不敢相信。

我們以為過去政府對於經濟措施的威信所以屢失，不但由於執行人事之積弊過深，雖有良法美意一到實施便變了質，恐怕根本精神也有待商之處。十年以來，政

府關於經濟的措施雖屢變，但根本精神並沒有變，直到這一次的方案還是如此。這根本精神是什麼？就是想以政府的力量來管制物價和金融，而不讓其自由流通。本來統制經濟在西方各國行之有效者甚多，中國當然也有做效的理由，但是一般人却忘了凡實行統制經濟的國家都是工業已經發達的國家，平常各種生產事業本已集中到幾個大組織之下，有了基礎，政府從而加以管制，順理成章，像中國這樣廣土眾民的國家，經濟基礎又偏於農業，即使人人奉公守法，執行管制也有種種的困難，和西方國家的情形截然不同，何況人事還未能盡善呢？

本來中國現在的經濟危機原因很簡單，一言以蔽之曰游資作祟。游資如洪水，水可養人，水多了便要汎濫。統制經濟，管制物價的方策好比築堤防水，堤築得越多，水勢越急，防此失彼，防彼失此，有一處防禦稍疏，立即橫決，簡直可以說防不勝防，以堤防水，實在可以說是心勞日拙之舉。治水之法，不外標本兩項，治本在減少水源，治標在疏通河道。目前游資之多自然主要由於通貨膨脹，只要能縮減通貨，游資自可日少，這是治本之策，但在目前內戰擴大，軍費浩繁之際，治本已

成爲不可能，那麼只有治標。治標利在疏導，使游資之水得循正當的河道流行，才可不致汎濫，正當的河道卽是使游資走向正當生產運輸事業投資的方向，要引導游資走向這個方向，必須保障正當工商業的合法利潤，使鬼有所歸，始不爲厲。但是十年以來政府所採用的經濟統制政策，却是與這個方向正相反對，處處打擊正當生產者的利益，游資既不能走向正當途徑，只好橫決而爲投機，於是天下遂爲澤國。

像以上的理論，一定不會爲深中統制經濟之毒的當今朝野經濟學家所同意，所以也不再深論。不得已而思其次，統制就統制吧，但是要真正澈底統制，不要又成爲一篇具文，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要善保其威信。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中華時報社論

宋子文辭職後之政局

宋子文氏因財政經濟政策失敗，受立法院、參政會、和全國輿論的攻擊，拂袖而去，就宋氏個人的出處計，不失爲光明磊落之舉，政治家之出處依政策成敗而定，政策既不爲全國所諒解，引咎辭職，乃屬當然。吾人雖不同意於宋氏之政策，但於其負責到底之態度，以爲究不失爲西洋政治家之作風，較之漫無主張，惟以圓滑敷衍，投機取巧之官僚輩戀棧作風，迥然不同。

宋氏雖名爲行政院長，實際上祇能專理財政，對於一般政治，未遑顧及。實際上今日中國之財政，一舉一措無不與一般政治乃至軍事有關，財政經濟之無辦法，非財政本身之過，乃軍事政治之環境有以致之，在此情形之下，任何人處理財政經濟問題，亦決無善法。抗戰以來，負財政經濟之重任者，如孔祥熙、宋子文輩，均受盡輿論之指斥，平心而論，孔宋二氏在位時之措施，固多不滿人意之處，然根本

問題則在於戰爭狀態之迄未終止，軍事一日不停，即貨幣膨脹一日不能停止，赤字預算一日不能彌平，生產事業一日不能恢復，物價騰漲之勢一日無從遏止。循此以往，全國土崩魚爛之勢，祇有日甚一日，雖有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繼宋氏而起者，果有良策乎？此不待智者而決也。

夫一切關鍵繫於軍事問題，而軍事之不能停止，和平之不易恢復，又為已成之事實。最近政府封閉中共在各地之留守機構及報紙以後，更使和平形勢趨於無望。和平局勢之破壞，雙方均有責任，未可專責之於一方，今日政府所感受之財政經濟危機，中共方面亦未必無之，不過問題或比較簡單耳。總之此種內戰狀態之延長，受威脅者不止國民政府單方面，即延安政權亦何嘗無土崩魚爛之懼，特雙方負氣到底，無從得一緩衝之策耳。

政府在此情形之下，為轉移國內外觀聽計，乃不得不商及於在野之青年、民社兩黨，在兩黨參加四機構名單發表之後，又繼之以全面改組政府之敦促。政黨既以擔當國事為責任，則對於參加政府之態度，自須以出處能否有利於國家為斷。

苟其無補於國事，雖寵以高官厚爵不爲榮；苟其有利於國，雖艱鉅在前亦義所不能辭。故兩黨之出處，吾人以爲宜視能否對於當前國事商有解決之方案爲定，此朝野各黨所同應注意者也。

吾人以爲今日一切問題之中心，在於國家能否有一全權負責之責任內閣政府，卽此政府對於一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須有全盤籌劃不受任何掣肘之權，此政府祇對合法民意機關負責，而不對任何法律以外之機關或個人負責，政府有此權力，始能通盤籌劃，盡興革損益之能事。以財政而論，預算之外不許有不列預算之預算，而後預算始能舉預算之實，如其不然，則政府自政府，而政府之外別有若干太上之政府，人人皆得以其己意爲設施，在如此情形之下，任何人不能負責有所設施，則亦何貴有此政府哉！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四日中華時報社論

臺灣事件的處理

臺灣事變發生以來，已經有十天以上了，我們因為事實的真相尚未明瞭，不願意輕作判斷。但是就這十天以來的事態發展狀況看起來，變亂不但沒有停止，而且還有蔓延之勢，並且性質的演變也日趨極端，超過了原來的範圍，一方面有所謂「臺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者，向臺灣行政當局提出三十二條的要求，並有將成立「處理局」及「政務局」的傳說；一方面政府的軍隊也在換防，在事變正在發展的期間，不免更給予臺省人民以相當的刺激。古語說：「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臺灣事件看來似乎是地方局部的事件，但是如果處置稍有不當，前途的演變實在難以預料。臺灣重歸祖國的懷抱不過一年多，就發生這樣不幸的事件，為國家大局計，為臺灣人民計，都是至可悲痛的事情。

原這次事變之起，本來造端甚微，最初因為當地政府勵行專賣和經濟統制的政

策，不免賈怨於一部分倚此爲利的商民，及臺北暴動事起，又滲雜上地方的感情，這兩件事都是在意計之中。就陳儀長官本人講，廉明幹練，勇於負責，不失爲行政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不過出身軍人，過去受日本教育過深，不免過信統制，而忽略人民的情感，在這民主作風的時代，不甚適宜，特別是最不適宜於甫歸祖國懷抱，亟待以恩情相結的臺灣。其部下用人既多，自不能個個都能擔保其一定奉公守法，又況有些機關是由中央各機關直接派去的，也非陳長官一人之力所能監督到底，臺灣脫離祖國已有五十年，人民過去多受日本教育，雖然赤誠仰望祖國，畢竟風土語言與其他各省比較，不免有扞格之處。正如一個過繼於他姓的子女，一旦認祖宗，雖然衷心喜悅，究竟對於父母兄弟姊妹，不免猶有生疏之感。光復之後，大批內地人渡海東去，在語言風土彼此不同的環境中，相互接觸頻繁，偶爾隔閡是難免的，我們但看在抗戰期中有所謂「上江人」與「下江人」之區別，在勝利以後，有所謂「上海人」與「重慶人」之區別，以及最近湘鄂兩省的天祐垵之爭，可知地方意見的隔閡，利害的衝突，到處均有，不止臺灣爲然，也決不可以把這個問題看得

過分嚴重。人類情感是相通的，況且同屬炎黃胄裔，本來一家，何分彼此。你如果把對方看作是自己人，雖仇敵可化作朋友，如果預先存有歧視之見，雖同舟也能化爲胡越。我們記得歷史上唐德宗在河北三鎮叛亂之後，納了陸贄的忠諫，一紙罪己詔，六州感泣，立刻釋兵；又記得清末四川鐵路風潮初起之時，因趙爾豐等處置不當，引起事變，又以端方帶兵彈壓，更激起川人憤慨，惟有岑春煊一紙告蜀父老書「祇春煊與吾蜀父老兄弟別久矣」頭一句話，就有許多川人感激涕零，當時清廷如果早罷趙爾豐，不用端方，而專任岑春煊，則川亂可以立消，而武昌革命也未嘗無挽回之機。這兩件歷史上的事例，都是值得供我們今日處置臺事的參考的。至於少數野心家乘機擾亂，自所難免，但是大多數的臺灣同胞，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和國內各省的同胞一樣，是希望和平解決而決不會希望禍亂擴大，所反對者祇是政府的政策和人事，而決非有脫離祖國的企圖。政府如果不逼迫他們向極端方面走，野心家雖欲利用而不可得。如果不分青紅皂白，一味以兵力鎮壓，甚至擴大衝突，則正是爲野心家造機會。

前日蔣主席在國府紀念週宣布政府對於臺灣事件處理方針，承認可以取消長官公署，定期設立省政府，凡憲法所規定之地方政府應有之權限，儘可授予地方，並允於一定期限內，實施縣長民選，這些措施我們都認為頗為開明。至於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提的條件，可以容納的自不妨儘量容納，過分逾理的要求，如繳卸臺灣警備司令部武裝，及臺灣陸海軍皆由臺灣人充任之類，無異於使臺灣從祖國懷抱中分裂，形成割據的局面，自亦為任何政府不能接受。不過我們希望政府在處理此次事件時，務須切實注意，要嚴格分別大多數臺灣人民的正當要求，和少數野心家的別有用心的陰謀，對於前者，不妨盡量開放，盡量容納，對於後者則只有堅持一定限度，無法作有妨國家民族整個利益的讓步。同時也希望臺灣的真正人民領袖，應該大家挺身而出，一面督促政府接受尊重臺灣民衆的正當合理要求，一面也力求排除野心分子的乘機擾亂，使此次事件得有公平合理的解決，是國家之福，也是地方之福。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二日中華時報社論

杜魯門演說的劃時代性

美國杜魯門總統三月十二日在國會兩院特別聯席會議上發表的演辭，是戰後各強國負責當局第一篇公開而有爆炸性的挑戰演說，特別是在美國這樣具有強大力量而又素來傾向孤立主義的國家，杜魯門這篇演說，其劃時代的重要性不下於門羅宣言和羅斯福總統的大西洋憲章。我們看到這篇演說，彷彿又置身於第二次大戰前夕反法西斯納粹的氛圍中了。

當然，這次演說恰好在莫斯科四國外長會議的召開之初提出來，本意還是神經戰的成分為多。對於唯力主義的獨裁極權之徒，說理的態度是不能使之讓步的，只有以力對力，以決心對決心，庶幾可使之稍知警懼，不敢冒然破壞和平，不但對於國際和平有益無損，即對於侵略的唯力主義者本身也不失為一種君子愛人以德之道。第一次大戰後，美國如不採取孤立態度，退出國際漩渦，英法如不執行張伯

倫、達拉第輩的綏靖政策，則法西斯納粹的瘋狂侵略不至漫無止境，世界人類固不至遭此浩劫，希特勒、墨索里尼之徒也還可以保其首領以歿，不至死無葬身之地。現在軸心國家的法西斯勢力雖已粉碎，但法西斯主義所從以自出的原本尚在，全世界的第五縱隊還在橫行，希臘、土耳其、乃至中國，都是這種老牌法西斯的第五縱隊活動下的犧牲者。中國人民爲什麼戰後還不能得到和平？爲什麼交通還不能恢復？爲什麼財政經濟還不能入於正常軌道？全國人民爲什麼還在受通貨膨脹的苦難？老百姓爲什麼一大批一大批拉到前線去當炮灰？大戰中間四強的地位爲什麼到戰後一落千丈？國民政府官吏的無能無操守固然是一個原因，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在國內存在着一大批甘心爲他國侵略者做工具的第五縱隊，他們執行其遙遠的祖國所賦予的任務，千方百計阻撓中國的和平統一，使中國永遠不能成爲強盛國家，然後他們的祖國才可以無東顧之憂。只要對於他們一向執持的基本哲學和多年歷史熟悉的人，決不至於妄想和這種勢力還有妥協的可能。英美民族因爲一向崇尚自由，愛好和平之故，曾經不惜向希特勒低頭，但是結果是如何？祇有予打擊者以打擊，才能

使和平能夠多延幾年。杜魯門的演說，就是站在這個認識上，這是這個偉大民主國在經受了幾次嚴重的教訓後所發生的覺悟。

有人說，杜魯門總統現在的政策似乎是和故羅斯福總統的政策正走着相反的方
向，其實不然。羅斯福如果至今尚在，他一定要採取杜魯門同樣的路線，反之，杜
魯門在戰時，也曾經同意於羅斯福的政策。因爲在那時民主自由的最危險的敵人是
軸心法西斯國家，不能不放鬆其他的國家來專心一致對付當前的敵人，現在，軸心
已倒，民主自由的障礙者是另外一批人了，目標的移轉是當然的，並且是合乎邏輯
的。

我們相信以杜魯門總統演辭的坦白，再加上馬歇爾國務卿的態度嚴正，必可使
老獪的侵略者知難而却步，侵略的威風可以稍戢，世界和平可以多延長幾年。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中華時報社論

汎亞洲會議的瞻望

汎亞洲會議在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先生的主持之下，已於本月二十三日在新德里開幕了。印度國大黨奮鬥了二十餘年，甫經取得政權，對於一切政務的處理應該已經日不暇給，偏偏還要於百忙之中，來召集這次的汎亞洲會議，照現實過度的中國人腦筋看來，未免太迂闊了，然而印度民族之所以偉大者正在此處，國大黨的前途也正在此處。

政治運動本是針對現實的一種運動，政治之不能離開現實，正如魚之不能離開水一樣，沒有人主張政治可以不顧現實，但是技術上儘管可以現實，而一種運動如何推動得起來，則絕非一味現實所能解決，必須其背後有一種生氣勃勃的力量在推動着，在不斷地推動着，這就是理想之光。一種政治運動如果把生氣勃勃的理想之光，認為無足重輕，甚或自毀其歷史，認過去的理想為幼稚，而矜目前的現實為進

步，勢必墜入魔道，愈陷愈深，集團的政治生命與個人的政治生命同趨斷絕，所謂現實的取得乃變成了短視的自殺政策，所得者甚小，所失者甚大，所謂現實通盤合算起來乃是最不現實的。

我們看印度國大黨人之所以最可佩服之處，就在始終不放棄理想主義的作風這一點上。印度國大黨奮鬥二十餘年，到今天還不得不在英國總督監臨之下，來組織臨時政府，這是遷就現實的地方，不得不然，可以獲諒。但如此遷就地獲得了部分政權之後，却並不曾放棄了原來的理想。第一，依舊反對英國人，要求印度的完全獨立，結果果然獲得英人的允許；第二，就是召集汎亞洲會議，表示印度將爲全亞洲的團結而努力。這兩大方針，顯示印度國大黨人在取得政權之後，依然不曾放棄過去理想主義的光芒，依然沒有爲現實的環境所征服，所同化。就從這一點上，我們看出了印度國大黨在未來政治史上是有前途的。

今天的世界已經不是孤立主義所能應付的世界了，一個國家的獨立復興，不能不和其周圍的鄰國有密切的命運聯繫。印度的解放，與全亞洲的解放有密切的關

係，全亞洲不能獲得解放，印度也無從真正獨立安樂。今天的亞洲，橫互着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第一是歐洲舊資本主義與殖民地民族的衝突；第二是亞洲各國家與國家間、民族與民族間的利害感情的衝突；第三是亞洲特有的宗教的衝突，如印回、阿猶間的爭執；第四是共產主義者所主張的階級鬭爭及其與蘇聯膨脹政策的聯繫；第五是戰敗國如日本者的處置問題；第六是各國內部的政治糾紛；第七是亞洲各民族共同感覺的工業落後，和現代資本主義最大國家的經濟狂瀾的威脅；第八是亞洲舊日光榮的文化傳統的動搖，和歐洲新思潮漫無抉擇的侵襲；第九是如何與汎濫全亞洲的普遍的愚昧，普遍的貧窮作戰的問題。要安定世界，必須安定亞洲，要安定亞洲，上舉這九個問題便必須一一予以解決，固然我們不能期之於這一次時間短促的汎亞洲會議，但希望能從這一次會議中，找出一點解決問題的端緒來。

中國，印度，與全亞洲的問題是不可分的，我們希望汎亞洲會議的成功，同時也希望中國自身的政治糾紛能夠早日解決，不要成爲問題的對象。

同時更希望理想之光在現實過度的中國民族中能夠像在印度一樣，從新燃燒起

來，中國不敢希望能夠產生甘地那樣的聖人，能夠有尼赫魯也就是萬幸了。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中華時報社論

人民至上，救命第一！

民主的定義是什麼？就是人民至上，一切權力出於人民，一切設施爲了人民，一切享受普及於人民。在國大討論憲法第一條國體的時候，爲了增加「民有，民治，民享」六個字，曾費了若干的爭執，在野黨派爲什麼要堅持增加這六個字？因爲有了這六個字，才能夠充分表示出民主憲法的精神來。

但是單靠在憲法上寫下幾個白紙黑字是不夠的，必須在事實上真正做到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國家的基礎才能穩固。

近來高喊人民利益的莫過於中國共產黨，有些討厭共產黨的人甚至連人民兩字也不願意用，其實這是錯誤的。共產黨之失敗，不在於高喊人民利益，而在於並沒有切實尊重人民利益。首先的錯誤是依照他們錯誤的階級理論，先把人民橫剖爲兩段，一種是被尊重的人民，即所謂無產階級；一種是被打倒的人民，即所謂無產階

級以外的一切人，於是，人民之中有智識，有才幹，有號召力量的一部分人先被打倒。其次，即在所要尊重的一部分人民身上，共產黨也並不曾保障了他們的利益，共產黨的壯丁是抽自這一般人中間，共產黨的錢糧也是取之於這一部分人中間，這一部分人民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同樣地感受壓迫，威脅，和恐怖，人民並不會把共產黨看成是自家人，這是目前共黨軍事所以慘敗的唯一主要原因。如果延安的人民都能為共產黨効死勿去，無論如何，五天決不會陷落。

那麼進攻共產黨的國軍是不是代表人民呢？國民政府是不是已經真正尊重了人民的利益呢？我們希望他如此，事實上却不能給我們以一個有力的證明，無寧倒是反證為多。人民對於現政治的不滿是普遍反應在全國各階層上，物價的壓迫，貪污的橫行，攤派的苛重，壯丁的徵發，秘密警察的淫威，所有這一切都是人民所疾首蹙額而不敢言的，只有在報紙上，各種民意機關的集會上，乃至國民黨自身的集會上，才略略透露出一點人民微弱的呼聲來，因為參加這些集會分子，包含國民黨員在內，本身也多來自田間，對於人民的疾苦有時也能多少反應出來。

國民黨定都南京二十年來，我們所最感遺憾的，乃是差不多把大部分精力、時間、眼光都用在爭取軍事的力量和爭取少數熱中政治者的擁護，而忽略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其他大多數人民。在近代中國統治者腦裏，包含北洋系、國民黨、共產黨一齊在內，似乎都以爲只要有了軍人、政客、黨人、這三種人擁護，這江山便可以坐得穩，對於其他大多數的人民，包含農、工、商、教、公務人員、及自由職業者六種人的死活存亡却可以置之不理，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認識。中國國事之所以始終沒有安定，便由於一切統治者的這種錯誤認識所致。

眼前的現象，證明了大多數人民，無論都市或農村，都已經瀕於全部崩潰之境。在都市，或許有假繁榮的市容遮掩着，粗心的人或許一時看不出危機的嚴重，只要你肯走到鄉村去看一眼，便立刻可以發現土地荒廢，地價低落，人口凋零，經濟枯窘，疾疫流行，風俗敗壞，盜匪橫行，良民無法立足的種種慘象，而這一切也就是指示了以農立國數千年的中國農村已整個破產，也就是說明了中國立國的基礎已經動搖，這是何等危險的事實！負責任的政府如果還看不見這種事實的嚴重，其後

果是不堪設想的。

如何補救這種局面，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這是今後政府的第一件緊要工作。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中華時報社論

恢復農村的經濟力

中國的復興應該從什麼地方入手呢？我們想來想去，只有安定農民生活，恢復農村的經濟力，才是第一件最要緊的事。

中國號稱以農立國，在過去，每逢大亂之後，只要有幾年的休養生息，農村的秩序便可以逐漸恢復，農村一恢復，全國的經濟便逐漸入於平衡狀態，社會逐漸安定，政治才有了向上的軌道可尋，而人民也才可以欣欣望治。

現在是工業的時代，當然不能像過去閉關時代一樣，單靠農村繁榮便可以解決了整個社會的問題，但中國既是落後的工業國，要從工業建設方面來迎頭趕上各先進國家的經濟水準，決非十年二十年之內所能作到，而且也非單靠自身此刻的力量所能解決。農業經濟的恢復乃至建設，雖不能解決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問題，但至少可以解決一部分問題，而且也是比較可以靠自力所能辦得到的，與其天天矚望一時

尙不能實現的五年十年計畫，不如檢可能辦到的先辦一兩件，特別是恢復農村的經濟力。

我們住在上海的人不容易知道中國農村現在已經凋敝到什麼樣子。在上海，人祇看到大綱大綱的鈔票在滾來滾去，萬萬日億已經是個很平常的數字，但在農村裏，爲了幾萬塊錢可以逼死一條人命，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都市的花雖然開得很美，但農村的土壤已經乾枯到了十二分的境地，藏在土壤中的水分一旦枯竭，這好花也開不了多時的，何況花也並不好。

中國農村的枯竭自然有兩個重大的原因，第一個是外來的經濟侵略，使農民口袋中的錢流向都市，而都市住民荷包中的錢又流向外洋，這是鴉片戰爭以來的主要趨勢。第二個是長期戰亂的結果，從辛亥革命起（辛亥以前的洪楊等役姑且不算），一直打了二十五年的內戰，又打了八年的外戰，外戰才停，內戰又起，民國三十六年中，沒有大規模內戰的年頭數來數去也不過兩三年，長期戰亂的壓迫，使農村走上整個毀滅之途，人力物力都瀕於消耗殆盡，才造成今日可悲的形勢。

關於第一個問題，自然積極的只有扶助幼稚的工商業，從事於積極的生產建設之途，消極的也只有實行保護關稅政策，杜絕外來的經濟侵略的洪水。但這兩件事都非目前環境所能做到，中國沒有大規模的資力來從事大規模的生產建設，結果不能不仰仗外力，而仰仗外力的結果，經濟先已不能自主，不由得就走上飲鴆止渴之途。如果運用得十分巧妙，毒藥也能治病，何況經濟落後如中國者，尚不到與資本雄厚的國家分庭抗禮的境地，國際上的經濟分功，原非不可能，但是縱使如何巧妙，也非一朝一夕所能辦到，而無論何種工業建設，資力技術縱然須仰仗他人，原料和勞力總須出自本國，而且也非取諸農村不可。農村經濟力不恢復，工業建設無從做起，所以工業建設不成功，雖是造成農村破產的原因，但促進都市的工業建設，仍非先從恢復農村的經濟力着手不可，世界上的事原是循環的。

至於第二個原因，自然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內戰不停止，農村和都市經濟都無從恢復，更談不到建設，這自然也是一個死症。但是一般呼籲停止內戰的人雖然天天苦口婆心，在祝禱內戰告終，但內戰始終不曾告終，這是爲了什麼緣故？爲什

麼不仔細推敲推敲？爲什麼今天世界上發生內戰的國家並不止中國一國？爲什麼像朝鮮那樣自身毫無武力的國家也要發生南北朝？爲什麼像土耳其那樣兢兢業業閉關自守的國家，雖無內戰，也不得不動員百萬以上的兵力以備禦國境？如果把這些事實分析清楚，就可以知道中國的內戰不過是國際動盪局勢下的一種反映，除非國際情勢有了大轉變，中國的內戰不是單靠苦口婆心的呼籲所能停止的。今天的世界正是在合縱連橫的戰國中期時代，一切弱小國家眼前只有兩條路，合縱以拒秦，抑連橫以事秦，沒有第三條路。中國如果還想保持一個獨立國的地位，就只有加入合縱拒秦陣線之一途，因爲這個現代的秦，已經深入於各國內部，造成了一種分化國家的力量，在可能的情形下發動內戰乃是這般秦人豢養下的黨徒天賦的使命，在這種情形下，雖欲事秦以圖生存也不可能，除非自身有力以抵抗這種外力所造成的內亂，內戰永不會停止，直到舉國投降，淪爲秦之附庸而後止。在這種情勢下，我們不能希望由停止內戰來解決中國農村經濟的問題。

但是中國農村經濟必須趕快恢復，不能等到國際情勢好轉。如何可以渡此難

關，是我們目前所應慎重考慮的。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中華時報社論

恢復農村的經濟力

八三五

附錄一

歐戰縱橫談

歷史的重演

歷史是重演的嗎？這是歷史哲學上一個尙待討論的問題，但我以爲至少在相同的環境條件之下，歷史是可以相似的姿態重複出現的。譬如法國和德國，因爲一千一百年前的凡爾登條約（八四三）偶然把查理曼帝國分作日耳曼、法蘭西、意大利三個國家，以致引起一千年來萊因河兩岸這兩大民族的永久相斫，而且這兩大民族相斫的戰場，老早是在荷蘭、比利時這兩塊地方。第二次歐戰中的日耳曼人依然抄着威廉第二失敗的老套，大膽蹂躪比利時的中立，以疾風掃葉之勢攻入了法國北境。魏剛將軍是否霞飛將軍？馬崙河之役是否重演於今日？雖尙在不可知之際，但

就目前而論，盟軍與德軍所處的地位，依然還是二十六年前兩軍所處的地位，不過把威廉換做了希特勒，又加了一幕動人的空軍表演罷了，這不是重演是什麼？

希特勒與拿破崙

從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大革命以來，歷史家早就預言拿破崙將要出現，因為根據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的往例，在猛烈的變動之後，往往要產生一個強有力的獨裁侵略者。俄國革命與法國革命的類似處都是很顯然的，譬如兩者在革命之前都碰到一個暗弱的皇帝和穢亂的宮闈；兩者在暴風雨之前都產生一大批的反抗思想家；用銳利的筆尖去攻擊統治勢力的罪惡；兩者在革命初期都有一個溫和派的得勢時代，但不久便為極端派所戰勝；兩者在革命的過程中都會使用無情的恐怖手段去彈壓反動，並且利用愛國的意識擊退了援助反動勢力的外國軍隊；兩者在革命成功之後，都會引起黨內的分化，托洛斯基步武但頓，斯達林便老實取得了羅拔士比的地位，現代羅拔士比比從前的羅拔士比是運命長些，因為他比那一位實際得多些，但其取

得權力的經過都頗爲類似。不過，這裏却發生一個例外，就是拿破崙還沒有出現。否，他早已出現了，不過不在那僻遠的俄羅斯，而却出現在四戰之地的德國。是的，拿破崙不應該出現在這樣一個四戰之地的國家嗎？如果拿破崙出現在僻遠的俄羅斯，他縱然有渾身解數，也施展不出來，只有這樣地處中原的國家，法蘭西也好，德意志也好，才會產生拿破崙這一類的典型人物，並且供他以用武之地。

希、拿的類似點

希特勒自然不是一個天才的將領，如拿破崙一樣，但他是一個天才的外交家，他在外交上的成就比得上拿破崙在武力上的成就。拿破崙是意大利人却來統治法國，希特勒是奧地利人却做了德國的元首。兩人都是同樣大膽，富於野心，征服慾極強，有統御之才，果敢有決斷，這都是一般紳士階級的布爾喬亞所缺乏的；兩者都是乘革命的新興勢力而起，獲得全民族的擁護；兩者都有膽量去無情地打擊左右兩方的敵人；兩者都有建造一個大陸帝國的志願，並且膽敢使之見諸實行；兩者都躁

急而無忍耐力，自私自利，爲目的不擇手段；兩者都以英國爲主要敵人，竟敢夢想跨海西征；兩者都曾經過短期間的聯俄政策。一八〇七年拿破崙和俄皇亞歷山大相會於默麥爾中流的木筏上，雙方訂了一個休戰條約，把全世界劃成兩半，實行分贓；希特勒雖然沒有和斯達林面對面喝過香檳酒，但經過里賓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之手，德俄兩國也訂了一個暫時的和平條約，並且在波蘭實行平分春色。拿破崙的最後失敗，在得罪了俄國；希特勒如果也有這一天，那也必然是失敗在斯拉夫民族這一把鈍鈍的刀口上。

雅典精神與斯巴達精神

西洋歷史上還有一個顯著的例子，大可以拿來和目前的歐戰形勢作比。我們知道目前德國與英、法等民主國家的對壘，還不僅是一個政治軍事上的問題，其背後還有更深沉的思想文化上的衝突，即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的衝突。這兩種思想的衝突其實並不始於現代，遠在二千多年以前，希臘半島上就存在着雅典精神對斯

巴達精神的鬭爭，當時的希臘在波斯戰爭之後，正處於繁榮的黃金時代，而以民主的雅典爲其領袖。當時的雅典勢力遍於海上，財富甲於全希，很有點類似現在的大英帝國。至於那尙武集權的斯巴達民族，則顯然是今日納粹日耳曼人的雛形。紀元前四三一年雅典人和斯巴達人開始了長期的比羅奔尼蘇戰爭，這場衝突一直蔓延到二十七年之後，結果雅典勢力完全崩潰，於紀元前四〇四年向斯巴達投降，接受最苛辱的條件，如毀去城牆和砲壘，放棄海外領地，戰艦不得超過十二艘，加入斯巴達的聯盟等等，於是斯巴達的勢力佈滿全希臘，各城邦都有他的戍軍，對於各城邦都強迫其改行斯巴達式的寡頭政治，以三十個貴族統治雅典，盡量屠殺平民黨的人物，結果雅典固然衰頹，斯巴達也因戰勝而流於腐化，喪失了原來的尙武精神，最後整個希臘爲北方新興的蠻族馬其頓人所征服。現代歐洲人的極盛時代是在十九世紀，從第一次歐戰起，我們可以認爲歐洲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而踏入了一個大規模的比羅奔尼蘇戰爭時代，這次歐戰不過是上次歐戰的延長，凡歷史上規模大的戰爭皆是時斷時續的，並不是一次就能解決。這次歐戰如果德國人真能戰勝英法，則

戰後的歐洲自然也會像戰後的希臘一樣，佈滿了斯巴達式的寡頭統治，其結果促成整個西歐文明的崩潰。如果歷史真是依樣重演的話，也許北方還要興起一個馬其頓帝國，而遙遠的西方更有羅馬帝國等在後面。

羅馬與迦太基

西方歷史上還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可以比擬此次戰爭的，那就是羅馬與迦太基的戰爭。迦太基之敗於羅馬，正如雅典之敗於斯巴達一樣，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海上帝國敵不過大陸帝國的兩個最顯明的例。迦太基人因為偏重於海外貿易的緣故，所以在地中海四週都有她的殖民地，勢力過於分散，對於本國的保衛反形薄弱；又因為過於重視財富的緣故，養成了苟安和平的民族性，而政權操於少數目光短淺的富人，惟知一味惜費，而不知大禍已迫在眉睫。這種情形正和今日的大英帝國相似，而美國所謂孤立派更與迦太基亡國前之富豪同樣近視。大抵陸上的國家雖然貧乏，但其力集中，故易於獨立；海上的國家，雖財富遠過於陸國，但其力分散，故

恒爲陸國所敗。歷史上所有建設世界帝國的民族，如古代的埃及人、亞述人、波斯人、馬其頓人、羅馬人、以及中古以後的匈奴人、突厥人、阿剌伯人、蒙古人，乃至我們中國的漢唐，都是以大陸爲根據地而建設一個大帝國的。至於歷史上所謂海洋民族，如克里特人、腓尼基人、雅典人、迦太基人、威尼斯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之類，縱使一時憑藉海上的威權，甚爲炫赫，結果終難免受制於大陸民族。近年一般人目覩各帝國主義者海權的鼎盛，多以爲勢力中心已由陸地移於海上，實際是一種錯誤的觀察。蓋海洋國家無論領土如何擴張，並不能使本國民族隨之增大爲一大民族。因其殖民地距離母國過遠，易於分化故也。反之，陸上國家，其領土擴張一步，即民族隨之也擴大一步，始終爲一完整的體制。所以陸上國家可由小民族擴張爲大民族，而海洋國家則不易。近代大英帝國的所以能維持霸權，不過靠着她善於運用大陸均勢的外交政策，方幸免於難。如果一旦歐洲大陸統一於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則大英帝國的末運就到了，特別是在今日空軍逐漸代替了海軍地位的時代。

歐洲的小國

今天英、法的作戰理由是為了保障各中立小國的獨立，這些小國是否有值得獨立的價值，似乎還是一個問題。第一次歐戰後書生總統威爾遜憑藉書本上的理想，相信民族自決的原則是正確的，結果硬替歐洲製造出許多小國，平添了無數的麻煩。其實民族自決的原則根本就不過是一種好聽的口號而已，世界上除了幾個顯著的已經完整的大民族以外，其餘所謂弱小民族根本就難得劃清他們的界線；譬如今日的巴爾幹如果合併成一個大國家，則在居民的政治、經濟、文化上豈不蒙益較多？又如今天的德國和義大利，如果還像十九世紀以前一樣是一個小國林立的地域，則政治上的衝突糾紛恐怕比今天還要多些，像丹麥、挪威、芬蘭、荷蘭、比利時幾個小國，固然在文化經濟上水準較高，比巴爾幹諸國較有存在的價值，但是如果能把斯干狄納維亞合成一個國家，荷蘭比利時合成一個國家，或把荷、比、瑞士三國中的德語民族、法語民族、及小部分的義語民族，令其分別合併於德、法、義

三大國之內，豈不更合理些。可見民族自決的原則並不見得就真正合理並且對人類前途有利益。今後的世界已由小國時代進步到大國時代，沒有一萬萬以上人口的民族，根本就無獨立建國的力量。

比王的投降

比王立歐泊爾德三世最近忽下令比軍停戰，此舉對於盟軍的影響自極重大。按立歐泊爾德三世素主親德，一九三六年十月曾以國王名義發表宣言，謂比利時行將放棄其對法聯盟而恢復戰前的中立狀態，當時英法政界爲之震動，至一九三七年四月，英法兩國聯合發表宣言，承認比國可以不受洛加諾條約的拘束，同時又再度聲明，英法願確保比利時的安全，可見比王及其左右一部分人不願再捲入大戰漩渦，替英法犧牲，早有意採取中立態度，不自今日始。目前比國內閣及僑法的民衆雖然反對，但軍隊武裝既已解除，恐再行組閣已不容易。按第一次歐戰中，國王與內閣對戰爭左右袒主張不同者，以希臘爲最顯著。英法兩國扶助希臘的大政治家委內瑞

洛斯起兵逼走親德的希王君士坦丁，始轉變希臘的態度。此次比利時國王與內閣的衝突，也與希臘的情形差不多，平心而論，比王此舉雖於國家榮譽有損，且後患甚多，但比利時以小國處於兩大之間，每遇戰事，祇有犧牲而無代價，上次歐戰，比國出九牛二虎之力為法國抵擋一陣，結果戰後所得甚微。反正戰局勝敗繫於雙方主力如何，小國總是聽候人家解決，比王和內閣的各走極端，也許是一種變相的雙簧吧。

法國的安全

法國在第一次歐戰時，受盡了德國的蹂躪，戰後他們喊出一個口號叫做「安全」，戰後二十年來法國的政策，無往而不是求安全。因為想求得一個安全的保障，才於戰後組織小協約國的集團，締結法蘇互助協定，建築馬奇諾防線，集中黃金，在外交上緊緊拉住了英國，所有這一切，其目的不過在求本身的安全。

法國人這種想法，正如同三家村的田舍翁一樣，有了十石穀，便萬事皆足，此

外再無所求。所以最好是牢牢關緊了大門，死抱着金甕銀甕，做一個縮頭的烏龜，因此想盡方法，把法國在那國際的駭風巨浪之中，建設成一個與世隔絕的孤立國。

法國人這種想法，正美國孤立派的想法，也是漢光武閉玉門關，宋太祖玉斧劃大渡河爲界的想法，也是一切小布爾喬亞的想法。但是天下事不進則退，在承平一統時代，這種保守心理尙不能長治久安，何況在這樣國際動態息息相關的時代？所以十餘年來，小協約集團瓦解，法蘇互助協定失效，馬奇諾防線竟限不住敵人的戎馬，只有自己的陸空軍實力才是最可靠的。法國人到了現在想來已經覺悟了吧。

法國的危機

法國自第三共和成立以後，政治社會漸入於安定而平庸的時代，以前那些光華發越的時代，如路易十四時代、大革命時代、拿破崙時代，早已過去了，絢爛之極歸於平淡，七十年來，法國的政治家中僅樸蔭開雷、克里門梭二人稍具雄才大略，其餘盡屬平庸之徒。法國人因過去受英雄之害甚多，故共和以後，力反舊轍，務以

阻抑英雄，獎勵平凡爲務。其政黨採取小黨林立方式，即使任何人才，不能實行其抱負。政治家中如稍大膽的加約，竟遭排擠，甚至禁錮數年。自十九世紀布郎熱將軍的獨裁陰謀失敗以後，對於稍著聲望的軍人猜忌尤甚。魏剛將軍因篤信天主教關係，爲左派所猜忌，排擠去職；貝當上將因擁護共和主義，又被右派目爲左傾。此次雷諾政府起用魏剛爲總司令，但同時又用貝當爲國防副總理，仍含有互相牽制之意。今天法國的國命繫於魏剛之手，按魏剛本非法國人，生於比利時，謠傳爲比前王立歐泊爾德二世之私生子，其考入法國的聖西爾陸軍學校，係屬冒名，左派人深恐其與保守黨及天主教徒關係過深，致爲右派所利用，有動搖共和政體的危險。其實法國共和已七十年，人民習慣已久，雖保皇黨仍在活動，實際已無能爲力。法國今日的危機在於領袖人才的缺乏，官僚政治的腐敗，如一九三三年的斯達維斯基行賄自殺案，致引起二月六日的大慘變，法西斯主義的火十字團及保皇黨人與左派的社會黨、共產黨人公開械鬥，幾危及政府。今後倘戰事失敗，法西斯主義自必抬頭，火十字團的領袖洛克中校和因斯達維斯基賄案去職而與發動二六事變有關的前

任巴黎警察總監姬亞伯也許都要乘機活動，但希特勒也許夾袋中尚放有更親德的法西斯領袖，這些傢伙還不配做傀儡吧？

民族的春夏秋冬

民族和個人一樣，也是一個有機體，所以也有從少壯到衰老的有機過程。用中國的文學批評名詞說起來，便叫做初盛中晚；用佛學的名詞說起來，便叫做生住異滅；用自然界作比喻，便好比一年之有春夏秋冬四季。民族在青春時代，必有許多蓬勃發越的氣象，其人才多半是狂者進取一派，到秋冬時代，便趨於收斂，從前的氣象便看不到了。法國民族的春夏時代早已過去，現在已入深秋，暮氣日深，其人口逐漸減少，比之今日德國相差竟至一倒，無論此次戰爭勝敗如何，其民族的前途總是很黯淡的。日耳曼民族，目前正在極盛時代，普魯士諸雄主時代好比春天，自普法戰後便入於夏季。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春天是在宗教改革時代，從依利薩伯女王以後便入於夏季，這時代出了許多海賊式的狂者，替英國掙得一個海上帝國；

十九世紀是秋收的時代，維多利亞的繁榮正是食從前的收穫；二十世紀以後，開始有點秋末冬初的景象了。英國思想家約翰彌爾在十九世紀中葉便慨歎於英國思想狂人之絕跡，這便是民族精力衰頹的徵兆。但條頓民族比拉丁民族究竟少壯，所以在十九世紀英國政治社會上尚有許多卓越的領袖，如巴麥斯頓、狄斯累利、哥布頓、格蘭斯頓之流，到二十世紀以後，這些有魄力的領袖漸漸減少，第一次大戰時的阿斯葵斯和近年來的馬丹諾、鮑爾溫、張伯倫之流，乃至於工黨的領袖阿特里，都未免平凡一點，只得讓有點浮誇的邱吉爾矮子裏頭選將軍了。日耳曼民族還會有希特勒式的狂人，這便證明日耳曼人還在夏季。

德義強弱與民族的本質問題

自德軍截斷英法海峽，發動第二步作戰計劃，企圖直撲巴黎後，這幾天來舉世所注目的，是義大利的態度。墨索里尼本是希特勒的前輩，但近年以來，自希氏登臺後，德國的表演着着驚人，義大利反有相形見拙之勢，這不是墨氏本人的才力

不如希氏，也不是單純國力的問題，實在是一個民族本質的問題。以墨索里尼本人論，無論在任何方面說，都比希特勒高出不知若干倍，實爲列寧以次兼具革命性和常識的唯一人物。以義大利的國力說，固然先天不足，但比之凡爾賽條約宰割下的德國，軍備全無，財政紊亂者，究屬較勝一籌，何以希特勒登臺不過七年，就能雄飛世界，而墨氏執政已在二十年以上，尙不能一躍而列於富強國家之林呢？可見這不但不是個人才力強弱的問題，並且也不是原來國力憑藉強弱的問題了。大抵民族本爲一有機體，有生老病死等有機現象，拉丁民族的極盛時代早已過去，今日已入於衰老之境，雖有一二英雄偉人，無能爲力，於此可見支配歷史的原動力並非個人的，亦非任何偶然的事象，其根柢實在於整個的民族有機機構問題。昔梁任公先生著義大利建國三傑傳，謂加富爾早死，不如俾斯麥老壽，所以德能如此，而義僅如彼，證之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執政時期的久暫，覺任公此論，殊未必然。

近代歐洲各民族的興衰

以民族爲決定歷史主要因素之說，可分兩派：一派即納粹德國的學者所主張的，認民族本質爲一成不變，優者恒優，劣者恒劣，其原因由於各民族血統自始即有高下之分，故其自視日耳曼人爲天生之優秀者，有統治全世界的資格，創爲長頭圓頭之說，在十九世紀卽有少數種族學派的學者如張伯倫等主張此說，納粹黨人本此理論，更加發揮。此說之爲謬論，不必多所批評，卽以日耳曼民族本身的史迹證之，如果日耳曼民族自始就是天生優秀的所謂北歐諾的克長頭民族，何以在紀元十世紀以前尙爲一蠢如鹿豕的蠻人？又何以在紀元十六、七世紀時西班牙、法蘭西、瑞典、英吉利各民族已相繼勃興，而日耳曼諸邦尙在微弱被宰割的狀態？卽此可見日耳曼民族亦和其他民族一般，有盛有衰，並非永久優秀的了。其另一派卽社會有機體派的說法，認民族爲一有機體，和生物一樣有生老病死的有機現象，有幼年，有成年，亦有衰老。每一民族都必須經過此種有機過程，成熟越早者，衰老也越早。以歐洲近代各民族而論，義大利民族先興，在十四、五世紀已有佛羅倫斯、威尼斯等共和國，執近東海運的牛耳，文藝復興爲其極盛時代，過此則漸衰；次爲西

西班牙民族，興於十五、六世紀，衰於十七世紀；次爲荷蘭民族，興於十六、七世紀，十七世紀末卽衰；次爲英吉利民族，興於十七世紀，十九世紀爲極盛時代，今始漸衰；次爲日耳曼民族，十八世紀初始有普魯士之建國，以後逐漸興盛，至今日爲極盛；又次爲斯拉夫民族，興於十八世紀，至今尙未達於極盛，其前途未可限量。以此論之，義大利民族早已衰老，雖有墨索里尼亦不能望其有多大成就，反之，德國縱無希特勒，其復興之機也是不可遏止的。

民族的攝生與自戕

上節所論民族興衰情形，係就一般現象而言。民族既如生物，則彼此之間自也有個性的差別，其生長率不必完全一致，如小民族其興也速，其衰也必速，荷蘭、瑞典、葡萄牙之類皆屬此例。龐大的民族，則其生長過程甚爲緩慢，其興盛的時間較長，衰老現象也是慢慢發現的，如中國、印度、俄羅斯皆屬此例。俄國與德國雖同開化於十八世紀初年，普魯士的稱王和俄皇大彼得的變法，實在同時，但德國已

達極盛，而俄國至今尙未完全開化，即因民族的大小不同而異。又民族也和個人一樣，有善於攝生者，有不善於攝生者。善於攝生的民族，雖不能避免最後的衰老，但能比較延長其壽命。不善攝生的民族，在其少壯時期，盡量縱慾，自行戕賊，則雖秉賦較厚，也難免中道夭亡或提前衰老。現代最善養生的莫過於英吉利民族，其對內對外皆持中道，在內政上盡量容許自由，使人才得以發舒，而同時又有一穩固的統治階級，不易推倒。代表英國統治階級的是保守黨，保守黨是最善於吸收人才的，凡有在野的新起人才，必千方百計拉入該黨，其次則寵以貴族爵位，列入上流社會，如仍有強項不屈者，則尊重其反對黨的地位，遇有機會即拉攏合作，故英國雖爲貴族統治，但其貴族階級隨時參加平民中的新分子，一時不至於老朽。統治階級以外的人才，在不得志時雖常常反對政府，但一經統治者紆尊降貴，與之妥協，即亦心平氣和。如工黨的前領袖麥唐納和現在的領袖阿特里之流，皆被統治階級施以種種籠絡手腕，失却反抗到底的勇氣，而參加所謂舉國一致的內閣。其對於殖民地也用此種手腕，凡反抗最力的即予以自治的權力，如愛爾蘭及其他各自治領；其

次則拉攏其領袖人才，又其次則尊重其固有習慣，不加干涉。

以英國統治印度的情形爲例，首先在印度創設了一個完美的文官制度，使有志上進的印度人才在英國統治之下能夠有上進的希望。其次則對於甘地、尼赫魯等國民大會的反抗分子，相當地予以讓步，承認各省自治，使反對黨因得了政權而放棄反英的態度。英國人此種政策，在印度雖尙未收效，但在其他各處則已着着收效，如南非聯邦的荷蘭人在二十世紀初年曾對英發動獨立戰爭至兩年之久始失敗，但自取得自治權以後，反變而親英。波亞戰爭中的領袖斯末資將軍，在第一次歐戰中及戰後，反成爲擁護英國最力的人物。又如埃及的國民黨人，在未獨立之前，反英最力，但現在則完全幫助英國。即最強項的愛爾蘭自由邦領袖凡勒拉，自執政以後，也不汲汲於要求完全的獨立，反而對激烈的共和黨人，加以壓迫，可見英國政策的成功。至對於國際問題，英國也處處採取持盈保泰態度，非萬不得已不訴之於激烈手段。凡此種種，都是英國民族善於攝生的證明。由此觀之，英國的命運尙不至一時就趨失敗，不過其日漸走向老境則爲無可避免的事實。現代國民之中，最不善於

養生者莫過於西班牙人，西班牙在十五、六世紀盛極一時，殖民地遍於東西兩洋，但因其好大喜功，窮奢極欲，內外交戕，不轉瞬而降爲三等國家。其次，德國人和日本人也是最不善於養生的。日本之興不過七十年，近十年來，因其軍閥浪費國力，一味戕賊，致陷入對我戰爭的自殺境地，此次戰後，日本必衰無疑。德國的國力，經威廉第二和希特勒的一再浪費，即使戰勝，也損失浩大，短期間不能恢復。若此次仍然戰敗，恐怕日耳曼民族的極盛時代也就該過去了。從前法國自路易十三起，國運鼎盛，而因爲路易十四的窮兵黷武，窮奢極欲，以致國力虛耗，致有十八世紀七年戰爭的失敗，海外領土喪失殆盡，而引起大革命的危機。革命以後，又經拿破崙的一次浪費，民族精力遂消耗大部，法蘭西民族的光榮時代因此過去。幸以後布爾奔諸王及共和政府，均能自審國力，不輕於舉動，如人在暮年，能知節欲，故尙能維持門面，否則也難保不蹈西班牙的覆轍。德國之有俾斯麥，猶法國之有黎塞留；德國之有威廉第二，猶法國之有路易十四；德國今日之有希特勒，也猶法國當年之有拿破崙。拿破崙之後法國再無光榮；希特勒之後，德國的黃金時代也該過

去了罷！

德法兩民族在文化上的互詆

每一民族皆有自尊心，往往推尊自己文化而抹殺他人文化。在強盛的國家，此種現象尤爲普遍。我國在百年以前，國勢尙在盛時，故自視文化特高，而鄙視一切異族爲蠻夷戎狄。自鴉片戰爭以後，迭受挫折，始一變自尊心而爲媚外心理，一切文化、語言、起居、飲食乃至意識觀念均惟歐化是務，甚至頭髮不黃不曲，亦燙而黃之曲之，此種心理實爲民族自信力衰亡的徵兆。白色人種近數百年來方在興旺時代，故其人自視非常高傲，而鄙視有色人種爲不足與伍，白人與白人之間亦互相鄙視，各尊其自己民族而輕視他民族。如日耳曼人在百年以前尙羨慕法國文化，自視甚低，上流社會交際用法語，通信用法文，否則引爲恥辱。自經拿破崙第一的侵略後，始發憤自強，其大哲非希特公開演講，竭力推尊本國文化，並發揚日耳曼人的天賦使命，後集成「告德意志國民」一書，影響甚大。自此以後，「德國，德

國，高於一切』的國歌，遂深印於德人腦中。到國社黨執政後，更曲解種族學說，以日耳曼人爲天賦優秀，應有支配全世界的資格，更增加侵略的氣燄。此種心理不獨德人爲然，即英、法等國民亦何嘗不自視特高。英國人的高傲向來即著名於全世界，可不必論。法國民族雖受平等博愛思想的陶冶，對異族歧視的心理稍輕，但其自視法國文化爲優美，而鄙視他種文化，則與英、德等國初無二致。德法世讎，法人恨德最深，故在文化上也詆毀德國不遺餘力。第一次歐戰時，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曾在「時代雜誌」上發表一文，大罵日耳曼人是未開化的蠻族，此次歐戰起後，「時代雜誌」擬將該文重新刊布一回，並去函徵求柏氏同意，柏氏覆函不但同意，且附加說明，將日耳曼文化攻擊尤甚。以一代大哲學家其心胸的狹隘猶如此，可見歐洲民族自尊心是如何強烈了。法國人之所以能抵抗強敵者，即賴有此自尊心。中國自命心胸廣大的學者們聞之，必曰：柏格森沒有唸過「禮運」，不懂得「大道之行，天下爲公。」

文化與野蠻

世界上任何民族都喜歡自稱爲文化民族而鄙視他人爲野蠻，其實從有利於民族生存發展與否的實際觀點看來，文化未必是好，野蠻未必是壞。自有歷史以來，文化民族常被野蠻民族所征服，而文化民族很少有能征服野蠻民族者。埃及人爲黑克索斯蠻族所征服，古巴比倫人爲亞述人所征服，希臘人爲馬其頓人所征服，波斯人爲希臘人所征服，迦太基人爲羅馬人所征服，羅馬人又爲日耳曼人所征服，中國人則屢爲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洲所統治。印度文化甚古，但常受西北方面蠻族的侵入。現代法國的文化較久於德國，亦較爲優美，但常畏懼德人。可見文化在實際上不如野蠻，蓋文化一高，其人民卽流於奢侈淫樂，個人主義發達，心理上、生理上都因之較弱，失去抵抗力，故常爲新興的蠻人所征服。中國民族所以能維持久遠的壽命，並非靠文化，乃歷史上不斷地輸入蠻族的血液所致。中國人因文化甚高，故在思想上常善談和平忍讓，在體質上也日漸纖弱，這都是一種文化病。今後

欲復興國家，必須先從培植一批野蠻人入手。

希特勒的成功秘訣

希特勒以一個毫無憑藉的流浪者，赤手空拳奮鬥十餘年，居然取得政權，且做出許多轟轟烈烈的事業，無論將來成敗如何，固不失爲一世之雄也。其所以成功的秘訣，具見於「我的奮鬥」一書，約略言之，不外以下幾點：第一，充滿戰鬥精神，在任何場合皆採取攻勢，其對內鬪爭如此，即此次對外作戰方略也仍然如此。第二，對民衆宣傳，祇用很簡單的幾個口號，反覆重說，深得羣衆心理的奧妙。第三，主張和行動極端化，能喚起民衆的熱狂，尤能將左派青年爭取過來。第四，對外不擇手段，但對內則言必信，行必果，並不欺騙民衆。第五，對於知識階級並不重視，而以青年及流氓爲黨的主要分子。希特勒對於大學教授一流的文化人極端看不起，因爲這班人祇能坐而談，不能起而行之故。

英國的誤國首相

德國之有今日，人都說是張伯倫應負責任，平心而論，張伯倫對德政策，雖未免失之軟弱，但實際上在張氏執政以前，英國的實力已遠遜於德。德軍侵佔捷克以後，據聞張氏曾召集軍事當局，詢以能戰與否，及知國防實力羸弱，始不得已忍辱求和，而有慕尼黑協定之成立。可見應負責者，不止張氏一人。我以為英國首相中最應負誤國責任者，莫過於工黨領袖麥唐納氏，當其一九二四年第一次任首相時，誤信和平主義，實行縮軍，甚至將新嘉坡築軍港的計劃停頓。一九二九年第二次組閣以後，雖鑒於遠東風潮險惡，稍稍注意於國防問題，新嘉坡的軍港終於在他任內完成，但自他於一九三一年背棄了工黨的同志和政策，與保守、自由兩黨組織所謂國民統一內閣後，即變成保守黨的傀儡。九一八事變，他聽任西門外相執行向侵略者屈服的政策，不肯與史汀生合作，制止暴日，以致釀成以後法西斯國家強暴的惡潮。一九二九到三三年，正是世界經濟風潮的危險年頭，德國因為受經濟風潮的

影響，內政不安，才促成了希特勒的上臺。假使麥氏當時眼光稍爲遠大，對於德國內部的反法西斯勢力能稍稍加以扶植，希特勒也不會有上臺的可能。所以麥唐納才是英國首相中的第一個誤國者。

英法對德政策的失敗

希特勒自登臺以後，片面撕毀條約，任意侵犯隣國，所向如意，並非希氏真有過人之才，不過他的運氣好，碰到了當時英法兩國的政權都在一般優柔寡斷的紳士之手而已。當希氏撕毀凡爾賽條約向萊因進兵時，英、法兩國即應斷然出兵干涉，彼時德國武裝尙未完成，必不敢作戰，結果可將希特勒的野心頂回去。乃英、法當局，優柔不決，結果使希氏赤手空拳獲得勝利，此爲第一次的失敗。其後西班牙內戰時，蘇聯既已出頭贊助西班牙人民陣線政府，英法若趁此機會，與蘇聯拉一手，公開對德義加以壓迫，則西班牙不至完全陷於法西斯黨手中，法國今日的地位也比較好些，此爲第二次失敗。慕尼黑協定才是第三次失敗。法國路易勃魯姆的人民陣

線政府，當時完全注意內政，對國防及國際問題不肯積極，其誤國之罪不下於英國的工黨。

二十世紀歐洲無大政治家

以上係就近年來英法兩國的錯誤政策說，若再推遠一點說，則可以歸咎於二十世紀的歐洲——特別是英法兩國——無眼光遠大的政治家。當十九世紀初年拿破崙失敗以後，戰勝各國中如俄、如普，頗存對法國報復的心理，幸當時奧相梅特涅眼光遠大，力勸俄皇亞歷山大以維持各國正統派政府爲重，對於布爾奔王朝復辟後的法國勿予壓迫，以免激起革命風潮，結果俄皇同意梅氏的政策，在維也納會議中對法國採取一視同仁態度，不割地，不賠款，因此法國雖經戰敗，不懷怨恨。自一八一五年後，歐洲各大國間維持和平狀態至四十年之久，直至一八五六年始有克里米戰爭，其間之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兩次革命，則均屬各國內亂問題，並非國際戰爭性質。梅特涅的反動政策雖爲後來自由主義者所痛詆，但就梅氏的立場論，其政策

不爲不合理。一九一八年歐戰以後，英法等民主國家，若有眼光遠大如梅特涅的政治家，對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政府不提出種種嚴酷的條件，甚或加以經濟上的援助，則不至迫使德國走入法西斯主義的極端路線上，歐洲和平雖至今維持可也。昔俾斯麥在一八六六年戰勝奧國以後，普王與各將領主張直搗維也納，俾斯麥再三勸阻，以至痛哭流涕，終於保全奧國體面，德奧不久復爲盟友。普法戰爭以後，俾氏也主張不割法國寸土，但拗不過軍人的要求，終於結成德法的深仇。一九一九年凡爾賽會議中，路易喬治、克里蒙梭輩，不能如梅特涅、俾斯麥的眼光遠大，逞一時的意氣，對德國備加束縛，始有今日之禍。戰後德國的猶太政治家賴提璠氏是主張德法親善的第一個大政治家，不幸不爲國人所諒，被刺身死。其後法國的白里安和德國的斯特萊斯曼雖力主恢復德法親交，但嫌怨已深，終難挽救了。此次戰爭英法如能獲得最後勝利，兩國的政治家總該鑒於已往的覆轍，執行一種對戰敗國比較寬大的政策吧。

巴黎之陷落

據電訊所傳，德軍侵入巴黎已爲第四次。按之歷史，一八一三年普魯士乘拿破崙征俄潰敗以後，發動民族解放戰爭，在利比瑟戰勝法軍，布魯協將軍率軍進入巴黎，此爲第一次。次年，拿破崙從厄爾巴島逃回，復興兵戈，與英普聯軍大戰於滑鐵盧，失敗之後，聯軍又入巴黎，此爲第二次。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爲第三次。惟以前三次均無此次之迅速，法軍放棄巴黎，傳聞係徇議員及市民要求，保全文物，不失爲一個大國風度，與一八七一年巴黎之圍，抵抗至百日之久，彈盡糧絕始投降者，作風又自不同。但風度愈優雅，愈表現民族精神之窳弱，巴黎之暖風早已將法國民族吹得骨醉神酥矣，以馬奇諾防線之鞏固，竟不能保首都之安全，可見有國者不可恃險！

歐局的解鈴人

自歐戰展開以來，蘇聯的態度始終是一個謎，日前忽宣傳立陶宛境內有傷害蘇

軍之舉，立總理被迫赴莫斯科談判，吾人當時即知其中必另有內幕。立陶宛是何等國家，豈敢於這個時候傷害蘇聯；德國國社黨縱使強暴，又豈肯於此時得罪蘇聯，可見此事件的製造者必另有其人。果然，立總理赴蘇以後，舉世久不聞其消息，忽於十五日電傳，立政府已接受蘇聯要求，准許蘇聯佔領立國領土及駐紮足額軍隊，蘇軍已於十五日晨三時佔領立京及考那斯、維爾那等地。蘇聯此舉其意何在？不難測知。希特勒若是聰明人，應趕快於巴黎佔領之後，對法進行寬大的和議，否則恐螳螂捕蟬，黃雀已伺其後，難免有後悔莫及之一日。此次歐戰的促成，德蘇協定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斯達林之意，本想學卞莊子刺雙虎的策略，令德國與英法長期相持，兩敗俱傷，然後起而兩乘其敝。不想德國這隻老虎太煞兇猛，英法那兩隻老虎又未免有點驢蒙虎皮，大戰不過兩月，巴黎已經陷落，斯達林若再按兵不動，難道真相信希特勒的友誼嗎？所以我想蘇軍佔領立陶宛以後，無論是否逕行參戰，總要牽制德國一部分兵力，對西歐戰局顯有重大影響。現在舉世注目於美國的態度，其實美國太遠了，又太持重了，對於這樣閃電的局勢，一時夠不上說影響。解

鈴還是繫鈴人，真正的關鍵，是握在蘇聯手裏，不過也許已經遲了一點。

所謂天然願望

義大利此次興兵，以天然願望爲號召，所謂天然願望，按之法國名女記者塔布衣夫人的計算，幾乎包括地中海全部，其野心實在不小。按天然願望之界說並無一定，可隨意伸縮，與日本所謂大和民族的生命線及東亞新秩序之說，同爲侵略者一種便宜的口號。人類的貪慾豈有止境，任何民族皆可天然願望，充其量雖征服整個地球亦難滿足。義大利以繼承古羅馬帝國自命，羅馬極盛時代，大不列顛及高盧等地均爲其勢力範圍，若根據此項歷史理由，則英法兩國都應併入義國版圖，始能滿足義之天然願望。但此種歷史理由，各國都能找出，法國人若根據查理曼帝國之版圖，則其天然願望爲英、德、義及整個西歐都須歸其統治，天下豈有此理。若根據地理的理由，謂義大利爲地中海國家，故地中海應當歸其掌握，則地中海沿岸之國家甚多，如希臘爲較羅馬更古的地中海國家，埃及民族之活動於地中海更在任何

民族之前，應先讓此兩民族要求地中海之權利，然後義大利才有發言權。

作於民國二十九年

附錄二

從春秋到戰國

好多年以來，就有許多人說，今天的時代是「新戰國時代」，或「大戰國時代」，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人。現在看看歐洲的政治局勢，看看地中海國家如義大利、希臘等國的遭遇，看看波羅的海三小國及波蘭、芬蘭等國的遭遇，真覺得令人對於戰後和平的局面有點不寒而慄。一切的中國人，都應當澈底覺悟，今後的世界不是幻想所能安慰的了，國際的局面是現實而又現實的，鐵與血仍是今後世界的支配者，而且比十九世紀更要激烈。

站在新戰國時代的二十世紀，不由得回想到二千年前我們的舊戰國，『以古爲鑒，可知成敗，』所以今天來談談「從春秋到戰國」。

春秋時代正和十六、七世紀的歐洲一樣，是一個封建社會崩潰的時代，當時的

大國有十四個，卽魯、衛、齊、晉、鄭、宋、曹、許、秦、楚、陳、蔡、吳、越，除了吳越是後起的強國以外，實際上頭等的強國只有四個，卽晉、楚、齊、秦。講文化，魯國最高；講地位，鄭宋最爲衝要。在春秋初年，領袖的國家是齊、魯、鄭三國，但到了後來，除了齊國以外，其餘兩國都變成了衰弱的國家，而反倒使比較文化落後的秦晉等國發展起來。爲什麼呢？主要的原因大約有兩點，第一點是晉、楚、齊、秦四大國恰好分佔了東西南北四個邊區，四面都是些蠻夷或小國，容易擴張領土。齊國吞併過十國（紀、邾、鄆、譚、遂、鄆、陽、萊、介根、介、牟），晉國吞併過二十二國（韓、耿、霍、魏、虢、虞、荀、賈、楊、焦、邢、滑、梁、沈、姒、蓐、黃、郟、原、樊、冀、潁），楚國吞併過四十二國（權、邢、鄭、穀、羅、廬、戎、郟、鄆、貳、軫、絞、州、蓼、息、鄧、申、呂、弦、黃、夔、江、六、蓼、麋、宗、巢、庸、道、柏、房、沈、蔣、舒蓼、舒庸、舒鳩、賴、唐、頓、胡、蠻氏、陳），秦除將周朝在陝右之地盡行佔領以外，並且滅了戎族的國家二十個。這四個大國既因地勢上佔便宜的關係，能夠盡量擴張領土而不受限制，

所以越強越大，越大也就越強。其餘中原的國家如鄭、宋等國，最初也未嘗不想向四面發展勢力，無奈四圍都是些勢均力敵而且文化較高的國家，不容易放手吞併，所以久而久之就相形見絀起來。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理由，因為地勢的理由祇足以說明鄭、宋等國之所以不能強，却不能夠解釋魯國之所以也不能強。魯國與齊國同處山東半島，一北一南，地勢相似，向北雖有齊國的障礙，不能發展，但向南去便是今日江蘇、安徽的北部，在當時都是淮夷、徐、戎等蠻夷之國，未始不可供其發展，事實上魯國也曾吞併過九個國家（極、項、鄆、郟、根牟、向、須句、鄆、郟），和齊國差不多，爲什麼齊國日強一日，而魯國則日弱一日呢？所以主要的理由還是在第二點，那些積弱的國家如魯、衛、鄭、宋等，都是保存封建社會貴族政治的傳統形式而不能加以改革的，晉、楚、齊、秦四大國之所以強，就在其能夠比較地消除封建貴族的政治社會力量，而率先採用尊主權、擢賢能、樹法紀、明賞罰的法家政治的精神。除了楚國以外，齊、晉、秦三國在春秋時代就不曾大用同姓貴族來把持政治。齊國的世卿是高國兩異姓，但這兩家都不能把持齊國的政治。齊桓

公相管仲、鮑叔牙、甯戚諸人以致霸，都是出自微賤，並非高等的貴族。管子一書雖爲戰國時代的齊人所依託，但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見於國語、左傳，應該不是後人假造的，所以齊國是首先一個打破貴族軍隊制而實行全民徵兵制的國家，齊之所以強卽以此。晉自桓叔以貴族侵吞宗國，至孫武公滅晉而篡立以後，歷代都疎忌宗室，獻公盡殺諸公子，惠公用呂、卻，文公用狐、趙，都是從異姓的賢才中擢取卿士，而絕不用同姓貴族，晉之公子年長就須出仕於他國，不許在本國盤據，晉之所以強大卽在於此。晉文公作被廬之法，是以法治代禮治的先聲，後來戰國時代的法家兵家多出於三晉，未始不是因爲晉人的法治思想早已見於實際之故。楚國雖然是同姓貴族輔政，但君主的權力很大，能夠生殺自如，得臣和子反都是楚國的令尹，但楚王一怒就可以置之死地，可想見其貴族力量並不甚強。秦也是以用異姓人才而強國的，秦穆公用蹇叔、百里奚、由余而稱霸，百里奚是虞人，由余是戎人，可見春秋時代的秦國已多用客卿了。這種反封建貴族而尊主明法的政治趨勢，到春秋末年而益顯著。區區之鄭，以子產爲相，能立法紀，鑄刑書，以猛爲治，雖受當時

保守派貴族如晉叔向的譏評，及國人的譏罵憤慨，而卒使鄭國的國際地位一時提高。當時社會上也有鄧析等學者，鼓吹法家的思想，開戰國法家的先路。可惜子產死後，鄭國的君相不能繼續這種政策，又讓反動的封建貴族勢力復活，終致自弱。吳、越兩國以後起的新興民族，登用異國的人才（狐庸、伍員、文種、范蠡都是楚人，而見用於吳越），實行富國強兵的政治、軍事、經濟政策，一掃春秋時代的積習，所以能以東南而爭衡天下。我們讀吳越春秋、絕越書及國語所紀越王勾踐復讎圖霸的一切設施，就很明白戰國的局面從此時起已開始了。

孔子生於春秋末年，雖然很想挽回這種封建社會的頹勢，而慨歎於「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然而實際上却是「齊一變，至於強；魯一變，至於弱。」時代的潮流，是向推翻封建秩序（以禮教爲代表）的法家思想去演進，而不是向恢復封建秩序的儒家理想去演進。他老人家和後來的儒家，儘管栖栖皇皇，舌敝唇焦，終久不能挽回這種社會革命的趨勢。完成新社會的建設者是商鞅、李斯一輩的法家，而並不是敦詩書、說禮樂的儒家。

民國三十二年作，未發表

附錄三

事業心與生命向上創造

——勉有志赴西康服務的青年

西康在目前的地地位是抗戰的大後方，但同時我們也不可忽略西康也是國防的最前線。無論就目前抗戰計，或就將來建國計，建設新西康都是急不容緩的一件要務。在目前抗戰的艱鉅環境下以及西康比較其他腹地各省所特有的社會、經濟、宗教、種族種種困難的條件之下，每一個有志服務邊區的青年，更應該警覺自己的責任，明瞭建設新西康的主要意義和自己所應擔負的任務。

我們知道，在一個邊遠省分內服務和在普通省分中服務的，其任務之難易大不相同。平常在內地各省服務的人，只要能明瞭國家的法令並具有忠實機敏的執行才幹，就足以勝任，但是像在西康這樣一個新建的省分中去服務，就覺得祇靠這些還

不夠。因爲這裏是一個廣大的未開發區域，一方面是天然的條件非常優厚，可資我們開發之處甚多；一方面却是人力物力的開發尙未至相當程度，使我們的工作感受許多限制。因此，在這樣一個省分服務的人，不但須具有行政的才幹和智識，並且需要一種事業家的精神。大家到西康去爲的是辦事，不是爲的作官。我們知道外國之所以強盛，就因爲人家有事業心的人很多，中國過去之所以衰亂，就因爲大多數人都存有作官不作事的心理，以認真作事爲愚傻，以作官不作事爲聰明。作官與作事之分，在乎作官者其目的在享受，作事者其目的在創造。有事業心的人，其人生觀是動的，創造的，周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便是事業家的精神。因此事業家不是沒有享受，是要從血汗勞動中，從艱難奮鬥中，從冒險進取中，獲得人生的真趣味。至於那些抱祇作官不作事的人生觀的人，他們所要求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以爲這樣才算安逸，才算人生幸福。殊不知人生人生，人就是活的，身體和精神都需要時時活動，斷無靜而不動之理。以作官爲目的的人，他們的身體精神仍然不能沒有活動，不過活動到不正當的娛樂上去，天天在

吃喝嫖賭場中去尋求生命的活動，結果不但對社會國家有損，即對自己也是有損無益。我們看外國人尋求娛樂的方法便不是如此。有許多人安安穩穩坐在家裏不舒服，偏要冒險駕飛機橫渡大西洋，或者到南極、北極去探險。我們中國人看了這些必然笑他們太傻了，但是天下有許多事業偏是這些傻子才幹得出來。試看白種人的殖民地何以遍於五大洲？科學的發明何以征服到天空？到海底？還不是因為當初有許多傻子肯幹傻事，肯無所爲而爲的去尋求生命的叛逆活動。國家有了這許多抱事業心的人，國家前途才有希望。

生命的奧秘是無人能夠說明的，但有一件事是人人都是可以承認的，就是生命必須是「動進」的，生命便是動，沒有動便沒有生命。法國最近逝世的哲學家柏格森，他的哲學便叫做生命哲學，他把生命的進化比作一道水流，又比作一堆烟火，生命在地球上最初出現的時候是極微細的，但演化的結果愈變愈複雜，竟變化出千門萬類，好比新年放烟火一樣，其根柢只在一股衝動的力量。有這種生命力或「生之衝動」的人，就是事業心極強的人，他決不能安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生

活，他必須尋求衝動以滿足生之欲望，只有生命力已經衰弱的人，才祇望安逸，不求勞動，這是老人的心理，一個民族若欲競存於今日的世界，必須竭力排斥惡勞就逸的老人苟安心理，而鼓勵發揚蹈厲的少年進取精神，才能把老大的民族變成少壯的民族。

衝動當然也有好的，有壞的，英國的哲學家羅素把生之衝動分作兩種：一種是「創造的衝動」，一種是「佔有的衝動」。一個事業家必須富有「創造衝動」的精神。一個社會中有創造衝動的人佔多數，則社會凡百事業必能向上發達；有佔有衝動的人或根本即缺乏生命力的人居多，則社會事業不歸停滯，必歸紛亂。因為創造衝動是要從無中去生有，從日新又新中去開拓新生命的境界，目光瞻望將來而不依戀過去，因此才能對世界有真的貢獻，也可以說是替世界添了許多新東西。若是創造的人少而佔有或根本無所用心的人太多，則世界上只有停滯而無創新，並且越消磨越少，這樣的世界便不是向上的世界，而是向下的世界。

關於生命向上創造的原理，不但是西洋近代哲學的新貢獻，也是中國文化的中

心思想。一部周易講的都是生生不息的道理，中國歷史上的聖人，如有巢、燧人、伏羲、神農、黃帝等，都是能夠發揮創造本領的人。易繫辭上說：『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開物成務便是創造，便是有事業心，便是全民族所需要的英雄。易繫辭又說：『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每一個有事業心的人，都應該以此爲其格言。

西康在目前還是一個邊省，因爲是邊省，所以物質的條件不夠，容易使人畏難而却步；也正因爲是邊省，所以待開發之處甚多，有生命創造力、有事業心的人，大有發展事業的餘地。因此我希望凡是到西康去服務的人，都應該把作官的念頭轉化成作事的念頭，立定志向，在整個建設計劃之下，本筆路檻襍以啓山林的精神，來胼手胝足用一滴汗一滴血去創造新的西康。特別是在抗戰的今日，西康已由邊遠的省分變作民族復興的後方根據地，我們有志前往服務的青年們，應該不論職位高低，各人謹守着自己的崗位，把自己的使命擔負起來，發揮我們創造的本能，向着建設新西康的大目的前進！

附錄四

民主是什麼？

民主是什麼？民主不是那一個黨的主義，不是那一個教的教條，不是一種主觀的信仰。民主祇是一種態度，是各色各樣主義的折衷，是各種各式教條的協和，是各黨各派的信仰的互讓，互認。民主主義者不相信世界上唯一的真理，而相信世界上存在着多種多樣的真理。因此，在承認自己所信仰的真理以外，也同樣尊重他人的信仰，他們的真理。只有在各種各樣真理的相互尊重諒解之下，民主精神才能夠充分發揚光大起來。

這個態度的養成不是容易的，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流了無數次的血，打了無數次毫無結果的戰爭，才使一切狂熱的人獲得了這一點點寶貴的經驗。但是直到如今，有許多人類還在執持自己所相信以為唯一的真理，而不惜對於不同的意見、信仰加

以迫害、殺戮、禁錮，民主精神的發揚仍待多數人的努力。

在歐洲，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畢達哥拉斯和蘇格拉底，就曾因為意見的不同而被當時的人放逐，或逼死。中古以來，在宗教的權威之下，曾迫害了無數意見不同的人。基督教徒打回教徒，回教徒打基督教徒，舊教徒打新教徒，新教徒打舊教徒，什麼十字軍戰爭，什麼三十年宗教戰爭，什麼異端裁判所，都是愚昧的人類所演出的一些把戲。到了近代，宗教的熱狂過去了，又換了主義的熱狂，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斷頭臺，神聖同盟的醜劇，猶太人的被迫害，和現在世界上的布爾什維克、法西斯狂飢，都在證明今天的人類並不比石器時代進化許多。

「容忍」是民主精神的唯一的武器，一個懷抱民主精神的人必然可以對一切的不同意見加以容忍，即使是正和自己反對的意見。民主主義者口裏沒有「反動」或「反革命」這一類的咒語，動輒拿「反動分子」的大帽子威脅人的，根本就還不會了解民主。

在現代的中國，有許多人還待努力學習容忍，能夠充分學到了容忍他人，民主精神在中國就成功了。

附錄五

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的理由

近來蘇俄仇友的問題，討論的人很多，我不是學政治、學經濟的，對於蘇俄的實在情況又未研究過，本不想說什麼話。只是看了關於此問題的許多話以後，覺得仍有一點爲大家所未討論及的問題，我因此不避淺陋，提牠出來。

我覺得關於蘇俄的問題應當分作好幾個部分去看。我們是否贊同廣義的共產主義（或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問題；是否贊同馬克司派共產主義又是一個問題；是否贊同過激派所依託的馬克司共產主義又是一個問題；贊同過激派的共產主義而是否即欲適用於此時之中國又是一個問題；如欲適用於中國是否完全模倣蘇俄的運動方法又是一個問題；蘇俄可聯與否又是一個問題；蘇俄的金錢可受與否又是一個問題；外蒙是否可任其聯俄又是一個問題；外蒙應否有自治權又是一個問題……像這些問題分析起來，很多很多，幾天也說不完。（不知徐志摩先生討厭這樣的分析不討

厭？)

我雖然對於共產主義不曾詳細研究過，但憑常識的判斷我是很表同情於廣義的共產主義的。便是馬克司派的共產主義我也有許多同意之點，尤其喜歡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運動方法和精神。我同情於吳稚暉先生的話：「俄國之社會主義僞者也，真正之社會主義國將起於馬克司之故鄉。」我爲什麼相信俄國的馬克司派是依託的？馬克司明明主張工業越發達之國家距社會主義之實現越近，而俄之過激派是乃專門傳佈其主義於工業落後之國家，即此一點，已可證其非馬克司之嫡系了。但此處我不過證明列寧之非馬克司嫡系，至於二說孰長，猶待討論。不過以列寧之不得不讓步，採取新經濟政策看之，可見工業落後之國家決無實現真正共產社會之可能，有之則僞共產之官僚主義耳。

關於這個問題，不是此時我欲討論的，姑且不講。我只說我認爲蘇俄共產主義對於中國最不適宜而且最危險之一點。這一點是什麼呢？便是蘇俄式的少數專制政策。現今蘇俄之政治不但非出於全體國民之公意，抑且非出於全體勞農階級之同意

，不過少數共產黨專斷之政治耳。即此一點而論，姑無論其政府領袖之人格如何，政策之是非如何，已爲吾儕篤信民主主義之人所絕對不能承認。蘇俄共產主義者假共產之名行專制之實，與中古教皇假宗教之名行專制之實，其爲害相同，人之迷信之不以爲非也相同。羅素謂馬克司派爲新興之宗教，誠然。今之蘇俄猶穆罕默德之回教大帝國，即欲以其盲目之信仰征服世界者也。吾儕渴望自由之人對於此種宗教式之主義非反對不可。

假使此主義實行於宗教信仰素強之國家（如俄羅斯），雖不免有違反自由與人道之處，然猶以真誠純潔之精神行之，尙屬可敬（其實即在俄國已有多數弊端，請閱醒獅五十四期即知）；假使此主義而行於宗教信仰心極薄、專制餘毒極深、官僚政治色彩極重之國家如我中國者，我敢言其所生之弊惡尤百十倍於他國。蓋有此主義之後，在上之秦始皇、明太祖輩即可假之以維持其獨斷政體，在中之王治馨、陸建章輩又可假之以實行其官僚政治，可憐之農工固已日爲人所假而不知，少數有爲之青年又惑於主義而不生反抗之心，於是共產政府遂可維持其獨裁至於千百年。此

種政治，吾中華國民在一千九百年以前之王莽時代已備嘗之矣。可惜張作霖、吳佩孚輩畢竟頭腦簡單，不知利用此種頭銜，否則青年早已歌頌其獨裁政治之聖明矣。

天下大政治家之成功，往往在善於播弄名詞，以朝三暮四之術，玩民衆於股上。譬如『開明專制』人所懷疑者也，自有大政治家改爲『訓政』，便大多數人從而恭維之矣；又如『賢人政治』亦人所懷疑者也，自有大政治家改爲『以黨治國』，便又有多人從而附和之矣。其實此種『訓政』，此種『以黨治國』之方法，吾儕早已領略過了，謂予不信，請看模範省的模範督軍他的村範政治，非訓政而何？他的排斥異己非黨治而何？其結果亦不過造出大大小小若干委員區長之飯碗，多向老百姓身上刮幾個錢耳。此種小官僚決不會到孫中山執政以後便一變而爲眞了解三民主義者，更不會到列寧執政以後便眞成共產主義之信徒。

所以我說蘇俄之最可怕者，卽在以其專制之榜樣暗示於青年，使青年有爲之士不從坦蕩蕩的民治大路走，而迷信使武力萬能排斥異己之黨化政治，不但不爲專制主義之敵，反變成專制主義之擁護者，其結果則促進民族之死亡而已。

我嘗謂歐戰以後世界上有兩種反動的大潮流，一是反對物質文明的復古主義，二是反對民治政體的專制主義。此兩種潮流實爲人類之大敵，歐洲人苟迷信此種潮流，盡棄其十七世紀以來努力之結果，反向回頭路上走，則白種人必滅亡。然我信白種人絕不若是之愚，倒是退步的黃種人有點危險耳。我相信惟有物質文明與民治主義這兩條大道是人類的公路，中國人其毋走向歧途！

編者按：本文載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晨報副刊一三〇六號，後收入「聯俄與仇俄問題討論集」上冊，十六年二月北新書局出版。